ISSN 3080-3039
eISSN 3080-3047

中国现代教育学报

Journal of Modern Educational Studies in China

维普数据库全文收录
国际中文学术期刊数据库ICAJD 收录期刊
中国国际中文期刊卓越行动计划 建设期刊

Modern Education

HKHS 香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 HONG K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WISVORA

主办：广东国图出版管理有限公司

2025
第1卷第4期
4

中国现代教育学报

Journal of Modern Educational Studies in China

主管　香港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

主办　广东国图出版管理有限公司

编辑出版　《中国现代教育学报》编辑部

编辑部邮箱　jyxb@wisvora.com

投稿地址　www.wisvora.com

中国国际中文期刊卓越行动计划 建设期刊

国际中文学术期刊数据库ICAJD 收录期刊

总编辑　梅见华

编辑委员会

陈科存	孙文杰	苏天	穆艾伟	熊森浩
刘伟伟	吕憬岩	黄少安	刘宇	叶明裕
陈曦	景瑞宾	崔健	王正威	李泽宇
姚金芳	李明蔚	吴钰双	穆尚海	曹一君
陈立立	舒波	袁臣辉	郝澳茹	

版权声明

文章版权由文章作者与维思沃尔版社(WISVORA Publishing)所有。单篇文章由 WISVORA Publishing 正式出版，所刊载文章均依照 Creative Commons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CC BY 4.0）进行许可。根据该许可协议，任何第三方在明确署名原作者与出处的前提下，均可对本刊内容进行复制、传播、演绎使用，无需作者及出版社另行个别授权。

香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
HONG K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香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专注于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与交流，旨在为学者提供研究支持，并促进知识的共享与应用。研究院通过出版学术期刊、举办学术会议及提供政策建议，推动学术界与社会各界的对话与合作。

网址：www.hks.ac.cn 邮箱：info@hks.ac.cn

维普数据库
全文收录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印刷出版 ISSN 3080-3039
电子出版 ISSN 3080-3047

出版社 WISVORA Publishing
维思沃尔出版社

地址 香港新蒲岗景福街99号启德工业大厦8楼007

wisvora-publishing@wisvora.com

www.wisvora.com

中国大陆引进
北京中科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大陆发行
广东国图出版管理有限公司

WISVORA
Publishing

微信扫一扫

维思沃尔出版

《中国现代教育学报》2025 年第 1 卷第 4 期
Journal of Modern Educational Studies in China Vol. 1 No. 4,2025

目 录 TABLE OF CONTENTS

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现状调查研究——以湖北省武汉市 Z 校为例 - 张娅 ……1-8

“黑神话：悟空”为载体的中学英语教学与中华文化传播研究 - 李嘉 ……9-14

追逐云彩的光辉，做未来科学家的守卫者——《摇篮里的科学家》书评 - 杨晓岚，俞雪琴 ……15-19

大学生户外运动热潮中的消费景观与生活实践 - 赵海呈，杨晨飞，但懿 ……20-24

习近平总书记致第九次少代会贺信的内涵阐释、时代机理及实践进路 - 许彤，刘衡宇…25-30

诗意之议：百年新诗教育的若干矛盾说略 - 高若栋…… 31-36

深度融合虚拟仿真的公共管理学科教学改革：理论构建与实践路径 - 丁惠炯，方朝华，李霞 ……37-42

U-S 协同视域下《小学生心理辅导》课程的实施困境与优化措施 - 刘丽，孙思洁……43-48

高校美育中非遗技艺传承的文化资本转化路径研究 - 方梦麟，徐炜琳，黄燕兴 ……49-54

高校开放式马匹违禁物质检测实验室的管理探索 - 石继龙，曹鹏，龙围，谭荣 ……55-59

情绪经济视角下的数字媒体艺术短视频创作：共情叙事与情绪操控机制分析 - 田霖 ……60-64

文化双创背景下博物馆研学旅行赋能美育教育的实践路径研究 - 陈矿，徐锦博 ……65-70

运动认知视角下初中生体育学科自我概念的培养路径研究 - 汤悦 ……71-74

“以学习为中心”教学范式在《学前儿童发展科学》中的实施策略与成效探究 - 孙思洁，刘丽，杨颜珲，张文莉 ……75-80

消防救援领域四字格翻译错误归因及对策——基于语料库的分析 - 刘灵灵，王莉 ……81-86

识别乡村旅游发展的建筑标准——基于传统村落建筑与保护的 LDA 分析 - 葛文君……87-93

环境设计对儿童的艺术疗愈价值与应用研究——以幼儿园环境设计为例 - 田成龙，黄艳华 ……94-98

星火大模型赋能高职商科教师专业发展的路径研究 - 韩峰，李荔，辛田静 ……99-104

成都工业遗产的价值 - 郑毅凡，张程 …… 105-114

地域叙事与影像工业：厦门电影文化产业的历史嬗变 - 毛思宇 …… 115-121

基于 CIPP 模型的大学英语课程思政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 丁建华 ……121-127

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藏中国佛教造像碑概述 - 王颖 ……128-132

《觉醒》中的隐含作者 - 曹斐 …… 133-137

网络思政融入高校就业指导工作的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 - 武亮亮 …… 138-142

高校行政人员数智素养培训体系的优化路径研究 - 樊梅 蒋宝晴 唐瑛 陈逸璇 …… 143-146

政产学研用融合育人促进高职学生主体性发展研究 - 王夏 …… 147-152

新文科视域下基于非遗活态传承的《微纪录片工作坊》课程改革与实践 - 刘冬，龙海鸣 ……153-158

多模态大模型赋能高校思政教育的比较与路径 - 陈佳琪，柯宇曦 …… 159-164

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现状调查研究

——以湖北省武汉市 Z 校为例

张娅

（中南民族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世界格局加速演进，大众传媒迅猛发展，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与纷繁冗杂的价值观念不断对爱国主义教育提出新要求新挑战。大学生是在高校接受系统性高层次教育的关键人才，是青年中的精英，其发展关乎国家进步、民族未来。深化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既回应现实需求，又具有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价值和政治意义。本研究选取民族院校 Z 校展开调查，整体结果呈现爱国情感深，教育效果好的状态，但也有知识背景欠缺、意志不够坚定、行为转化困难等不足，有必要从更新课堂教学、深化仪式教育、营造爱国氛围、加强实践锻炼、贯彻爱国法规等维度出发，提升大学生的爱国的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表达，使其成长为社会主义时代新人。

关键词：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知情意行；仪式教育；思想政治教育

DOI：doi.org/10.70693/jyxb.v1i4.106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patriotic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Taking Wuhan Z School in Hube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ZHANG Ya[1]

[1] College of Education, South-Central Minzu University,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With the accelerated evolution of the world pattern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ass media, various diverse values have emerged. The conflicts in the ideological field are still very severe, constantly putting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and challenges for patriotic education. College students are key talents who receive systematic and high-leve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and they are the elite among the youth. Their development is closely related to national progress and the future of the nation. Deepening patriotic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is not only a response to practical needs, but also has security value and polit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ideological field. This study conducted a survey at Z University, a Minzu University, and the overall results show deep patriotic emotions and effective educational outcomes. However, there are also shortcomings such as lack of knowledge background, lack of firm will, and difficulties in behavior transform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start from dimensions such as updating classroom teaching, deepening ceremonial education, creating a patriotic atmosphere, strengthening practical exercises, and implementing patriotic laws and regulations to enhance college students' cognitive, emotional, volitional, and behavioral expressions of patriotism, enabling them to grow into new socialist-era individuals.

Keywords:college students; patriotic education; knowledge, affection, action; ceremonial educ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作者简介：张娅(2000—)，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学校管理学；
通讯作者：张娅

一、问题的提出

爱国主义是支撑中华民族绵延千年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爱国主义教育具有情感传递和行为激发的功能。青年是民族的未来，大学生是青年中的精英，肩负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重任，他们对祖国的情感状态反映了党的思想教育在高校的落实情况，也直接影响到民族和国家的未来发展与社会稳定。从古至今，横贯中西，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备受统治者关注。儒家思想提倡的“仁爱”、“君臣”、“忠诚”与“孝道”奠基中华五千年的爱国传统，民国学生提出“兴中华”、“以国为家”等口号并成为“五四运动”前期主力军。做出类拔萃的爱国者是美国对大学生的基本要求；[1]韩国将“国民精神”教育置于大学生教育的突出位置；[2]俄罗斯颁布《青少年公民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纲领》专管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当前，世界格局加速演进，大众传媒迅猛发展，纷繁冗杂的价值观念不断冲击青年大学生的价值观念，急需爱国主义教育掌舵领航。2023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的颁布是对宪法中“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精神的具体化，是学校实施爱国主义教育的行动纲领，发挥着重要的规范和引领作用。在此背景下，聚焦青年人的爱国问题，规范高校爱国主义教育是顺应时代潮流、把握时代脉搏的应有举措，创建具有历史性、多样性、情感性、规范性、多渠道的爱国主义教育成为重要的时代命题。

二、文献综述

自古以来，爱国主义作为一种关乎民族认同、国家安全的情感，始终受到统治阶级的重点关注。大学生作为未来的社会主力军聚集在为其发展精心设计的学校环境之中。学校因其特有的文化教育功能，肩负着传播阶级思想、凝聚爱国共识的政治使命。站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节点上，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更具有安全价值和政治意义。

（一）关于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重要性的研究

中华泱泱大国，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始终备受关注。无论是历史与现实层面，还是在个体成长、文化传承、社会稳定、国家发展等多个维度，青年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历史层面上，爱国主义教育是发扬优良传统、弘扬历史文化的主渠道。爱国是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高级情感，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到民族独立再到爱党爱社会主义，经历了长期丰富的历史时期[3]。新时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应该接续历史传统，发扬优良传统，推动国家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民族精神与历史文化在长期积淀中实现价值升华，又在爱国主义教育等时代传承中得到价值凝聚。当前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应该顺应历史潮流，厚植文化底蕴，传承民族精神。

现实层面上，爱国是个人成长、社会发展、国家富强的强大精神力量。爱国主义教育是培养大学生成为时代新人的主渠道。思想意识决定个体社会服务的方向与态度，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4]，这就需要大学生从爱国主义教育中汲取养分，端正价值观念，知国史、懂国情，涵养爱国心、强国志，才能真正成为勇担民族大任的时代新人。爱国主义是践行核心价值观维护社会稳定的精神力量。爱国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人层面的第一要义，是个体行为的第一准则。爱国主义教育是缓和与加强不同社群之间关系的途径[5]，通过教育将爱国刻在大学生心中，从而加强不同民族、地域大学生联系，共同践行核心价值观念，加强社会认同。爱国主义是应对国际挑战维护国家安全的精神支柱。当前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在不断冲击国家观念[6]，新媒体多元信息杂融带来虚拟道德危机[7]，大学生作为互联网的原住民，急需爱国主义教育掌舵领航，坚定强国、报国的志向，自发维护国家政治、经济、网络、文化、意识安全，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最终达成共产主义目标而不懈努力。

（二）关于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状况的研究

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内容、教育方式是教育的四大基本要素[8]16-19。在教育主体上，学生是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主要受教育者，教育者主要由党委各职能部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教师和学生工作队伍承担[9]。在教育内容上，包含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以文化自信为抓手法律制度与历史文化，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党史国史为根基的“四史”教育，以民族资源为要素的团结统一教育。与 2023 年 10 月 24 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关于教育内容的规定较为一致。在教育方式上，以课堂教学为主，辅之以实践教育的育人功能，校园文化氛围的浸润作用，仪式教育的情感激发效用，网络媒体教育的实时性与共享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鲜活性与感染力[10]。除此以外，国家公务员考试、研究生入学考试、各省市事业单位招聘考试等也发挥了一定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

与此同时，各组织对爱国主义教育重视程度不够；教育主体主动意识欠佳，课程协同推进的总体规划和纵深发展不够[9]；教育内容过于偏向政党政治理论，缺乏时代性；教育方式单一，实效性有待优化，未形成教育合力，媒介环境带来严重消极影响、微媒体应用占比低，正桎梏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优化完善。学者

们对上述问题进行详细原因分析，包含人口特征、家庭背景、学校教育方式以及网络媒体的影响[11]，爱国主义教育理想信仰解释难、认同难，爱国行为激发难的先天缺陷[12]，外部环境与思想意识领域的多元冲击等原因。有必要从教育理念、教育方式、教育路径、教育思想等不同角度进行优化。新时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要坚持情理融合、知行合一、上下协同发展[13]，保证守正与创新、内修与外治、隐形与显性相结合[14]，通过思想引导激发学生爱国情怀，通过制度建构保障学生报国志向，并通过文化熏陶来培养国家传承之道[15]。

综上所述，当前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多从教育要素入手展开问题研究与对策建议，缺少对情感形成内部心理机制的探析与讨论。有鉴于此，本研究着力从认知、情感、意志、行为心理过程的四阶段入手，利用文献分析法、问卷法、访谈法，将理论建构、思辨分析和调查研究相结合，根据 2023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的新要旨和具体要求，为高校爱国主义教育因地制宜提出对策。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说明

基于爱国主义教育在民族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的基础性、独特性作用，本研究最终确定在民族院校 Z 校开展调查，其民族特色鲜明、民族种类丰富、民族学生众多，是我国高等教育中具有特殊含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重要性的把握和对青少年思想动向的了解，本研究对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现状展开调查，对大学生在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时对相关教育资源与教育组织形式的意见与需求进行整体性把握与关注，进而对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进行系统完善和路径优化。在整合思想政治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编制了 Z 校爱国主义教育效果调查问卷和 Z 校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现状半结构访谈提纲。

问卷包含个人基本信息、教育效果两部分，其中教育效果又包含认知、情感、意志、行为四个维度。传统心理学认为，个体的心理过程包含认知过程、情绪情感过程、意志过程三部分，行为是使心理过程由内而外转化的外部表现。爱国主义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培养提高受教育者知、情、意、行整体和谐发展的过程。[8]277 访谈提纲涵盖个人基本信息、对爱国主义教育的理解、教育需求与现状（教育内容、教育方式、存在问题）、教育期待三个部分。

图 1　爱国主义认识的“心理本质”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2023 年 3 月 14 日至 4 月 8 日期间，课题组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对 Z 校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学生进行访谈。共计访谈 10 名学生，其中男性 4 人，占总体 40%；女性 6 人，占总体的 60%。大四 3 人，大三 3 人，大二 2 人,大一 2 人。文史类 5 人，理工类 2 人，经管类 2 人，艺体类 1 人。对访谈文本整理后利用 Nvivo12 质性分析软件对其进行整理编码。2023 年 3 月 27 日至 4 月 3 日期间，课题组对 Z 校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调查主要通过电子问卷的方式展开。共回收 157 份问卷，其中有 13 份没有通过反向计分测谎题，为无效问卷，最终有效问卷 144 份，有效率为 91.7%，其中男生 61 人，女生 85 人，四年级学生 48 人，三年级学生 37 人，二年级学生 25 人，一年级学生 34 人。问卷经编号整理后，统一用 SPSS 软件进行整理与分析。

（三）信效度分析

问卷信度表明，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实施效果调查问卷的克隆巴赫（Cronbach）α系数为 0.940，具有较高的信度，KMO 结果值为 0.887，且显著性小于 0.05，通过了 Bartlett 球形检验，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四、调查结果

通过问卷调查与访谈，Z 校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状况表现出较好的教育效果，但在知识背景、意志坚定、行动转化等方面还存在一定不足。

（一）爱国认知的现状

树立正确认知是爱国的基础。大学生对国家发展历史、基本国情、爱国知识的学习与掌握是理性爱国的前提和基础。Z 校学生对爱国知识的理解和基本国情的掌握达到基础水平，但在知识背景方面表现出一定欠缺。在“您对我国的基本情况了解程度”问题上，

83.8%的学生表示较为了解，表示中立和不了解的占16.2%，说明大部分学生对当前国情有基本认知。在“您知道怎样爱国才是合理的”问题上，86.5%的学生表示较为清楚，表示中立和不清楚的学生占 11.9%，完全不知道的仅有 1.5%，说明大部分学生对如何爱国有清晰的认知。在“您知道中国共产党成立日期、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香港回归的具体时间吗”问题上，只有 38.8%的学生全部知道，37.3%的学生知道三个，14.9%的学生知道两个，2.9%的学生知道一个，还有 5.9%的学生全都不知道，这表明绝大部分学生爱国主义知识背景较弱。上述数据表明，大学生对国家历史记忆不牢，但对如何理性爱国、基本国情认知度较高。这种情况的产生与 Z 校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设置有紧密关系，访谈对象 M 表示：“在党课上学到跟党相关的知识，在政治课上学到历史、国情等知识，还有围绕着每年重大纪念为主题的专题讲座，内容比较全面，所以在知识层面大家还是比较清晰的。”Z 校爱国主义教育内容在本文中共对应 20 个参考点，与爱国主义教育法律规定基本一致。完善、有效、多样的教育内容更全面地服务当前的爱国主义教育，将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之目标落到实处。

（二）爱国情感的现状

培养浓厚情感是爱国的核心。一个没有爱国之情的人不可能为爱国付诸实际行动，大学生对国家的情感态度是实现爱国主义的关键所在。Z 校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积极学习，表现出积极的爱国情感。在“作为中国人，你自豪嘛”问题上，选择较为自豪与非常自豪的学生共有 92.5%，选择中立、没什么感觉和完全没感觉的只有 7.5%，由此表明大多数人对祖国较为自豪认同，十分认可。在“您常被英雄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影响，他们的爱国之情深深打动着您”问题上，93.9%的同学都表示认同,选择中立和没有感受的学生占 5.9%。在“老师上课讲到有关国家、爱国事件时，常常使您的爱国情感都会逐渐浓厚”问题上，89.5%的学生表示赞同，表示中立和不赞同的学生占 10.4%，表明大多数学生在接触爱国相关事宜时不断厚植爱国情感。由此可见，大部分学生对祖国情感深厚、积极热爱。与此同时，丰富而恰当的方式对情感激发具有关键作用，访谈对象 W 同学表示：“不同的教育方式影响各异，比如课堂教学作为常规培养方式，具有稳定情感激发作用，但实践活动等其他方式具有短时间强烈激发的作用。”教育方式在本研究中共对应 67 个参照点，在主轴编码下分别对应着七个自由节点，分别是思政课程、仪式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爱国主义纪念活动、爱国主义实践活动、新媒体宣传、培训班讲座等。丰富的教育方式不仅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诠释教育内容，还能相互取长补短，进一步发挥教育方式本身潜移默化的情感激发作用。

（三）爱国意志的现状

意志是爱国的关键保障。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意志是指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目标自觉做出的努力，是在理论与实践中学习，经过理智权衡与辨析对祖国形成的坚定情感和绝对拥护。对思想活跃但“三观”尚未形成的大学生来说，养成坚定、持久的爱国意志较为困难。在“只要是对国家发展有利的事情，再难你也愿意坚持”问题上，80.5%的学生表示愿意坚持，表示不清楚或者不愿意的学生占 19.5%，虽然比例不大，但大学生作为基数大、传递性强且持续存在的一个群体，反映在人数上依旧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在“你希望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和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问题中，有 85.1%的学生表示愿意，还有 8.9%的学生不清楚自己的想法，剩下 6%的学生不愿意，这反映出较少一部分学生缺乏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与向往，在为人民服务的意向上也动力不足。利用 SPSS 分析入党意愿对爱国意志的影响，就单因素 ANOVA 检验结果，在“意志”上的显著性小于 0.05，因此不同入党意愿的大学生在“意志”维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这说明入党意愿越强，爱国意志就越坚定，两者相互促进。上述研究说明，大部分学生有坚定的爱国意志，可以并且愿意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和社会贡献力量，在入党动机的影响下，动机越强的学生爱国意志越坚定，但依旧存在大约 20%的学生意志摇摆，急需各高校加强教育。

（四）爱国行为的现状

班杜拉提出的三元交互决定论表明“行为受个体及环境的影响，行为又反过来影响并最终决定个体思维及外部环境”。[16]爱国行为影响爱国认知，爱国行为又是爱国情感的外化与归宿，爱国心、强国志最终都要转化为报国行。在“当我国部分地区遭受严重自然灾害时，您主动捐款捐物参与救灾行动”问题上，选择非常符合与较符合的学生分别是 44.7%和 35.8%，有 14.9%的学生不清楚自己的选择，还有 2.9%的学生选择不符合，1.5%的学生选择完全不符合，这表明将爱国情感、意志转化为爱国行为存在一定困难。在“当我国遭遇外敌入侵时，您会积极主动参军”问题上，有 43.2%的学生选择肯定会参军，28.3%的学生选择应该会参军，23.8%的学生不清楚自己的选择，还有 4.5%的学生表示应该不会参军，这表明有大约 30%的学生有拒绝参军保卫祖国的想法。在“紧急事情发生时，您会积极主动的配合国家政府的工作，坚持集体主义大于个人利益的原则”问题上，89.5%的学生选择了积极倾向的愿意配合，选择不太愿意或者不清楚的占 10.5%。利用 SPSS 分析入党意愿对爱国行为的影响，就单因素 ANOVA 检验结果，在“行为”上的显著性小于 0.05，因此不同入党意愿的大学生在“行为”维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由上述数据可知，大多数学生可以做到知行合

一，但爱国信念在小部分学生心中没有顽强扎根，特别是入党意愿不强或者没有的学生，爱国行为感召力较弱，难以将情感意志转化为有意识的报国行为。

五、结论与讨论

变幻莫测的国际环境与大数据的飞速发展给爱国主义教育带来新挑战。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施应该充分考虑教育主体实际情况，成为发扬学生爱国情、报国志的抓手，指引大学生坚定、正确地扣好“思想”的扣子。本文基于对一高校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现状的调查，进行以下讨论：

（一）统筹课堂教学，夯实爱国认知

清晰明确的认知是爱国的基础，扎实的知识背景是正确认知的关键，知识背景来源的主渠道为课堂教学[17]，改革课堂教学对增进爱国认知具有核心推助作用。当前课堂教学存在教育主体动力不足，知识掌握情况差等问题。这与教育主体认识不足，教学缺乏针对性、持续性和系统性有很大关系。[18]本文将从课堂质量、教育方式、课程联动三个方面优化课堂教学。

一方面，“三端并重”，加强课堂质量建设。加强课堂质量建设是强化教育效果的关键所在，课堂质量需要教师、学生和教育中介三端通力合作，建设“真实而有温度”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堂。教师作为教育活动中的领导者、设计者、引领者[8]6，要树立坚定的教育理想，认真备课上课，不断加强自身素养建设。作为学生，保持积极的学习态度，认识到爱国主义教育对自身成人成才的关键作用。教育中介包含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是教育者将知识、情感传达给受教育者的载体。内容上，融合传统文化与时代话语，串联红色资源和社会热点，联合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功能和时政教育实时性强的优势；在方式上，建构以电子技术为媒介的“00 后”教育方式。在教学中融合科学技术和互联网，将异地的人与物容纳到同一画面之中，使场景具有较强的联动性和穿越性[19]，实现课堂教学的创新发展。在整体性建设上，推进五项课程联动发展，加强顶层设计、明确不同课程的重点、目标、发展路径，形成合力，共同育人。

另一方面，“专题延伸”，增强课堂针对性与持续性。习近平指出“爱国主义教育要用好课堂教学主渠道，在改进中不断加强课堂亲和力和针对性，与学生发展需求与期待相吻合[20]”。专题教育作为一种“精准打击”式教育方式，改“以线为主”的知识性教学为“以点为主”的问题式教学[21]，针对大学生日常生活中不清楚、不坚定、不明确的问题和时政热点进行深入探讨，交流思想、理清头绪、坚定情感，在教师引导、同伴影响、自我教育中不断深化爱国认识。德国教育家凯兴斯泰纳认为“公民教育的核心内容应当与各种教育背景相结合[22]”，要注意针对根据各年级、专业学生的特点有针对性地选择教育内容[23]。此外，调动地域文化传统与学习资源进行校本课程建设，如井冈山大学开设《井冈山精神与当代大学生》、清华大学开设“抗战烽火中的清华”专题学习等，将地域文化搬进爱国主义教育的课堂，加大学生生活与爱国主义教育的联系，实现爱国主义教育的生活化和持续化。

（二）深化仪式教育，厚植爱国情感

爱国主义仪式教育包含升国旗、唱国歌、举行入党入团宣誓等仪式活动，存在强制要求学生参加、过于形式化、缺乏情景性、情感性等问题，背离教育初衷。这与仪式教育认识不足和缺乏制度规范有关，可以从加强认知、丰富内涵和规范制度三个方面出发，使仪式教育发挥所长。

第一，提高将仪式运用于爱国主义教育重要性的认识。认知学派主张认知是行为的基础，充分认识是良好利用的前提。关于提高认识，经验主义认为人类通过对外界的感觉获得认识，通过参与爱国主义仪式教育实践加强认知。理性主义认为理性思考是认识的根本途径。理性思考建立在知识基础、逻辑管理和综合思考基础上。有必要创建仪式教育在线学习通道，推送国内外关于仪式教育的实践、学术观点与成果。如展示中国古代的礼乐教育与冠礼教育，阿诺尔德·范热内普认为“仪式与事件相伴而生，使个体能够从一种境地过渡到另一种”[25]。王铭铭认为“仪式的举行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内部矛盾与冲突[26]”等学术观点。

第二，充实爱国主义仪式教育的内涵。内容是爱国主义仪式教育的核心。每一场仪式背后都应该有其精神内核与价值输出，可以在爱国家、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基础上增加爱自己、爱家庭、爱学校的主题。类型丰富的爱国主义仪式教育是取得成效的关键。仪式教育由来已久，中国古代就有国家层面的仪式礼仪“祭奠大典”和社会层面的家国伦理社会教育仪式。在当今通过性仪式与纪念性仪式在爱国主义教育中占比较大，可以加大竞赛性仪式与日常性仪式的出场频率，如组织学生一同观看军运会、奥运会等国家重大赛事，不定时进行重温入党誓词仪式等，将仪式教育的作用发挥到最大。

第三，构建仪式体系与仪式制度。大学生群体具有多重身份，仪式教育应该根据不同层次特点的学生针对性地进行，实施国家仪式、社会仪式和个人仪式。国家仪式包含观看或参与国庆阅兵、国家公祭日、大型节日纪念活动等。社会仪式包含参与地方最美家庭、最美个人评选仪式等。个人仪式包含入团、入党宣誓仪式，开学典礼、毕业典礼等。仪式制度是保障，没有制度爱国主义仪式教育就会成为一盘散沙，难以发挥真正作用。仪式制度应该由爱国主义教育主管部门制定，规定仪式教育的程序、纪律规则、章程，使爱国主义仪式教育呈现规范性、原则性、灵活性特点。

（三）加强文化建设，坚定爱国意志

习近平强调：“要重视加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把爱国主义精神贯穿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全过程，把爱我中华的种子埋入每个青少年的心灵深处。”[27]学校教育的全过程不仅包含课堂教学，还包含学生生活、学习的全过程，而校园文化作为重要的教育资源在育人过程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28]，是主流课堂教学的重要补充，也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自《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纲要》颁布以来，众多高校大力推行校园文化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但还存在重形式轻内容、重情感渲染轻行为养成、重宏大叙事轻身边小事等问题[9]。有必要从深化内容和拓展途径两方面给予改进。

一方面，“深化内容”，实现历史与现代、国家与个体的统一。内容是校园文化建设的核心，健全、先进、科学的内容设置对建设积极健康的校园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当前校园文化建设内容干瘪、脱离实际的情况，本文提出校园文化建设要立足国家历史进程和当下时政热点，联合国际国情与个人风采，实现过去与现在，国家层面与个体层面的统一。在发展历程版块，可以组建“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事件专题”等栏目；在时政版块，以国家和地方的热点话题为中心组建专栏；在个人风采版块，展出对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民族团结做出贡献的校友，对校园和谐、班级发展、同学友爱做出贡献的学生，对具有优良品德，先进的爱国主义者进行突出表扬与宣传。发挥历史文化的浸润作用、同伴榜样和时政热点的现实感召作用，在潜移默化中深化学生的爱国意志，坚定爱国理想。

另一方面，“拓展途径”，线上线下文化建设渠道相结合。具有沁润作用的文化、知识和作品需要借助一定的载体才能发挥其功能和作用。当前校园文化主要通过宣传栏、横幅标语等形式呈现，具有一定局限性。引入参与式、互动式校园文化活动，如“五四汇演”、“‘长征’校园马拉松”，在富有趣味性的校园文化活动中加深对中国历史、红色精神的理解。此外，在信息化数据化时代，借助线上网络渠道进行爱国主义校园文化建设是时代选择。融入校园广播、学校学院的微信公众号、官方 QQ、微博、小视频等大众传媒软件的校园文化建设功能，在其中定时或不定时地发布有关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使爱国主义教育思想不仅充斥在生活学习的现实生活中，还弥漫在学生日常接触到的网络环境上。图文、音频与视频相结合，线上与线下相统一，全面全过程全方位的爱国主义教育可以在无形之中不断强化学生的爱国意志。

（四）增进实践锻炼，助推爱国行为

实践锻炼因其较强的体验性、互动性和投入性，在爱国主义教育中表现为较高的育人价值和育人功能。认知理论认为人们通过实践来建构知识和理解知识，从而促进学习与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也强调“爱国主义教育要注重实践养成”。可见，实践育人是爱国主义教育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当前爱国主义实践教育已经成为高校教育的普遍共识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在系统规划、内容健全、因人制宜、助推行为转化等方面还存在一定不足。[29]对此，应该加强顶层设计，进行全面布局；提高实践内容和形式的针对性与专业性，在实践教育中学习并践行爱国主义。

一者，进行全面布局，构建系统的实践教育。实践教育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方式之一，需要高校爱国主义教育专管部门协同学生工作处、教务处等相关部门，做好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统筹爱国主义实践教育的进行。理论是实践育人的基础，课堂教学中的爱国主义理论教育内容是实践育人的重要蓝本。思政理论课教师、学科专业教师和学生工作队伍应该以此为基础展开研讨策划，对实践教育的具体内容和形式进行设计，尽量做到实践进程中的实践前准备、实践中强化、实践后反馈的优化统一，达到实践维度的认知情感与学术成果的统一，时间维度的过去、现在、未来的统一，人文维度的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的统一，激发学生的家国情怀，在实践育人中实现爱国主义教育和践行的统一。

二者，内容形式创新，构建科学的实践教育。实践教育是连接学校和社会的桥梁，只有通过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实践教育加深学生与社会的交往互动，在实践教育中亲身体验，理解、吸收、消化爱国主义理论知识，才能实现知行合一。爱国主义实践教育的组织应该考虑不同年级、不同学科学生的特点。[23]针对低年级的学生，组织其进行社会调查、考察，参与社会服务活动和社会公益事业，走向社会，认识社会，不断提升社会实践能力。针对高年级学生可以组织在相关专业组织和部门进行见习实习，在实践锻炼中强化专业知识，学习专业工作者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和专业能力。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鼓励其利用课余时间参与专业相关的比赛和社会实践，如科技制作和科学发明活动、寒暑假社会实践、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等专业赛事，在专业实践中深入了解中国大地和社会人情，在实践中推动知行合一，使爱国情感转化为爱国行为。

（五）贯彻爱国法规，加强制度保障

当前爱国主义教育存在体系分散、架构不清的缺陷，导致活动虽多但缺少规划配合，收效甚微，这与缺少规划和法律规范有关。美国、俄国通过法治方式保障和推进爱国教育，为我国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域外经验。美国形成由联邦立法、州立法、总统行政令三方组成的爱国法制保障体系[30]；俄罗斯初步建立以《爱国教育示范法》为核心的，由独联体示范法、联邦立法、地方立法组成的三层爱国法治保障体系，颁布爱国主义教育国家纲领[31]。

借鉴他国经验，2023 年 10 月 24 日，十四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该法的颁布对于改善当前爱国主义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起到了“及时雨”的作用，为了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高校应从组织完善、政治课程、理论研究、爱国主义创作等方面入手，配合上级爱国主义教育主管部门的安排，不断完善本校爱国主义教育体制机制。

其一，建立爱国主义教育主管部门。高校应该建立专门的爱国主义教育主管部门，负责全校爱国主义教育工作的指导、监督和统筹工作。建立以专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育学院的副校长为领导，各二级学院书记和院长为组长，分管学生工作副书记、辅导员、班主任及学生干部为主要成员的坚实队伍，做好爱国主义教育的设计与执行。

其二，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顶层设计。对爱国主义课堂教学、仪式教育、实践教育、校园文化建设等进行系统性统筹建设，使不同教育方式之间优势结合、劣势互补，形成合力，共同育人，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针对性、系统性与亲和力、感染力。

其三，支持爱国主义理论研究与创作。高校是进行科学研究的专门机构，爱国主义教育的发展不仅需要应用性探索也需要基础理论性研究的加持。支持高校教师进行爱国主义理论研究，出版爱国主义教育相关课程教材与著作，并对在爱国主义教育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从而提高大家推进爱国主义教育的积极性。此外，鼓励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创作。大学生群体才艺广泛、具有一定专业技能，鼓励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创作不仅可以应用专业知识，更能深化对爱国的理解，增强爱国情感，是双赢的重要举措。

参考文献：

[1]严炜,郑红宇.美国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特点及启示[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6):627-631.

[2]牟瑶. 新时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研究[D].乌鲁木齐:新疆师范大学,2022.

[3]李明. 新时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研究[D].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20.

[4]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2022-10-16.

[5]Smith, Alan.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Northern Ireland: Beyond national identity? [J]. Cambridge Journal of Education, 2003(1):15-32.

[6]李琼.新形势下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路径[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7(04):143-147.

[7]刘左元,李林英.对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的认知与思考[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2(03):14-16.

[8]王道俊，郭文安主编.教育学（第七版）[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6.

[9]赵轩.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四重路径[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03):158-164.

[10]刘宇. 新时代高校爱国主义教育有效路径研究[D].南昌：江西财经大学,2022.

[11]FÉNYES H ,PUSZTAI G .Volunteering among Higher Education Students. Focusing on the Micro-level Factors[J].Journal of Social Research Policy,2012,3(1):73-95.

[12]张宁娜.新时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研究[D].西安：西安理工大学，2021.

[13]孟丽.论新时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新机遇与新举措[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1(05):27-29.

[14]孙华峰.新时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价值意蕴、现实挑战及创新路径探析[J].思想教育研究,2022(08):147-152.

[15]刘嘉圣.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路径[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0(03):27-31.

[16]吴国来，张丽华等编著. 学习理论的进展[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8：17-18.

[17]庄兴忠.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加强爱国主义教育路径探析[J].思想教育研究,2023(01):109-114.

[18]范益嘉.新时代高校爱国主义教育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D].天津：天津大学,2023.

[19]郑文博.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场景的建构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22.

[20]习近平.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EB/OL].（2016-12-09）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1209/c1001-28936072.html

[21]张恒艳.专题研讨式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实践探索[J].教育现代化,2016,3(25):109-110+119.

[22][德]凯兴斯泰纳.凯兴斯泰纳教育论著选[M].郑惠卿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243.

[23]周如东.论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的层次性[J].思想教育研究，1995(04):15+14.

[24][法]阿诺尔德·范热内普. 过渡礼仪[M]. 吴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66.

[25]王铭铭.想象的异邦：社会与文化人类学散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56.

[26]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161.

[27]张璨丹.浅析用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J].教育与职业,2013(33):69-71.

[28]严丽娜.新时代文明实践与爱国主义教育机制创新[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4(06):73-78.

[29]莫纪宏,诸悦.爱国教育制度法治化研究[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1(05):119-129.

[30]马文琴.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的爱国主义教育政策与实践[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7(02):57-61.

“黑神话：悟空”为载体的中学英语教学与中华文化传播研究

李嘉*

（太原师范学院 外语系，山西 晋中 030619）

摘　要：本论文探讨如何将以《黑神话：悟空》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元素融入中学英语教学，以提升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与文化传播能力。通过分析游戏中的文化内涵、语言应用以及其在全球文化交流中的影响力，阐述了中学英语教学与中华文化传播的结合点与实施策略，旨在培养学生在跨文化交流中讲好中国故事的核心素养，促进中学英语教学的多元文化融合与创新发展。

关键词：黑神话：悟空；中学英语教学；文化传播；山西文化；教学策略；跨文化交际

基金项目：2025 年度山西省研究生教育创新项目（2025SJ403）

DOI：doi.org/10.70693/jyxb.v1i4.107

Black Myth: Wukong as a Medium for Middle School English Teaching and Chines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Li Jia*

**Foreign Languages Department Taiyuan Normal University, Jinzhong, Shanxi, 030619*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elements, represented by Black Myth: Wukong, into middle school English teaching to enhance students’ interest in English learning and their capacity for cultural communication. By analyzing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s, linguistic applications, and global cultural exchange impact of the game, the study elucidates the convergence points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for combining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with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The aim is to cultivate students’ core competency in effectively narrating Chinese stories in cross-cultural exchanges, thereby fostering multi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in middle school English teaching.

Keywords: Black Myth: Wukong; middle school English teaching; cultural communication; Shanxi culture; teaching strategie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1.《黑神话：悟空》中的中华文化元素

作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旨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2021 年 5 月 3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立体、全面、真实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这一重要论述不仅为新时代文化国际传播工作指明了方向，也为教育工作者的育人使命提供了根本遵循[1]。在全球化的今天，创新传播思维与形式，不仅有助于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全球认同，也有利于提升文化自信与国家软实

作者简介：李　嘉(1994—)，女，硕士，研究方向为英语教学设计。
通讯作者：李　嘉

力。

游戏产业作为全球化背景下极具影响力的文化媒介，正日益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2024 年，以《黑神话：悟空》为代表的国产游戏在全球范围内引发热潮，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开辟了新路径。该游戏根植于古典名著《西游记》，以现代数字技术重构神话宇宙，展现出中华文化持久的创造力、吸引力与生命力。从杨洁导演的电视剧《西游记》，到周星驰系列电影作品，再到源远流长的猴戏表演艺术，《西游记》题材在不同艺术形式中历久弥新，不断焕发新的生机。《黑神话：悟空》不仅从文学传统中汲取灵感，更融合当代视听语言与科技手段，实现对经典文化的创新表达[2]。此外，游戏中对电视剧《西游记》主题音乐《云宫迅音》的运用，唤起几代人的集体记忆，也在某种意义上完成了对经典的再塑造，使其成为连接不同时代的“年轻传统”。这一系列文艺作品彼此呼应，形成丰富的互文网络，持续拓展传统文化表达的广度与深度。

与影视、舞台艺术相比，游戏以其互动性与沉浸感，更能激发用户的主动探索意愿，从而拓展文化传播的广度与深度。《黑神话：悟空》凭借独特的东方美学、神话叙事与中国风格，成功吸引全球玩家的关注。例如，游戏中的京剧锣鼓音效、陕北说书等元素，成为外国玩家津津乐道的文化符号，甚至激发了他们阅读《西游记》原著、观看相关动画与连环画的兴趣[3]。这种由游戏引发的文化探源行为，标志着《黑神话：悟空》已不仅是一款娱乐产品，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出海”的新渠道，为文化传播提供了生动范例。

游戏作为文化载体在全球范围的崛起，对教育领域具有重要启示。2024 年《黑神话：悟空》的国际反响，为在英语课堂中融入中华文化、推动文化传播教学提供了新契机[4]。通过剖析该游戏的成功案例，教师可提炼出适用于英语教学的理论依据与教学策略，探索传统文化在跨文化语境中的表达方式。在全球化背景下，构建以文化产品为媒介的英语教学模式，不仅能够增强学生用英语讲述中国故事的能力，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能见度，也有助于增进不同文化背景学生之间的理解与尊重，推动构建多元、包容的全球文化交流格局，从而培养具备国际视野与文化使命感的新时代青年。

2.黑神话悟空与山西文化历史的联系

《黑神话：悟空》与山西文化历史之间存在着深层的互文性关联，其联结远不止于场景的借用，更在于游戏将三晋大地的物质遗产与精神内核，创造性地融入了数字叙事的脉络之中，实现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

2.1 游戏取景与山西古建筑

游戏在场景构建上与山西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其选取的全国 36 处景点中，多达 27 处源自山西，形成了一条极具分量的“山西文化线索”。从大同的云冈石窟、悬空寺，到忻州五台山的佛光寺，再到朔州的应县木塔、平遥的镇国寺与双林寺等，这些历经千年的建筑瑰宝不再是静态的背景板，而是被游戏以高度写实的数字技术“活化”为可游、可感的叙事空间[3]。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游戏对如佛光寺东大殿等场景进行了近乎 1：1 的精准还原，使得玩家得以在虚拟世界中亲临这些平日难以触及的文化遗产。此举不仅展现了这些古建筑宏大的物理形态，更通过沉浸式体验，传递了其背后深厚的历史价值与文化意蕴。

2.2 游戏内容与山西文化元素

《黑神话：悟空》对山西文化的融合，超越了表层的视觉呈现，深入至精神内涵层面。山西古建中丰富的宗教元素，如佛光寺的佛教壁画与悬空寺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哲学观，被巧妙地转化为游戏世界观的一部分，为玩家提供了基于中国文化逻辑的解读空间[4]。

在叙事层面，游戏虽根植于《西游记》这一全民 IP，却有意融入了与山西地理、传说相关的文化元素，对经典故事进行了在地化与当代性的重构。这使得孙悟空的故事不仅在神话中延续，更在与三晋大地历史文脉的交织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2.3 游戏热度与山西文旅

游戏的文化影响力迅速由线上蔓延至线下，引发了显著的“破圈”效应。《黑神话：悟空》的成功，为山西文旅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关注度。无数玩家在体验游戏后，产生了亲赴山西，一睹古建真容的强烈愿望。

山西省文旅部门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契机，顺势推出如“跟着悟空游山西”等系列主题活动，将游戏中的虚拟场景与现实的文旅资源精准对接。这不仅有效提升了山西的文化旅游热度，更将文化影响力转化为切实的经济效益，形成了“文化赋能产业”的良性循环。

2.4 游戏作为文化传播的新载体

综上所述，《黑神话：悟空》通过现代数字媒介，为山西文化历史的传播与传承开辟了全新路径。游戏不再是单纯的娱乐产品，而是扮演了“文化转译者”的角色。它一方面通过创新的融合与改造，使古老的建筑与文化符号契合了当代审美与交互体验；另一方面，它以全球玩家喜闻乐见的方式，激发了新一代对中华传统文明的兴趣与热爱。这种“数字文保”与“创新表达”相结合的模式，无疑为未来传统文化的活化与“出海”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思路。

3.中学英语教学与中华文化传播的现状

在基础英语教学的实践中，我们不难发现，许多学生在理解和表达中华民族的文化时感到力不从心。近年来，中学英语试题中逐渐增加了与中国传统文化

相关的内容，这体现了教育部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然而，现实情况是，许多中学英语教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不够深入，难以将其与英语教学有效地结合起来。甚至有一些教师认为，文化融入并非英语教学的必要组成部分。这一认知偏差，已成为推动英语教育深化改革、提升学生文化综合素养过程中必须正视的问题。

3.1 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在中学阶段有意识地融入中华传统文化，具有多方面的教育意义：

首先，有助于学生确立正确的价值观念。中学生正处于三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过度偏重西方文化而忽视本土文化熏陶，可能影响其精神成长的平衡。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哲学思想、道德准则与行为礼仪，是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形成文化定力的重要资源。

其次，能够培养学生的文化传播使命感。作为未来的建设者，中学生有必要成为中华文化的传承者与推广者。英语教学不仅是语言习得的过程，更应成为跨文化理解的桥梁。学生只有在深入理解中西方文化异同的基础上，才能具备有效的对外传播能力。

此外，此举直接关系到学生文化认同与自信的建立。通过英语课堂认识、解读并表达本国文化，学生能够更清晰地定位自身文化身份，增强民族自豪感，从而在跨文化交流中展现出从容与自信。

最后，文化融入有助于深化学生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的认知。英语作为载体，既传递西方文明，也应成为讲述中国故事的平台。在双向的文化参照中，学生能够发展出更为全面的跨文化视野与交流能力[6]。

3.2 当前教学中文化融入的现实困境

尽管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华传统文化在中学英语教学中的融入仍面临结构性困境：

一方面，教材内容仍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现有教材虽在语言地道性和题材多样性上有所进步，但涉及中国文化的内容在数量和深度上均显不足，导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与本土文化渐行渐远，不利于文化认同感的培养。

另一方面，教学实施中存在明显的文化缺失。课堂活动多围绕西方节日、礼仪展开，中国传统节日、哲学思想、艺术形式等很少成为教学主题。学生缺乏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机会，进而陷入“不会说、不愿说、不敢说”的失语状态[7]。

要改变这一现状，必须在教学理念、内容设计与教师发展等方面进行系统性改进，使英语课堂真正成为帮助学生理解世界、表达中国的双向平台。

4.将《黑神话：悟空》融入中学英语教学的策略

4.1《黑神话：悟空》中的山西文化与英语教学融合的理论基础

（一）文化传播理论

文化传播是指文化从一个社会群体或个体向另一个社会群体或个体的扩散过程。在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借助大众文化产品如《黑神话：悟空》进行文化传播具有重要意义。中学英语教学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阵地，能够将游戏中的山西文化元素以英语为媒介传递给学生，进而通过学生向更广泛的国际受众传播。例如，游戏中的山西古建筑、民间传说等元素，在英语教学中被赋予了国际化的表达形式，有助于打破文化隔阂，实现文化的有效传播[8]。

（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是学习者在原有知识经验基础上，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主动对新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建构知识意义的过程。将《黑神话：悟空》融入中学英语教学，正是为学生提供了一个丰富且具有吸引力的社会文化情境。学生在接触游戏中的文化元素时，会结合已有的知识和生活经验，在英语学习的过程中构建对山西文化和中华文化的新认知[9]。例如，在学习与游戏场景相关的英语词汇和表达时，学生会主动联想游戏中的画面和情节，从而加深对词汇意义的理解和记忆，同时也对山西文化的内涵有更深入的领会。

（三）跨文化交际理论

跨文化交际强调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在中学英语教学中融入《黑神话：悟空》中的山西文化元素，能够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学生在学习用英语介绍山西文化特色的过程中，需要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掌握有效的跨文化交际策略[10]。例如，在向外国友人介绍游戏中的山西传统祭祀仪式时，学生需要考虑到西方文化中宗教和仪式的不同特点，选择恰当的英语表达方式和沟通方式，以确保信息的准确传递和文化的相互理解。

4.2《黑神话：悟空》中的山西文化教学资源剖析

《黑神话：悟空》蕴含丰富的山西文化元素，为英语教学提供了多元素材：

在视觉文化方面，游戏中对山西古建筑进行了精细再现，如五台山佛光寺等场景的还原。五台山作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其寺庙建筑融合了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的特色。游戏中对飞檐斗拱、雕梁画栋等建筑细节的刻画，展现了山西建筑文化的独特魅力。在英语教学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学习“flying eaves”（飞檐）、“carved beams and painted rafters”（雕梁画

栋）等专业词汇，同时解读这些建筑元素背后的文化内涵。山西独特的自然景观在游戏中同样得到展现。恒山的雄伟险峻、黄河壶口瀑布的磅礴气势，都为游戏增添了浓郁的地域特色。教师可以借此引导学生学习“magnificent mountains”（雄伟山脉）、“spectacular waterfalls”（壮观瀑布）等表达，训练学生用英语描述自然景观的能力，同时增强对家乡文化的认同感。

在听觉文化方面，游戏融入了丰富的山西戏曲元素，如晋剧的高亢唱腔和独特旋律。晋剧作为山西地方戏曲的代表，其音乐调式和乐器演奏（如板胡、锣鼓等）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在英语课堂上，教师可以通过播放游戏中的戏曲片段，让学生感受晋剧的独特韵味，同时教授“Jin Opera”（晋剧）、“aria”（唱腔）等专业术语，培养学生用英语介绍山西戏曲文化的能力。游戏中的语音叙事也包含了山西民间传说与故事。这些通过角色对话和旁白呈现的传说故事，承载着山西人民的智慧和价值观。教师可以选取合适的片段作为听力材料，让学生在提高英语听力水平的同时，了解故事背后的文化寓意，并鼓励学生用英语复述这些传说，锻炼口语表达能力。

在民俗文化方面，游戏中体现了山西丰富的传统节日与庆典活动，如春节的社火表演、元宵节的花灯展览等。教师可以借此介绍“Spring Festival”（春节）、“Lantern Festival”（元宵节）等节日的英文表达，以及“fireworks display”（烟火表演）、“lantern show”（花灯展览）等相关词汇，引导学生用英语分享节日体验，描述民俗活动的文化意义。山西民间手工艺在游戏中也有体现，如剪纸、面塑等传统技艺。这些手工艺以其精湛的技艺和独特的造型，展现了山西人民的审美情趣和文化传承。教师可以通过展示实物或图片，教授“paper-cutting”（剪纸）、“dough sculpture”（面塑）等词汇，并引导学生用英语介绍这些手工艺的制作流程和文化特色[2-4]。

4.3 融入《黑神话：悟空》的山西中学英语教学方法与策略

（一）情境教学法

通过游戏场景还原与角色扮演，创设真实的语言使用情境。教师可以选取游戏中的典型场景，如古寺庙、庙会等，组织学生扮演游戏角色、外国游客等，用英语进行对话交流。例如，由学生扮演导游向“外国游客”介绍寺庙建筑的历史文化，其他学生提问互动。这种方式能让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文化氛围，提高语言应用能力。

利用多媒体资源创设教学情境也是有效手段。通过播放游戏视频片段、展示游戏图片等，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观察并描述其中的山西文化元素[11]。比如在展示黄河壶口瀑布场景时，引导学生用英语描述其壮观景象，并深入探讨黄河在中华文化中的象征意义，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传播山西文化。

（二）任务驱动教学法

设计文化元素调研任务，促进学生主动探究。学生分组选择游戏中的特定文化元素，如某种建筑类型或手工艺，通过查阅资料、实地考察（条件允许时）等方式深入研究，最终用英语撰写调研报告并进行课堂展示。这一过程既能提高学生的英语读写能力，又能培养其团队协作和自主学习能力。

开展故事创作与讲述任务，激发学生创造力。要求学生基于游戏中的山西文化元素创作英语故事，可以是对游戏情节的续写，也可以是全新创作。通过课堂上的故事讲述比赛，学生能够锻炼英语口语表达和叙事能力，同时深化对山西文化的理解。

（三）合作学习教学法

组织小组文化项目合作，提升学生综合能力。学生分组开展与游戏文化元素相关的项目，如制作英语手抄报、拍摄英语短视频等。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学生需要分工合作，共同解决遇到的问题，这不仅能够提高英语综合应用能力，还能培养团队合作精神。

开展跨文化交流合作，拓展学生国际视野。通过与国外友好学校的学生进行线上交流，以《黑神话：悟空》为切入点，分享对游戏中文化元素的理解，讨论孙悟空形象在不同文化中的解读。这种跨文化对话不仅能提高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还能促进中西文化的相互理解。

5.基于《黑神话：悟空》的中学英语教学

5.1 词汇与短语教学

在词汇教学中，教师可充分利用《黑神话：悟空》中的丰富元素，将语言学习与游戏内容深度融合。通过选取游戏中的标志性场景，如“花果山”(Mountain of Flowers and Fruits)、“水帘洞”(Water Curtain Cave)等，教师能够引导学生学习相关英语词汇，同时鼓励学生运用“picturesque”(风景如画的)、“magnificent”(壮丽的)等形容词描绘这些场景的特色。

在角色词汇教学方面，教师可以系统介绍主要角色的英文名称，如“Sun Wukong”(孙悟空)、“Zhu Bajie”(猪八戒)等，并拓展相关的特色词汇，包括“golden cudgel”(金箍棒)、“somersault cloud”(筋斗云)等。这种教学方式不仅帮助学生掌握词汇，更使其在了解角色背景的过程中，深入体会中国神话人物的独特魅力和文化内涵[12]。

此外，游戏中的战斗动作和技能为动词教学提供了丰富素材。教师可选取“leap”(跳跃)、“strike”(打击)、“defend”(防御)等基础动词，结合游戏情节组织学生进行短语和句子练习。例如，通过“Sun Wukong can leap over long distances and strike the enemies with his

golden cudgel.”这样的句式练习，使词汇学习更加生动具体，有助于学生理解和记忆。

5.2 语法与句型教学

在故事叙述句型教学中，教师可借助《黑神话：悟空》的故事背景，引导学生学习故事叙述的句型结构。例如，教师可以给出游戏中的一个情节片段，让学生用英语进行描述，如“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monkey named Sun Wukong. He was born from a magic stone. He had great power and was very brave.”通过这样的练习，学生能够掌握过去时态、一般现在时态在故事叙述中的运用，以及如何使用简单句和复合句来构建连贯的故事[13]。

人物描写句型教学则可围绕游戏角色展开。教师可以示范如何使用“with...”结构、“have...”句型等来描写人物的外貌特征、性格特点和个人能力。例如“Sun Wukong is a character with remarkable strength and intelligence. He has piercing eyes and a furry body.”这样的例句，指导学生掌握人物描写的基本句式和表达方法。

5.3 文化内涵解读与讨论

在神话故事与价值观的教学中，教师应引导学生深入探讨游戏所蕴含的文化寓意。例如，通过分析孙悟空反抗精神的文化象征意义，组织学生讨论“What does Sun Wukong’s rebellious spirit represent in Chinese culture?”等问题，帮助学生理解这一形象所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正义、勇敢和自由的追求。

同时，教师还需引导学生探讨游戏角色所体现的传统价值观，如忠诚、友爱、坚韧等美德。以孙悟空与师兄弟间的情谊为例，组织小组讨论“How can we inherit and carry forward the traditional values of loyalty and friendship in modern society?”并要求学生用英语撰写讨论报告或进行口头汇报，从而在提升语言能力的同时强化对传统价值观的认同。

在文化符号与象征意义的教学中，教师应着重分析孙悟空作为中国文化符号的多重含义。通过展示不同艺术形式中的孙悟空形象，引导学生用英语描述其文化象征意义，如“Sun Wukong is a well-known cultural symbol in China. He represents the indomitable spirit and infinite wisdom of the Chinese people.”[14]。

此外，教师还需引导学生识别游戏中的其他文化符号，如佛教寺庙、道教符咒等，指导学生用英语解释这些符号的文化内涵，例如：“Buddhist temples in the game are symbols of religious culture and spiritual sustenance. They represent people’s pursuit of peace and enlightenment.”通过这样的教学活动，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提升其跨文化表达能力。

5.4 创意写作与口语表达活动

在故事续写与改编活动中，教师可提供游戏故事片段，要求学生进行英语续写创作。学生可以延续孙悟空的冒险旅程，或创作新的角色情节，在运用所学语言知识的同时融入传统文化元素。这种活动不仅锻炼学生的写作能力，更培养其文化融合与创新能力。

故事改编活动则鼓励学生对原作进行创造性改编，如将故事背景转换到现代都市或西方神话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学生需要考量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价值观和叙事差异，用英语完成改编创作，这有助于深化其对文化差异的理解，提升跨文化交流能力[15]。

在角色对话创作与表演中，学生分组选择游戏角色，创作符合角色性格特点和文化背景的英语对话，并通过角色扮演展示学习成果。例如，通过创作孙悟空与唐僧面对困难时的对话，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师徒关系，同时锻炼口语表达能力。

文化主题演讲活动要求学生选择游戏中的特定文化元素进行深入研究，并用英语进行主题演讲。从演讲稿撰写到现场表达，这一完整过程能够全面提升学生的逻辑思维、口语表达和文化阐释能力，增强其用英语传播中国文化的自信心。

5.5 跨学科融合教学

在与历史学科的融合教学中，教师可引导学生探究游戏所反映的历史文化背景。例如，通过分析游戏中的唐朝元素，介绍唐代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以及佛教、道教的发展传播，帮助学生理解孙悟空形象与唐代文化的历史关联，提升其对历史文化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

同时，教师可引导学生探讨游戏情节与历史事件的潜在关联，如将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情节与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相比较，从历史角度分析其中的文化意义，并用英语进行讨论阐述，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在与美术学科的融合方面，教师可指导学生分析游戏画面的艺术风格，特别是其中蕴含的中国传统绘画元素。通过引导学生用英语描述游戏场景中的水墨画风格特征，如“The landscape in the game is painted in a style similar to Chinese ink wash painting...”，提升学生的艺术鉴赏力和英语表达能力。

创意美术作品创作活动则要求学生基于游戏文化元素进行艺术创作，并用英语阐释作品创意。例如，学生在介绍以孙悟空为主题的绘画作品时，可以说明：“I used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techniques and colors to show his heroic image...”这种跨学科实践活动有效培养了学生的创新能力、艺术表现力和文化传播素养。

6.结语

将《黑神话：悟空》所承载的中华文化元素融入中学英语教学，不仅是对传统教学模式的有益补充，

更是在全球化语境下推动文化传承与语言学习深度融合的重要探索。通过语言教学、文化内涵解读、创意写作与口语表达活动以及跨学科融合教学等多种策略的实施，能够激发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英语语言技能，增强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解与传承意识，培养学生在跨文化交流中的自信与能力。

在实施过程中，学生得以在真实有趣的文化语境中学习英语，不仅掌握了语言知识，更建立起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与自信。与此同时，教师通过挖掘游戏中的教学资源，拓展了教学内容的广度与深度，使英语课堂成为传播中国文化、培养国际视野的重要阵地。

展望未来，中学英语教师应积极探索和创新教学方法，充分利用这一富有文化内涵的游戏资源，为学生提供更加丰富、多元和富有活力的英语学习环境，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使他们成为具有国际视野和文化传播能力的新时代人才。

参考文献：

[1] 李俊欣,高钦鹏.重走西游:中华优秀传统文化IP在《黑神话:悟空》中的转化与传播[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6(01):57-68.

[2] 梁燕.《黑神话：悟空》一座中国传统文化的“微缩数字博物馆”[J].标准生活,2024,(05):20-27.

[3] 张强.跟着“悟空”游山西文物古建[J].文化月刊,2024,(09):34-39.

[4] 张昀竹,太平.《黑神话:悟空》&《中华文化符号·撷英山西》……打开三晋宝藏[J].中国民族,2024,(08):96.

[5] 徐建华.“《黑神话:悟空》:一只猴子刷屏的背后”素材多角度运用示例[J].中学生阅读(高中版)(下半月),2024,(12):38-39.

[6] 党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理论要素、时代要求及实践要点——以《黑神话：悟空》的传播为例[J].理论导刊,2024,(12):96-101.

[7] 贾媛媛,王子焱.国产电子游戏《黑神话:悟空》的文化价值及对外传播策略探析[J].视听理论与实践,2024,(06):84-90.

[8] 曹书乐,石闵龙,何威.玩法为器，文化为魂：《黑神话：悟空》的国际传播与游戏推动文化走出去的创新机制[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06):119-131+171-172.

[9] 姜晓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中英语教学策略[J].学周刊,2024,(36):140-142.DOI:10.16657/j.cnki.issn1673-9132.2024.36.047.

[10] 王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小学英语课堂的策略研究[J].英语教师,2024,24(23):89-91.

[11] 徐丽莉.初中英语教学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及实践方法[J].英语教师,2024,24(23):29-32.

[12] 万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英语课堂中的有效融入[J].文理导航(下旬),2024,(12):52-54.

[13] 陈海贝.课程思政融入高校英语教学的路径研究与实践[N].精神文明报,2024-11-28(B02).DOI:10.28476/n.cnki.njswm.2024.000476.

[14] 张慧.初中英语教学中传统文化的渗透与融合[N].科学导报,2024-11-26(B03).

[15] 马永霞.将中华传统节日文化融入初中英语阅读教学的策略探究[J].甘肃教育研究,2024,(19):146-148.

追逐云彩的光辉，做未来科学家的守卫者

——《摇篮里的科学家》书评

杨晓岚[1] 俞雪琴[1]

（1.常州工学院 师范学院,江苏 常州 213000）

摘 要：本文摘录和介绍了经典名著《摇篮里的科学家》一书中的核心观点。主要内容包括：第一部分梳理了认知科学史，重点就婴儿先天具有知识建构的程序和学习的机制进行介绍；第二部分剖析了婴幼儿学习与发展过程中“先天知识、学习能力、他人指导”的三元耦合机制；第三部分关注了婴幼儿大脑的活动过程，以及对关键期理论提出的挑战；第四部分提出了“婴儿即科学家”的核心类比，揭示了二者在探究热情和思维方式上的相似本质。最后，在回顾这本经典著作内容的基础上，本文对全书的核心观点和价值进行了概括，即：成人应当以科学的态度观察和了解儿童，守护儿童无限的好奇心，做追逐云彩光辉的人。

关键词：认知发展；大脑可塑性；科学精神；早期教育；书评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重点）“医康幼一体化”学前融合教育机制的构建与实践路径研究（编号：B-b／2024/01/191）;常州工学院校级教学改革专项研究课题基于江苏省一流课程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的内涵研究及实践（编号：30120300100-23-yb-jgkt34）

DOI：doi.org/10.70693/jyxb.v1i4.109

Pursue the Brilliance of the Clouds, and Be the Guardian of Future Scientists

-- Book Review of "Scientists in the Crib"

Yang Xiaolan[1], Yu Xueqin[1]

1. Normal College of Ch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Jiangsu 213000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tracts and introduces the core viewpoints from the classic work The Scientist in the Cradle. The main contents are structured as follows: The first part reviews the history of cognitive science, focusing on the innate procedures for knowledge construction and learning mechanisms in infants. The second part analyzes the tripartite coupling mechanism of "innate knowledge, learning ability, and guidance from others" in the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The third part examines the activity processes of the infant brain and challenges to the critical period theory. The fourth part proposes the core analogy of "the infant as a scientist," revealing the fundamental similarities in their enthusiasm for exploration and modes of thinking. Finally, based on a review of the book's content, the article summarizes its core arguments and value: adults should observe and understand children with a scientific approach, nurture their boundless curiosity, and become those who "chase the brilliance of clouds.".

Keywords: Cognitive development; Brain plasticity; Scientific spirit; Early education; book review

作者简介：杨晓岚(1983—)，女，博士，研究方向为学前儿童语言发展与教育；
俞雪琴(1993—)，女，硕士，研究方向为学前儿童科学教育；
通讯作者：杨晓岚，276640294@qq.com

《摇篮里的科学家》一书是由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心理教授、著名的认知科学家艾利森.戈波尼克,以及华盛顿大学心理学教授安德鲁.N.梅尔佐夫和帕特利夏.K.库尔夫妇合著的。[1]书中作者用生动、幽默且具有诗意的表达方式，将认知科学中儿童心智的最新发现，与"儿童像操作中的科学家"的观点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通过科学家对早期儿童发展的描述，向我们展示了儿童发现世界的巧妙过程,不但清晰地描绘了婴幼儿和儿童的学习方式，还向我们提供了诸多洞察幼儿发展的丰富视角。[2-5]以下将结合书中内容从四大板块进行详细介绍。

一、思维的起源——认知科学亘古不变的焦点

在第一章中，作者从古老的哲学认识论入手提出问题：人的思维是如何产生的？人们是如何理解他人心理、外部世界和语言的？思维又是如何发展的？在探讨这个问题时，人们不得不回归到对生命起源点的关注，即我们的婴幼儿是怎样获得对人、世界和语言的理解与认识的，他们是如何开始思维并如何发展思维的。新近的科学论述中将婴儿比作是一种特殊的计算机，并指出婴儿具备的一些独有的特征："在婴儿最初的程序中已经有许多关于世界的知识建构；婴幼儿有强大的学习机制，允许它们自发地修改、重塑和重构他们的知识；婴儿有宇宙中最好的技术支持系统-成人"[1]5。追本溯源，苏格拉底、沃兹沃斯等哲学家最早从哲学角度对此问题就展开了争论，进而皮亚杰、维果斯基等教育理论家开始通过科学严谨的观察和实验分析进一步探讨儿童的发展，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二者不相同的是皮亚杰从生物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儿童是从遗传中获取知识，在其遗传密码中包含有天生的思想以及学习的能力，坚信"学习和吃东西一样自然"[1]11。维果斯基和他的学生则通过对塔塔尔部落人群的研究证实了阅读书写能力对知觉领会的深刻影响，强调成人对儿童认知的重要作用。虽然他们的观点不尽相同，但对儿童发展的贡献是同样伟大的，正是由于他们的理论都是基于对儿童认真细致地观察和实验。20 世纪 60 年代，发展心理学重新受到重视，随着女性研究者的逐渐增多以及研究技术的进步，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为婴幼儿的研究提供了条件，作者对这一阶段的概括是："我们开始认为观察和理解孩子是值得做的事情了"[1]15，充分表明儿童发展科学的研究真正受到了重视。于是在接下来的篇章中，作者通过系统介绍了近几十年来儿童发展研究的一些惊人科学成果，为我们展示了婴儿是如何了解他人、认识事物和学习语言的基本过程，让我们更加接近于了解这门学科、了解婴幼儿的发展。

二、先天基础、学习能力与他人指导——婴幼儿学习与发展的核心要素

在第二、三、四章中，作者分别阐述了婴幼儿对人、事物、语言的学习过程，并在第五章中详细论述了贯穿儿童发展过程中的先天知识、强有力的学习能力以及来自成人的无意识的指导这三大要素对婴幼儿学习和发展的重要作用，同时间接地反驳了与之相对的一些错误认识。

其一，儿童并非一无所知，婴儿出生时已经知道许多东西。研究发现刚出生的婴儿就能够从视觉和听觉刺激中区分出人的脸和声音，并且婴儿偏爱熟悉的脸和声音，譬如，他们会转向与妈妈皮肤相似的垫子，而不去注意其他的脸、声音和味道；婴儿能够从抽象光点构成的形象中将人形区分出来，并且表现出对人的形象的偏爱；即使是新生儿也能够模仿成人脸部的表情；婴儿已经知道各种不同样子的高兴的脸都是相同的，而悲伤的脸是不同的，表明他们具有最初的表情识别能力；九个月的婴儿就能够区分高兴、悲伤和生气等不同表情，如果打开一段让人高兴或是悲伤的音乐，婴儿会在与音乐相符合的脸上停留更长的时间等等。对于婴儿这种对人及人类情绪的敏感性，作者的解释是"大自然巧妙地给了我们一个跨越式的开始来认识- 他人思维的问题。我们可以直接地知道我们像其他人，其他人也像我们"[1]20。不仅仅是对人，婴儿对物体和语言也具有一定的认识基础。当我们给婴儿一个复杂的图片，婴儿眼动的过程表明他在追寻物体的外边线；幼小的婴儿不仅能够跟着他面前的物体一起运动，而且他们还能预测物体将怎样运动；婴儿的视觉能够感知物体的三维空间，著名的"视崖"实验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在本书中科学家们运用另一种实验同样得出了这个结论——很小的婴儿已经建立了大小恒常性的概念，无论球放置的远近位置如何他们都可以对球的大小作出准确的判断；婴儿能够将嘴里感觉到的橡皮奶头和它的视觉形象联系起来，甚至具有原始的唇读能力，至少可以读简单的元音。现代科学研究对此的回答是"我们有一种特殊的能力能够将我们感觉到的信息转换成对物体的描述" [1]41。婴儿对语言的敏感也同样令人惊异，研究发现"新生儿已经能区分物理声音和语音，而且把语音分成了更有吸引力的类别，并能区分世界上使用的所有语言" [1]70。

"婴儿的思维开始于把外界的信息转换成丰富、复杂、抽象、相关的表征的过程，这些表征允许婴儿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解释他们的经验，并对新的事件做出预测" [1]94。也就是说"从一开始我们就能理解世界，选择重要的时间，知道要期待什么，从出生开始，我们就运行一种程序能把光波和声波转换为人、物体和语

言”[1]97。比起婴儿已经知道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婴儿出生时已拥有了强有力的程序并随时可以运行。相反，诸多的生物遗传障碍研究也再次证明了先天基础的重要性，例如，孤独症儿童先天缺乏情绪理解的能力，威廉姆斯综合症儿童不能理解物理世界现象，语音障碍儿童即使听力和智力都正常，在语言上却出现混乱，特别是在阅读和写作中凸显出了极大的困难。因此婴儿所具有的先天的程序是后期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

其二，儿童并非一无所能，婴儿具有强大的学习能力。“婴幼儿的经验引导他们强化、更正、修改、重构、重组，有时取代他们最初的表征，并形成一种完全不同的丰富、复杂、抽象、相关的表征。当儿童从外界输入更多的信息时，他们用于转换、操作和重组输入的规则也会改变”[1]94。最初婴儿知道自己与他人是相同的，他们将自己与他人的情绪之间的连接扩展到了对外界的共同态度；一岁半左右，婴儿开始明白人与人之间是不同的，知道人们会有喜好，这些喜好可能与他们自己不同甚至对立，很快我们发现儿童似乎意识不到他们自己的信念已经改变，科学家们用一系列实验系统证明了儿童能够记得过去的事情，但是却不记得自己早些时候的信念。刚出生的婴儿可以分辨各种语音，然而到一岁的时候婴儿的语音分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的分类系统已经开始类似于他们文化中的成人，婴儿开始把这个混乱的语音世界组成一个复杂但一致的结构，而这种结构对他们特定的母语来说是特有的。“语言差不多是在学习中发明的”[1]76。婴儿并不是简单地把名字和事物联系起来，而是积极重建语言以满足自己的目的；他们似乎认识到词语的排列是有一定顺序的，并运用不同的词语排列表达不同的意思；儿童用大量自己的规则和语法来连接他们自己的语言，但重要的是这种规则的建立就是最初的语法。

婴儿具有强大的学习能力，就像一台生物计算机，然而他们所拥有的能力远比现时的最精密的计算机要强，“最奇妙的是这个最优质的程序还在不停地自我改变，形成了更有力和更精确的程序”[1]97。哲学家奥托•勒伦斯把知识比作我们航行中重建的船，为了保持船的漂浮，尤里西斯得不断地修理和重建它居住的船，婴儿的发展过程就好似在尤里西斯船上的航行，婴儿的“计算机”一开始就用一种特别的程序转换所输入的信息，将从外界获得的准确的表象转换成预测和行动，并不断地重组程序以适应外界新的规则，与此同时与人造计算机不同的是：“婴儿能做事，他们积极地介入世界之中，参与寻找发生在他们周围的事情，提出假设，进行验证，并寻找解释”[1]100。

其三，儿童并非完全依赖自身发展，他人在儿童发展中起到了促进和影响的作用。一岁左右，婴儿与人互动的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形成了由婴儿到他人到物的认知三角，婴儿会根据他人的表情来判断外界事物。在儿童语言学习过程中，“母亲式”语言的作用不容忽视，具体表现为：在与婴儿对话中，成人甚至是年长一点的哥哥姐姐都会不由自主使用一种特殊的语调与婴儿对话，我们通常将这种对话方式称为“母亲式语言”。研究发现婴儿表现出了对“母亲式语言”的偏爱，这种语言中的句子更加短小、简单，经常重复且很少有变化，特别是母亲式语言中完整的结构、拉长的辅音和元音等都在无意识之中帮助婴儿解决了语言的所有问题。母亲式语言是各种文化中最普遍的语言现象，同时也成为帮助儿童习得语言的最好范例。儿童学习中的一个重要参照物和影响因素就是成人，模仿是婴儿向成人学习的一种内在机制，成人所使用的语言和成人行为的方式已经在无形中对婴儿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不仅仅是父母，兄弟姐妹也同样影响着儿童。“我们对婴儿的直觉行为和婴儿对我们的直觉行为结合起来可令婴儿尽可能多地学会他们要做的事”[1]111。婴儿正是依靠他人获得关于世界的信息，在与世界的表象和周围人的协调中不断地改变和修正已经形成的表象。

他人对于婴儿产生的影响发生在无意识的各种行为之间，但是作者在这里强调：“他人不能简单地塑造儿童的行为”[1]111。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人对婴幼儿发展的巨大影响，就如同新生儿最初能够分辨各种语音，但是在短短的不到十个月时间内，他们的听觉系统已经形成了对于母语特定语言系统敏感的语音分辨能力，这正是因为受到了他们所处的生活环境中成人使用语言的影响。然而作者认为儿童有其自身发展的程序，“父母不是程序员，相反，父母似乎只是在适当的时候、提供正确的信息，以帮助儿童自己重新编程”[1]111。也就是说，并不是我们教儿童学会了什么，而是我们为儿童提供了学习的环境和条件，帮助他们完成了自身的学习。

三、大脑——经过进化设计的生物计算机

作者生动地将人的大脑比作一个“经过进化设计的生物计算机”[1]89，通过接收信息并将它转换成一串符号来运行工作，并形象地假设如果认知心理学家有足够的智慧给婴儿提供正确的输入内容，并解释他们的输出内容，我们同样能够找出婴儿大脑的程序。

大脑是思维发展的物质起源，新的科学技术 PET、FMRI 等让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到大脑的活动过程。“人类的大脑一旦启用便会不停的自我连接，重要的是它会深深地依赖经验去埋下线路，早期的经验不断地改变着大脑，婴儿所看见、听见、嗅到、触到和尝到的每一种东西都会影响大脑争取联络的方法”[1]118，这就是儿童早期大脑发展的重要特点。“研究表明儿童的大脑比我们成人忙，3 个月大的婴儿由于大脑的听觉区、视觉区和触觉区的活动量增加而需要燃烧更大量的葡萄糖。大约 2 岁时，大脑的能量估计完全达到了成年人的水平。3 岁儿童的大脑活跃程度是成年

人的两倍，在2- 3岁期间大脑突触的发展达到最高峰，每个细胞已达到15000个突触，比成人多很多。这些生物学的研究成果都证实学前儿童的大脑比成人更活跃，更有联结力和更有弹性，从神经学的角度看，不得不称作是奇特的天赋”[1]122。大脑通过儿童的一系列感觉器官与周围世界的接触不断建立新的连接，同时也不断删减废弃的连接以巩固一些特定的连接，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新生儿能够区别各种语言的语音，而一岁以后的儿童只对母语的语音更加敏感。

涉及大脑的发展，我们不得不谈到有关关键期的问题，科学研究证实“神经中枢在发展的最早期是独特的，并且深深地影响着往后的发展”[1]124，动物大脑发育的相关实验也证明某些经验必须限定在相当准确的时间段里获得才起作用，这似乎告诉我们大脑和思维的发展是存在着一定的关键期的。然而新的观点表明，人类“关键期的发展并不完全受生物钟的统治，关键期也不只是意味着成熟结束灵活的学习周期”[1]125，正如书中所列举的学习第二语言的问题，成人之后学习第二语言的困难是因为我们大脑在特定时期既定的表达原型干扰我们新的语言表达原型的建立，但我们也有可能通过创造干扰信号来避免干扰，夸大的言语形式就完全可以实现这种可能。虽然我们可能没有婴儿那样聪明，但新的证据表明，我们可能会比我们自己认为的更聪明。“甚至作为成人，当我们面对新的困难、不预期的环境或是非一般的刺激时，我们似乎能够再次改变连接”[1]128，这些论述极大地抨击了过分夸大儿童发展中关键期作用的偏激认识。

四、儿童与科学家——世界上最优秀的学习者

作者在文中多次将儿童比作科学家，认为儿童和科学家之间有着许多的相似之处，概括起来主要有两大方面：

首先，儿童和科学家一样充满着探究的热情。他们对世界充满着好奇，试图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探究，“两岁的淘气包显示的学习动力是多么有力而深刻。对于两岁的儿童来说，就像科学家们一样，找到真理比职业本身更重要，这就是热情”[1]25。科学家对于真理的追求也是同样充满着热情的，“甚至这种热情有时会让他们牺牲与人相处的快乐”[1]25。在人类儿童生命的头三年中充满了探索事物和实践的欲望[2]，这种动机是儿童理解世界的最纯粹的方式，同样科学家也致力于透过世界的表面试图去推论其深层的模型，儿童和科学家同样具有探索世界本原的强烈动力。

其次，儿童和科学家了解世界的方式是一样的。作者认为“儿童是通过成为心理学家来了解思维的。他们作出假设，进行实验，试图解释他们所看见的以及在已知的基础上建构新的理论等”[1]37。儿童在每天的游戏中对他们自己的想法进行实验，并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和解释他人的行为。这个由假设到实验到解释结果的过程与科学探究的过程不尽相似。作者认为儿童和科学家同样具有笃信真理的虔诚，“儿童和科学家同样可以忽视与他们的理论相矛盾的反例”[1]37，起初他们对自己的理论深信不疑，在经过反复的验证之后认可新的理论。儿童和科学家同样是基于自己已有的知识来学习和建立新的知识，“儿童利用他们已知道的知识，并把所知道的当成一种基础，从而学习更多的东西”[1]86。科学家的研究也同样包含了“依靠自己的力量”的过程：“科学家们也会利用他们目前的理论作为形成新理论的基础”[1]87。“科学家像儿童一样也有丰富、复杂、抽象、一致的世界表征，他们原有的理论将输入的信息——科学家们获得的证据转化成了更抽象的事实表征”[1]102，就像儿童通过游戏来检验他们对于周围物体的假设一样，科学家也同样是通过实验来验证自己的假设，并在实验和探索的过程中不断修正最初的理论，儿童也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认识世界，因此作者认为“儿童和科学家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学习者，而且他们操作的方式也很相似，甚至是一样的”[1]103，“我们认为儿童和科学家有相同的基本的认知机制。他们有相似的程序，并以相同的方式重构自己。他们建构理论，提出和检验预测，寻找解释，进行实验，根据新证据修正已有的知识，这些能力是科学成功的核心因素”[1]106。

作者甚至认为科学家们“伟大的科学天赋结果是得益于对他们发展时间表的轻微改变：他们将自己的大脑停留在婴儿期的时间比我们长”[1]128。这就是说科学家们保留着婴儿期一般对世界探索的热情和动力，拥有着强烈的学习的动机和能力，正是这种对世界的好奇之心，推动科学家们不断去假设、验证、修正和创建新的理论。

五、思考与启示——做追逐云彩光辉的守护者

阅读完全书之后，在一方面感叹婴儿学习和发展的巨大潜能的同时，另一方面也深深地感受到了作者所传递给我们的一种科学的精神。在以往的认识中，科学在我们眼中一直是深奥而不可及的知识，然而本书却为我们打开了了解科学的神秘大门，作者通过一个个生动有趣的科学实验，以及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例子让我们理解了科学家们所从事的工作，了解了有关儿童发展科学的相关知识，更重要科学家们客观和严谨的科学态度，笃信真理的科学信仰，充满热情的科学追求给了读者莫大的震撼。

综观全书，作者在全篇通过有关新生儿听觉、视觉、动觉、思维的无数个科学实验再次证实了这一点，遗传、环境乃至先天的生理机制让我们与生俱来拥有独特的生理和心理基础以及不同于动物的强大学习能力。尽管儿童的发展离不开成人的影响，但是正如本文的作者所阐述的，成人并不能更改和设计儿童原有的程序，并不是教授者，而是帮助者。儿童已知的和其自身发展中的巨大的学习潜能是不可忽视的，婴儿最美好的地方是他们那无限的好奇心，而我们要做的

就是对儿童的充分肯定和细心观察。对婴儿最深刻的洞察产生于对婴儿的专心观察，专心观察婴儿能使我们以完全不同的态度对待他们，与此同时，这种“对儿童的观察也在某种程度上唤醒了我们自己的好奇心和求知欲”[1]138。

对大脑的一系列研究已经证实了关键期的存在，然而，关键期对于学前儿童乃至人的一生的发展究竟应当发挥怎样的作用，我们应当怎样看待关键期的问题呢？是否错过了关键期将为儿童一生的发展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呢？本文中作者通过科学的实验，客观分析和评价了关键期，并提出“关键期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发展和学习的终结，适宜的刺激是可以改变人的发展”的观点，这也让我们对关键期的问题有了一个更加科学的态度，关键期的发展是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重要的是不要轻信对于某一方面的片面夸张，客观地承认它的存在，很好地利用儿童的关键期发展其各方面的能力，然而关键期的终结并不片面等于能力的缺失和发展的终止，运用适当的方式帮助儿童更好的发展，这就是科学的态度。

与以往不同的是，本书中并没有针对父母或者我们教育工作者应当怎么做的问题给予明确的指导，其实科学的精神也正是这样，我们所知道的是儿童是怎样成长和学习的，然而我们却不能人为地去改变儿童固有的程序。最后一章作者的命名是“追逐云彩的光辉”，似乎将儿童比作五彩斑斓的云彩，而将成人比作追逐云彩光辉的人，指出“真正关心婴儿的人对儿童成长科学的研究不应局限于技术科学杂志或者报纸咨询栏目所提供的内容”[1]130，这就是说我们应当用一种科学的态度来真正观察和了解我们的孩子。作者认为科学对成人提出的“最重要的和最确定的建议是：父母即成人在正常情况下需要安排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发挥天赋的能力去帮助婴儿学习”[1]132，由此可见成人仅仅是帮助儿童发展的有力臂膀，而不是去改造和控制儿童的发展。作者指出“科学的精神不是指我们需要专家告诉我们如何培养孩子，我们需要的是时间、空间和机会去做我们能够做的事，这恰恰是我们正在丧失的”[1]134。

最后作者以这样的一段话结尾：“我们可能不认为与婴儿调情（互动）有助于解决他们思维的问题，不认为玩捉迷藏的游戏有什么哲理性，不认为与婴儿谈话有助于回答有意义的问题，但是，这正是发展认知科学所发现的，我们人类似乎天生地要通过追求普通的小快乐去完成我们伟大的项目”[1]139。陪儿童一起探索世界，完成他们的科学活动，在看似简单的对话和游戏中完成儿童对世界最复杂的理解、认识和学习过程，这就是我们能做的。让我们的婴儿保留着科学家一般对探索真理的热情和好奇，保留着可贵的笃信真理的科学态度，努力为他们提供发展需要的空间，保护儿童可贵的好奇之心和探究精神，让这些摇篮里的科学家们健康成长，终有一日成为未来真正的科学家！

参考文献：

[1] 艾利森.戈波尼克，安德鲁.N.梅尔佐夫，帕特利夏.K.库尔著，袁爱玲,廖莉,任智茹等译. 摇篮里的科学家[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2] 程杨,金昌涛.从《摇篮里的科学家》谈儿童认知发展[J].考试周刊,2017,(08):184-185.

[3] Parker S .The Scientist in the Crib[J].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 Behavioral Pediatrics, 2002, 23(1).

[4] D'Arcangelo M .The Scientist in the Crib: A Conversation with Andrew Meltzoff.[J].Educational Leadership, 2000, 58(3):8-13.

[5] Gopnik A , Meltzoff A N , Kuhl P K .The Scientist in the Crib: What Early Learning Tells Us About the Mind[C]//Tells Us About the Mind,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2010.

大学生户外运动热潮中的消费景观与生活实践

赵海呈[1] 杨晨飞[1] 但懿[1]

（1.玉溪师范学院体育学院，云南 玉溪 653100）

摘 要：近年来，徒步、露营、骑行等户外运动在大学生群体中迅速升温，专业装备、精致营地与社交媒体打卡共同塑造出一种新的校园景观。表面上，这一热潮体现了健康意识和休闲方式的扩展，但置于消费社会与景观理论视野，可见其中蕴含明显的消费主义取向和景观化倾向，身体实践与日常经验有被符号化消费遮蔽的风险。结合德波关于景观社会的论述以及国内体育消费文化与户外运动人文价值研究，本文分析装备崇拜、网红路线与媒介呈现如何重组大学生的户外经验，并从身体劳动、地方经验、时间结构和关系网络等方面揭示其对生活实践维度的压缩。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若干转向路径，包括推动户外运动的日常化与在地化、倡导朴素而可持续的身体文化、扶持以实践为中心的学生共同体，以及在高校体育教育话语中突出生活方式与公共性。

关键词：消费景观；户外运动；体育消费文化；生活实践；大学生

基金项目：玉溪师范学院 2024 年教学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202401）

DOI：doi.org/10.70693/jyxb.v1i4.110

Consumer Spectacle and Lived Practice in the Boom of Outdoor Activities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Haicheng Zhao[1], Chenfei Yang[1], Yi Dan[1]

1.Faculty of Physical Education, Yuxi Normal University, Yuxi,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outdoor activities such as hiking, camping and cycling have rapidly gained popularity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Branded equipment, refined camping setups and social media check-ins together shape a new scene of campus life. On the surface, this boom seems to reflect rising health awareness and a diversification of leisure choices. Viewed through the lens of consumer society and spectacle theory, however, it also reveals clear tendencies toward consumerism and spectacle, with bodily practice and everyday experience at risk of being absorbed into symbolic consumption. Drawing on Debord's notion of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as well as domestic research on sports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humanistic value of outdoor activities,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gear worship, popular routes and media presentation reorganize students' outdoor experience, and shows how they compress the dimension of living prac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bodily labour, local experience, time structure and relationship networks.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proposes several possible shifts, including promoting the everyday and place-based character of outdoor activities, encouraging a simple and sustainable body culture, supporting student communities centered on practice, and highlighting lifestyle and publicness in the discourse of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Keywords: Consumer Spectacle; Outdoor Activities; Sports consumer Culture; Lived Practice; University Students

作者简介：赵海呈(2003—)，男，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户外运动教学与实践；
但懿(1989—)，女，博士，讲师，研究方向教育与领导力。

通讯作者：杨晨飞（1989—），男，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户外运动理论与产业。

走进今天的高校校园，围绕户外装备与路线选择的讨论已逐渐成为大学生日常交往的一部分。关于某款冲锋衣在影像呈现上的效果、不同品牌徒步鞋的性能与性价比，以及整套户外着装的搭配建议，时常出现在宿舍谈话与网络社群之中。各类社交媒体平台持续推送面向大学生的露营攻略、骑行路线和装备推荐，邻近高校的山地与湖岸在周末呈现出明显的学生聚集式户外休闲景观，成为相关消费与实践活动的集中承载空间。表面上看，这种变化意味着学生更加重视体力活动和自然体验，校园生活从教室、宿舍的直线开始向更广阔的空间延伸。与此同时，体育消费文化研究提醒我们，体育参与与消费主义之间从来就存在复杂的张力[1]。当体育被包装为可供购买与展示的生活方式符号时，人的主体性很容易被品牌、流量和平台逻辑牵着走。体育消费文化的反思指出，当“健康”“阳光”的表层话语覆盖了体育产业化和消费主义逻辑时，参与者对自身处境的批判性意识往往会被削弱[2]。户外运动研究则表明，户外实践在本质上并不仅仅是一组技术动作或装备组合，而是与自然生态、地方文化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长期实践过程[3]。当大学生以周末项目的方式走向户外时，他们究竟在体验什么？是在参与一种新的生活实践，还是在消费一套被包装好的自然景观？这两种理解在当下往往交织在一起。因此，有必要在体育消费文化与景观理论的视野下，对大学生户外运动热潮进行一次文化层面的反思，尝试回答三个问题：

第一，这股热潮在多大程度上被消费主义与景观逻辑所塑造？

第二，在“看上去很户外”的图像背后，被遮蔽的生活实践维度是什么？

第三，高校是否可以通过教育和制度安排，引导这股热潮朝着更具实践深度和公共价值的方向发展？

一、理论视角：消费社会、景观与体育消费文化

（一）从消费社会到体育消费文化

消费社会理论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已从以生产为中心转向以消费为中心，消费不再只是满足生存需要，而是成为身份认同、阶层区分和意义建构的重要方式[4]。在体育领域，体育消费不仅包括门票、赛事转播和周边产品购买，还包括体育旅游、健身服务和与运动相关的形象消费。当体育以“健康消费”的形式出现时，既折射出现代社会对身体管理的重视，也不可避免地卷入消费主义文化，其审美化倾向可能导致身体经验的平面化[2]。体育消费文化的反思与重构研究揭示，当体育消费不再强调身体实践与精神体验，而过度突出品牌、符号和物质堆砌时，人们对体育的理解会发生偏移：体育变成“看上去健康”的标记，而不是一种持续的生活实践[1, 5]。这种偏移在户外运动领域尤为明显，昂贵装备和精致营地布置很容易被视为“是否真正热爱户外”的外在标尺。

好生活的期待密切相关，其价值不应仅限于经济产出或消费扩张，还涉及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地方文化认同与生态文明建设[3]。在他们看来，户外运动的快速发展与体育人文价值研究的兴起在时间上有所重叠，这恰恰说明人们在实践中不断追问“如何生活”这一根本问题[3, 8]。这一视角为我们理解大学生户外运动提供了重要线索：如果将户外运动视为一种生活实践，而不是一次消费事件，那么关注的重点就会从“买了什么装备”“去了哪个网红点”转向“如何与自然相处”“如何与同伴协作”“如何在重复实践中重塑生活节奏”。这意味着，需要从批判消费景观入手，但不能停留在否定层面，而应进一步探讨如何将户外运动重新嵌入日常生活和公共文化之中。

（二）德波“景观社会”与体育景观化

德波在《景观社会》中指出，在高度发达的商品社会中，现实生活逐渐被图像和表象取代，景观成为统摄社会关系的中心媒介[6]。景观不仅是视觉现象，更是一种社会关系，它通过图像的生产和消费，使人们的经验被固定在可观看和可再现的形式之中。体育领域的媒体奇观研究进一步表明，在全媒体环境下，精心构造的赛事图像和体育娱乐节目构成了新的景观形态，观众不断消费这些景观，却很少参与真实的身体实践[7]。在户外运动场景中，景观逻辑体现为对“好看”的强烈追求：流行路线、网红营地、打卡点位被不断复制和传播，自然空间被编码为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展示的图像背景。学生参与户外运动的过程，常常被浓缩到几张精修照片、一小段短视频和若干标签之中，身体劳作、困难时刻和沉默时段则被剪裁掉。换言之，户外运动逐渐被建构为一系列可分享、可点赞的景观单元。

（三）户外运动人文价值与生活实践视角

与消费和景观视角形成对比的是，户外运动人文价值研究强调户外实践与自然伦理、地方社会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内在联系。相关学者在讨论中国特色户外运动的人文价值时指出，户外运动的兴起与群众对美

二、大学生户外运动热潮中的“消费景观”面向

（一）装备崇拜与身体的“包装化”

在许多学生的社交媒体页面上，户外运动首先呈现为“穿什么”：什么品牌的冲锋衣在今年秋冬“必备”，哪一款登山鞋“适合新手又专业”，帐篷、天幕、折叠椅的颜色和风格是否协调。装备选购指南远远多于路线规划和风险判断的讨论，一些学生几乎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装备搭配之中。从体育消费文化视角看，这种倾向与体育消费审美化、符号化的逻辑高度一致[1—2]。装

备不再只是保护身体、适应环境的工具，而成为可见的身份标记。昂贵的装备象征“专业”“资深”“懂行”，即便对一些同学来说，参与户外运动的次数并不多。身体在这种结构中被“包装化”，被遮蔽在多层功能性面料之下，以品牌和外观作为主要被感知对象。这种装备崇拜的一个后果，是学生在户外运动准备阶段花费了大量时间与金钱，却并未真正理解自身身体状态与环境条件之间的匹配关系。装备带来的安全感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实的，但如果安全感完全建立在品牌和价格之上，身体对环境的敏感度反而容易减弱。

（二）网红路线与目的地的景观化编码

在选定目的地时，许多学生会习惯性地搜索“适合拍照的山”“最出片的露营地”。各种旅游平台、社交媒体账号和视频博主已经提前完成了路线分级与价值排序，如某条线路被称为“某地小香格里拉”，某个观景台被标记为“必须拍照的机位”。学生在这样的信息结构中做选择时，很容易被预设好的景观代码牵引。这些路线与目的地本身固然可能风景优美，但被统一编码为“打卡点”之后，它们在体验层面呈现出高度相似性。不同学校的学生在不同城市周边进行徒步时，看到的往往是别人的同款照片和同款姿势。景观的意义从“在场经验”转向“可复制图像”，自然环境被简化为拍照背景，地方社会和生态环境则退居到视线之外[3, 6]。这种景观化编码有其便利性，学生可以快速找到出片率高的目的地，也能在有限时间内获得较好的视觉体验。但从生活实践角度看，这种便利有可能降低学生对地方环境和文化的主动探索意愿，使户外运动沦为一场事先被设计好的视觉消费之旅。

（三）社交媒体“打卡”与算法放大的观看逻辑

大学生户外运动经历往往以照片和短视频的形式被重新组织并呈现在社交平台上。滤镜、字幕、音乐和剪辑将整个活动压缩成几十秒的“高能片段”，艰难路段、队友争论、疲惫低落等片刻则被有意无意地删除。对于观看者而言，户外运动被塑造成一场轻盈、顺畅且高度可见的体验。媒体奇观研究指出，在新业态下体育媒体不断生产“豪华场面”和“全民狂欢”，观众在虚拟符号的消费中获得满足，却难以意识到被景观结构塑造的价值取向[7]。在大学生户外运动场景中，这种逻辑也在发挥作用：点赞和评论数量成为评估一趟活动“值不值得”的指标，活动本身是否带来生活方式的改变，反而很少成为讨论重点。更为重要的是，在算法驱动的内容推荐机制下，平台会不断将类似内容推送给用户，强化“露营就应该长成这样”“骑行就应该去哪儿”的想象。学生在看似自由选择的过程中，实际上逐渐被纳入一套既定的景观体系，身体实践被重新组织为适合观看和复制的模板。

三、淹没的生活实践：从“看上去很户外”到“真正活在户外”

消费景观并不否定实践本身的存在。即便在高度景观化的环境中，大学生依然需要背负背包上坡、搭帐篷、熬夜看星星。问题在于，当对外呈现的景观越来越占据注意力时，许多具有生活价值的经验容易被忽略或轻描淡写。

（一）身体劳动与辛苦经验的被遮蔽

几乎所有初次参加长距离徒步的学生，都经历过某个时刻：双腿发软、背部酸痛、呼吸急促，步伐变得沉重。这种身体劳动经验是户外运动区分于室内健身的一个重要维度，它让人直面身体的极限与韧性。然而，在最终呈现的照片和视频中，大多数人选择保留的是“登顶合影”“笑着跳跃”的瞬间，辛苦过程则被淡化为简单一句“有点累”。从生活实践视角看，这种删减会使外人对户外运动形成偏差想象，也会削弱参与者反思的机会。辛苦经验不仅关乎克服困难的成就感，更关乎对自身身体节奏的重新认识。倘若所有“难熬时刻”都被快速略过，户外运动就很难成为修正日常生活方式的契机。

（二）地方社会与生态语境的背景化

许多高校周边的户外线路往往紧贴村落、农田或小镇，学生在行程中会不经意地穿过别人的生活空间。然而，社交媒体上的呈现多聚焦于山、水、天和帐篷，很少有人认真记录与当地居民的对话、对土地利用方式的观察以及对环境承载力的思考。户外运动人文价值研究提出，户外实践与乡村振兴、地方文化传承和生态文明建设存在天然关联[3, 8]。如果学生只把这些空间视为适合拍照的背景，而不关心当地生活方式和环境压力，户外运动便错失了作为公共文化实践的机会。在乡村旅游与体育产业日益结合的背景下，这种“背景化”倾向更值得警惕。

（三）时间结构的碎片化与难以持续的生活方式

大学生户外运动往往以周末项目、节假日活动的方式出现。一次活动结束后，日常生活很快回到考试、作业和实习之中。许多学生在一次活动后，需要很久才会再次行动。社交平台上密集出现的户外内容，让人产生“人人都经常在户外”的错觉，但个体实际参与频率往往并不高。消费社会强调“即时满足”和“快节奏更新”，活动被当作一项项短期项目，而不是慢慢沉淀的生活方式[4—5]。户外运动一旦被纳入这种节奏，便难以发挥调节生活节奏、重塑作息结构的作用。“一日山野”确实能带来短暂放松，却不一定能改变长期的久坐、熬夜和缺乏日照的状态。

四、从消费景观走向生活实践：可能的转向路径

在消费社会语境下，大学生户外运动很难完全摆脱景观化倾向，但这并不意味着实践维度必然被吞没。

只要在制度安排、社团运作和个体选择上做出一定调整，景观结构内部仍然存在向生活实践转向的空间。

（一）将户外运动从偶发事件转化为日常生活方式

当前不少学生参与户外运动的方式，大体可以概括为，在长时间高压学习与屏幕环境之后，利用节假日安排一次远距离出行，以集中方式完成放松和补偿。这种模式当然具有缓解压力的功能，却很难真正改变日常生活结构。身体在漫长的备考和熬夜中依然被过度透支，山野只是日历上偶尔出现的一次短暂中断。如果把目光从单次活动转向更长时段，可以看到另一种可能：把户外运动从例外经验转变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空间层面，不必把目标设定在遥远的名山大川，而可以从校园和城市边缘那些步行可达的空间出发。学生在同一条河岸、同一段山路、同一片林地中反复行走或骑行，在这种往复中逐渐熟悉坡度、气味、光线和人流变化，对日常环境的感知因此变得更加立体。原本只是“背景”的城市边缘，渐渐呈现出自己的纹理和节奏。时间层面，户外运动可以从偶尔的大块时间，转化为相对稳定的小块时间。例如每周一次夜间步行、隔周一次半日徒步，在不打乱学习节奏的前提下，让身体持续在空间中展开。运动不再只是为了终止疲惫，而是在悄然改写时间使用方式。许多学生事后回忆，改变往往并非来自某次轰动性的远行，而是来自一段时期内坚持以步行回宿舍、定期走向城郊的习惯。从存在论角度看，这种日常化意味着，生活的重心不再完全压在“将来某一天”的安排上，而是在当前可触及的时间和空间中为身体留出位置。山不一定要高，路不一定要远，关键在于身体在这种重复中获得了可以依托的节奏。

（二）重建朴素而可持续的身体实践取向

在装备高度商品化的环境中，坚持朴素的身体实践并不容易。许多学生第一次接触户外运动时看到的，就是完整装备清单和精致营地图。视线很自然地落在外在物品上，似乎只有在拥有某种鞋、某种背包、某种帐篷之后，才算真正进入这一领域。时间一长，身体在心理秩序中的位置被推到物品之后，仿佛是对装备的填充。如果回到身体本身，会发现装备的意义有必要重新排序。安全装备当然不可或缺，但在满足基本安全需要之后，更多物品未必带来更深的体验。一些学生在回顾时常常提到：记忆最深的并不是第一次背着全新装备出行，而是与同伴一起修补旧背包、在雨夜搭起略显简陋的帐篷，那些时刻带来的安心感，更多来自手上的动作和彼此之间的信任，而非商标和价格。朴素实践并不是否定物质条件，而是改变身体与物之间的主从关系。可以通过共享和循环使用来调整消费结构，例如社团建立公共装备库，鼓励毕业生留下仍可使用的器材；在讲解时不以品牌划分“行家”和“新手”，而是强调对天气的判断、对节奏的把握以及对同伴的照顾。随着这种评价标准的变化，真正被视为经验的，不再是拥有多少装备，而是能否在变化环境中保持清醒和可靠。从哲学视角看，这是一种价值重心的转移。人们从占有外物转向实践能力，从追求新奇转向对世界具体应对方式的培养。学生在这种转移中逐渐意识到，支撑自己在不确定环境中不慌乱的基础，并非物品本身，而是身体与环境长期磨合形成的默契。

（三）扶持以实践为中心的学生共同体

户外运动多在团队中完成，身处队伍之中，人会更直接地体会“在一起行动”意欲何为。有人擅长规划路线，有人关注队尾安全，有人熟悉天气变化，有人善于缓和情绪。共同体并不是抽象概念，而是通过一段路程、一顶帐篷、一顿简易晚餐在许多细节里被一点点塑造出来。高校现有的户外社团、骑行小组、登山协会，本身就是实践共同体的雏形。关键在于，这些组织是主要围绕活动结果运转，还是围绕共同生活与学习运转。如果过度倾向于前者，社团容易退化为活动供应平台，成员之间的联系主要体现在项目合作上；如果逐步发展为后者，户外实践就会自然带上生活的重量和长线关系。

学校在提供支持时，可以在安全底线之上保留足够的自主性，使学生有空间以自己的节奏组织活动，而不必事事对接竞赛、评奖和展示。社团内部则可以通过一些具体安排强化实践导向，如活动前共同研判天气和路线风险，活动中轮换角色，让更多人体验领路、照看队尾或记录的责任，活动后在分享会上不仅展示照片，也谈迷路时的紧张、体力透支时的犹豫、意见不合时的磨合。这些看似日常的讲述，实际上包含明显的存在论意味。学生在回忆这些片段时，会被迫面对平时不常追问的问题：在不安的时候，我最先想到的是保护自己还是照顾他人？在需要做出决定的时刻，我更依赖习惯、权威，还是愿意和同伴共同承担？这类反思并不需要借助复杂术语，却在无形中触及“我是谁”“我如何与他人共处”的根本问题。

（四）在高校教育话语中突出公共性与生活意义

高校如何描述户外运动，对学生的理解和选择有着重要引导作用。如果相关文本只强调消费潜力、产业带动等经济指标，学生自然会倾向于把户外运动视为一种消费场景，在其中追求的是购买和展示。如果教育话语能够更多地将其放入生活质量、公共责任和生命经验等框架之中，参与者的自我理解就会随之发生偏移。

在课程大纲、项目介绍和宣传材料中，可以优先强调户外活动与身体健康、时间管理能力、环境伦理意识、团队协作以及地方认知之间的联系。例如，在说明一次徒步活动时，可以重点介绍海拔变化、植被

类型、地质条件以及沿途村落的生活方式，引导学生把行程视为一次对环境和社会的现场观察，而不仅是完成路程的任务。在总结环节中，可以鼓励学生谈谈对节奏安排、对队友状态的感受、对当地生态压力的直观印象，而不是只停留在“风景很美”“照片效果不错”的评价上。户外运动同样可以纳入生命教育的讨论。教师完全可以在合适的课程中提出一些与学生经验紧密相关的问题：为什么需要离开熟悉空间？在体力濒临极限时，是怎样看待继续前行与选择止步？在自然环境中体验到渺小与脆弱之后，是否仍然以同样方式看待成绩、排名甚至挫折？这些问题不必被说得过于宏大，只要与具体经历相连，就能够为学生打开另一种理解自身和世界的入口。

从整体来看，当高校愿意以生活实践、身体经验和公共参与为关键词来建构户外运动的意义时，就在悄然调整一套价值排序，即不再将消费规模视为成功的主要标志，而是以能否帮助学生学会和自己、他人、环境相处为标准。对个体而言，这意味着在评价一段经历时，会更多问一句“它对我的生活方式产生了什么影响”；对校园文化而言，这也是在消费社会逻辑之内，为实践与反思保留的一块空间。

归根结底，从消费景观走向生活实践，并不是否定消费本身，而是避免让消费成为解释一切的唯一语言。当更多大学生愿意在户外运动中关注身体的感受、时间的节奏、地方的记忆以及与他人的关联，这股热潮就有可能不只停留在图像层面，而是在具体生活中留下更为持久的痕迹。

五、结语

大学生户外运动热潮在消费社会和数字媒体背景下出现，它不可避免地带有消费景观色彩。精致营地、网红路线和社交媒体打卡构成了当代校园的一幅新景象。这一景象既使户外运动更具吸引力，也隐藏着将身体实践、地方经验和公共性淹没在图像之中的风险。体育消费文化研究提醒我们警惕消费主义对身体与生活意义的侵蚀，户外运动人文价值研究则指出，户外实践仍然有能力承载人与自然、地方社会和生活方式之间的深层联系。在两种视角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非此即彼关系。事实上，每一位走向户外的大学生，都在景观与实践之间不断做出选择：是在照片里完成一次旅行，还是在身体记忆和生活节奏中延长这次经验。对于高校来说，关键不在于简单地鼓励或限制户外运动，而在于如何通过课程、社团和制度，在消费景观之外为生活实践留出空间；对于学生自身而言，重要的是在“看上去很好玩”的画面之外，认真对待身体的辛苦、地方的复杂以及关系的责任。只有当户外运动真正成为日常生活和公共文化的一部分，而不是一次次单独的消费事件，我们才能说，这股热潮从消费景观走向了生活实践。

参考文献

[1] 孔维峰。我国体育消费文化的反思与重构——从“乔丹体育”侵权事件谈起[J]。体育学刊，2012，19（05）：33—36。

[2] 赵晓琳，竺大力。新时期传媒对体育文化产业的影响分析[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18，38（02）：28—31+47。

[3] 杨占东，于涛，董耀华，等。中国特色户外运动的人文价值考量——基于中外户外运动人文价值的对比分析[J]。体育科学研究，2024，28（06）：33—39+87。

[4] 张为民。消费主义文化视角下的体育功能转型[J]。体育文化导刊，2017，（01）：16—18。

[5] Baudrillard J。 The consumer society： myths and structures[J]。 1998。

[6] 居伊·德波。景观社会[M]。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05：251。

[7] 李哲。新业态下体育媒体奇观意义呈现及其价值多元化研究[D]。暨南大学，2017。

[8] 王莉，胡贝贝。户外运动研究问题透视与展望[J]。体育科学研究，2018，22（02）：54—59。

习近平总书记致第九次少代会贺信的内涵阐释、时代机理及实践进路

许彤[1] 刘衡宇[1,*]

（1.锦州医科大学，辽宁 锦州 121001）

摘 要：在中国少年先锋队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对大会召开表示祝贺。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致第九次少代会的贺信精神，是全国各级共青团组织、少先队组织的首要政治任务。新时代新征程，呼唤新担当新作为。新征程上，要加强党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领导、促进少年儿童德智体美劳立体化、发展保障少年儿童全方位健康成长成人成才、建设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少先队工作队伍、做牢做实少先队组织基层基础工作、聚合社会力量推动少先队工作紧跟时代；从而于实践中学习领悟贺信精神，推动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创新发展。

关键词：少先队；贺信；少年儿童

基金项目：山东省青少年教育科学研究院 2025 年度大学生职业规划课题“以加强共青团青年统战工作赋能各界青年建功立业”（25ZSY051）；共青团云浮市委 2025 年度云浮市青年发展研究课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共青团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径研究”（YF-2025-QFY013）。

DOI：doi.org/10.70693/jyxb.v1i4.111

The Connotation Explanation, Era Mechanism and Practice Progress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Congratulatory Letter to the Ni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Young Pioneers of China

Tong Xu[1],Hengyu Liu[1,*]

1.School of Marxism, Ji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Jinzhou, Liaoning

Abstract:On the occasion of the opening of the Ni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Young Pioneers of China,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sent a congratulatory letter to congratulate the convening of the Congress. Studying in depth the spirit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congratulatory letter to the Ni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Young Pioneers is the primary political task of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and Young Pioneer organizations at all levels across the country. A new journey in a new era calls for a new role and new behavior. On the new journey,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Party's leadership of the work of children and youth and the Young Pioneers, promote the three-dimensionality of children's morality, intelligence, physicality, aesthetics and labor, develop and guarantee the all-around healthy growth of children and youth, build a high-quality and professional Young Pioneers' workforce in the new era, do the grass-roots infrastructure of the Young Pioneers' organizations, and aggregate social forces to promote the work of the Young Pioneers to keep up with the times; thus, we will learn to understand the spirit of the congratulatory letter and promote

作者简介：许彤(2002—)，女，硕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与青年教育；
刘衡宇(1976—)，女，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与实践。
通讯作者：刘衡宇

the work of children and Youth and the Young Pioneers' innovations. In this way, we can learn and understand the spirit of the letter in practice, and promote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and youth and the work of the Young Pioneers.

Keywords:Young Pioneers; Congratulatory Letter; Children and Youth

一、引言

中国少年先锋队是中国少年儿童的群团组织，是少年儿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预备队[1]。自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关心关爱少年儿童茁壮成长，聚焦于培育党的未来工作接班人的关键要义，从事业发展、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长远视角切入，对少年儿童工作和少先队工作的核心宗旨、工作方法、改革策略、实践理路等重要理论与实际问题提出众多创新性见解及思考，形成习近平有关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

2025 年 5 月，中国少年先锋队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圆满闭幕[2]。作为党带领各界人民群众开创我国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事业的宝贵结晶及最新节点，习近平总书记致第九次少代会的贺信不仅构成了习近平青年工作观的最新发展成果，更为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提供了理论依托[2]。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致第九次少代会的贺信所蕴含的精神，对于赋能新时代我国青年事业发展，持续助力青年工作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二、贺信的内涵阐释

习近平总书记于贺信中提出：“新征程上，少先队要高举队旗跟党走，聚焦培育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根本任务，着眼于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教育引领广大少先队员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2]。想要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第九次少代会的贺信所蕴含的精神，就亟待于深化少先队事业建设之中弄懂、弄通蕴含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论述的深刻内涵。

（一）新时代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要坚持锚定政治航标

政治性是少先队全部工作的原点与归宿。少先队必须把对党绝对忠诚写进组织基因，把“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转化为少先队员可感可知的精神坐标；以“四个意识”校准方向，用“四个自信”凝聚力量，以“两个维护”检验行动，确保红色基因代代相传[3]。习近平总书记将“党、团、队”依次定位为“先锋队、突击队、预备队”，指出“入队、入团、入党”是青年向往政治跃升的“人生三部曲”，为新时代育人链条标注了清晰刻度[4]。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共青团必须扛起自身肩负的政治责任，把“为党育人”的核心目标置于首位，把政治引领贯穿队、团、党衔接的每一环节；突出情感启蒙与价值观塑造[5]，在推优入团环节强化政治考察与仪式教育，在推优入党阶段注重骨干历练与理论淬炼，实现链条无缝衔接、阶梯递进。要教导少先队员聆听总书记教诲、对标总书记要求，把朴素爱戴转化为勤奋学习、全面发展、矢志报国的日常行动，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二）新时代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要坚持践行使命要义

少先队自诞生之日起就把培育共产主义接班人刻进血脉。初心所指、使命必达，新征程上，少先队更要把思想政治引领置于顶层设计，让红色基因渗进血液、透入灵魂，引导少年儿童从小树立宏远目标，立志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在风雨中练筋骨，在斗争中强意志，使每一条红领巾都成为最鲜亮的底色[5]。习近平总书记于贺信里指出，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2]。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共青团必须肩负起全团带队的历史责任，带领各级少先队组织置身“国之大者”，贯通全方位全要素青少年成长链，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接稳历史传承使命，随时准备在民族复兴的赛道上奋勇冲刺，为党的事业永续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

（三）新时代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要坚持推进实践育人

实践育人是少先队最鲜亮的标识。只有使少先队员走出教室、走向田野、走进社会，德智体美劳才能真正融为一体。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共青团要牢牢牵住党建带团建、队建这根主线，把党委政府、教育部门、社会资源拧成一股绳。建好用好“红领巾研学地图”，把革命旧址、科技场馆、乡村振兴一线变成活教材；完善“红领巾奖章”进阶体系，与推优入团、推优入党无缝衔接；健全辅导员培养、评价、激励机制，使辅导员们成为孩子探究世界的同行者、价值塑造的引路人[3]；同时，依托团教协作联席机制，把少先队阵地建设纳入学校、社区、青少年宫整体规划，在经费、师资、课程上给予稳定保障，在全社会形成协同育人的强大合力，为民族复兴的新生力量茁壮成长铺就宽广跑道[6]。

（四）新时代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要坚持秉承守正创新

守正创新是少先队事业长盛不衰的内在动力。一方面，必须将红色基因、组织制度、仪式规范等光荣传统熔铸为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根”与“魂”，在实践中反复检验、提炼、升华；另一方面，要以时代命题为牵引。回望百年，少先队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正在于始终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时代脉搏为节拍，在赓续传统与革故鼎新中实现自我更新。其一，在理念上，坚持政治启蒙与儿童特点相统一，把宏大叙事转化为“听得懂、记得住、做得到”的微言大义；其二，在方式上，由单向灌输走向互动共创，依托项目化、情景化、游戏化学习，使少先队员在真实任务中体悟道理。由此，少先队既守住红色根脉，又在守正创新中持续焕发蓬勃生机。

三、贺信精神的时代机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将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与少先队组织建设置于党和国家事业的核心议程之中。习近平总书记坚持每年同少先队员共植新绿，多次出席队内外主题活动，深入中小学课堂；每逢“六一”儿童节，以回信、寄语等形式向广大少年儿童传递党中央和习爷爷的关怀与期望；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审订少先队改革方案，推动出台首份由党中央印发的少先队专门文件，由此引领少先队工作实现整体跃升与深刻变革[7]。

（一）文件政策的准确要求赋能改革创新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少先队工作的意见》是党的历史上首份以党中央名义发布的少先队事业纲领性文件，标志着少先队事业在新时代的全面升级与制度定型[7]。《意见》以“为党培养红孩子”为主线，贯通政治启蒙、组织建设、实践育人和资源保障四大板块。在政治引领上，首次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细化为“儿童化”叙事，把宏大理论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能共情”的成长体验，使“爱党、爱国、爱领袖”的情感在少先队员心中落地生根；在组织建设上，重构校内外贯通的少工委体系，学校少工委、社区少工委、行业系统少工委“三轴联动”，共青团、教育、民政、妇联等部门资源跨域整合，形成“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共青团牵头、团教协作、社会协同”的实施矩阵。文件的出台，不仅从制度层面破解了长期以来少先队工作“条块分割、资源分散、学段断层”的痛点，更以国家意志确立了少先队作为战略预备队的政治定位，为红色江山后继有人提供了可持续、可借鉴的中国方案[7]。

（二）少先队员的切身实践彰显青春风采

新时代少先队员的政治情感愈发深沉而饱满，赓续红色血脉的信念亦愈加坚固。置身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壮阔蓝图，新时代少先队员的成长轨迹是一场由宏大叙事与日常细节共同编织的精神远行，呈现出政治认同、文化浸润、实践淬炼“三位一体”的立体格局。少先队员们在建党百年、党的二十大、新中国七十五周年庆典的礼炮声里，也在乡村巨变、冬奥燃情、神舟腾跃的烟火气中，把对习近平总书记的朴素爱戴凝成“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铿锵誓言。脚步所至，井冈山炮台、延安窑洞、港珠澳大桥钢梁与“天宫课堂”失重舱共同构成时空坐标，让少先队员们在革命星火、古典智慧与科技强国的同频共振里，把红色故事、非遗技艺、大国重器转译为“小小传承人”的鲜活叙事。回到组织生活，各族少年在“手拉手·石榴籽”课堂共读《习近平讲故事》，把民族团结的比喻绣进一幅辐充满童真的剪纸。校门之外，课堂更加辽阔。航天城里，少先队员们触摸神舟返回舱灼痕，聆听航天英雄讲述五星红旗如何插上太空；少年军校的泥水战术场把“掉皮掉肉不掉队”刻进肌肉记忆……红色基因、文化根脉、强国梦想由此被重新编码为面向未来的精神操作系统，也让胸前的红领巾成为个人小我与民族大我之间最生动的连接。

（三）各级主体的火热践行形成生动局面

过去五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少先队工作纳入治国理政整体布局，《意见》由此从政治文件转化为可感可及的成长生态[7]。首先，各级党委普遍建立“党委统一领导、政府支持保障、共青团牵头协调、教育部门具体实施”的运行机制。全国各“省、市、县”三级少工委全部配备由党委负责领导就任的名誉主任，少先队重大事项列入同级党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常态议题。其次，组织体系上，中小学全部建立学校少工委，大队、中队、小队三级网格纵向到底，实现队员在哪里、队旗就飘扬到哪里；入队仪式、少先队旗、少先队徽、红领巾规格、队礼动作等国家标准相继发布，基层操作首次实现“一把尺子量到底”[8]。与此同时，理论阵地亦不断夯实，国家社科基金首次设立“少年儿童与少先队研究”专项。放眼队伍建设方面，中央党校、团中央、教育部、全国少工委等单位共同举办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全国少先队辅导员骨干”研修班；并且团中央还单独实施“青马工程”少先队专项，遴选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突出的辅导员建立“红领巾巡讲团”，常态化进校入班。最为关键的是，国家层面将少先队事业发展写进“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儿童发展纲要”等政策文件，并于未成年人保护法、家庭教育促进法中增设专门条款；财政、民政、文旅等部门在经费、阵地、实践线路等方面给予专项支持[3]；少先队工作从“部门事务”上升为“国家工程”，全党重视、政府支持、社会协同、人人关爱的生动局面正在形成，为党、团、队育人链条的衔接提供了坚实而温暖的制度底座。

四、少先队工作的未来进路

今年是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召开十周年，新时代新征程，呼唤新担当新作为。新征程上，作为党缔造的少年儿童组织，少先队承担着为共产主义事业培养后继者的神圣职责，必须引导广大队员成长为心怀家国、勤学力行、身心俱健的新时代红色少年。面向民族复兴的时代洪流，少先队必须立足“预备队”战略定位，在党的领导下把红色基因、全面发展、实践育人熔铸为贯通童心与国运的育人长链。

（一）加强党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领导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新时代少先队事业行稳致远的根本前提。要把“党是先锋队、团是突击队、队是预备队”的政治逻辑转化为制度安排和运行规则，确保党的领导贯穿少先队工作全过程、各方面[6]。一是健全党委统一领导、政府支持保障的工作架构。各级党委应将少先队建设纳入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年度要点，与基础教育改革同部署、同检查、同考核；建立党委负责同志担任同级少工委名誉主任的常态化机制，实现“关键少数”亲自抓、负总责[9]。二是强化共青团牵头抓总的政治责任。由各级团委主要负责人担任少工委主任，团教两家建立月度会商、季度通报、年度述职制度，确保政策、项目、经费、评价“四同步”。三是完善党建带团建、队建制度链条。把少先队改革任务写进中小学党建责任清单，把队室、鼓号队、仪式教育等基础建设纳入学校党组织标准化验收指标[3]。四是构建党团队一体化育人体系。依托“青马工程”少先队专项，建立从小学到大学的政治骨干递进培养通道，把推优入团、推优入党与红领巾奖章、优秀少先队员评选贯通衔接，形成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政治吸纳链。五是夯实政治启蒙和价值观塑造的内容供给。鼓励各级共青团组织、少先队组织用“童言童语”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发“总书记教导记心中”系列微课，使党的创新理论以可观、可感、可互动的形态浸润童心。进而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少先队工作的制度优势、实践优势，为少年儿童在政治上“扣好第一粒扣子”提供坚强保障。

（二）促进少年儿童德智体美劳立体化发展

新时代的少先队员，既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潜在生力军，也是延续中华文脉的青春接力者，其成长路径必须贯通“求真理”与“承文化”的双重坐标。立足“双减”背景与核心素养导向，少先队要以“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为总要求，把科学精神与文化底蕴并置为育人核心，构建纵向贯通、横向协同的立体化育人模式。一方面，要注重德育铸魂，依托党史学习教育长效机制，用好“红领巾爱学习”“红领巾讲解员”等品牌，把红色故事、英雄模范、时代楷模转化为儿童化叙事。另一方面，要围绕智育启慧，实施“红领巾爱阅读”计划，联合图书馆、出版社推出分级阅读书单，建立城乡共读、亲子共读、师生共读机制；实施“红领巾爱科学”计划，与科技馆、实验室共建“少年科学院”，开设“小院士”课题营，引导队员在真实科研情境中体验科学精神[10]。与此同时，要坚持体育强魄，推进“红领巾爱运动”普及行动，开发集趣味性、团队性于一体的运动游戏，让孩子们享受运动乐趣、锤炼意志品质。美育润心同样不可忽视，要深入实施“红领巾爱艺术”浸润计划，依托青少年宫、美术馆、剧院建立流动艺术课堂，常态化开展合唱、书法、戏剧、舞蹈等社团活动，为乡村孩子搭建与城市孩子同台展示的平台。最后，要协同劳育养德，实施“红领巾爱劳动”成长计划，开发家务劳动、校园劳动、社区劳动、生产劳动四级清单，建立劳动学分机制；与农业基地、工厂车间、社区工坊共建劳动教育实践点，让孩子们体悟劳动创造价值。综上所述，各有关单位应大力促进课程融合、活动整合、资源整合，实现五育从“简单相加”到“深度相融”，培养有大爱大德大情怀的新时代好少年[4]。

（三）保障少年儿童全方位健康成长成人成才

少年儿童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未来主人。各级有关单位要在工作中全面贯彻儿童优先原则，聚焦少年儿童急难愁盼，构建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位一体”的守护体系，使每一朵花蕾都能向阳绽放。一要强化政策依托。把握当前正在撰造新一季国家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契机，推动将课后服务、心理健康、营养改善、近视防控等纳入基本公共服务清单；依托各级两会、团代表通道，持续提交助力少年儿童成长的立法建议和预算提案[3]。二要加强学业帮扶。创新发展“希望工程”“情暖童心”等主题活动，重点向乡村留守儿童、城市困境儿童等群体倾斜，达成从“能学习”到“学好习”再到“好学习”的梯次跃升；建立“希望小屋”心理关爱站、“梦想教室”学业提升营，为困境儿童提供一对一陪伴。三要做优服务项目。完善 12355 青少年服务台省、市、县三级网络，开设 24 小时心理、法律、安全专线；联合民政、妇联打造“家门口的少年宫”，在社区提供爱心托管、假期研学、兴趣社团等公益性服务；建立少先队夏（冬）令营安全标准，确保活动零事故、零风险。四要加强依法保护。推动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配套实施细则落地，建立“红领巾法治副校长”制度，深入开展法治教育及安全演练；与检察机关共建“未检工作站”，形成涉未案件强制报告、快速处置、心理干预闭环。五要夯实心理健康防线。建立“学校—家庭—医院”转介绿色通道，实现抑郁、焦虑等问题的早识别、早干预。综上所述，各有关单位应全力推动深化制度化保障、项目化供给、专业化服务，为少年儿童营造安全、健康、温暖的成长生态，让孩子们能够体魄强健、心理阳光、人格健全，最终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四）建设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少先队工作队伍

辅导员是少先队员健康成长的引路人，必须打造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双师型”队伍。一是要严把政治关口。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推动党员、团员青年教师优先担任辅导员；建立辅导员政治理论学习清单，确保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3]。二是要构建分层分类培训体系。中央层面依托中央团校开设高级研修班，省级设立骨干辅导员学院，市县建设实训基地，校级落实校本教研，形成“国培→省培→市培→校培”四级网络；开发包括政治理论、组织建设、活动策划、心理辅导、危机干预等模块的标准化课程包，实现新任必训、在岗轮训、骨干精训。三是要完善评价激励机制。推动教育行政部门将少先队辅导员纳入中小学教师职称序列，增设“少先队活动”职称评审条件；持续开展“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评选，纳入国家级表彰项目，增强职业荣誉感。四是要健全管理监督制度。制定辅导员职业行为准则和退出办法，建立师德负面清单，对体罚、歧视、违规补课等行为零容忍；建立省级辅导员信息库，实行持证上岗、年度注册、违规通报。五是要壮大校外辅导员力量。聘请退役军人、科技工作者、非遗传承人、社区志愿者担任校外辅导员，建立“校外辅导员联盟”，实施项目化聘任、课时化补贴、荣誉化激励。综上所述，各有关单位应围绕系统设计、精准施策，建设让党放心、让少年儿童满意的高素质专业化工作队伍，为少先队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人才支撑[11]。

（五）做牢做实少先队组织基层基础工作

基层是少先队全部工作的落脚点，必须大抓基层、夯实基础，使组织体系更加严密、活动开展更加规范、作用发挥更加充分。一是要健全责任链条。建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先队工作重要指示批示”贯彻落实台账，实行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闭环式督办；推动各级党委每年专题听取少先队工作汇报，将结果纳入党建述职评议考核。二是要推进中小学少工委深化发展。将少先队组织建设情况结合进“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出台中小学少工委主任、大队辅导员等少先队教师的权责分配方案及工作考评机制，推动队室、红领巾广播站等基础阵地全面达标。三是要创新基层组织形态。适应学龄人口流动和城乡结构变化，探索社区少工委、楼宇少先队等新型组织模式；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青少年宫、青年之家建立“少先队活动圈”，实现组织、项目、队伍、资源下沉。四是要强化活动保障。建立仪式教育规范指引，统一入离队、颁章、主题队日流程；持续开展红领巾风采展示等活动，增强组织吸引力和凝聚力[12]。借由责任压实、制度固化、资源下沉、活动提质，打通少先队工作“最后一公里”，让基层真正强起来、活起来、实起来。

（六）聚合社会力量推动少先队工作紧跟时代

面对经济社会深刻变革和新一轮科技革命，少先队亟待打破“围墙思维”。一是要提升宣传声量。打造各级融媒体少先队频道，建立“少先队员讲给少先队员听”内容共创机制；实施优质文化产品制作推广计划，实现联动与共振。二是要注入科技动能。推动建设“智慧少先队”云平台，整合队员管理、活动发布、奖章评价、资源配送等功能；开发 AI 辅导员助手，实现活动策划、心理筛查等智能服务；联合科研院所推出“少年 AI 实验室”“少年航天工坊”等场景化课程，使少先队员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科技强国脉搏。三是要完善社会协同。推进家校社“教联体”建设，建立少先队校外实践基地联盟，吸纳博物馆、科技馆、企业研学中心、青少年宫等单位，实现课程共建、师资共享、评价共认[13]；同时鼓励设立“红领巾公益基金”，撬动企业、基金会、社会组织资金，资助基层少先队创新项目。四是要强化网络治理。建设“清朗 · 红领巾”网络卫士志愿者队伍，开展网络素养教育进校园活动；与互联网平台合作设立“青少年模式”内容池，确保孩子们触网安全。五是要拓展国际视野。依托“一带一路”青年交流机制，开展“中外少年手拉手”云交流、夏令营互访，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综上所述，各有关单位应推动多元主体协同、多维资源聚合，使少先队始终与时代同频、与社会同步、与少年儿童同心，持续焕发蓬勃生命力。

五、结语

2025 年，中国少年先锋队迎来建队 76 周年，星星火炬始终高擎，少年童心描绘时代华章。到 2035 年，今天的红领巾少年将成为青年担当，成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力军。到本世纪中叶，他们又将在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征程中挑梁扛鼎，在民族复兴的壮阔画卷上镌刻属于自己的时代锋芒[9]。各级团组织、少先队组织要高举团旗、队旗，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头脑，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纵深激励志向，用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锻造本领，使孩子们在“知”与“行”的统一中体悟“强国一代有我在”，在“小我”与“大我”的融合中回答“请党放心”的时代之问，进而让星星火炬点亮孩子们成为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前方坦途。

参考文献：

[1] 中国少年先锋队章程[M].北京,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2025.5.28.

[2] 新华社.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少年先锋队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EB/OL].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50527/445ca2f15d824371bbc7a7b053b7087a/c.html,2025-5-27.

[3] 王艺.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教导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时刻准备着——

在中国少年先锋队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J].中国共青团,2025,(11):12-18.

[4] 习近平.论党的青年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06：11、25、26.

[5] 阿东.担起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让新时代新征程的红领巾更加鲜艳——在中国少年先锋队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致词[N].中国青年报,2025-05-28(02).

[6] 中国青年报社评论员.把听党话、跟党走的种子根植在孩子们心里[N].中国青年报,2025-05-30(01).

[7]新华社.中共中央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少先队工作的意见[EB/OL].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zywj/2021-02/03/c_1127060398.htm,2021-2-27.

[8]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徽》国家标准 6 月 1 日正式实施》[EB/OL].https://www.samr.gov.cn/xw/sj/art/2025/art_fe37fb249cbf47f0ad4e0568ceb747de.html,2025-5-29.

[9]石泰峰.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时刻准备着[N].人民日报,2025-05-28(006).

[10]中国青年报社评论员.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培养未来生力军[N].中国青年报,2025-05-28(01).

[11]朱丹,子梦婷.构建新时代少先队辅导员政治素质提升的目标体系[J].社会主义论坛,2025,(05):45-46.

[12]董树梅,刘宸宇,黄曼飞.少先队仪式助力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教育的路径探索[J].中国德育,2025,(08):45-50.

[13]苏婷.新时代少先队活动与博物馆资源有效结合的深度实践[J].少先队活动,2025,(06):28-29.

诗意之议：百年新诗教育的若干矛盾说略

高若栋[1]

（1.香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中国 香港 999077）

摘 要：饱受师范与文学双重领域关注的新诗教育问题，既是脱胎于古典汉语文学与美学道统的衍生产物，具备明显的书斋风范、私塾气质，长期作为一种传统语文或诗词教育的支流、附属品而存在；同时在愈发丰赡的文化理论与学术视角下，新诗教育又堪称一面跨学科、跨时代的多维度的价值舆图。汉语新诗迄今百年，其本质正是近现代中国文化发生剧变和改革的碑铭。长期反映乃至介入、参与建构几代人的精神“启蒙”、思辨与审美。深入研究当代新诗教育所存在的矛盾与弊症，所开拓的创见与新思，或将形成一章有利于学科建设与施教发展的经验图谱。

关键词：新诗教育；诗歌文化；当代文学；转型与矛盾

DOI：doi.org/10.70693/jyxb.v1i4.112

Poetic discussion: some contradictions in the hundred years' New Poetry Education

Gao RuoDong[1]

[1] *Hong K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The issue of new poetry education, which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from both the normal and literary fields, is not only a derivative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esthetic orthodoxy, but also has obvious style of study and style of private school. It has long existed as a tributary and access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or poetry education; At the same time, under the increasingly rich cultural theory and academic perspective, the new poetry education can be regarded as an interdisciplinary, cross era and multi-dimensional value map. The essence of Chinese new poetry is the inscription of the dramatic change and reform of modern Chinese culture. Long term reflection, even intervent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piritual "Enlightenment", speculation and aesthetics of several generations. An in-depth study of the contradictions and disadvantages existing in contemporary new poetry education, and the innovations and new ideas developed may form a chapter of experience map conducive to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and teaching development.

Keywords:New poetry education; Poetry cultur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Transformation and contradictio

作者简介：高若栋（2003—），男，香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社科前沿》及 Multidimensional Culture & Arts 编委、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会员，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批评与文化生态研究。

一、阵痛或永痛：诗学价值的缝合

解构新诗教育的概念，其本质乃是对新诗文学和现代教育的双重探索，甚至包括对诸如社会或政治等跨学科的第三领域内容展开联合勘探。惟有如此多维度的研究视阈和设计范畴，方能在复杂或复合的涌动信息中归因、溯源，从筚路蓝缕的演进历程中尝试总结经验，面对若干矛盾和创见，推动有效地纠偏与展望。纵观发展史，新诗教育这一概念从较为浅显粗略的学术思考，转变为一种具体落地的融入主干学科的授学项目，最早能锁定在 1930 年代前后，彼时基于以胡适、蒋光慈、郭沫若等为代表的初代白话诗人的作品和较为粗糙的理论模型，基本形成了新诗教育与传播的框架，在相对精英化的社会中少数人群内流通，教育的主要案例发生在脱产的象牙塔内，客观上为后续多年间新诗教育与“知识分子化写作”或“学院写作”概念产生稠密关系奠定了历史渊源。历经“新文化运动”后的文化环境可谓地覆天翻，汉语新诗在诞生之初就附带着强烈的域外色彩，其代表文本与相关文化论章都彰显了与古典中国的诗词文学道统的“脱钩”行为。而这种新与旧之间的割裂之感，在彼时的文坛尚无太多学者注重修复或重探；至于教育领域，则更是在“既成事实”中几乎不加辩驳和探析地展开模糊的普及和授课运动。

事实上，在更宏观的历史层面审视近现代中国文化及文学的发展历程，始自 19 世纪中期便已经具备了从旧至新的“大变革”的前兆和部分人文环境，而中国的教育学近现代化思想也基本起步于这一阶段。少数留洋海外的官僚知识分子或具备资产阶级革命倾向的学人，成为了鸦片战争国门洞开之后，接触西洋思潮乃至学习其价值体系，深入考虑中国之文化命运的先驱。倘若按照如此状态顺遂发展，在 1850 年代中国理应诞生出较为成规模的新式学堂，引入西洋人文思想，从而在后续十余年间培养出本土文化人才，策动包括诗歌在内的诸文学领域的改革。但现实却远非如此，中国在整个 1842 至 1862 年间，在教育的发展上几乎是没有任何作为的”[1]，其中原因诸多，主要还是源于根深蒂固的自上而下的封建集权社会结构，以及自下而上的传统教条包裹的保守化本土文化思想壁垒。由此几乎可以得出结论，在基础军事运动尚未掀翻现行政治状态之前，在革命政治势力尚未对腐朽而庞大的社会文化心理产生冲击之前，单纯期待文化与教育领域的改革先行，并以此试图引发对古典中国的改造和革新，乃是或见涟漪但波涛不兴的镜花水月。

因此直至 1910 年代，即便历经了包括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皇族内阁等政治事件，甚至是太平天国、捻军、义和团等波及大半个中国社会的历史事变之后，中国的诗歌教育仍然基本保持着一种传袭自古典时代的理论体系、思辨价值观和教育模式，在对诗的处置、学习的方法论上，以曾国藩所谓“先之以高声朗读，以昌其气；继之以密咏恬吟，以玩其味”[2]的方式高度类似，这种教育行为习惯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蔓延到了 1949 年后，成为多数对汉语新诗不加了解的社会大众对诗歌教育所秉持的固有印象。而在诗的主体、内容的问题上，迄止 1920 年代，伴随具备浓厚政治色彩和体制革命倾向的“五四运动”为燃点，汉语新诗才终于以诸如《新青年》等革命性文化杂志为桥头堡，正式实现了初代文本及理论的诞生，并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扩充其影响。杜鹏所谓“当新诗作为一种知识进入教育场域并被传播和推广的同时，具有现代意义的审美方式也随即得到传播和推广”[3]的判断，确切反映了汉语新诗与现代教育之间相辅相成或堪为先导的关系。然而繁冗密布的问题和矛盾，自汉语新诗发轫起便紧随其身，学界内的争论甚至蔑视，文人士林之间的犹疑或过分激进，诸如此的情况屡见不鲜，究其根本主要是围绕新诗话语的革命价值，所附着的极容易被解读为暴力性的特质。整个民国时代几乎都充斥着旧文化、旧道德及其价值体系与新文化、新思想及其自有主张之间的对垒和互搏，汉语新诗长期作为文学领域的一个显著代表存在。关于文本语言的根本性改变，几乎挖空或置换了千百年以来古典汉语诗歌的基因，从风雅颂到乐府，从宫体诗到格律诗词，某种文字模式上的传承感在汉语新诗的纸面几乎踏空，无论是对韵律的要求、可读性的讲究，或是描写物象及书写精神，都存在了较大的偏差或位移。而关于诗学思想上的转向，则更为受到批判和质疑。汉语新诗以域外经典的引入作为发展基准点之一，客观上大量吸纳以欧美为主体的哲学、美学思想系统。存在一定“崇洋”特征的新诗写作群体容易造成一种可悲的偏见，继而是对中国本位传统的背弃或下放，甚至是面朝历史文脉的践踏。

在《谈新诗》中，胡适曾列举过中国诗史上四次诗体大解放，即“由《三百篇》的‘风谣体’到南方的骚赋体，这是第一次解放；由骚赋体到汉以后的五七言古诗，这是第二次解放；由五七言诗变为句法参差的词，这是第三次解放；直到近来的新诗发生，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诗体，并且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这是第四次的诗体大解放。”[4]诚如其所言，在四次“解放运动”之中，能够明显窥出前三次的变化相对平顺，时间周期偏长，几乎都消耗数百年乃至千年。同时，变革后的诗歌无论体式抑或是思想系统，对变革前的诸种内容能体现出较为明显的继承、传袭特征。惟第四次“解放”之变革烈度、跨越程度几乎是空前的，并且耗时之短、转变之剧烈也难以从历史中获取更多前例经验，这或许是近代中国社会全方位所面临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处细节体现。结合时代整体环境，新诗及其教育问题所折射出的崎岖与试错之旅，便相对易于解读了。

欧美及日本的近现代诗学理论、文艺思想与变革

历程，曾为中国提供了相当丰富和多元的外来经验，以及与之伴随的风险和错谬。结合于此，迄止 1940 年代，汉语新诗及教育问题迈过二十年艰难发展阶段，终于初步形成了一套基本完整且勉强自持的体系。由于汉语新诗与古典中国传统诗学价值系统的相对脱钩，为了在短期内建立起一套新式而独立的诗学结构，不得不大量取法于域外，其中包含诗歌教育在内的诸多环节内容，以此尝试解决文学生态所存在的价值矛盾和逻辑空窗。曾经与中国在“教育现代化曾处于同一起跑线”[5]的日本，在近现代诗歌文学转型发展问题上，却领先于中国至少一个时代周期。由于“黑川开关”之后幕府统治的逐步崩溃，日本文坛在整体政治与文化环境的变更之下，迅速拥抱以欧美为主体的理论轴心，结合过去数百年间治理“汉学”与“兰学”的经验，在扭转了江户时代以前“学校教育衰落，武士阶层只能在家庭中和寺院里受教育，平民百姓则享受不到有组织的教育”[6]的情态之后，在 1868—1926 年之间，由于自由民权运动的发展，社会文化氛围相对宽松，加之文艺教育的蓬勃和对外视野的开放，日本诗坛得以孕生出以岛崎藤村、秋原朔太郎、石川啄木、北村透骨等为代表的诸多诗坛名家，客观上为后续高桥未衣、横山伸子、藤本洋子、堀场清子等 1920—1935 年间诞生的更为年轻的一批诗人铺垫了写作生态和提供了经验范本。至于以高桥睦郎、谷川俊太郎为代表的 1940 年代及其后的诗学大家，则更是日本新诗历经变革阵痛和初步发展阶段后的重要受惠群体。中国的新诗发展与教育系统几乎在1930—1950年之间出现了类似的状况。以闻一多、李金发、徐志摩、穆木天等为代表的先驱诗人依托各自的理论雏形和思维判断，或尝试连接传统文脉，开拓以“新格律”为名的流派探索；或不断效法于西方“现代派”的衣钵，开展汉语的“解放”步骤。

相较于日本之于中国近代化进程的相似性，欧美为主导的诗学文化对汉语新诗百年发展的影响力几乎无可替代，浩大的“启蒙”思潮几乎贯穿了整个 20 世纪，在汉语新诗的两大黄金时代占据了重要作用，从“新文化运动”到“新诗潮”时期，从梁启超时代“新民”[7]启蒙阶段，到李泽厚所谓“再度启蒙”[8]的呼声，其中浪潮无一不与欧美文艺达成紧密关联。前者时代，从知识体系到授课机制、伦理规范到价值意识都大批接收域外的经验和文本态度，在 1950 年代之后台湾地区以周梦蝶、洛夫、余光中等为代表的诗人开始反思中国古典文化道统与新诗衔接或复振问题之前，基本上欧风美雨稳定占据以学院为主场的汉语新诗研究、创作与教学的份额。诚如许子东所言，西方现代主义文艺及文化思潮对中国大陆的渗入和影响呈现出两个主要形态，即“一方面表现为一连串热闹起伏的文艺论争，另一方面则诱发了一种静悄悄踪迹难辨的文学技巧”[9]，即便是 1958 年前后大陆地区诗坛，对于西方文艺思潮的理论研讨和潜移默化的技巧学习，仍然是频繁发生有迹可循的，即便多数明面上的效法对象逐步狭窄或受控制化，从广泛的西方内容，变更为针对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范畴内的文艺作品及理论。彼时汉语新诗的教育体系也呈现具有苏俄化、东欧化色彩的外来系统与本土惯有的诗词文学教育系统并存或互涉的状态，普希金、叶赛宁、李白、杜甫可以供存在一本教材中，甚至还包括诸如毛泽东、陈毅等革命领袖的诗词作品，进入 1960 年代，汉语新诗的教育问题在基本结束了精英知识分子群体小范围传递或研判之后，逐步进入了扩大社会受众和参与度的普及时代，多数的工农大众及其子弟得以在新中国的教育体系之下初步接触到汉语新诗作品及若干粗浅的理论模型，即便具体施教的方式尚不精细和优良、选材文本的内容尚不前沿和丰赡。但伴随新诗教育的客观发展，数十年前所存在的群众心理中，新诗体系与本土文化所存在的严重之不适配、新诗与古典诗词文学所存在的难以调和之冲突等问题，已被有序消弭。

二、狭路或歧路：教育思想的症候

教育事业的变革与迭代在汉语诗学从无到有、高速发展的 20 世纪上半叶，同样处于不断试错、开拓和处理诸多历史性矛盾的运动状态中。自清末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整体系统性的近现代转型，在 1940 年代完成了基本建构，民国时代高校文科专业的丰盈化、专业化发展，逐步接纳了汉语新诗，继而成为发展的温床甚至是理论创生的母港，在战火纷飞的时代叙事之下，南渡北归的变迁羁旅之间，为诗学提供了一处避风之地，汉语新诗的教育融入进汉语言文学的整体脉络，开始愈发吸引、凝聚一批年轻的诗人或批评家群体，对其从热爱到逐步产生文艺认同，这与“地方认同”的概念有几分相似，即所谓个体所投入“一系列态度、价值观、想法、信仰、意义和行为倾向”[10]，汉语新诗正是在如此的“认同”之中，营建起初期的信徒和拓边者。有赖于从蔡元培到李太白，从陶行知到刘伯明乃至叶圣陶，几代堪称大学旗幡的教育家所主导或参与的深化改革，迄止 1950 年代，在高等教育板块内汉语新诗已经相对稳定地能够占据现当代文学内容的一席之地，较为细化地产生的诸如外国诗歌、中国现代诗歌等被纳入外国文学、文学翻译、中国近现代文学等独立学科的专业知识项目。在初级教育阶段，甚至是扫盲或普及性教育阶段，汉语新诗也不再被忽视，乃至排斥在诗歌这一概念之外，即便彼时提及诗歌仍以唐诗宋词为主轴，言必称李杜苏辛。

汉语新诗的崎岖之路，其大多数时刻与现代教育的实验之路产生着路径性的呼应，在新旧教育体系的矛盾之中，自然隐藏着新旧文化、新旧诗学之间的问题。诚如程士庆所言，“诗教之所以强调启蒙教育的重要性，当然是出于要充分利用孩童记忆这一黄金窗口期，可以让孩子在初识自然名物时便具有诗性的眼光，潜移默化地培养情操，成长为一个自足的个体”[11]一

般，启蒙阶段几乎可以被视作诗歌教育的桥头堡，过去千百年间长期为古典诗词所占据，新诗自发轫阶段起便一直渴望获取部分席位，从幼年阶段培养孩子的诗性理解、价值版图和思想雏形，对于一类文学形式和文化系统的发展是百年大计。新中国建立之后教育改革与文化领域现代化进程持续推动，抵达 20 世纪后半叶，虽然多数课堂上仍然以所谓“灌输和填鸭式的僵化教学方式，即时代背景——段落大意——中心思想——艺术特色的四段论教学方式”[12]开展新诗教育，但汉语新诗确已保障了其在教育环节内的份额，加之 1960 年代后地下阅读与写作运动的开展，客观上为改革开放后汉语新诗的高速发展时代，奠定了大量阅读受众和社会参与度的基础。

历经半个世纪的发展与探索，对于汉语新诗学术地位的争辩、学科价值的批驳和发展趋势的臆测，已经不再是为人所关注的重点，新诗在创作与理论建构层面、不同级别的教育层面都出现了长足的进步，文艺姿态和文化心理，成为了 1978 年之后值得广泛思考的影响莫大的问题。当跨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特殊时期”所笼罩的文艺阴霾和政治风云之后，从手抄本与“禁书”时期成长而出的一代文学青年开始放出新声，这是绝不同于艾青、何其芳、闻捷、公刘、牛汉等诗坛宿将已然趋于老迈、固化和带有沉淀意味的腔调，以北岛、芒克、舒婷、梁小斌等为代表的中青年笔端，通过强烈的呐喊和质疑、叩问与谛听面朝浩荡的历史与迷茫的当下社会爆发既出自个人情绪又具备群像代表价值的文字，在“今天派”为主体的写作集群作品频发，在大众社会和文林学界产生普遍反响的时刻，章明等老批评家所谓“气闷的朦胧”[13]的驳斥言论很容易便被时代的浪潮所淹没。一种全新的文艺姿态在经济高速发展、社会体制变革的中国土壤上愈发滋长，并且 1980 年代中后期的诗坛，伴随诸如“非非主义”、“莽汉主义”、“整体主义”等“第三代诗歌运动”的新态势接踵发生，更为多元丰盈的局面造就了百家争鸣的盛况，诸多主张各异的写作群体、理论派系共同组建了百舸争流的汉语新诗图景，其中的思想风险与文化收益共存且高涨。对此时期，谢冕曾谈到，“新诗潮的最大贡献在于引进意象表现等现代手法，造成了诗意的朦胧，从而在新诗的艺术领域展开了一场美学变革，而后来的挑战再一次瞄准了这一要害，他们向意象造成的罗列和雕琢，以及艺术的贵族倾向发难……当诗变成人人都可为所欲为的时候，诗歌的危机也就不可避免地到来”[14]，汉语新诗在此之前的阶段似乎从未出现过如此之多的“挑战者”或“异见人士”，当“今天派”将老一批官员诗人或成名宿将推向岁月故纸堆之后不满十年间，“第三代”的更为年轻的诗人则操持理论的武器，配合笔端的新文本态势，力图将“今天派”诸君拉下神坛。而“第三代”内部诸多流派和风格群体之间的互相攻讦、讨伐、批判与攀附亦是多如牛毛，或有对本土传统文脉产生颠覆性思想，或有对威权解构，主张一切回归于世俗生活的语言，对修辞等艺术手段嫉之如仇。若干作品走上了“使熟悉的语言给人以陌生的感觉”[15]的境地，而另一部分则大有通俗到底的精神，将一切隐喻、婉约、精雕或虚浮的内容解绑、拆散，直到近乎日常口语的地步。

文化心理作为更深邃的另一项问题，从“新诗潮”阶段几乎蔓延至今，长期作为诗学理论、新诗教育和诗歌创作等诸领域无可回避的议论重镇。同时该问题也可被视作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心理与社会文化转型的一个旁证，诗歌往往具备映射时代、折射人心的效用，尤其针对于暗角、深井等不易觉察的细微之处。张枣在 1990 年代谈及“元诗（metapoetry）”概念，彼时“知识分子写作”概念已然崛起，诸如欧阳江河、臧棣、孙文波、西川、王家新等诗人已成为引领纸面潮流的成员。纵览当下活跃于话语诗坛的大多数名家，几乎都亲历甚至深度参与过这一阶段的诗坛论战，他们在青年时代即开始反思诗学的现状和身世，对汉语新诗数十年的发展之旅展开系统性的质疑和反省，并基于此展望未来诗学的可能性。在诸多矛盾与未知、经验与反经验之间，文化心理转变的波幅，呈现出聚焦于诗歌理论细节和立足于整体新诗脉络的两个分镜。关于前者，所谓“元诗里的反思必然趋向理性与抽象，元诗的语言也相应地趋向于工具性的表征，这一切皆与诗背道而驰，使元诗面临内在的自我消解的危机”[16]的论述堪称代表，张枣对于汉语新的探索已超出了彼时整体环境，从公共现实到私人情感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的关联性写作之外，他所注重的“从诗到诗”的方式，以某种旁的路径的概念成为丰赡乃至突破理论框架的尝试。而关于后者，更为宏大且触及汉语新诗底层逻辑建筑的问题，被世纪之交的诗人们愈发提及、重视，正如 2001 年 10 月于坚在书信中曾对陈超谈起的“不是由西方诗歌建立起来的”[17]一般，在度过了新诗发轫阶段的理论与文本双向空无、早期取法欧美营建基本新诗系统、政治挂帅的写作突破与紊乱等阶段之后，诗人与批评家们普遍开始重谈“标准”的定义，汉语新诗这一看似孪生于欧风美雨经验之下的文学形式，是否到了构建自身独立性，开展与本土传统文脉对接或复归的契机。时代发展的主流，所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因此新诗教育这一领域再度迎来了新的转折，即如何实现汉语古典诗学教育和新诗教育的融合、互涉与整体性发展和施教。

新诗教育基本呈现出滞后于新诗写作与理论前沿一代人左右的状态，具体换算到时间轴上，大概维持在 10—20 年甚至更长时间。在高等教育板块，邓小南围绕改革开放后四十年中国人文学科发展及构建“自主学术话语体系”曾展开探讨，所谓“但目前的学科体制，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人文学科的根本性义务，使得学术某种程度上重心不在学而在术”[18]的问题，一针见血

地扼住了新诗教育的弊病所在，自 1980 年代以来高校关于新诗的教育多数偏重于按照编年史系统的事件流水账记录，或若干重要人物的脸谱化、扁平化灌输，并且在这类诗学的“岁月史书”中还存在相当规模的空隙或漏洞，对于数十年前的新诗文本选用、解构以及重点诗人的分析和剖解，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粗疏。最为典型的案例，莫过于迄止 2010 年代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在为新时期诗歌所设置的两章内容里“对于北岛这一最为重要的朦胧诗人，依然采取避而不谈的策略”[19]，受非文学性规制要求的结果，或刻板化、僵化的文学教育方法论所造成的结果，即是在谈及“新诗潮”这一汉语新诗黄金时代之际，竟忽视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诗人，在如此的教材影响之下，对于汉语新诗在具体诗艺的“术”和理论思维的“术”的忽视，也就容易解析了。

直至近十余年来，伴随诸如创意写作等专业的普及开设，以及新诗研究专项机构的陆续设置，汉语新诗的教育与诗坛前沿生态之间的距离终于在逐步缩减，同时施教手段的多样性和教育思想的扩散与拓展，成为另一层的助力。诸如“在诗歌教育中，少一些理论，多一些创作；少一些概念，多一些作品；少一些学术论文，多一些细读批评；少一些美学，多一些美的示例”[20]的呼吁近些年不断发生，一行在《论诗教》中便曾有过如此阐述。而这一观点在中小学义务教育阶段的指导或参考意义，相较于陆续丰赡和高度专业化的高校，更为切中实际效果。长期深耕基层诗歌教育问题的吴昊，曾对廊坊市某初中的三个年级共 150 名学生进行过问卷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喜欢并且愿意了解新诗深刻内涵的学生占 49。01%，对新诗没什么感觉的学生占 41。72%，不喜欢新诗的学生占 9。27%”[21]，数据中显示过半的学生并不存在对新诗了解和学习的欲望，所反映而出的客观现实是由于教育环节或方式的弊病，导致新诗距离大量的年轻人愈来愈远，逐步成为束之高阁的事物，大有退化或缩减为精英群体内部沟通或营设的文化产物的趋势，从而无法延续自新中国以来新诗教育不断下沉民间、普及大众的发展策略。

深究更为细节的问题，一者是中小学阶段新诗选材与内容上的缺憾，和高校早前存在的矛盾类似“迥异于传统新诗的所谓‘异质新诗’，长期以来一直遭受到语文教育界的漠视”[22]，不在少数的重要作品和理论结构从纸面缺席，在教育环节和生态氛围中新诗长期处于相对弱势和边缘化的状态，学生对于汉语新诗的理解大多停留在大半个世纪前以闻一多、艾青为代表的经典作品，或极少数诸如普希金、惠特曼等百年前域外诗典的译介版本，极容易对当代汉语新诗形成基于上述的单薄印象。课外阅读板块上，能够主动选择新诗文本掺入浏览的学生群体更为稀少，在“考纲”为主旨的应试教育结构之内，大量饱含着自由色彩、个体精神和人文探索的汉语新诗近乎以一种迥异者、外来客的形象存在，游离于学生们的认知范围之外，也被隔绝于课堂的书本之外。二者则是源自大量教育工作者对于新诗的漠视或无知，在中小学层面大量的基层教师自身对于汉语新诗的理解存在各种曲解、歧意或盲目，普遍师范院校流水式锻造出的施教群体，自身对于汉语新诗的学习程度本身就基于上述所谈及的高校教育，加之“高校新诗教学与中学新诗教学似乎是各成体系，缺少交流”[23]的现状，导致除却极少数源于自身对新诗抱有兴趣或兼职从事写作事业的成员外，整体教师的群像，仍旧是匮乏之姿。汉语新诗在课堂上所面临的失位、偏移等问题，追溯其成因，部分根源就在于此。

社会教育与文化传播层面，作为系统性教育结构之外的另一重要场域，其与象牙塔之间长期维系着联动、互补或互相戕害的联系。以作协、文联单位及下属或主管的文学杂志、理论期刊等机构为主体的新诗文化链条，在当代中国文化社会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其中所产生的奖项及签约项目私相授受、文学活动及出版资质暗箱操作等问题，客观上损害着新诗教育的发展，诸如《星星》诗刊的“夏令营”、《诗刊》社所主办的“青春诗会”等，愈发沦为若干文人关系网络中衍生权利和资源接班人的“继位流程”游戏，而非对整体社会的诗学普惠。而另一层面，上述“链条”由于手握海量官方资源，在诸多政策性纲领的指引之下所开展的工作，在新诗文学作品传播、诗人活动等领域为汉语新诗扩大受众面和阅读群体、参与人群做出难以磨灭的贡献。与之同时，社会层面还存在若干学者、公共知识分子、书商、出版人等组成的或独立工作或联合活动的诗学力量，多年来陆续衍生诸多民间诗歌读本、刊物以及活动奖项，奖掖者大多出自民间，身份职业各异，对于新诗文化的传播起到至关重要的效用，另有诸如王志军的《进入诗歌——关于读诗和写诗的六堂课》、廖伟棠的《我偏爱读诗的荒谬——现代诗的三十堂课》、王炜的《试论诗神》以及黄梵的《意象的帝国：诗的写作课》等相对阅读门槛偏低的通俗讲解新诗类作品，在青年人为代表的非汉语新诗领域相关从业群体之间，具备较为具体的影响力，往往被视作了解新诗的敲门砖。

张桃洲曾扼要地指出，新诗教育大体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纳入程式化的学校教育机制、与其他学科教育无差别的新诗教育，一种是个性化的、非应试的新诗教育。后者的意义是打破环绕在新诗和教育周围的双重樊篱，将新诗教育还原为一种广义的教育，即通过各种历练、实践对个体身心进行自我完善，而读诗和写诗是其中一种灵活、便捷的方式”[24]，诚如是，所谓“广义的教育”正是对社会层面的新诗教育活动极好的定义。作为诞生伊始就不断与时局政治、地缘历史、社会思潮乃至域外信息产生丰盈的交流，存在包容与

被包裹、影响与受影响等关系的文学品类，汉语新诗历时百年，从社会教育、高等教育和义务（基础）教育三个剖面进行阐析，或能够有利于学界抵近其相对真实客观的庐山面目，在文化强国的时代旗幡之下，构筑中国自主的文明与文化理论体系、文学与文论话语权已然成为汉语新诗必然参与，乃至亟待作出更深度贡献的事业。而作为新诗发展的基石，其教育路径将如何克服历史的、现行的甚至未来的矛盾和困境，革故鼎新，弥久发展，是值得付诸思考和寄予期盼的"终极"之问。

参考文献：

[1]吴小玮. 前教育现代化时期的落差——以《海国图志》在中日两国的传播为例[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09(2): 90.
[2]张隆华. 中国语文教育史纲[M]. 长沙: 湖南师大出版社, 1991: 258.
[3]杜鹏. 重返 20 世纪上半叶"诗教"现场——评孙晓娅《庠序有诗音：新诗教育研究 1919—1949》[N]. 昆山日报, 2025-07-03(003).
[4]徐芳. 百年新诗传统、诗歌教育与其他——吴思敬教授访谈录[J]. 文艺论坛, 2023(1): 25.
[5]古惠文. 从中日近代教育的比较看大国崛起[J]. 嘉应学院学报, 2007(5): 48.
[6]王桂. 日本教育史[M]. 长春: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87: 84.
[7]田兵权, 陈国庆. 梁启超启蒙思想的历史价值[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6): 102.
[8]徐碧辉. 美学与中国的现代性启蒙——20 世纪中国的审美现代性问题[J]. 文艺研究, 2004(2): 158.
[9]许子东. 现代主义与中国新时期文学[J]. 文学评论, 1989(4): 21.
[10]梁江川, 刘志宏. 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认知对粤港澳大湾区认同的影响——文化特质的中介作用[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24, 40(10): 1567.
[11]程士庆. 为什么是诗歌——诗教与文学通识教育[J]. 星星 · 诗歌理论, 2025(6): 21.
[12]霍俊明, 岳志华. 展开的起点：新诗教育问题与反思[J]. 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7(4): 17.
[13]徐国源. 批判"失语"与"朦胧"指征——中国朦胧诗派新论[J]. 当代作家评论, 2005(1): 100.
[14]谢冕. 一个世纪的背影——中国新诗 1977—2000[J]. 文艺争鸣, 2007(10): 59.
[15]罗振亚. 新诗解读方法说略[J]. 求是学刊, 2007(1): 111.
[16]李心释. 元诗的发生及成诗逻辑[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5(9): 136.
[17]霍俊明. 夜雨修书：陈超和他的朋友们往来书简[M].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4: 243.
[18]邓小南. 人文学科不宜过于"科目化"——写在《中国人文学科四十年》出版之际[N]. 光明日报, 2025-10-18(012).
[19]易彬. 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与新诗教育问题[J].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4): 108.
[20]一行. 论诗教[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1.
[21]吴昊, 苗雪艳. 现代诗歌研究课程与廊坊市初语教学衔接研究[J]. 语文教学之友, 2024(1): 7.
[22]潘涌. 论语文素质教育背景下的新诗教学[J].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2): 98.
[23]吴昊, 姚灿. 高校与中学新诗教育的差异性分析及融通路径探索[J]. 江汉学术, 2024(5): 29.
[24]张桃洲. 新诗教育的困境及可能[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2): 138.

深度融合虚拟仿真的公共管理学科教学改革：理论构建与实践路径

丁惠炯[1]，方朝华[2]，李霞[3,*]

(1.梧州学院管理学院，广西 梧州 543000；2.梧州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广西 梧州 543000；

3.包头技师学院，内蒙古 包头 014030)

摘要：数字化时代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对公共管理人才的实践能力、复杂问题解决能力及数智决策素养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传统以理论灌输和案例研讨为主的公共管理教学模式已难以满足这一需求，公共管理学科教学面临从理论导向向实践能力培养转型的迫切需求，其教学体系改革势在必行。研究构建了一个包含“目标层－核心层－支撑层－评价层”的公共管理虚拟仿真教学改革理论模型，并明确了“体验－探究－协作－反思”的四阶段教学流程。通过“智慧城市治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决策”及“跨部门政策协同”等典型的教学案例分析，结合教学效果对比可见，实证虚拟仿真教学在提升学生综合能力方面的显著成效。研究深入探讨了改革面临的技术、师资与评价挑战，并提出了系统性的对策，以期为公共管理学科的现代化转型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与可行的实践蓝图。

关键词：公共管理教学改革；虚拟仿真实验教学；教学模式

基金项目：广西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工程项目：基于 LOS 理念的应用型地方高校“公共管理类”人才培养模式——公共管理专业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的设计与实现（编号：2025JGB401）；内蒙古自治区教育科学研究“十四五”规划课题：虚拟现实技术在空内设计教学中的应用研究(编号：NZJGH2023034)。

DOI：doi.org/10.70693/jyxb.v1i4.116

Teaching reform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discipline deeply integrated with virtual simulation technology: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al path

Hui-Jiong Ding[1]，Chao-Hua Fang[2]，Xia Li[3,*]

1.School of Management, Wuzhou University, Wuzhou , Guangxi,China,543000;

2.School of Teacher Education , Wuzhou University, Wuzhou , Guangxi,China,543000;

3.Baotou Technician College, Baotou, Inner Mongolia,China,014030.

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ra in economic and social spheres has imposed new and higher demands on public management professionals 'practical capabilities, complex problem-solving skills, and digital-intelligent decision-making literacy.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which primarily relies on theoretical indoctrination and case studies, can no longer meet these requirements.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for the discipline to transition from theory-oriented instruction to practical competency cultivation, making systemic reform of the teaching framework imperative.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model for virtual simulation teaching reform in public

作者简介：丁惠炯，男，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教育政策与体制创新；
方朝华，女，教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教育技术学；
李霞，女，教育硕士，研究方向为教育技术学。

通讯作者：李霞

administration, comprising four layers: "goal layer, core layer, support layer, and evaluation layer," while establishing a four-phase instructional process: "experience, inquiry, collaboration, and reflection." Through analysis of typical cases including "smart city governance," "emergency decision-making in public health crises," and "cross-departmental policy coordination," combined with comparativ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the study demonstrates the significant benefits of empirical virtual simulation teaching in enhancing students' comprehensive competencies. The research further explores technical, faculty, and evaluation challenges in the reform process, proposing systematic countermeasures to provide solid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actionable blueprints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disciplines.

Keywords: Public administration teaching reform; Virtual simulation experiment teaching; Teaching mode

从构建之初，公共管理学科一直肩负着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具备公共精神、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的重任；新时代下，公共管理学科更需要培养数以千万计的基层治理人才以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公共管理学科教育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的结构性失衡问题。传统的教学方法（如课堂讲授、文本案例分析等），虽能够帮助学生构建系统的基本知识框架，但在模拟宏大的公共管理场域中高度动态、复杂模糊且充满价值冲突的真实情境方面，明显地力有不逮。现行公共管理学科教学中仍普遍存在的问题可一言以蔽之：培养的学生掌握了“关于公共管理的知识”，却缺乏“从事公共管理的能力”，更难以形成“公共管理实践应有的思维方式”。

与此同时，以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深刻重塑着公共治理的形态，数字政府、智慧城市建设对公共管理人才的数字素养与智能化决策能力提出了直接要求。这一背景使得公共管理学科的教学改革不仅必要，而且紧迫，其应当回应两个核心问题：第一，如何有效弥合理论与实践的鸿沟？第二，如何培养学生的数字时代胜任力？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技术的成熟，为回答上述问题提供了关键突破口。它通过构建高度逼真、可重复、无风险的虚拟情境，使学生能够“浸入”其中，扮演特定角色，处理模拟的公共管理问题，从而实现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建构、从知识记忆到能力内化的根本性转变。本研究旨在超越将虚拟仿真视为一种单纯技术工具的浅层讨论，而是将其置于教育学与公共管理学的交叉视角下，进行深度的理论挖掘与系统的模式构建，以推动公共管理学科教学实现一场深刻的范式革命。

一、 公共管理教学改革与虚拟仿真融合的深层理论溯源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应用，并非无源之水，其背后有着坚实而丰富的教育理论与公共管理理论作为支撑。

（一）虚拟仿真教学是现代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知识不是通过传授被动接收的，而是学习者在与环境的交互中主动建构的。虚拟仿真教学完美契合了这一理念。它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可供探索和操作的“微缩世界”，学生在此环境中通过解决具体问题（如平衡财政预算、回应民众诉求等），主动地将抽象的公共管理理论（如公共选择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等）与具体情境相结合，从而完成个人知识的建构。这一教学方式的实施远比听教师讲解理论更为深刻和持久。

情境认知学习理论强调，学习本质上是情境性的，是“合法的边缘性参与”实践共同体的过程。传统课堂是一个剥离了具体情境的场域，而虚拟仿真则能够精准复现公共管理的特定实践共同体（如政府部门、社会组织等）。学生在仿真中扮演多元主体各类角色，其学习过程是从“边缘”观察、模仿到“中心”决策、负责的参与过程，进而更为有效地习得该共同体所需的默会知识、行为规范与决策逻辑。

体验式学习循环理论（体验式学习法）提出的“具体体验 - 反思观察 - 抽象概括 - 主动检验”四阶段循环模型，为虚拟仿真教学提供了经典操作框架。在仿真实验中，学生首先获得“具体体验”（如一次虚拟的群体性事件）；随后通过回放、讨论进行“反思观察”，分析决策的得失；进而“抽象概括”出处理此类事件的一般性原则或理论模型；最后在后续的仿真任务或新的情景中进行“主动检验”，开启新一轮学习循环。虚拟仿真技术使得这一循环可以高效、低成本地重复进行，极大优化了学习效率。

能力本位教育理念聚焦于学生学习后能“做什么”，而非知道了“什么”。这与公共管理专业强调的应用型、职业化导向高度契合。虚拟仿真教学能够直接针对性地培养一系列核心能力，如政策分析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应急决策能力、数据挖掘与分析能力等，并通过学生在仿真任务中的行为表现对其进行精准评估，从而实现从“知识输入”到“能力输出”的转变。

（二）虚拟仿真教学与公共管理实践能力的培养目标相契合

公共管理学科自身的发展也为虚拟仿真教学提供了学理上的合法性。“治理理论”强调多元主体的协同共治，学生可以在仿真中体验如何设定 KPI、管理虚拟部门并接受“虚拟公众”的绩效评价；仿真平台可以设计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等多方角色，让学生在博弈与协作中理解“网络化治理”的复杂性与艺术性。这些前沿理论在传统课堂中难以真切体会，却在虚拟仿真中变得可视、可感、可操作。

表 1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的多理论基础整合模型

理论维度	核心观点	在虚拟仿真教学中的体现
建构主义	知识是学习者主动建构的产物	学生在虚拟场景中通过自主探索、决策和问题解决，主动建构对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的理解。
情境学习	学习是“合法的边缘性参与”实践共同体	学生通过扮演特定公共管理角色，在模拟的“政府”、“社区”等实践共同体中，学习该角色的行为规范、技能和默会知识。
体验式学习	学习是基于体验的循环过程	虚拟仿真为学生提供“具体体验”，并通过系统设计的反思、概括与检验环节，完成完整的科尔布学习循环。
能力本位教育	教育目标应聚焦于可观察、可测量的能力产出	教学设计和评价体系直接围绕公共管理核心能力展开，通过学生在仿真任务中的表现来评估其能力达成度。

二、 公共管理虚拟仿真教学改革的系统模型构建与实践路径

基于上述理论，我们构建了一个系统性的教学改革模型，该模型由四个层次构成。

表 2 公共管理虚拟仿真教学改革的系统模型

模型层次	核心构成要素	功能与内涵
目标层 (导向)	1.核心素养提升 2.实践能力锻造	-公共价值理性：塑造公共精神、伦理观念与公共利益导向。 -系统思维与复杂决策能力：培养对复杂公共问题的综合分析与决断力。 -政策分析、危机管理、沟通协调、数据运用等关键职业能力。
核心层 (载体与引擎)	1.技术内核 2.内容模块 3.教学流程	-VR/AR、大数据、智能体模拟等构建沉浸式、动态响应环境。 -政策仿真、城市治理、危机管理等主题情境库。 -“体验→探究→协作→反思”四阶段闭环学习流程。
支撑层 (基础保障)	1.课程体系 2.师资队伍 3.资源与环境	-课程重构：将仿真实验嵌入核心课程，或设立独立仿真课程。 -师资赋能：对教师进行技术培训与教学法更新。 -平台建设：建设智慧实验室、开发与共享案例资源库。
评价层 (反馈与优化)	1.过程性评价 2.结果性评价 3.综合性评价	-行为数据：记录决策路径、沟通协作等过程数据。 -绩效指标：基于仿真系统内嵌的量化结果（如公众满意度）。 -能力评估：结合反思报告、小组互评，进行多维能力画像。

该模型需要容纳和正确处理两类关系，其逻辑结构如下：

（一）自上而下的驱动关系

1.目标层：是整个模型的出发点和归宿，它定义了改革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决定了核心层的内容设计与评价层的指标体系。具体包含：

（1）核心素养提升：培养学生公共价值理性、系统思维、复杂决策能力、数字领导力。

（2）实践能力锻造：重点强化政策分析、项目管理、危机应对、沟通协调、数据运用等职业能力。

2.核心层：是实现目标层的关键载体与核心引擎，通过先进的技术与科学的教学流程，为学生创造达成能力目标的学习环境。具体包含：

（1）技术内核：集成 VR/AR/MR、大数据分析、智能体模拟、云计算等技术。

（2）内容模块：包含“公共政策仿真”“社区治理模拟”“应急管理沙盘”“公共服务设计与评估”等多个主题模块。

（3）流程设计：遵循“体验- 探究- 协作- 反思”

四阶段教学流程：

情境体验：学生通过终端设备进入虚拟情境，明确角色与任务。

自主探究：学生独立或在系统引导下收集信息、分析数据、识别问题。

多角色协作：不同学生扮演的不同角色在平台内进行沟通、谈判、协作，共同制定方案。

系统化反思：任务结束后，系统自动生成决策过程数据可视化报告，教师组织学生进行复盘、撰写反思日志，将感性体验上升为理性认知。

（二）自下而上的支撑关系

1.支撑层：是核心层能够有效运行的基础保障，没有重构的课程、赋能的教师和必要的资源环境，虚拟仿真教学就无法常态化、高质量地开展。具体包含：

（1）课程体系重构：将虚拟仿真实验作为核心环节，嵌入《公共政策分析》《电子政务》《社区治理》《应急管理》等核心课程，或开设独立的《公共管理决策仿真》综合实验课。

（2）师资队伍建设：对教师进行常态化技术赋能培训，并鼓励教师与技术人员合作开发本土化仿真教学案例。

（3）技术环境与资源：建设智慧实验室，保障硬件与软件支持，并建立共享的虚拟仿真教学案例库。

2.评价层: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的始终，它既检验目标层的达成度，也为优化核心层的教学设计和强化支撑层的建设提供数据反馈和决策依据，形成一个持续改进的闭环系统[i]。具体包含：

过程性评价：记录学生在仿真过程中的关键决策点、沟通记录、资源利用效率等行为数据。

结果性评价：基于仿真系统内置的量化指标体系（如公众满意度、财政健康度、事件解决率）对任务成果进行评分。

综合性评价：结合学生的反思报告、小组互评及教师观察，进行多维度、立体化的能力评估。

三、 典型案例分析与效果验证

为验证上述模型的有效性，本研究选取了三个具有代表性的虚拟仿真教学案例。

（一）案例一：“智慧城市治理”综合仿真平台

本平台以模拟一个运行中的虚拟城市为核心而构建。学生被分为不同小组，分别扮演市发改委、交通局、环保局、财政局及市民代表等角色。面临的核心任务是：在有限的财政预算下，协同制定一个为期五年的“智慧交通”建设规划。仿真过程中，各部门需要提交项目提案、进行预算博弈、应对市民的质询和媒体采访。平台会实时模拟政策实施后的交通流量、环境污染、公众舆论等数据变化。

效果分析：教学团队对参与该实验的班级与传统案例教学班级进行了对比研究。通过前后测问卷调查和仿真过程数据分析发现，实验班学生在以下方面表现出显著优势。

表 3 虚拟仿真教学与传统教学学习效果对比图

能力维度	传统案例教学组（平均分）	虚拟仿真教学组（平均分）	效果差异分析
系统思维能力	72	88	虚拟仿真通过模拟动态复杂的城市系统，使学生更深刻地理解政策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连锁反应，系统思维提升显著。
政策分析能力	75	85	传统教学能打下理论基础，但虚拟仿真通过“决策-反馈”机制，让学生在实践中掌握政策分析工具并预见后果，应用能力更强。
跨部门协作能力	68	92	传统课堂讨论难以模拟真实协作场景。虚拟仿真通过角色扮演和即时通讯工具，强制学生进行跨部门沟通、谈判与妥协，效果差异最为明显。
数据驱动决策能力	65	90	传统教学多介绍数据概念。虚拟仿真则要求学生在海量动态数据中挖掘信息、建立分析模型以支持决策，极大提升了数据素养与决策科学性。

说明：本表数据源于对采用传统案例教学法和虚拟仿真教学法的平行班级进行的教学实验后测评估，评分基于统一的量化评分表和教师评估小组的综合判定。

结果描述：在四个能力维度上，“虚拟仿真教学组”的平均分均显著高于“传统案例教学组”，尤其在“跨部门协作能力”和“数据驱动决策能力”上差距最为明显。

差异分析：在“跨部门协作能力”和“数据驱动决

策能力”这两个高度依赖实践和情境的维度上，优势差距最为突出。这证明了虚拟仿真在模拟真实工作场景和提供数据实践环境方面的不可替代性。

教学启示：该对比结果强有力地支持了将虚拟仿真实验教学深度融入公共管理学科改革的必要性。它表明，虚拟仿真并非对传统教学方法的简单补充，而是在培养学生高阶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方面的一种范式革新，能够有效弥合理论与实践的鸿沟。

（二）案例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决策”模拟

该案例模拟某城市爆发新型传染病。学生组成应急指挥部，需要在信息不完全对称、资源紧张、舆论压力巨大的情况下，做出诸如是否封城、如何调配医疗物资、如何进行风险沟通等一系列艰难决策。仿真系统会引入媒体和公众反馈，决策的每一个步骤都会影响疫情发展曲线和社会的稳定度。

（三）案例三：“跨部门政策协同”博弈仿真

该仿真聚焦于“老旧小区改造”这一典型的多部门协同难题。学生扮演住建局、城管局、民政局、社区居民委员会等不同角色，各自有不同的部门利益和政策偏好。他们需要在仿真中进行多轮谈判、协商和妥协，最终形成一个能被各方接受的整体方案。此案例深刻揭示了“碎片化”行政体制的弊端以及协同治理的必要性与艰巨性。

四、 改革面临的深层挑战与系统性对策

尽管前景广阔，但深入推进此项改革仍面临诸多挑战。

（一）核心挑战

1.技术与内容的“高成本”壁垒：高质量的虚拟仿真教学平台开发成本高昂，且需要持续维护更新。许多高校面临资金和技术人才短缺的问题。

2.教师的“角色转换”与“能力恐慌”：改革要求教师从知识的权威传授者转变为学习环境的设计者、引导者和促进者。部分教师存在技术应用能力不足和教学模式转型的适应性焦虑。

3.评价体系的“科学性”与“可信度”：如何将学生在虚拟环境中的表现科学地量化为课程成绩，并建立一套既重结果也重过程、既客观又全面的评价体系，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4.仿真情境与真实世界的“保真度”差距：任何仿真都是对现实的简化。如何确保仿真情境的逻辑真实性和复杂性，避免学生形成机械的、脱离现实的决策思维，需要审慎设计。

（二）应对策略

1.构建“共建共享”生态：鼓励高校、企业、政府部门合作开发仿真资源，建立国家级或区域级的公共管理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联盟和案例共享库，降低单个学校的开发成本。

2.实施“阶梯式”教师发展计划：通过工作坊、教学沙龙、设立教改专项基金等方式，分阶段提升教师的信息化教学设计与实施能力，并将其纳入教师考核与晋升评价体系。

3.深化“数据驱动”的评价改革：充分利用仿真平台生成的过程性大数据，结合人工智能分析技术，对学生的能力画像进行多维度、精细化的刻画，使评价从“主观印象”走向“客观证据”。

4.坚持“虚实结合”的混合式教学设计：明确虚拟仿真的定位是“练兵场”而非“战场”。在教学过程中，必须将虚拟仿真与实地调研、真实项目参与、资深公务员讲座等实体教学活动相结合，相互印证，弥补虚拟环境的不足。

五、 结论与展望

研究系统论证了虚拟仿真实验教学手段深度融入公共管理学科教学改革的理论必然性与实践可行性。其并非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一场基于现代教育理论体系和公共管理学科理论体系，以学生“发展”为教学中心、以学生“获得”为教学导向，对教学目标、内容、方法与评价进行全方位重构的深刻变革；其有效地破解公共管理教育体系长期存在的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困境，是贯彻落实“人工智能+”战略在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方面的有效突破，也是培养面向未来、能够驾驭复杂的公共治理实践挑战的高素质人才的教育现代化转型。

展望未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公共管理学科虚拟仿真教学将朝着更加智能化、个性化和社会化的方向发展。人工智能可以扮演更聪明的虚拟对手或协作者，动态生成无限逼近真实的政策情境，为本学科学生提供更具挑战性的学习体验。教育主管部门、高校和学界应给予此教育教学模式的深刻变革更多的关注、支持乃至于资源的投入，共同推动我国公共管理学科教育迈向与数字时代同频共振的新纪元。

参考文献

[1]李雄,孙路遥.虚拟仿真教学的内涵、设计及应用[J].中国教育信息化,2019(06).

[2]丁惠炯,彭顺绪.公共管理类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及方法论探析——对地方高校的实证研究[J].教育现代化,2019,6(93):1-4.

[3]张敏,文福安,刘俊波.高校虚拟仿真教学环境构建逻辑探讨[J].实验技术与管理,2023,40(03):1-6.

[5]逯行,朱陶,徐晶晶,张丽萍.高校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的基本问题与趋势[J].现代教育技术,2021(12).

[6]汤显峰,沈丽燕,董榕,杨玉辉,张宇燕.基于云渲染

的 VR/AR 智慧教室的设计与应用[J]. 现代教育技术,2021(05).

[7]梁婧茗,李连香,孙继佳,等.基于 CIPP 模型的《健康管理》虚拟仿真教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24,41(04):427-431+463.

[8]刘清涛;张新荣;贺朝霞.工程机械开放式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管理平台建设[J].实验技术与管理,2018(07).

[9]李小平;赵丰年;张少刚;张琳;许梦幻.VR/AR 教学体验的设计与应用研究[J].中国电化教育,2018(03).

U-S 协同视域下《小学生心理辅导》课程的实施困境与优化措施

刘丽[1] 孙思洁[1]

（1.常州工学院，江苏 常州 213022）

摘 要：本文基于 U-S 合作模式，针对当前小学生心理辅导课程建设与实施中存在的困境展开探究。其具体困境包括：管理机制缺乏制度保障；信息共享平台缺失；外部资源支持不足；专业队伍跨界能力欠缺；课程设计缺乏差异化衔接等问题。基于以上问题本研究立足 U-S 合作框架，强调理论引领与实践反思的双向互动，依托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构建了以差异性、整体性与系统性为基本原则的小学心理辅导课程体系。在具体措施层面，提出应从顶层设计入手，建立统一的管理体制；深化合作内容，创新课程实施模式；构建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加强课程体系建设，按低、中、高学段分层设计内容；并优化活动方案，促进分类实施与有效衔接从而提升小学心理辅导课程的科学性、实效性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关键词： U-S 合作模式；小学生心里辅导；课程改革与建设

基金项目：2023 年常州工学院校级教学改革重点项目《小学心理辅导》产教融合示范课（CJRHKC2023-19）；2023 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一般项目“多主体协同视角下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体系的解析与重构”（2023SJYB1296）

DOI：doi.org/10.70693/jyxb.v1i4.114

Implementation Challenges and Optimizations for the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Course in a U-S Collaborative Framework

Li Liu [1], Sijie Sun[1]

[1] school of Education, Ch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Changzhou of Jiangsu, 213022

Abstract: This article employs the U-S collaboration model to examine the current challenge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courses f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Key issues identified include: the absence of institutional safeguards in management mechanisms; a lack of information-sharing platforms; insufficient support from external resources; limited interdisciplinary competencies within professional teams; and course designs that are neither differentiated nor seamlessly integrated. Based on the issues identified above, and within the U-S cooperation framework, this study emphasizes a two-way interaction between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practical reflection. By engaging multiple stakeholders in a collaborative process, it aims to construct a primary school student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curriculum system founded on the core principles of differentiation, comprehensiveness, and systematicity. At the level of specific measures, the study proposes a multi-faceted approach: initiating a unified management system through top-level design; deepening cooperative engagements and innovating curriculum delivery models; establishing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ies for teacher development; strengthening the curriculum framework with differentiated content tailored to lower, middle, and upper grade bands; and optimizing activity plans to

作者简介：刘丽 (1989—)，女，博士，研究方向为问题青少年教育与矫正；
孙思洁(1993—)，女，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儿童发展心理学、积极心理学。
通讯作者：孙思洁

facilitate tiered implementation and seamless articulation. These steps collectively aim to enhance the scientific rigor, effectiveness, and sustainability of primary school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courses.

Keywords: U-S Cooperation Model; Primary School Student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Curriculum Reform and Development

引言

随着社会的快速转型和教育改革的深入推进，心理健康问题已从隐性议题演变为不容回避的社会性问题。学生最为家庭与社会高期望的承载群体，其心理健康水平不仅关系到个体生命的健康成长，也深刻影响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2023 年度中国精神心理健康》蓝皮书数据显示，当前学生群体中抑郁、焦虑、自伤及轻生等心理行为问题频发，其中高中生抑郁检出率达 40%，初中生为 30%，小学生亦达 10%，大学生心理危机形势同样不容乐观　　。这一现实态势倒逼教育行政部门、学校乃至全社会必须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予以系统性重视。为积极回应这一挑战，教育部等十七部门印发的《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 年）》明确要求将心理健康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培养学生积极乐观的心理品质和百折不挠的意志品质”[2]。然而，现实中，小学生心理辅导课程的开发与实施仍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大学教育理论研究与中小学教育实践之间存在结构性断裂，高校丰富的学术资源未能有效转化为一线教学实践；另一方面，小学教师在课程开发过程中常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引与持续的专业支持，致使心理辅导课程在内容设计上趋于零散，在方法运用上流于单一，整体专业性明显不足。究其根源，这一困境背后反映两大问题：其一，大学研究成果向基础教育实践转化的机制长期薄弱甚至缺位；其二，小学教师难以获得稳定、系统且具指导性的专业发展支持。两者叠加，导致心理辅导课程陷入内容碎片化、方法刻板化与效果表层化的现实窘境。在此背景下，“大学—中小学合作模式”（University-School Partnership，简称 U-S 合作模式）的构建，成为破解实践困局的重要路径。这种合作模式通过建立大学与中小学之间的中介系统，为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联系和转化搭建桥梁，使两者在必要的张力中实现价值整合与文化融合。

一、U-S 合作模式下《小学生心理辅导》课程改革的时代诉求

U-S 合作模式源于美国，近年来在我国教师教育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也成为培养卓越教师的重要途径[3]。该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共生型合作关系，强调大学与中小学作为平等主体，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基础上，共同致力于教育问题的研究和教育质量的提升。在小学生心理辅导课程开发中，U-S 合作模式超越了传统的单向知识传递模式，创造了理论与实践双向对话的课程整合机制[4]。在这一进程中，大学教师与中小学教师逐渐形成伙伴式协作关系，共同构建“教研共同体”，并通过集体反思与实践，实现专业共同体的重构与再生。由此可知，依托 U-S 合作模式，能够体系化地增强小学心理辅导教育的自主发展能力与内生性育人机制。在我国现行教育体制与政策语境中，U-S 合作模式呈现出多层次、多元化、多类型等特点[5]，其具体表现形态如下：一是项目导向型合作，以特定课程开发或课题研究为纽带，大学专家与小学教师组成临时团队，项目结束后合作结束；二是制度导向型合作，通过建立教师发展学校或合作基地，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三是文化导向型合作，该合作模式强调长期合作中所形成的价值共识与行为结果，组织层面的深度文化互嵌等。本研究主要聚焦于项目导向型合作，以 U-S 合作模式为框架，探索大学与小学协同开展小学生心理辅导课程建设的具体路径与实施策略，旨在构建科学化、系统化、实用化的小学生心理辅导课程体系，促进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开展，同时也为 U-S 合作模式在教育实践中的应用提供可借鉴的范例。

二、《小学心理学辅导》U-S 合作模式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U-S 合作管理机制缺乏一体化保障

我国尚未建立起支持 U-S 合作的长效机制，合作多依赖于个人关系和短期项目，缺乏稳定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大学和中小学属于不同的管理体制，有着各自的组织目标、运行逻辑和评价体系，这种制度壁垒使得 U-S 合作难以实现真正的深度融合。在大学层面，参与合作的教师团队通常承担着较为繁重的科研与教学任务，导致其在 U-S 合作中面临较高的“机会成本”。此外，教师参与合作的意愿与投入程度，往往受个人责任意识与学术兴趣的影响。中小学教师同样因本职工作的压力，在合作中的参与频次与深度受到制约。尽管合作各方已建立一定的制度框架，但目前仍缺乏针对 U-S 合作的权威性、指导性政策文件；因而，制度保障不足客观上制约了小学心理辅导课程一

体化建设的推进，也不利于长效合作机制的形成与巩固。

此外，《小学心理学辅导》课程 U-S 建设中存在权责边界模糊的问题，尤其在合作协议中常出现关于“评估主体”与“干预责任”的争议。正如《Going against the Grain》一文所标明，合作初期的领导者往往面临“平和型领导风格”与科层化管理传统之间的张力，若缺乏清晰的角色分工，将直接影响项目的执行效力[6]。《小学生心理辅导》课程建设与实施作为一个动态生成的过程，依赖于精细化的过程管理与动态调适。然而，当前 U-S 合作中普遍存在“重两端、轻中间”的倾向，即重视合作启动阶段的签约仪式与最终成果的总结汇报，而忽视合作过程中关键的监控、督导与动态调整环节，影响了课程实施的质量与合作的实际成效。

（二）U-S 合作缺乏共享数据平台协同治理

U - S 合作的有效推进，亟需构建跨机构的信息共享平台，以实现学生心理数据的实时传递、干预策略的快速迭代以及教育效果的闭环评估。一体化的信息共享平台不仅是技术支持，更是制度保障，其为实现数据即时流转、干预方案科学优化与育人成效精准反馈提供了基础架构。然而，审视当前实践可见，多数地区的 U - S 协作仍滞留在以电子邮件、纸质报表为代表的“前数字化”协作模式中。学生心理与行为数据从采集、整理到经学校流转至高校研究团队，往往耗时数周，形成显著的“信息时滞”，使得大学专家基于滞后信息所提出的干预策略，难以匹配学生动态发展的心理状态，实质上错过了教育干预最为关键的“黄金期”，严重削弱了支持的精准性与有效性。

由于缺乏区域乃至国家层面的学生心理发展电子档案数据标准，不同学校乃至同一学校内部的不同信息系统之间缺乏统一标准[7]。此现象不仅造成学生成长轨迹的碎片化与难以追溯，更从制度与技术层面强化了机构间的“信息孤岛”效应，致使跨系统数据聚合分析、多情境比对以及长期追踪研究难以系统开展。此外，成功的 U - S 合作依赖于清晰的共同目标、透明的过程管理与定期的协同反思。然而现实中，合作双方常在项目进度、经费使用与核心评估指标等关键议题上缺乏统一制度化机制。临时性、非正式沟通往往取代稳定的协同治理结构，进而引发决策链条冗长、权责边界模糊等问题，使合作精力过多消耗于内部协调，而非聚焦于专业创新与实效提升，造成 U-S 合作模式协同效果较差。

（三）U-S 合作模式缺乏长效外部资源支持

《小学心理辅导》U-S 的可持续合作，有赖于持续且充足的外部资源支持。外部资源包括行政支持、专业社群和中介机构等。美国 U-S 合作的经验表明，教育行政部门、专业协会和中间组织的支持，对合作的成功至关重要[8]。例如，美国联邦教育部通过建立教师教育标准，为大学和中小学伙伴关系提供资助，使双方联系更加紧密。相比之下，我国在这方面的支持体系还不完善，U-S 合作多为点对点的自发行为，缺乏系统支持。因而，现实中合作双方都面临着资源约束的问题。从小学方面看，繁重的教学任务和有限的办学资源，使得学校难以将太多精力投入到 U-S 合作中。特别是在心理健康教育这类“非考试科目”上，学校的重视程度和资源投入往往不足。从大学方面看，虽然拥有专业知识和研究能力，但缺乏对小学实际情况的深入了解和实践经验，提供的指导往往与学校实际需求脱节。除资源约束外，U-S 合作还面临内部动力不足的挑战。合作的成功推进，尤其依赖于小学一方具备明确的改革意愿与发展需求。然而现实中，不少小学参与合作更多源于行政指令或外部压力，而非基于内在发展动机。此类外驱型合作模式往往缺乏持续性与深入性，难以形成实质性的教育改进效应。

（四）U-S 合作专业队伍匮乏并缺乏有序衔接

专业知识扎实、业务能力突出的师资队伍，是保障小学生心理辅导教育工作有效开展的重要基础[9]。在 U - S 合作中，“专业人才互补”构成了其核心机制，大学教师团队具备将抽象理论转化为具体教育实践的能力，研究者需要具备将抽象理论转化为具体实践的能力，小学教师团队需善于从实践经验中提炼理论构建。然而，当前，这种跨界合作素养在现实实践中往往缺乏。大学教师擅长理论建构，但对小学心理课堂的实践有限；小学教师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但在理论建构存在不足。另一个能力层面的问题是课程转化能力的不足。小学教师虽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但在理论提升和系统化表达方面仍显薄弱。

此外，课程转化能力的欠缺也成为制约合作成效的关键因素。小学心理健康辅导课程的改革，要求将心理学理论与咨询技术有效转化为契合小学生认知特点及符合小学实际条件的教学内容与活动设计。这一转化过程有赖于大学研究者与小学教师的共同参与和深度协作。然而现实中，高校方面所提供的指导往往偏重理论、缺乏可操作性；小学教师则普遍对理论转化信心不足，由于小学教师专业能力有限，更倾向于期待“拿来即用”的现成方案，使得 U - S 合作难以真正落地见效。

最后，心理健康教育在学校的整体课程体系与日常管理序列中常尚未处于核心地位。多数学校尚未将其视为与学科教学同等重要的育人环节，加之其成效难以即时量化评估，导致该工作往往沦为依赖教师个人责任感。这种“去制度化”的生存状态，使得小学生心理辅导的推进更多依托于教师的职业操守与奉献精神，而非健全的制度保障与科学的激励评价机制。其结果不仅加剧了师资队伍的不稳定性，也从根源上制约了

小学生心里辅导课程目标的全面实现与教育质量的整体提升。

（五）U-S 合作课程设计缺乏差异性的统筹衔接

小学生心理辅导课程承担着系统引导儿童青少年认识自我、调节情绪、发展社会性能力的重要使命，其科学性与适切性直接关系到学生心理素养的全面形成[10]。大-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有效衔接，并非仅指课程内容在形式上的前后延续，更强调应依据不同学段学生心理发展的阶段特征与实际需求，进行有侧重、有层次的系统设计。这种衔接应遵循发展适宜性原则，既要体现不同学段间的阶段性差异，又要保持教育目标的连续性与递进性，从而使课程内容、教学目标与方法能够契合学生不断发展的认知水平、情感体验及社会性成长需求，切实发挥心理健康教育的累积效应与整体育人价值。然而，当前我国小学心理辅导课程在大学与小学实际合作中存在较为突出的结构性困境，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重复、错位与脱节。小学阶段的教学内容又往往浮于表面、脱离学生真实生活场域，难以有效回应其在成长过程中的深层心理需求。难以回应儿童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深层心理需求。因此，如何实现大学与小学课程内容的“同向同行”，构建纵向贯通、横向协调的一体化课程体系，已成为当前小学生心理辅导课程衔接实践中的关键难点，也深刻影响着该课程体系整体育人功能的实现效果。

三、《小学生心理学辅导》课程 U-S 合作模式建设原则

小学心理辅导课程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途径，其有效实施需在理念层面坚持正确的教育原则，在操作层面遵循科学的实施准则。在原则上，本文非常赞同俞国良学者提出的“四个突出”，其具体内容如下：一是坚持针对性与实效性相统一，突出教育响应的“时效性”；二是坚持教育与服务、教育与发展、预防与危机干预相结合，突出心理支持的“服务性”；三是坚持面向全体学生与关注个别差异、有教无类与因材施教相结合，突出“健康观”。四是以学生发展需求为中心提供适宜的教育内容与方式，突出学生成长的“自主观”[11] 。在实施层面，需遵循差异性、整体性与系统性三大原则[10]。一是差异性。小学心理辅导课程应关注小学不同阶段学生心理发展的差异性特点和规律，组织开展适合小学年龄及认知发展需求的丰富的心理活动，进而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差异化原则要求把握同一年龄段学生群体心理发展特点的同时，关注个体间的心理差异并根据低、中、高学段制定具体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实践过程。二是整体性。U-S 合作模式要求运用整体性原则建构小学生心理辅导一体化课程，形成多渠道全方位育人过程，构建由学校为主阵地，教师、家长、社会等联合协作心理健康教育环境和平台。三是系统性原则。U-S 合作模式要求小学心理辅导课程在制度管理、目标衔接、课程内容、教材选择、活动设计等方面与小学呈现系统性关系，每一要素在整个系统中均占有一定地位，并且在设计过程中不断调整并完善其不合理之处，使其满足发展需求。

四、《小学生心理学辅导》课程 U-S 合作模式建设优化措施

（一）做好顶层设计，健全和完善统一管理体制

小学的心理学辅导课程与其说是单一的“课程”，不如说是一个系统化、多层级的支持体系。这个体系的顺畅运行，得益于其清晰的顶层设计和统一的管理体制。首先，在制度层面，需通过政策保障将心理健康教育提升至与核心课程同等重要的地位，并与社区、家庭协同制定《小学心理辅导》专项计划，形成多方联动的制度支持。其次，在组织层面，应成立由大学课程与教学论专家、心理学研究者、小学德育负责人、专职心理教师及骨干班主任共同构成的学校心理辅导团队。大学专家团队负责将抽象的教育学、心理学理论转化为小学教师可理解、可操作的教学指南，助力教师准确把握心理辅导的核心目标与实践路径；小学教师则将在课程实施中遇到的问题与有效经验及时反馈给大学研究者，形成双向互哺的协同机制。这一过程不仅是信息的传递，更是教育实践与理论创新之间的知识共构。最后，制定档案管理制度，完善学生心理健康信息库建立。心理健康档案作为一体化建设的基本内容，能够客观有效掌握学生成长和发展的心理轨迹，并且有助于学生在各学段转折过程中教育者的有序衔接，一旦学生出现心理危机也便于心理教师科学、快捷、高效进行干预。由于心理档案的保密性原则，各学段档案转交可以参照法律条款及咨询伦理，制定一套适合个人心理信息档案转接的制度与手续，规范此项工作的开展,这也是小学生心理辅导课程 U-S 一体化运行的必要环节。此外，还可引入“课程建设档案袋”机制，系统收录从方案设计、教学案例、课堂观察记录、学生作品到教师反思日志等全过程资料，为课程优化与效果评估提供完整依据。

（二）深化合作内容，创新课程模式

U-S 合作应超越简单的理论指导或资源供给，走向深度融合的课程共建。在小学心理健康课程改革中，大学和小学应共同参与课程目标设定、内容选择、活动设计和评价实施的全过程，形成课程发展共同体。

这种深度合作不仅能提升课程质量，也能促进双方的专业成长。创新课程模式和教学方法是 U-S 合作的重要突破口。小学生心理辅导课程应突破传统的讲授式教学，采用体验式、活动式、探究式的教学模式，如沙盘游戏、角色扮演、团体辅导等。大学研究者可以引入前沿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小学教师则可以贡献实践智慧和创新灵感，双方共同探索适合小学特点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U-S 合作还应着力推动校本课程的开发，立足学校实际与学生真实需求，构建具有校本特色的心理健康课程体系。校本课程的开发不仅能增强课程内容的针对性与教学实效，也有助于形成学校育人特色并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在此过程中，大学研究者可提供理论支撑与方法指引，协助教师将实践智慧转化为系统化、可推广的课程资源，从而实现理论实践化与实践理论化的双向赋能。

（三）构建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共同体

构建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共同体，是强化学生心理健康支持体系的师资保障，也是推动 U-S 小学心理辅导课程心建设的关键举措[12]。构建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共同体的本质是在大-小学之间基于共同愿景建立的平等互信、互相尊重、互利互动的能够有利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教师队伍。落实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队伍共同体，其具体路径如下：一是实现资源共享。大小学校之间应加强合作与交流，共同开发和利用心理健康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二是实现教师发展一体化。学校及地方政府应搭建常态化培训、交流与研究平台，支持教师跨学段互动与专业成长。各学段教师应主动开展协作，共同探索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在规律与实践路径，提升教育的系统性与连续性，形成合力从而构建心理健康教师共同体，落实教师队伍一体化。

（四）加强课程体系建设，创新一体化课程设置

在 U-S 协同育人理念指导下，小学生心理辅导课程建设以心理学理论为基础，系统构建符合学生心理社会性发展规律的一体化课程体系。课程内容设计应依据低、中、高三个年级段的发展特点进行差异化设计：低年级重点在于适应环境与建立基本规范，通过培养安全感、情绪初步调控、学习兴趣激发及友好交往行为，帮助学生适应学校生活，树立规则意识和集体归属感。中年级侧重自我认知与学习动力发展，引导学生了解自我、培养学习能力、合群交往与情绪合理表达，增强社会角色意识，为健康人格发展奠定基础。高年级关注自我悦纳与社会性成长，强化学习态度、异性交往、情绪调适与亲社会行为培养，提升问题解决能力，为顺利过渡至中学阶段做好心理准备。因而，U-S 合作框架下的心理健康课程建设，应充分发挥大学的理论引领与学校的实践主体作用，通过协同设计、共同实施与动态评估，实现课程内容的层级递进与育人功能的有机衔接，最终服务于学生心理素养的全面、持续发展。

（五）优化活动方案，促进分层分类有效衔接

在 U-S 协同理念指导下，大小心理辅导教育活动的有效衔接是构建一体化育人体系的重要环节。小学生心理辅导课程活动主要包括集体、小组与个别三种基本组织形式：集体活动侧重专题教育与学科融合，小组活动以心理训练与行为矫正为核心，个别活动则涵盖网络辅导、个体咨询与自主研修等多种途径。三者有机结合，共同构建多层次、立体化的小学生心理辅导体系。高校教师团队在心理健康活动组织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可通过 U-S 合作机制充分发挥高校的辐射引领作用，对小学的集体活动与小组活动进行专业指导与资源支持。如组织高校专业教师参与中小学幼儿园活动开展，小学教育师范生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实践锻炼，开展各种心理主题的团体活动等。

结语：

本研究围绕小学生心理辅导课程的现实困境，论证了构建大学—小学合作模式乃是一项系统性、根源性的破解之道。U-S 合作的核心旨趣在于打通理论与实践的壁垒，实现双向互动，从而有效应对课程内容碎片化、实施路径单一化以及师资专业支持弱化等积弊。展望未来，推进 U-S 合作需致力于三大层面的协同共建：在制度层面，加强顶层设计，完善长效管理机制，以明晰的权责与过程督导保障合作深度；在课程与教学层面，深化合作内容，共同构建基于学生心理发展序列的、分层分类的一体化课程与活动体系；在资源与文化层面，则需着力培育跨校际的教师研修共同体，搭建资源共享平台，并积极寻求持续稳定的外部政策支持。唯有通过这种多维度、系统化的协同推进，方能切实提升小学心理辅导课程的育人品质，为促进学生心理健康全面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参考文献：

[1] 郭佳丽. 积极德育视域下大中小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一体化探析 [J]. 教育科学研究, 2024, (12): 80-86.

[2] 教育部等十七部门. 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 年）[Z]. 2023-05-11.

[3] 张晓莉. 美国U-S合作长效机制探索——以马里兰州 PDS 模式为例 [J]. 外国教育研究, 2019, 46 (12): 98-112.

[4] 汤博闻,郝少毅,朱志勇. 跨越“边界”:U-S 合作中的教师互动模式 [J]. 教育学术月刊, 2022, (02): 9-18.

[5] 吕晓娟,王海霞,李越. 大学与中小学伙伴合作的百年历程与时代审视 [J]. 当代教育与文化, 2022, 14 (01): 87-93.

[6] Broekstra, G. (2014). Building high-performance, high-trust organizations: Decentralization 2.0. Springer.

[8] 屈丹. 大数据时代心理健康档案在学生心理危机预警中的应用 [J]. 山西档案, 2025, (03): 155-157+164.

[9] 周静,苏醒. 产教融合共同体赋能“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实践路径研究 [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25, 43 (11): 101-107.

[10] 刘春雷. 大中小幼心理健康教育一体化建设的困境与实现路径 [J].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 50 (03): 48-54.

[11] 王爱芬.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实施中的问题及对策 [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5, 45 (29): 49-53.

[12] 俞国良. 大中小学加强青少年心理健康管理的实践方略 [J]. 中国德育, 2021, (21): 26-30.

高校美育中非遗技艺传承的文化资本转化路径研究

方梦麟[1] 徐炜琳[1] 黄燕兴[1]

（1.广东梅州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梅州 514000）

摘 要：本论文聚焦以竹编为代表的非遗技艺活态传承与创新实践，以梅州地区为例，从文化资本转化视角深入剖析非遗技艺融入高校美育的探索路径。根据高校美育中非遗资源供给不足、文化价值转化不充分的现实问题，提出“非遗 +美育”三维赋能与“三链融合”策略路径。包括文化赓续赋能美育内涵深化、设计转化赋能美育实践创新、产业振兴赋能美育价值延伸。教育链衔接美育课程体系、创新链激活美育实践载体、产业链拓展美育价值边界，为非遗技艺在文化传承、美育育人、产业发展等多维度创新提供可行性分析。研究运用混合研究方法，结合定量分析与质性深描，一方面揭示文化认同对高校师生非遗美育参与意愿的显著影响，另一方面阐释产业生态重构对非遗技艺美育价值与经济价值协同提升的推动作用。研究不仅为以竹编为代表的非遗技艺融入高校美育提供可复制的活态传承方案，更通过政策赋能、教育引导、产业升级的多措并举，为高校美育内涵式发展、乡村振兴与文化产业协同推进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借鉴。

关键词：非遗竹编；高等教育美育；乡村振兴；客家文化

基金项目：广东省普通高校青年创新人才项目（2024WQNCX264）；梅州市教育教学研究课题（MZ12YBKT381);2025 年梅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MZSKLX2025098)；2022 年福建省中青年课题（JAS22366)

DOI：doi.org/10.70693/jyxb.v1i4.117

Study on the Transformation Path of Cultural Capital in the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rafts in Aesthetic Educa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englin Fang[1]，Weilin Xu[1]，Yanxing Huang[1]

[1]Guangdong Meizhou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living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ve practice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CH) crafts represented by bamboo weaving, taking the Meizhou area as a case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apital transformation, it conduct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exploration path for integrating ICH crafts into aesthetic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ddressing the practical issues of insufficient supply of ICH resources and inadequate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al value in college aesthetic education, the paper proposes a "three-dimensional empowerment" and "three-chain integration" strategic path for the "ICH + Aesthetic Education" model. The three-dimensional empowerment includes cultural continuity empowering the deepening of aesthetic education connotations, design transformation empowering the innovation of aesthetic education practices, and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empowering the extension of aesthetic education value. The three-chain integration involves connecting the education chain with the

作者简介：方梦麟(1990—),女,赫哲族,黑龙江人,专业主任,讲师,博士,职业教育；
徐炜琳(1991—)，女，汉族，硕士，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黄燕兴(1988—)，男，汉族，硕士，电子商务

通讯作者：方梦麟

aesthetic education curriculum system, activating the innovation chain to enhance aesthetic education practice carriers, and expanding the industrial chain to broaden the value boundary of aesthetic education. This provides a feasibility analysis for the multi-dimensional innovation of ICH crafts in cultural inheritance,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 study adopts a mixed research method, combining quantitative analysis with qualitative in-depth description. On the one hand, it reveals the significant impact of cultural identity on the willingness of college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ICH-related aesthetic education. On the other hand, it elaborates on the driving role of industrial ecosystem reconstruction in the coordinated improvement of the aesthetic and economic values of ICH crafts. The research not only provides a replicable living inheritance plan for integrating ICH crafts represented by bamboo weaving into college aesthetic education but also offers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college aesthetic education, as well as the coordinated advance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cultural industries, through the joint implementation of policy empowerment, educational guidance,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Keywords: ICH Bamboo Weaving; Aesthetic Edu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Hakka Culture

一、引言

以竹编为代表的非遗技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载体，兼具文化传承价值与高校美育资源属性。但在现代化进程中，这类技艺既面临机械化冲击、传承人老龄化困境，还存在与高校美育衔接不足的问题 ——当前高校美育课程非遗内容占比不足 15%，且多为理论讲授，缺乏实践融合（教育部 2024 美育发展报告）。

数据显示，2024 年该类非遗产业规模同比下滑 15%，60 岁以上传承人占比 67.4%，而高校系统学习相关技艺的学生不足 8%。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以美育培根铸魂”，为非遗融入高校美育指明方向。梅州作为该类非遗重要发源地，探索“非遗 + 美育”路径，本研究从文化资本转化视角分析其实践，为高校美育与非遗保护协同提供参考。

二、以竹编为代表的非遗技艺当代困境与转型契机

（一）核心困境：传承断层、市场挤压与美育融合不足

以竹编为代表的非遗技艺面临多重危机：市场上，手工产品价格为机器制品 5 倍以上，作坊利润仅 8%-12%；技艺传承上，梅州 37 项传统编织技法中 19 项仅 1 人掌握，35 岁以下从业者不足 5%，核心技艺濒临失传（《中国非遗年鉴 2023》）。

更关键的是，非遗与高校美育融合存在短板：高校课程对非遗挖掘浅，未结合技艺实践与美学内涵；传承人缺乏教学转化能力，美育功能难释放。且仅 12% 青少年能描述其文化与美学特征，“精神基因”“美学基因”需借高校美育激活。如梅州茶阳镇竹畚箩工艺，因塑料制品冲击与年轻一代兴趣缺失，其材美工巧的美学理念面临遗忘。

梅州茶阳镇起源于明朝的竹畚箩工艺便是典型例证：其需 20 余道工序，从选竹、破篾到编织成型，每一步都蕴含着“材美工巧”的传统美学思想，但随着塑料制品普及，竹畚箩市场需求锐减，年轻一代既不愿学习这耗时费力的技艺，也未能通过教育渠道感知其美学价值，“家庭作坊式”生产模式难以为继，其承载的传统美学理念也面临被遗忘的风险。

（二）转型契机：政策赋能、消费升级与美育需求提升

党的二十大报告为非遗保护与美育融合注入新动能，2023 年《非遗法》修订落地后，明确提出“推动非遗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发挥非遗在美育中的重要作用”。**2023 年《非遗法》修订提出“推动非遗融入国民教育体系”，梅州借此建设非遗工坊与高校美育实践基地，推动技艺与课程对接。**同时，“国潮”带动该类非遗文创销量 2024 年增 40%，消费者更关注文化与美学价值；83% 高校希望引入非遗丰富美育课程，竹编类技艺因可操作性、美学性成为优质载体。

梅州客家竹灯便是例证：融合传统竹编、现代设计与客家文化，既入高校美育课程，又使产品附加值提升 30%，印证非遗融入美育的可行性。

三、基于混合研究的文化经济分析

本研究以“文化基因-产业生态”双螺旋理论为分析框架（Bourdieu, 1986），通过混合研究方法解构非遗竹编的多维价值。在方法论层面，综合定量分析与质性深描，形成“数据验证-文化阐释-经济测算”的三元研究路径，突破传统单一研究范式的局限性。

（一）混合研究的设计逻辑与实施

研究采用 Creswell（2014）的解释性序列混合设计，分层抽样涵盖消费者（45%）、从业者（30%）、相关行业人员（25%）三类群体，共 287 人。定量模块里，用 SPSS 26.0 做信效度检验，问卷结构效度良好（Cronbach's α=0.832，KMO=0.781），Bartlett 球形检验显著（$p<0.001$），确保测量工具科学。构建 SEM 结构方程模型发现，文化认同度对消费意愿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67（$p<0.01$），为质性研究提供数据支撑。

检验指标	数值	标准阈值
Cronbach's α	0.832	>0.7
KMO值	0.781	>0.6
Bartlett检验	显著（p<0.001）	-

表 1 问卷信度检验结果

田野调查运用 Geertz（1973）深描理论对梅州 6 个代表性工坊进行参与式观察。通过视频解码技术总结出 8 大环节 32 道核心工序，其中青篾分层与万字纹编织耗时占比达总工时的 43%

工艺阶段	工序数量	具体工序	详细说明
选材与预处理	4 道	选竹	优选 3 年生毛竹，直径 8 - 10cm，节长均匀，无虫蛀裂纹（《丰顺县志》记载破竹择吉传统）
		裁切	按礼篮尺寸截取竹段，保留竹节完整以增强结构强度
		浸泡	竹材浸水 7 日软化纤维，降低破篾损耗率（传统损耗率 12.7%，现代优化后降至 8%）
		分层	用篾刀将竹筒剖为 4 层，外层青篾用于编织纹样，内层黄篾作结构支撑
破篾与精加工	5 道	粗破	将竹筒劈为宽 2cm 的竹条，需保持厚度均匀
		细剖	二次分篾至 0.3cm 宽，青篾需细如发丝
		刮青	去除表层蜡质，使篾条柔韧易染色
		熏蒸	用硫磺熏制防虫蛀，延长保存年限
		染色	采用苏木、栀子等植物染料，赋予篾条“万字纹”所需的赭红色
经线布置与固定	4 道	十字骨架	取 8 根加细铁丝的篾条，按“十”字交叉固定
		辐射扩展	将经线均匀调整为 32 根，间距误差≤0.5cm
		角度调整	经线向上弯曲 15° - 20°，形成篮身弧面基础
		临时固定	用竹签穿插固定节点，防止编织时移位
纬线编织与纹样呈现	8 道	底纹编织	采用挑二压三技法，形成致密篮底
		万字纹镶嵌	每编织 5cm 高度嵌入一组万字不断头纹样，象征福运连绵
		龟甲纹强化	在篮身中部增加六边形龟甲纹，提升结构稳定性
		收边处理	用双股篾条包覆篮口，边缘误差≤1mm
配件安装与加固	3 道	提手编织	用 6 股青篾编麻花辫式提手，承重测试需≥10kg
		内衬安装	贴合竹编内壁加装苎麻布衬里，防漏且提升触感
		金属扣件	在提手与篮身连接处加装铜质铆钉，兼具功能与装饰
质量检验与修正	4 道	尺寸校验	比对设计图纸，直径误差≤2mm，高度误差≤3mm
		承重测试	装载 5kg 重物悬挂 24 小时，变形率≤1%
		纹样审查	万字纹连续无断点，龟甲纹节点无松动
		表面处理	用蜂蜡抛光，确保无毛刺
文化符号附加	2 道	吉祥铭文	用烙铁在篮底烫印“福禄寿喜”篆体字
		仪式封装	按客家传统包裹红绸布，并附手写工艺证书
包装与运输	2 道	防潮处理	内置竹炭包，外覆防水油纸
		模块化装箱	利用瓦楞纸隔板固定，适配电商物流标准

图 1 春盛礼篮制作工序分解

通过传承人工作日志分析发现，日均 9.2 小时的高强度劳作与 12.7%的材料损耗率，揭示出手工艺生产的效率瓶颈。这种“数据-情境”互证模式，既量化了技艺传承的劳动密度，又保留了文化实践的本真性。

指标	传统模式	创新模式
日均产量	2.3件	8.7件
材料利用率	61.2%	89.4%
青年从业者占比	12.7%	43.6%

表 2 生产模式对比分析

（二）文化基因的符号学解码与再生产

从符号学视角剖析，竹编纹样构成客家社群的“文化超文本”（Saussure, 1916）。研究表明：“万字不断头”纹样用于婚庆礼篮，其 19 道工序对应《周易》“泰卦”意象，蕴含宗族延续观念；《丰顺县志》考据出“破竹择吉”含 12 项禁忌规范，体现“野性思维”遗存。

文化基因现代转化有两条路径：一是数字化建档，保存 37 项濒危纹样，建 1200 组图式数据库；二是用 Peirce 符号三分法创新转译，如将龟甲纹变为竹编灯具设计元素，让产品溢价率升至 215%，这实质是传统智慧与当代价值的动态协商。

（三）产业生态的重构与经济价值测算

基于SCP 范式分析，竹编产业呈现“高文化附加值、低生产效率”的悖论。投入产出数据显示，传统模式中人工成本占比 57%，导致净利率仅 5%，而标准化部件生产模式通过工序重组，使日均产量提升 278%（2.3→8.7 件），青年从业者占比从 12.7%增至 43.6%。运用 DEA 数据包络分析发现，创新模式的技术效率值从 0.52 提升至 0.89，证实产业升级的可能性。

文化资本的经济转化呈现非线性特征（Throsby, 2001）。案例研究表明，当产品文化内涵指数（CCI）超过 0.7 时，价格需求弹性降至-0.33，显示文化赋能的边际效益递增现象。梅州“竹韵客乡”系列可通过 IP 化运营，使单件产品文化附加值达 78 元/小时，较传统竹篮提高 4.6 倍。这种价值跃迁印证了 Hutter（2011）提出的“文化经济乘数效应”，为非遗产业化提供理论注脚。

四、方法论创新与理论贡献

本研究构建的混合研究框架，在方法论层面实现三重突破：首先，将视频编码技术引入工艺记录，建立“行为-时间-文化意义”的关联矩阵；其次，开发文化附加值计量模型（CAM），量化非遗的经济转化效能；最后，运用社会网络分析（SNA）揭示传承人互动模式，发现“核心传承人-青年学徒”的强连接关系对技艺传播效率提升达 37%。这些创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和理论视角。

五、“非遗 +美育” 三维赋能路径与 “三链融合” 策略的梅州实践

（一）文化赓续：构建乡土美育新范式与教育链创新

以非遗技艺融入高校美育课程为核心切入点，将以竹编为代表的非遗技艺系统纳入地方高等教育美育体系：在高校层面开发《非遗技艺与美育创新》特色课程，分为理论认知-技艺实践-美学创作三个模块。理论模块解读以竹编为代表的非遗技艺中的美学原理，如编织纹样的对称美、材质肌理的自然美。技艺实践模块邀请非遗传承人进课堂，指导学生完成制作过程的完整工序。美学创作模块则引导学生结合现代设计理念，将非遗技艺与装置艺术、文创设计等结合，形成感知-体验-创新的美育闭环。

同时，向下延伸构建高校-中小学-社区的美育协同网络，高校师生团队为幼儿园开发《非遗 STEAM 美育课程包》，在小学兴趣课堂中结合竹编技法与数学几何知识，如六边形编织对应蜂巢原理。在中学艺术课程中融入非遗技艺的文化美学解读；面向社区开展“非遗美育进万家”活动，由高校牵头组织亲子非遗工作坊，让高校学生担任美育志愿者，既强化非遗技艺的传播，也提升高校学生的美育实践能力。该模式借鉴上海嘉定区非遗 + 红色美育的经验，将梅州客家文化与以竹编为代表的非遗技艺结合，进一步拓展非遗技艺在文化传承与美育育人中的双重价值，为非遗传承培育具备美学素养的后备力量。

（二）设计转化：传统技艺的现代性表达与创新链重构

搭建非遗技艺美学资源共享平台，整合以竹编为代表的非遗技艺纹样数据库、技法教学视频、美育课程案例等资源，吸引文创企业、高校师生入驻。设立“美育设计大赛”，以非遗技艺的现代美学表达为主题，评

选优秀设计方案并对接生产企业，成功打通“高校美育创作-设计转化-市场落地”的全流程闭环，助力以竹编为代表的非遗技艺从单纯的技艺传承向美育驱动的创意产业转型升级。在创新链重构上，严格遵循“文化元素提取→数字化建模→用户偏好测试→量产优化”的设计转化流程，为非遗产品的美育价值与市场价值协同提升提供技术支撑。在创新链重构上，可以遵循文化元素提取→数字化建模→用户偏好测试→量产优化的设计转化流程，为竹编产品创新提供强大技术支撑。

（三）产业振兴：村集体工坊与电商融合及产业链数字生态构建

借助梅州地区优势打造村集体工坊 + 直播电商全新模式：农户专注于竹编产品生产环节，MCN 机构充分发挥专业优势，为农户提供直播技能培训，村集体则肩负起统筹品控与物流的关键职责。巧妙借鉴高坪竹编“互联网 +”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升级，可以在梅州建立竹材标准化分级体系，将原料损耗率从原本的 25% 大幅降至 12%，在产业链数字生态构建方面，形成云端工坊模式，提高产业运营效率。

六、多维价值：非遗保护与乡村振兴的协同机制

（一）文化认同驱动产业增值

以竹编为代表的非遗技艺融入高校美育，在梅州地区催生出文化认同-美育实践-产业增值”的良性循环：高校通过客家小导游等美育项目，培训学生深入了解非遗技艺的历史文化与美学价值，担任竹编文化传播使者，向游客讲解技艺背后的美学理念与地域文化；同时，将高校非遗美育实践基地与村集体工坊纳入乡村旅游线路，打造非遗美育体验游，游客可参与高校师生主导的竹编美学创作体验，带动周边餐饮、住宿等相关消费增长。

（二）生态友好赋能可持续发展

以竹编为代表的非遗产业与绿色经济、美育理念深度契合：梅州在高校美育课程中融入生态美学理念，指导学生利用竹编边角料创作工艺画、竹炭包等衍生品，既实现资源循环利用，又传递低碳美学价值观；同时，推广“以竹代塑”理念，在高校设计课程中开发竹编包装盒、餐具等环保产品，迎合当下消费者对“生态美”的需求。这一实践与党的二十大倡导的“绿色发展”战略、“以美育培根铸魂”要求高度契合，为乡村产业绿色升级与高校美育内涵拓展提供了示范范例，凸显非遗技艺在生态可持续发展中的美育价值与经济价值。

七、结论与建议

以竹编为代表的非遗技艺融入高校美育，构建“文化赓续 - 设计转化 - 产业振兴”的协同生态，是实现非遗技艺活态传承与高校美育内涵式发展的必由之路。从文化资本转化视角来看，这一实践可以将非遗技艺的文化资本转化为教育资本与经济资本，即将美学价值、技艺知识转化为美育课程资源、人才培养成果以及文创产品收益、乡村旅游收入，为非遗保护与乡村振兴协同推进提供可行路径。

未来，以竹编为代表的非遗技艺融入高校美育需在三方面实现突破：其一，构建跨区域非遗美育资源数字化共享平台，整合不同地区非遗技艺的美学素材、课程案例与生产标准，打破地域限制，推动高校美育资源共建共享；其二，创新非遗美育传承保障制度，例如联合高校与非遗传承人推出非遗美育传承制度，为参与高校美育教学的传承提供保障，缓解传承人老龄化风险；其三，深化生态美育实践，将“以竹代塑”等绿色理念与高校环境设计、产品设计等课程深度结合，对接国家“双碳”战略，推动非遗技艺从“文化美育符号”升维为“生态美育与经济发展融合的新范式”。

以竹编为代表的非遗技艺振兴，既是文化自信的重要体现，也是高校美育创新与乡村振兴战略协同推进的关键命题。其核心在于以美育为纽带，激活非遗技艺的内在美学价值与文化活力，使其在当代社会实现“从技艺传承到美育育人，从文化保护到产业赋能”的双重跨越，最终实现非遗技艺的可持续发展与高校美育的高质量提升。

参考文献：

[1] 梅州市人民政府. 传统工艺，客家竹编[EB/OL]. 梅州：梅州市人民政府，2021. https://www.meizhou.gov.cn/zjmz/lymz/ctgy/content/post_1951424.html.

[2] 梅州文化馆. 传统编织技法流失统计报告（内部资料）[R]. 梅州: 梅州文化馆, 2021.

[3] 梅州大埔县加强非遗保护和传承，竹编手艺迎发展新机 2021. https://so.html5.qq.com/page/real/search_news?docid=70000021_85163bbcd8686852&faker=1.

[4]中国非遗年鉴编辑委员会. 中国非遗年鉴2023[M]. 北京: 文化出版社, 2023.

[5]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EB/OL]. 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2022.

[6] Bourdieu P. The Forms of Capital[M]//Richardson J G, 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86.

[7] Geertz C.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8] Saussure F d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M]. Paris: Payot, 1916.

[9] 梅州市农业农村局. 梅州竹编产业升级项目报告（内部资料）[R]. 梅州: 梅州市人民政府, 2021.

[10] Throsby D. Economics and Cultur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高校开放式马匹违禁物质检测实验室的管理探索

石继龙[1] 曹鹏[1] 龙围[1] 谭荣[1]

(1.武汉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56)

摘 要：该论文围绕高校开放式马匹违禁物质检测实验室的管理展开深入探讨。分析高校建设开放式马匹违禁物质检测实验室的意义与必要性，阐述其在管理过程中面临的人员管理、设备管理、检测流程管理及安全管理等方面的挑战，针对性提出优化策略，包括建立完善的人员培训与考核机制、科学的设备管理体系、标准化检测流程及全方位安全保障体系等，旨在提升高校开放式马匹违禁物质检测实验室的管理水平，保障检测工作的准确性、高效性与安全性，推动马匹检测领域的发展。

关键词：开放式实验室；马匹违禁物质检测；实验室管理；探索

基金项目：武汉商学院教学改革项目（2023NO20）: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高校开放式实验室管理机制的研究和实践

DOI：doi.org/10.70693/jyxb.v1i4.118

Exploration of the Management of Open-Access Equine Prohibited Substances Testing Laboratories in Universities

Ji-Long Shi[1] , Peng Cao[1], Wei Long[1], Rong Tan[1]

1.Wuhan Bussiness University, Wuhan,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explores in depth the management of open horse prohibited substance testing laboratories in universities. Analyze the significance and necessity of building open horse prohibited substance testing laboratories in universities, elaborate on the challenges they face in personnel management, equipment management, testing process management, and safety management, and propose targete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including establishing a sound personnel training and assessment mechanism, a scientific equipment management system, standardized testing processes, and a comprehensive safety guarantee system, aiming to improve the management level of open horse prohibited substance testing laboratories in universities, ensure the accuracy, efficiency, and safety of testing work,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orse testing field.

Keywords: open laboratory; equine prohibited substance detection ; laboratory management; Exploration

作者简介：石继龙(1990—)，男，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违禁物质实验室开放管理；
曹鹏（1987—)，男，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体育场馆管理；
龙围（2005—)，男，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为违禁物质实验室开放管理。
谭荣（2005—)，女，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为违禁物质实验室开放管理。

通讯作者：石继龙

一、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高速发展，马术运动已然成为世界盛行的体育运动。然而在利益驱使下，世界范围内马术运动中兴奋剂事件屡禁不止，严重破坏了赛事的公平性、纯洁性和严肃性，更是对参赛马匹造成难以弥补的创伤。近些年，兴奋剂使用问题已经成为国际马术运动良性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因此，开展兴奋剂的检测对于马术运动的长期发展以及体育强国的实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科教融合”的号召下，高校积极响应并倡导学生在科研-教学-学习的过程中进行知识的传承与创新，马匹违禁物质检测作为一项新兴产业，在高校中逐渐发展起来。而开放性的马匹违禁物质检测实验室是大势所趋。其可以作为学科发展、交叉、融合的物质基础和平台[1]。随着高校办学规模扩大，实验室内的大型设备不断增多，教学和科研风险不断升高，导致实验室的管理占据了教师的大量时间，影响了马匹违禁物质的检测的开展。本文通过探索开放式马匹违禁物质检测实验室，旨在维护马术赛事公平，培养新兴行业人才，促进马术行业健康发展。

马术运动在我国逐渐兴起，马匹违禁物质检测的重要性日益明显。近年来，国内马术赛事数量逐年递增，如全国马术锦标赛，国际马术大师赛等大型赛事的举办频次和规模不断扩大，这使的违禁物质检测的需求急剧增长[2]。高校作为科研与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建立开放式马匹违禁物质检测实验室，不仅能够为马术赛事的公平公正提供技术支持，同时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推动相关专业人才的培养，推动马匹违禁物质检测技术的研究与创新。但是，开放式实验室在管理上与传统实验室存在明显差异，同时面临着诸多新的问题与挑战。如何实现准时、科学、高效的管理，确保检测工作的安全与质量，成为高校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二、高校建设开放式马匹违禁物质检测实验室的必要性

（一）促进国内马术行业发展

国内马匹违禁物质检测起步较晚，国内赛马运动，农业部系统下的马业协会与国家体育总局系统下的马术协会都会参与，但马匹的兴奋剂检测规定、手段及监管，都存在一定的问题。由于中国著名马术选手华天的马匹被发现有管控药物，致使其资格赛的优异成绩被取消，中国马术三项队也因此失去了 2024 年巴黎奥运会团体参赛资格。

此外，该类实验室开放可以吸引对马匹违禁物质检测、实验操作等感兴趣的学生，更高效地培养马匹违禁物质检测人才，缩减与国外差距。马匹违禁物质检测体系若不完善，会影响骑手心态与赛事公平，进而间接影响运动成绩，降低马术运动员的参赛意愿。

（二）提高学生的实验操作能力和创新能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完善科技创新体系，优化配置创新资源，加强科技基础能力建设，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3]。在传统的实验教学中，学生接触的实验均是验证性实验，老师讲解实验原理、实验步骤和注意事项，学生按照老师讲解，机械地重复实验。这种方式无法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4]。以武汉商学院为例，虽然该校拥有依托湖北工程中心的马匹违禁物质实验室，也开设马匹违禁物质检测相关课程，但没有专业系统的教材，实操时长也不能使学生完全掌握其基本操作流程，多依赖于授课老师的口述。该实验室开放有利于学生将理论与实践结合，提升学生实验的操作能力与创新能力[5]。

（三）提升高校知名度与学生满意度

以武汉商学院为例，尽管该校是全国开办马术专业最早，功能最全，规模最大的高等院校，并且是全国首个开设“马术运动与管理”专业的院校，拥有全国一流的马匹违禁物质检测实验室，但是武汉商学院知名度还是不高。因此，通过开放实验室的模式可以培养大量的创新型人才服务社会，增加公众对学校的关注和了解，进一步提高学校的知名度[6]。

通过访谈，我们得知学生对于该实验室了解程度低，但对新事物存有好奇心，开放后参与意愿较高，开放该实验室可以吸引学生参与。

（四）提高仪器设备的使用率与教师科研能力

目前，各高校均非常重视实验室的建设，每年有专项经费购置仪器设备。这些仪器设备在满足本科实验教学后，大部分闲置下来，利用率并不高，造成资源的浪费。而通过开放式实验室，在不影响本科实验教学的情况下，学生通过申请进入开放式实验室，开展大创项目、本科和研究生毕业论文以及学生感兴趣的实验，闲置的仪器设备可以被充分

的利用[7]。武汉商学院的马匹违禁物质检测实验室除上课外，其余时间很少有学生在此进行实验操作学习，设备使用率较低，通过开放该实验室可以提升仪器设备的使用率。

高校拥有丰富的科研资源和优秀的科研团队。开放式马匹违禁物质检测实验室为科研人员提供了研究平台，便于开展与马匹违禁物质检测相关的新技术、新方法研究，推动检测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创新，提升我国在马匹检测领域的国际竞争力。

三、高校开放式马匹违禁物质检测实验室管理面临的挑战

（一）人员管理难题

1.人员流动性大：开放式实验室面向校内外不同群体开放，包括高校学生、科研人员以及校外合作单位人员等。由于实验室开放性的特点，这些人员在实验室的工作时间和周期各不相同，导致人员流动性较大，增加了人员管理的难度。

2.专业水平参差不齐：由于人员来源广泛，其专业背景和技术水平存在差异。部分学生或校外人员可能缺乏系统的马匹违禁物质检测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在实验过程中容易出现操作不规范等问题，影响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和实验室的正常运行。

（二）设备管理困境

1.设备维护与更新：马匹违禁物质检测需要使用高精度的专业设备，如质谱仪、色谱仪等。这些设备价格昂贵，维护成本高，且对使用环境和操作要求严格。开放式实验室使用频率高，设备容易出现损耗，若不能及时进行维护和校准，将影响检测结果的可靠性。同时，随着检测技术的不断发展，设备也需要及时更新换代，以满足更高的检测要求，但设备更新所需的资金投入较大，给高校带来一定的经济压力。

2.设备使用规范性：由于使用人员众多且专业水平不一，在设备使用过程中，可能存在不按照操作规程使用设备的情况，这不仅会缩短设备的使用寿命，还可能导致设备故障或损坏，影响检测工作的正常开展。

（三）检测流程管理复杂

1.样本管理：马匹违禁物质检测样本数量大、种类多，包括血液、尿液、毛发等。在开放式实验室环境下，样本的采集、运输、存储和标识等环节容易出现混乱，如样本混淆、存储条件不达标等问题，进而影响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2.检测过程控制：检测流程涉及多个环节，从样本前处理到仪器分析再到结果判定，每个环节都需要严格的质量控制。开放式实验室人员的多样化和操作的分散性，使得对检测过程的监控和管理难度加大，难以确保每个检测环节都符合标准和规范。

（四）安全管理隐患

1.样本试剂安全风险:样本获取过程中易被各种细菌附着，部分样本中细菌感染性强，传播快，不易察觉等特性。高校开放式实验室由于人员流动性大，若样本处理不善，防防护设施不合格，则极易引起样本中某些细菌的传播，造成巨大损失[4]。

2.化学试剂安全风险：检测过程中会使用到多种化学试剂，部分试剂具有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特性。开放式实验室人员流动性大，若对化学试剂的储存、使用和废弃物处理管理不善，容易引发火灾、爆炸、中毒等安全事故。

四、高校开放式马匹违禁物质检测实验室管理优化策略

（一）建立完善的人员培训与考核机制

1.系统培训：针对不同阶段和专业背景的人员，制定个性化的培训方案。对于新进入实验室的人员，开展基础理论培训，包括马匹违禁物质检测的基本原理、实验室安全知识等；对于具备一定专业基础的人员，进行高级技术培训，如新型检测技术的应用和仪器的高级操作等。同时，定期组织培训讲座和经验交流活动，邀请行业专家分享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不断提升人员的专业水平。目前已有相关学者针对不同阶段背景进行针对性培训，可有效提升培训的效果[8]。

2.严格考核：考核是人才选取的关键途径。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制度，对培训效果进行评估很重要。而考核内容包括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两部分，只有通过考核的人员才能获得实验室准入资格[9]。在实验室使用过程中，定期对人员进行操作技能考核和安全知识考核，对于考核不合格的人员，暂停其使用实验室的权限，并进行再次培训和考核，直至合格为止。其主要模块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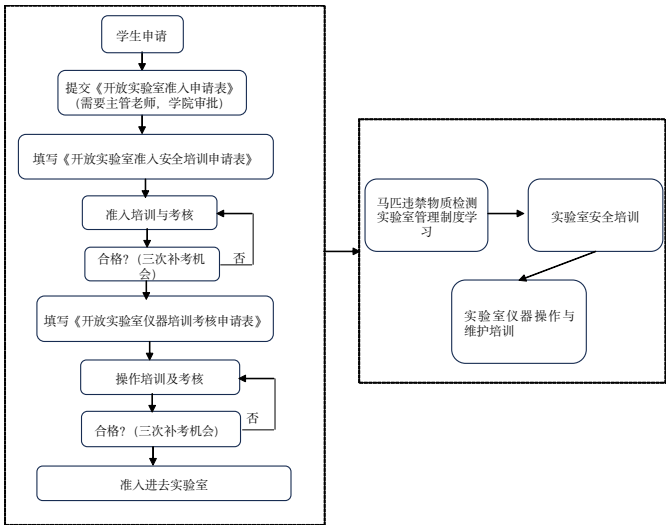

图 1.实验室培训流程图

（二）构建科学的设备管理体系

1.设备维护与更新规划:高校对应管理层需要制定详细的设备维护计划，定期对设备进行清洁、校准和保养，建立设备维护档案，记录设备的维护情况和运行状态。根据检测技术的发展趋势和实验室的实际需求，制定设备更新计划，合理安排资金，逐步更新老旧设备，确保实验室设备始终处于先进水平[3]。

2.规范设备使用流程:高校需制定严格的设备操作规程，并张贴在设备明显位置。对设备使用人员进行专门的操作培训，确保其熟悉设备的性能和操作方法。建立设备使用登记制度，详细记录设备的使用时间、使用人员、使用情况等信息，便于对设备使用情况进行跟踪和管理。同时，设立设备管理员岗位，负责设备的日常管理和监督工作，及时发现和解决设备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三）制定标准化检测流程

1. 样本全流程管理：该流程需要建立完善的样本管理制度，对样本的采集、运输、存储和标识等环节进行严格规范。在样本采集环节，制定统一的采集标准和操作规范，确保样本的代表性和完整性；在样本运输过程中，采用专用的运输工具和包装材料，保证样本的稳定性；在样本存储方面，根据样本的特性和要求，提供合适的存储条件，并建立样本存储台账，便于样本的查询和管理。

2. 检测过程质量控制：质量的保障是不可缺失的。因此，需制定标准化的检测操作流程，明确每个检测环节的操作步骤、技术要求和质量标准。在检测过程中，严格执行质量控制措施，如使用标准物质进行校准、进行平行样检测等，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同时，建立检测数据审核制度，对检测数据进行严格审核，防止数据错误和造假。

（四）构建全方位安全保障体系

1.生物安全管理:高校需要加强实验室生物安全防护设施建设，配备必要的生物安全设备，如生物安全柜、防护服等。制定生物安全操作规程，规范样本处理和检测过程中的生物安全操作。定期对实验室进行生物安全检查和评估，及时发现和消除生物安全隐患。同时，对实验室人员进行生物安全培训，提高其生物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理能力。

2.化学试剂安全管理:高校需要对化学试剂管理制度，对化学试剂的采购、储存、使用和废弃物处理，以及对各方面建立进行严格管理。化学试剂应分类存放，根据其性质和危险性选择合适的储存条件和场所。在使用化学试剂时，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操作，避免试剂泄漏和误用。对于化学试剂废弃物，应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分类收集和处理，确保环境安全。

3．建立规章制度

为了确保实验室的高效运行，保障人员安全，促进科研成果的产出，并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实验室工作人员和使用者都应严格遵守规章制度，以维护良好的实验环境。这要求相关单位从仪器设备管理、人员管理、财务管理、开放管理规定、岗位职责规定、安全管理制度等方面设立合理规范的规章制度，并且在实施过程中，根据评估与反馈不断完善，以适应不同的管理和运行需求[10]，如下图 2 所示。以武汉商学院为例，可实施双人双门制度，对管理人员进行权力的分配，更好地控制人员进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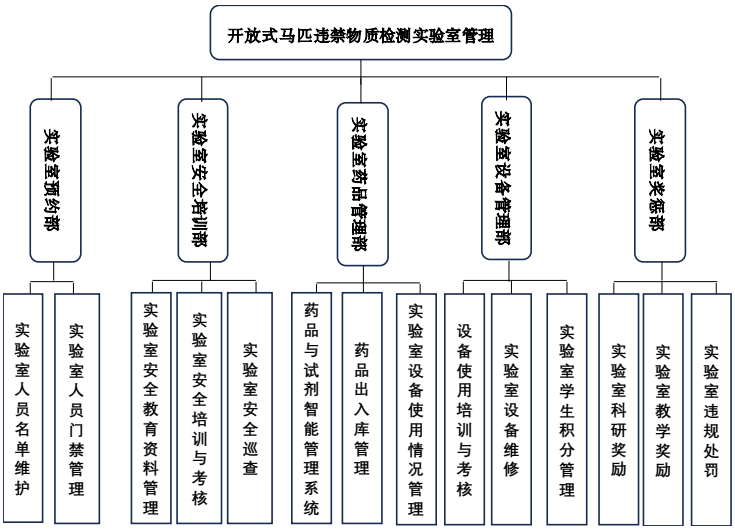

图 2 开放式马匹违禁物质检测实验室管理制度

五、结论

随新时代的到来，高校开放式马匹违禁物质检测实验室在服务马术赛事、人才培养和科研创新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其在管理过程中面临着人员、设备、检测流程和安全等多方面的挑战。本文通过对实验室的各方面分析，能够有效提升实验室的管理水平，保障检测工作的准时性、高效性与安全性，促进高校开放式马匹违禁物质检测实验室的可持续发展，为我国马匹检测领域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同时，高校还需不断探索和创新实验室管理模式，将更有益于适应未来新的需求和挑战。

参考文献：

[1]戴克林.高校实验室建设与创新人才培养研究[J].实验技术与管理,2014,31(07):32-35.
[2]王倩倩.确认体内违禁物质来源对兴奋剂违规非故意认定的意义—从阿德米诉欧洲足联案谈起[J].体育科研,2018,39(03):22-29.
[3]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党史博采,2023,(22):46.
[4]邢雪琨．依托实验室开放项目促进高校创新人才培养[J]．山西青年,2024(03):135-137.
[5]谭斌,陈金华,唐其.开拓高校实验室资源助力本科创新人才培养[J]．教育教学论坛,2023(33):21-24.
[6]刘振亚,杨桂臻,张王斌.高校本科开放式实验室制度建设探索[J]．轻工科技,2024,40(02):181-183.
[7]王会,郭雪松,于小磊,等．地方高校实验室开放运行与管理研究[J]．继续医学教育,2022,36(05):13-16.
[8]王芳．应用型本科院校实验室开放管理的探索与实践[J]．化学工程与装备,2021(04):265-266,207.
[9]胡林楠．高校实验室开放实施方案的研究与探索[J]．当代化工研究,2022(22):145-147.
[10]王泽生,陈子辉．高校实验室开放管理机制的探索[J]．实验室科学,2007(06):119-121.

情绪经济视角下的数字媒体艺术短视频创作：共情叙事与情绪操控机制分析

田霖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四川成都 611433）

摘　要：在短视频平台迅速渗透日常生活的当下，数字媒体艺术创作越来越深地卷入“情绪经济”的运作逻辑之中。流量竞争与算法分发，使情绪不再只是作品的审美维度，而成为吸引注意力、延长停留时长与转化互动数据的核心资源。本文以情绪经济为分析视角，聚焦数字媒体艺术短视频创作中的“共情叙事”与“情绪操控”机制：一方面，创作者通过人物视角的设置、叙事节奏的控制、声音与画面风格的协同，建构高密度的共情场景，将观众引入被预设好的情感轨迹；另一方面，平台算法对“高情绪强度”内容的偏好，又反向塑造了创作策略，促使作品在主题选择、视觉符号与叙事结构上向情绪标签化、极端化与同质化倾斜。

关键词：情绪经济；数字媒体艺术；短视频；共情叙事；情绪操控；算法治理

DOI：doi.org/10.70693/jyxb.v1i4.120

Short Video Creation in Digital Media Ar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motional Economy: Analysis of Empathetic Narrative and Emotional Manipulation Mechanisms

Tian Lin

Chengdu Vocational University of Arts

Abstract: As short video platforms rapidly permeate daily life, digital media art creation is becoming deeply embedded in the operational logic of the "emotional economy." Fueled by traffic competition and algorithmic distribution, emotion is no longer merely an aesthetic dimension of the work but has evolved into a core resource for capturing attention, prolonging viewing duration, and converting interaction data. From the analytical perspective of the emotional econom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mechanisms of "empathetic narrative" and "emotional manipulation" in digital media art short video creation. On one hand, creators construct high-density empathetic scenarios through techniques such as character perspective setting, control of narrative pace, and the synergy of sound and visual styles, thereby guiding audiences into predetermined emotional trajectories. On the other hand, platform algorithms' preference for "high-emotional-intensity" content inversely shapes creative strategies, prompting works to lean towards emotional labeling, polarization, and homogenization in their thematic choices, visual symbols, and narrative structures.

Keywords: Emotional Economy; Digital Media Art; Short Video; Empathetic Narrative; Emotional Manipulation; Algorithmic Governance

一、引言

在短视频平台全面渗透日常生活的媒介环境中，数字媒体艺术的生成、传播与接受方式正在经历深刻转变。算法驱动的内容分发机制、竖屏化与碎片化的影像形式、以互动数据为中心的评价体系，共同构成

作者简介：田霖(1992—)，女，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数字媒体艺术，电影学。

通讯作者：田霖

了当代影像文化的新基础结构。在这一结构中，“情绪”不再只是艺术作品的内在审美维度，而是与注意力、点击率、完播率等指标紧密绑定，被系统性地动员、放大与交易，成为平台竞争与内容生产中的关键资源。可以说，数字媒体艺术短视频的创作，已经难以脱离“情绪经济”（emotional economy）的逻辑加以理解。

与传统意义上以形式创新、观念探索为核心的艺术实践相比，当下大量数字媒体艺术短视频更显著地依赖“情绪钩子”和“情绪记忆点”来完成对观众注意力的抓取。无论是以“治愈”“共情”“震撼”“愤怒”“燃”等为标签的内容，还是通过极短时长内的强烈情绪反转制造“过山车式”体验的作品，都体现出创作策略与平台评价机制之间的高度耦合。情绪在此被编码进叙事结构和视听语言之中，被算法进一步放大与筛选，从而构成一种既可被设计又可被量化的“情绪生产体系”。在这种语境下，数字媒体艺术作品中的“共情叙事”一方面提升了观众参与感和沉浸度，另一方面也面临滑向“情绪操控”的风险[1]。

现有关于短视频与数字媒体艺术的研究，往往集中于技术革新、传播路径、审美风格变迁等层面，或从社会文化视角讨论短视频对日常生活与身份认同的影响。相较之下，以“情绪经济”为核心分析框架，系统考察数字媒体艺术短视频中情绪如何被设计、被放大以及被平台机制整合进流量循环的研究仍然相对不足。尤其是在艺术创作维度，尚缺乏对“共情叙事”如何被生产为一种可复制、可模板化的情绪结构，以及这种结构如何在算法治理之下转化为注意力与资本的批判性讨论。

二、情绪经济的逻辑：从“情感表达”到“情绪资源化”

在传统艺术语境中，情感通常被视为作品的内在审美维度，是艺术家通过形式语言抵达观众内心的重要路径。情感的价值主要体现在难以量化的主观体验上，而非可直接被计算和交易的对象。然而，在以短视频平台为代表的数字媒介环境中，情绪逐渐被嵌入注意力竞争与商业转化的技术—制度框架之中，从“被表达的内容”转变为“被运营的资源”。这一从“情感表达”到“情绪资源化”的转向，是理解当下数字媒体艺术短视频创作逻辑的关键前提。

所谓“情绪经济”，并不仅仅意味着内容更“煽情”或更“感人”，而是指情绪在平台体系中被系统性地生产、放大与利用。短视频平台经由对用户行为的持续监测，将点赞、评论、转发、停留时长、完播率等数据转化为对内容“有效性”的量化指标。在此过程中，能够激发强烈情绪反应的内容更易促成停留和互动，从而获得算法进一步推荐；情绪遂不再只是创作者与观众之间的审美桥梁，而被视为驱动内容在平台上循环、扩散的核心动能。情绪在这一意义上被“资源化”：它被拆解为可以计算、可预测、可优化的运营变量[2]。这种机制对数字媒体艺术创作产生了显著的反向规训效应。一方面，创作者逐渐意识到，仅仅依靠形式实验或观念探索往往难以在信息过载的环境中获得足够的可见性；能够在极短时间内制造“情绪峰值”的内容，则更有可能突破算法门槛。于是，创作策略开始围绕“情绪密度”和“情绪起伏”被重新配置：在开头几秒抛出强烈的情绪钩子，中段通过冲突与反差不断叠加情绪张力，结尾则通过反转或释怀完成“情绪闭环”。情绪成为组织叙事结构与视听语言的首要考量之一。

另一方面，平台对情绪的偏好并非中性的技术后果，而是与资本逻辑紧密相连。情绪越强烈，观众越容易沉浸其中，停留时间越长，平台便能嵌入更多广告、推动消费转化并积累更精细的用户画像。情绪在此被转译为与点击率、转化率和收益直接挂钩的经济资源，纳入一套可持续优化的运营模型。当数字媒体艺术短视频进入这一模型，其情感维度不可避免地被导向“可运营”“可复制”“可标准化”的方向：情绪越可控、越可模板化，越有利于规模化生产和风险管理。在这样的结构之下，“情感表达”与“情绪资源化”之间形成一种紧张的共存关系。一方面，数字媒体艺术仍然依赖情感维度来建构作品的深度与厚度，真实而复杂的情感经验依旧是高质量创作的重要来源；另一方面，当情绪被置入平台运营和资本增值的链条之中，原本应当保持开放性与多义性的情感体验，往往被压缩为易于识别、易于传播的“情绪标签”。诸如“治愈”“破防”“燃”“共情”“爽感”等标签，既为观众提供了快速理解内容的“情绪入口”，也在创作端被反向使用为设计目标，促使情绪朝着更极端、更可营销的方向集中。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情绪资源化”的过程往往被自然化为“迎合用户偏好”。平台以“推荐你可能感兴趣的内容”为话语，将算法选择包装为中立的个性化服务，从而遮蔽了情绪被筛选、排序和放大的结构性过程[1]。观众在此情境下难以察觉自己的情感体验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算法逻辑与平台机制，情绪被动员的方式被伪装为“自发共鸣”。对于数字媒体艺术而言，这既意味着作品的情感力量有机会获得前所未有的传播广度，也意味着其情感维度可能被卷入一套以流量为核心尺度的经济结构之中，逐渐丧失批判锋芒与复杂性。为更清晰地呈现这一转变，表 1 可以将传统艺术语境中的“情感表达”与平台语境中的“情绪资源化”进行对照分析：

表 1 情感表达与情绪资源化的比较

比较维度	情感表达（传统艺术语境）	情绪资源化（短视频与平台语境）
核心定位	作品内在审美维度，侧重个体体验与内心触达	可度量、可运营的注意力资源，与流量与商业转化直接关联
运行逻辑	艺术家自主创作—观众自由解读—意义开放、多元	算法抓取数据—放大高情绪强度内容—反向规训创作策略
评价标准	情感复杂性、深度与真诚度，难以被精确量化	停留时长、完播率、点赞/评论/转发等平台数据成为主要评价依据
创作者角色	通过形式与观念组织情感经验，强调表达与探索	在平台规则下优化“情绪钩子”和“情绪模板”，以适配推荐与分发机制
平台 / 制度角色	相对中性的展示渠道或展演空间	主动筛选、排序并放大高情绪内容，塑造内容可见性与“主流情绪”结构
对观众的主要影响	激发个体反思与多样情感体验，鼓励慢速、深度的审美活动	形成高频情绪刺激循环，易导致情感疲劳、审美浅化与模板化的共情体验

三、共情叙事：数字媒体艺术短视频中的情感动员策略

在情绪经济的结构性约束下，共情叙事成为数字媒体艺术短视频中最为常见且最具效力的情感动员方式之一。与传统叙事中较为缓慢、渐进的情感铺陈不同，短视频语境下的共情叙事往往以高压缩度、高密度和高可识别度为特征，通过精心设计的视听语言与节奏结构，在极短时间内完成情绪唤起与情感认同的建构。观众不再只是“理解一个故事”，而是在被引导进入一个被预设好的情感轨迹，在数十秒至数分钟的时间内迅速完成“代入—共鸣—宣泄”的过程[3]。

从叙事逻辑来看，这类共情叙事普遍遵循一种“浓缩化的情感弧线”。在开端阶段，创作者通常通过强烈的情境设置或冲突呈现，迅速建立情感期待：例如聚焦孤独、挫折、创伤等负面情绪，或通过视觉震撼、突兀场景直接夺取注意力；随后，在发展阶段通过细节、镜头与音效的铺垫，强化情绪张力，引导观众与画面中的主体建立情感连结[4]；最终，在结尾阶段通过情节反转、和解、疗愈、顿悟等方式完成情绪释放，使观众在短时间内获得完整的情感体验闭环。与其说观众在观看一则内容，不如说他们在参与一次被设计好的“情绪事件”。

在视听语言层面，共情叙事依赖一套高度可识别的技巧组合。影像上，近景与特写被频繁使用，以突出面部表情、身体微动作等细节，增强亲近感和代入感；手持镜头与轻微抖动则强化“现场感”和“在场感”，模糊创作者与观众之间的界限，使观看更接近“亲历”。光线与色彩方面，冷色调常用于强调压抑、孤独或失落，暖色调则用于营造和解、陪伴与疗愈的氛围。声音设计同样关键：叙事性配乐、氛围音效和情绪化旁白构成多重声场，往往在关键节点通过节奏与和声的变化“推一把”观众的情绪，使其更容易随叙事节奏起伏。

此外，短视频的时间结构进一步强化了共情叙事的“情绪浓缩”特征。创作者必须在数秒之内完成情境引入与情绪定调，这迫使叙事朝着更高的情绪密度与更明显的情绪标记发展。开头数秒的画面与文案往往被设计为“情绪钩子”，例如以强烈的第一人称陈述（“那天，我一个人……”）、极端情境（“如果这是人生最后一天……”）或冲突画面直接开启，从而在第一时间锁定观众的情感注意。接着，通过快速剪辑与节奏变化，在有限时长内维持情绪张力，避免“滑出”注意力曲线。在这一过程中，数字媒体艺术的形式感并未消失，而是被重新配置为服务情感动员效率的工具。

表 2 数字媒体艺术短视频中常见的共情叙事模板

模板类型	基本情绪路径	典型叙事结构	主要视听策略	潜在风险
创伤—疗愈型	负面情绪 → 共鸣 → 抚慰	创伤揭示—情感陪伴—象征性修复	冷暖色调对比、慢镜头、抒情配乐、内心独白	消费创伤经验、弱化结构性问题
困境—逆转型	压抑/愤懑 → 紧张 → 释然	困境呈现—努力/抗争—结局反转	快节奏剪辑、反差对比、高潮配乐、结尾“爽点”强化	情节悬浮化、简化复杂现实
日常—升华型	平淡 → 细微触动 → 温暖	日常片段—细节聚焦—情感升华	纪实画面、自然光、环境音、低饱和滤镜、轻柔配乐	过度“治愈化”，情感趋于温情模板

模板类型	基本情绪路径	典型叙事结构	主要视听策略	潜在风险
孤独—陪伴型	孤立感 → 共情 → 被理解感	孤独状态—他者介入—情感连结	大量近景特写、画外安慰声音、对视镜头、空间空旷构图	强化依赖幻想性陪伴、弱化现实支持
愤怒—控诉型	不公/愤怒 → 情绪聚合 → 发声	不公情境—情绪共振—象征性控诉或反击	强对比画面、节奏化剪辑、强调性字幕、集体评论引导	情绪宣泄替代实际行动，易被煽动化

从表 2 可以看出，这些共情叙事模板在情绪路径和叙事结构上具有高度相似性：它们均以快速建立情绪同感为起点，以情绪释放或情感升华为终点，并通过高度程式化的视听策略保证“情绪效果”的可重复生产。数字媒体艺术在此既贡献了细腻的形式语言与视觉想象，也不可避免地参与到了“情绪效率”的追求之中。

四、情绪操控机制：算法、形式与符号的协同运作

在情绪经济的整体结构中，共情叙事并不是孤立运作的单一层面，而是嵌置于算法逻辑、视听形式和符号话语共同构成的复杂技术—文化装置之中。若仅从创作者意图层面理解“情绪操控”，容易将问题简化为个体的道德选择，忽略其背后深层的制度性与结构性条件。更为重要的是，情绪操控并不必然以显性、粗暴的方式出现，它往往呈现为一种“温和的引导”，通过默认选项、推荐逻辑、视觉风格与语言标签的叠加，悄然形塑观众的情绪轨迹与感受方式[5]。

在此意义上，所谓“情绪操控机制”，可以理解为多重力量的协同运作：算法在宏观层面筛选、排序和放大特定情绪特征的内容；视听形式在中观层面通过剪辑、构图、色彩与声音组织情绪体验；符号与话语在微观层面通过标题、文案、标签与评论框架，对情绪的解读路径进行预设。三者并行不悖，相互强化，从而构成一种日常化、难以被直接察觉的情绪引导结构。

第一，从算法层面看，平台通过对高情绪强度内容的偏好，构筑起一种“选择性放大”的机制。算法基于停留时长、完播率、互动频次等数据，推断“受欢迎”的内容类型，并在推荐中不断强化这类内容的可见度。看似是对“用户偏好”的回应，实则是对特定情绪特征的持续放大。具有鲜明情绪极性和剧烈情绪波动的内容，更容易在这一机制中脱颖而出，而那些情感较为含蓄、复杂、多义的作品，则可能因数据表现不突出而被“隐形化”。随着时间推移，平台整体呈现出的情绪谱系被重构，观众所接触到的情绪类型趋于集中，并逐渐内化为“平台上的情绪常态”。

第二，从形式层面看，数字媒体艺术短视频中的剪辑、构图、光色与音效，构成了对情绪的“程序化操控”。通过前一节所述的共情叙事模板，许多作品已经形成高度稳定的情绪结构：开端设置“情绪缺口”，中段营造情绪张力，结尾实现情绪释放。形式在此不仅是表达工具，更成为触发情绪反应的“技艺机制”。例如，通过节奏极快的剪辑与音轨推进，将观众置于一种几乎难以中途退出的感官流中；又如，通过刻意夸张的画面反差与光影对比，营造“被逼迫看下去”的视觉吸附力。形式对情绪的操控并非总是负面的，但当其被系统性用于“最大化情绪效果”而缺乏相应的反思时，就容易滑向对观众的情感能量和注意力的过度攫取。

第三，从符号与话语层面看，标题、话题标签、文案以及弹幕与评论区的话语框架，共同构成了对情绪意义的预设性指引。许多短视频在内容尚未开始之前，就通过标题与封面给出了预设情绪指令，例如“看完直接破防”这一幕真的被治愈了”看完瞬间泪目”等[6]。观众在进入内容之前，已经被提示“应当以某种情绪观看”，作品的多义性在尚未展开之时，便被压缩到特定情绪通道内。与此同时，话题标签与推荐话题将相似情绪调性的内容聚合，使观众在一个情绪相对封闭的“情绪场”中反复流转。评论区与弹幕中的集体表达，又进一步加固这一情绪框架，使个体情绪逐渐与“群体应然情绪”保持一致，从而在不知不觉间完成情绪立场的同质化。

表 3 数字媒体艺术短视频中情绪操控机制的多层协同

层次维度	关键载体	主要运作方式	对情绪的影响路径	可能后果
算法层	推荐系统、排序机制、数据指标	基于停留时长、互动数据筛选并放大高情绪强度内容	决定何种情绪更易被看见，重塑平台整体情绪谱系	情绪类型集中化，多样性与复杂性被压缩
形式层	剪辑节奏、镜头语言、光色、音效	通过节奏控制、反差设计与视听组合构造情绪弧线	在短时内引导情绪起伏，提升情绪反应强度与速度	情绪体验被流程化、程式化，易导致感官疲劳
符号与话语层	标题、文案、封面、标签、弹幕与评论	通过情绪标签与话语框架预设意义和情绪解读路径	告诉观众“应当如何感受”，塑造群体情绪规范与期待	观众情绪立场同质化，批判性与距离感减弱

从表 3 可以看出，这一情绪操控机制并不必然表现为强制性的命令，而更像是一种“默认环境”：观众在

其中做出的观看选择和情绪反应，看似是自发的，实则是在多重结构性力量的引导下完成的。作品本身的情感指向、平台对情绪的技术处理以及观众之间的互动话语，共同构成一套难以外显但又无处不在的“情绪环境治理”[7]。需要强调的是，将上述机制概念化为“操控”，并不意味着否定所有情绪动员的正当性。情绪本身具有激活共感、促进理解与驱动行动的积极潜力，许多具有社会批判性和人文关怀的数字媒体艺术作品，正是通过精心组织情绪体验，引导观众进入更深层的反思过程[8]。然而，当情绪动员被系统性地纳入以流量和转化为核心指标的情绪经济逻辑之中，便容易从“促进理解”滑向“优化指标”，从“情感联结”滑向“注意力捕获”。在这一过程中，艺术作品的情感力量逐渐从“为意义服务”转向“为数据服务”，观众则从“情感主体”转变为“情绪数据的生产者”[9]。

五、结语

在短视频平台成为日常信息与审美体验重要入口的当下，数字媒体艺术的生成、流通与接受，已无法脱离情绪经济的宏观框架来理解。本文从“情感表达”向“情绪资源化”的转向入手，指出情绪在平台语境中被系统性地量化、运营与优化，成为与流量、转化率与广告收益紧密绑定的关键变量。在这一结构性条件下，数字媒体艺术短视频的创作实践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以数据指标为中心的运行逻辑，情绪不再只是作品内部的审美维度，而是外部制度得以运作的重要支点。

在对共情叙事的分析中，本文强调，短视频语境下的情感动员呈现出高度压缩和模板化的特征。通过对常见叙事模式与视听策略的梳理可以看出，创作者往往在极短时长内构建清晰的情绪弧线，并借助特定的构图、配色与声音设计，在“代入—共鸣—释放”的流程中高效调动观众情绪。这一机制一方面提升了数字媒体艺术触达广泛受众的能力，使复杂经验得以以更为亲近的方式被感知，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情感经验被标准化、情绪表达被程式化的风险，使“共情”日益成为可被设计、可被复制的情绪程序。进一步而言，情绪操控并非仅来源于创作者的个体意图，而是由算法、形式与符号话语多层协同运作而成的制度性结果。推荐算法通过持续放大高情绪强度内容，重塑平台整体的情绪谱系；视听形式通过节奏控制与影像技艺，将情绪体验“程序化”；符号与话语通过标题、标签与评论框架，预设观众的情绪解读路径。三者的叠加使情绪操控呈现为一种日常化、温和而难以被察觉的引导过程，观众在“被推荐”“被感动”“被共鸣”的连续体验中，逐渐将这一情绪结构内化为观看常态。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主要从理论与批判性评论角度，对情绪经济视角下的数字媒体艺术短视频进行了初步梳理与分析。未来研究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结合具体平台的算法规则、特定创作群体的实践经验以及观众的真实感知反馈，开展更为细致的经验性研究；也可以将短视频与虚拟数字人、沉浸式展览、游戏化艺术等其他数字媒体艺术形态进行比较考察，以构建更为完整的“情绪—技术—艺术”研究图景。对于数字媒体艺术而言，如何在情绪动员与审美批判之间持续寻找平衡，不仅是创作层面的策略问题，更是其能否在情绪经济时代保持文化意义与公共价值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戴元初,刘一川.情绪驯化：短视频平台的情绪塑造与价值转化策略[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5,47(07):104-113.DOI:10.19997/j.cnki.xdcb.2025.07.012.

[2]殷俊,杨金川.视角、时长与情绪：爆款短视频创作范式研究[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5,47(03):94-103.DOI:10.19997/j.cnki.xdcb.2025.03.002.

[3]奚路阳,程明.短视频米姆式传播:行动逻辑与社会文化意涵[J].传媒观察,2022,(07):65-72.DOI:10.19480/j.cnki.cmgc.2022.07.005.

[4]陈军.共情神经科学:探索亲社会行为、利他主义和道德的生物学基础[J].学习与探索,2019,(07):139-147.

[5]朱雄轩.数字媒体艺术在短视频创作领域的应用[J].记者摇篮,2025,(07):48-50.

[6]郝莹莹.数字媒体艺术在短视频创作领域中的应用分析[J].新闻传播,2024,(10):46-48.

[7]李静.“短视频”时代数字媒体艺术的优势与挑战[J].商业文化,2021,(31):137-138.

[8]刘锦平.情绪经济视角下直播带货的传播策略——以伊能静直播间为例[J].国际公关,2025,(08):158-160.DOI:10.16645/j.cnki.cn11-5281/c.2025.08.061.

[9]杨璐.文商旅体融合赋能消费扩容提质——基于情绪经济视角的实践路径探析[J].老字号品牌营销,2025,(18):59-61.

文化双创背景下博物馆研学旅行赋能美育教育的实践路径研究

陈矿[1] 徐锦博[2]

（1.成都大学，四川 成都 610106，2.福建师范大学，福建 福州 350117）

摘 要：美育教育在持续演进的过程中，面临着美育内容的单一、美育实践与社会实际的脱节以及美育评价体系不健全等主要议题。针对这些现存问题，本研究在文化双创的宏观背景下，深入剖析博物馆研学旅行的独特属性与显著优势。通过开发具有地域特色与文化深度的项目、创新课程知识与体验融合的设计、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提升博物馆研学旅行教育的互动性与沉浸感，使博物馆研学旅行被重塑为美育教育的一种新型模式。这不仅显著增强了美育教育的实践性与交互性，而且有效促进了学生审美情趣与创新能力的全面发展，充分彰显了文化双创在推动美育教育改革与创新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文化双创；博物馆研学旅行；美育教育

基金项目：四川研学旅行发展研究中心资助项目“文化两创视域下博物馆研学旅行研究”（项目编号：YX24-12）；绵阳市市级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基础教育研究专项课题“饮食影像中华传统美学与隐性教育研究”（编号：MSJJ24-C08）。

DOI：doi.org/10.70693/jyxb.v1i4.121

Research on the Practical Path of Empowering Aesthetic Education through Museum Study Tou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ultural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hen Kuang[1], Xu Jinbo[2]

[1] College of Chinese& ASEAN Arts，Chengdu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2] School of Communication，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 Fujian

Abstract: In the continuous evolution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t is confronted with major issues such as the singularity of aesthetic education content,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aesthetic education practice and social reality, and the incomplete evaluation system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n response to these existing problems, this study, under the macro background of cultural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deeply analyzes the unique attributes and significant advantages of museum study Tours. By developing projects with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ural depth, innovating the design that integrates course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and using modern technological means to enhance the interactivity and immersion of museum study tour education, museum study Tours have been reshaped as a new model of aesthetic education. This not only significantly enhances the practicality and interactivity of aesthetic education, but also effectively promotes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aesthetic taste and innovation ability, fully demonstrating the important role of cultural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promoting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aesthetic education.

Keywords: Cultural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Museum study tour Aesthetic education

作者简介：陈矿(1980—)，男，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戏剧影视文学、艺术美育；
徐锦博(1997—)，男，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影视编导。

中华民族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文明，孕育并积淀了丰富多元的传统文化精髓，这些文化元素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凝练为中华民族独树一帜的精神符号与身份标识。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伊始，中国共产党高瞻远瞩，相继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以及“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1]的文化发展方针，这不仅增强了国家的文化自信，还深刻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重要作用和运用。当前，美育教育处于复杂多维的发展境遇，其既受惠于国家政策的战略抬升与全面部署，亦面临实践层面的多维挑战。在国家政策层面，《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的颁布[2]，虽已明确了美育教育的重要性，但资源分配的不均衡性，以及社会美育资源与学校教育的融合不深，构成了美育发展的前进障碍；在师资力量层面，专业美育教师的短缺与培训体系的滞后，限制了教学质量与创新能力的进一步提升；在教学内容与方法上，单一化、传统化的倾向较为明显，缺乏跨学科整合与现代科技手段的应用，难以激发学生的审美兴趣和审美创造力；此外，在社会层面，“重智轻美”的传统观念仍根深蒂固，削弱了美育教育的地位与认可度。尽管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和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倡导下[3]，美育价值逐渐被重视，但观念转变与社会认知的全面升级仍需时日。

将美育教育与博物馆研学旅行深度融合，并探索其与传统文化“双创”理念的结合，是回应时代挑战、满足学生主体精神文化及审美需求的重要路径。进入当代，博物馆研学旅游更是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政策层面，政府相继出台一系列措施，明确支持研学旅行产业的发展，为博物馆研学旅游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市场需求方面，公众对历史文化的热情空前高涨，博物馆研学旅游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受众范围从中小学生扩展到商业团体、银发群体等各个年龄段。作为美育教育的一种创新形式，不仅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审美体验、审美素养和创新能力，还能促进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与创新性发展，为培养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创新精神及国际视野的新时代青年人才提供有力支撑。

一、文化“双创”背景下美育教育的现存问题

在当今文化创新与创造的时代背景下，美育教育作为塑造学生审美情趣、激发创新思维及培育人文素养的关键环节，其战略地位愈发显著。然而，美育教育的实践进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面临着教学内容同质化严重、与社会生活实践脱节、评价体系不健全等一系列深层次挑战，这些问题不仅削弱了美育教育的实效性与吸引力，还严重阻碍了青少年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与提升。

（一）美育教学内容相对单一

美育教育内容的丰富性对于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激发创造力和想象力，以及培养文化素养和人文精神都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了美育的重要性，提出“改进美育教学，提升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的方针，美育由理念倡导逐步走向教学实践，并融入日常的教学过程交叉融合[4]。然而，在当前教育体系下，美育教学展现出了内容相对集中且单一的趋向：一方面，美育教育过度集中于如美术、音乐与舞蹈等传统艺术领域，而对历史、科技、自然，广泛蕴含美育资源的文化领域探索不足。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现存美育内容与现实生活及社会文化脱节，难以有效激发学生的审美兴趣与审美主动性；另一方面，美育教学未能紧跟时代步伐，缺乏“双创”理念的深度融合，忽视了对学生创新思维与创新能力的培养。

究其原因，可归结为教育理念与目标偏差、课程设置与教学资源的局限，以及教学方法与手段单一三大方面：首先，部分教育者与教育机构对美育教育的认知仍停留于传统艺术教育层面，存在“单打独斗”，与思政教育、文化教育及德育“各自为政”的现象，导致美育课程缺乏指导性且建设实践较为粗糙[5]，未能全面把握美育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提升综合素质中的核心作用。美育教育目标的设定过于狭隘，侧重于技能与知识的传授，而忽略了对审美情趣、创新思维及人文素养的培育；其次，美育课程设置缺乏跨学科融合的设计思路，教学资源相对匮乏，尤其是高质量的美育教材与教辅资料严重不足，严重制约了美育内容的多样性与深度；最后，美育教学方法与手段单一，以教师讲授为主，缺乏课程之中的互动性与实践性，且教学评价过于侧重结果，忽视了对教学过程，即学生学习过程与创新能力的评估。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了美育教学内容单一的现状，亟待通过系统优化与创新改革来加以改善。

（二）美育教育与社会实践脱节

在当今全球化浪潮席卷与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背景下，美育教育作为塑造学生审美情趣、激发创新思维及培育人文素养的重要路径，其战略地位与价值意义愈发显著。人类与生俱来就拥有感受事物、认识事物、改变事物的愿望和能力，这些能力也是艺术教育的价值得以体现的前提和保障[6]。面对快速更迭的社会环境与日益增长的社会实践需求，美育教育却遭遇了与社会实践脱节的严峻挑战。美育教育的内容往往侧重于艺术理论、艺术史等学术性的相关知识，而忽视了与现实生活、社会文化紧密相关的实践内容。这导致学生的“第二课堂”体验不足，其所学的美育知识难以在社会实践中得到应用，降低了美育教育的实用性和吸引力。目前而言，大多数美育课程内容陈旧，

主要围绕艺术理论、艺术史等展开，缺乏对现实生活和社会文化的关注。另外，美育教育的教学方式多以课堂教学为主，缺乏实践环节和互动体验。例如，在美术课上，学生主要学习绘画技巧和艺术风格，但很少有机会将所学知识与现实生活场景相结合。单一的教学方式限制了学生的参与度和体验感，使得美育教育难以达到预期的课程实效，教育的评价体系往往过于注重学术成绩和理论知识的掌握，而忽视了对学生实践能力、创新思维和人文素养的评价，这种评价失衡进一步加剧了美育教育与社会实践的脱节，难以实现以立德树人为本的根本任务。

究其原因，美育教育资源分配的匮乏，构成了阻碍美育教育课程与社会实践深度融合的关键因素。部分贫困区域及教育机构受限于经济条件，美育教育资源及设施愈显捉襟见肘，难以支撑起多元化、实践导向的美育活动体系。此状况严重制约了美育教育的广度与深度，使得学生在实践中体验美、创造美的机会大打折扣。同时，教育体系内部根深蒂固的传统惯性与制度性壁垒，亦是美育教育难以与社会实践紧密衔接的重要原因。长期以来，由历史积淀形成的以“第一课堂”为主的教育模式、课程架构及评价体系，往往滞后于社会发展的新趋势与人才需求的新变化。这种固化的教育体系难以迅速响应外界环境的动态调整，导致美育教育在内容设计、教学方法及评估机制上均难以与社会实践实现有效对接，继而加剧了美育教育与社会实际需求之间的脱节现象。

（三）美育教育评价体系不完善

美育教育多元评价的重要性不仅是促进学生主体多元发展、激发学习兴趣与动机的关键，亦是提高教学质量、推动美育教育创新及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必由之路。美育所培育的素养是非标准化和及时性的，因此不应该用可测量的标准来评价学习者，而是通过“遥距观察”来评价和看待被评价者[7]。然而，当前美育选项课的考核往往采用统一的标准与项目，忽略了学生在艺术兴趣、审美偏好、技能基础及创造力等方面的显著差异，其考核内容未能平衡好学生群体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如果课程评价无法分析学生在每个课程目标上的达成度，那么评价结果就无法客观有效地反映出学生学习的整体情况，也就无法用于之后的持续改进工作[8]。这种“一刀切”式的考核方式，不仅难以衡量每位学生在美育领域的真实水平与成长轨迹，还可能抑制部分学生在特定艺术领域或审美活动中的积极性与创造力，特别是对于那些在非主流或新兴艺术形式上有独到见解与才华的学生。此现象背后的原因复杂多样，首先是对美育教育价值的认知偏差，部分教育者和机构未能充分认识到美育在培养学生综合素质中的核心作用，导致对评价体系构建的重视程度不足；其次，美育教育评价体系的构建起步较晚，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和实践经验积累，使得评价体系在科学性、全面性和有效性方面存在不足；再者，资源限制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部分地区和学校因经济条件所限，难以投入足够资源支持美育教育评价体系的完善，进一步加剧了评价体系的不完善状况。

二、博物馆研学旅游与美育教育的联姻

博物馆研学旅游与美育教育的联姻，是一种深度融合的教育创新模式。它巧妙地将博物馆的丰富资源与美育教育的核心理念相结合，共同促进了学生全面发展。在这种联姻中，博物馆研学旅游不仅为美育教育提供了生动、直观的教学场景和素材，还通过实地体验、探究学习等方式，深化了学生对美的认知与感受。同时，美育教育的目标和方法也为博物馆研学旅游指明了方向，提升了其教育价值和意义。具体来说，博物馆作为历史文化的宝库，收藏着大量的艺术品、文物和科学展品，这些都是美育教育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另外，通过博物馆研学旅游，学生可以近距离地观赏艺术品，感受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审美价值，从而培养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此外，博物馆研学旅游还注重学生的实践体验，鼓励学生通过动手操作、实验探究等方式，深入理解艺术品的创作背景、技艺和文化内涵，这种学习方式与美育教育强调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理念不谋而合。

（一）博物馆资源的丰富性与独特性

博物馆资源的广博性与独特性为美育教育的深化和拓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赋予了研学旅游更加深刻的美学意蕴与教育价值。博物馆所珍藏的丰富藏品，横跨艺术、历史、科技等诸多领域，不仅构成了跨学科的知识宝库，更为美育教育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审美对象。这些实物性的文物与艺术品，以其独有的形态、色彩与意涵，成为学生主体直观感知美学、领悟艺术真谛的活教材，有效地促进了学生审美认知与审美情感的双重发展。

在博物馆研学旅游的实践中，其作为一种美感成长、研究性学习和旅行体验相结合的校外教育活动形式，要使其有效开展，最重要的是要将研学旅行作为课程去实施，实现研学旅行美育课程化[9]。学生得以在历史的长河中追溯美的足迹，探寻美的多元表达与时代变迁。跨时空的美学体验，不仅拓宽了学生的审美视野，还激发了他们对美的探索热情与创新潜能。同时，博物馆资源所蕴含的地域文化特色，为学生提供了接触和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艺术样式的机会，促进了他们对多元文化的尊重、理解与欣赏，进一步提升了其审美素养与文化自觉。此外，博物馆作为学术研究与教育实践的交汇点，其专业性与学术性为美育教育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理论支撑与方法指导。博物馆内的学术讲座、研讨会及专家导览等活动，不仅为学生

搭建了与学术前沿对话的桥梁，还引导他们学会运用专业的视角与批评方法去深入剖析艺术品，从而培养出更加敏锐、深刻且独到的审美能力。博物馆研学旅游以其独特的资源优势、丰富的教育内容与深厚的学术底蕴，为美育教育的深化与创新提供了有力支撑。它不仅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审美素养与创新能力，还能培育他们的人文情怀、文化自信与全球视野，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人才贡献重要力量。

（二）研学旅行的教育性与实践性

博物馆研学旅行以其独特的教育资源与实践平台，为美育教育开辟了一条生动而高效的路径。在教育性方面，博物馆作为知识与文化的集大成者，其丰富的藏品与精心的展览设计，构成了美育教育的鲜活教材。这些藏品不仅涵盖了艺术史的精髓，还蕴含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为学生在实践中学习美学理论、提升审美鉴赏力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通过博物馆研学旅行，学生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艺术作品的魅力，理解美的多样性与层次性，继而在心灵深处播下审美的种子。而实践性是研学旅行的核心属性，博物馆旅游研学正是将旅游的沉浸性和互动性特性发挥到极致[10]。在博物馆的实地探访中，学生不再仅仅是知识的接受者，更是美的探索者与创造者。他们可以通过参与互动展览、动手制作艺术品、参与专家讲座与研讨会等多种形式，亲身体验艺术的创作过程与审美体验，从而将美学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这种寓教于乐、学以致用的方式，不仅激发了学生的艺术兴趣与创造力，还培养了他们的批判性思维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美育教育的实践应用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博物馆旅游研学通过其教育性与实践性的深度融合，构建了一种全新的美育教育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学生能够在实践中深化对美的认知与理解，将美学理论转化为个人的审美体验与创作实践。同时，博物馆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载体，还能够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现实与文化传承，培养他们的文化自信与社会责任感，为美育教育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博物馆与学校的协同育人机制

博物馆旅游研学为连接博物馆与学校的协同育人机制构建了重要桥梁，为美育教育开辟了一条创新且高效的路径，实现了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共享，极大地丰富了美育教育的内涵与形式。博物馆作为知识与文化的宝库，其丰富的藏品与专业的展览设计，为美育教育提供了生动而直观的教学资源。与学校传统的课堂教学相比，博物馆研学旅行让学生置身于真实的艺术环境之中，能够近距离地观察、感受艺术品的魅力，继而在实践中深化对美的认知与理解。这种身临其境的学习方式，不仅激发了学生的艺术兴趣与审美热情，还培养了他们的观察力与感知力，为美育教育的深入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学校与博物馆的协同育人机制为美育教育的实施提供了有力保障。通过校馆合作，学校可以充分利用博物馆的教育资源，将其融入日常的教学计划与课程设计中，形成校内外相结合的美育教育体系。同时，学校还可以借助博物馆的专业力量，邀请艺术专家进校园开展讲座、工作坊等活动，为学生提供更加专业、系统的美育指导，提升他们的审美素养与创作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博物馆与学校协同育人机制下的旅游研学活动，为学生提供了将美学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的平台。在研学过程中，学生不仅可以参观展览、学习艺术知识，还可以参与艺术创作、文化交流等实践活动，将所学的美学理论应用于实际创作中，从而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使双方合作关系经常化、普遍化、制度化，推动双方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共建共享[11]。这种知行合一的教育方式，不仅提升了学生的艺术修养与综合素质，还促进了他们全面发展与个性化成长。

（四）政策支持与社会关注

博物馆旅游研学作为美育教育的新颖载体，其独特价值与实践意义得以凸显。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导向与资金支持，不仅为博物馆与学校之间的深度合作铺设了坚实基石，还促进了研学活动课程体系与评估机制的建立健全，从而增强了博物馆旅游研学在美育教育中的规范化与持续性发展。与此同时，社会各界对美育教育的日益重视，以及对博物馆作为公共教育平台功能的广泛认可，共同构筑了博物馆旅游研学蓬勃发展的外部环境，极大地提升了其在公众视野中的认知度与参与度。在此背景下，博物馆旅游研学凭借其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与艺术品典藏，为学生提供了一个跨学科、多维度的美育学习空间。这些资源不仅跨越艺术、历史、文化等多个知识领域，还通过精心策划的展览布局与专业细致的解说服务，构建了一种沉浸式的学习体验，使学生在实践中深刻领悟艺术的真谛与历史的厚重，进而促进其审美素养与鉴赏能力的全面提升。此外，博物馆旅游研学还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艺术创作、文化交流等实践活动，将美学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操作技能，以此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实践能力及跨文化交流能力，为学生的全面发展与终身学习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过深度挖掘博物馆的教育潜能，博物馆旅游研学不仅丰富了美育教育的资源与内容，还促进了学生审美素养、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的综合提升。

三、博物馆研学旅行的美育实施路径

（一）开发特色研学项目

在博物馆研学旅行的美育实施路径中，明确而精

细的研学目标与内容设计是确保活动成效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核心要素。研学目标的设定需紧密围绕美育实践活动的宗旨，参照艺术学科课程标准中的核心素养框架，如审美感知、艺术表现、创意实践及文化理解等，旨在通过旅行过程中的知识探索与美的感悟，激发学生对知识的渴望与对美的敏锐感知。同时，研学内容的选择应依托博物馆丰富的展览与展品资源，结合学生的审美认知规律与知识体系特点，进行科学合理的编排。所选内容不仅需与学生的年龄阶段、知识背景及兴趣点高度契合，以确保学习的有效性与审美的享受性，还应突出美的元素与审美价值，注重学生的实践参与亲身体验，通过设计互动性、操作性强的活动，引导学生在观赏、分析、体验中深化对艺术作品的魅力与内涵的理解，进而培养其审美感知、鉴赏能力、创意实践与艺术表现能力。教育部门参与研学课程的开发使课程教学方式、教学目的、教学时间以及教学成果等能够符合青少年学生需要，使博物馆研学真正成为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12]。通过精心设计的研学目标与内容，博物馆研学旅行不仅能够为学生的美育教育提供丰富的实践平台，还能够有效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与审美情趣的显著提升。

（二）创新课程结构设计

在博物馆研学旅行的美育实践中，创新课程结构设计是提升活动质量与效果的关键环节。为了更有效地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与审美情趣的深化，课程结构设计应突破传统框架，构建多维度、跨领域的综合美育课程体系。首先，课程结构设计应体现“多维度”的特点。这意味着课程设计不仅要关注学生的知识学习与技能培养，更要注重学生的情感体验、价值观塑造以及审美情趣的提升。因此，课程可以围绕艺术欣赏、艺术创作、艺术史与文化等多个维度展开，通过丰富多样的活动形式，如导览讲解、互动体验、工作坊实践、专题研讨等，引导学生全方位地感受艺术的魅力，培养其综合艺术素养。

其次，课程结构设计应强调“跨领域”的融合，在美育课程中，应打破学科界限，将艺术与其他领域如科学、历史、地理、文学等相结合，形成跨学科的综合课程。例如，可以结合博物馆的自然科学展览，设计科学与艺术融合的课程，让学生在探索科学原理的同时，感受科学之美；或者结合历史展览，设计历史与艺术交融的课程，让学生在了解历史背景的同时，领略历史文化的艺术魅力。这种跨领域的课程设计不仅能够拓宽学生的视野，还能够激发其创新思维与综合能力。

此外，创新课程结构设计还应注重“个性化”与“差异化”的教学需求。不同年龄段、不同兴趣爱好的学生对于美育课程的需求进行因材施教。因此，在课程设计时，应充分考虑学生的个体差异，提供多样化的课程选择，以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例如，可以设置基础型课程供所有学生必修，同时提供拓展型、研究型课程供有兴趣的学生选修，以实现因材施教、个性化发展的教育目标。

（三）利用现代科技手段

在博物馆研学旅行的美育实践探索中，现代科技手段的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教育质量提升、学习体验丰富与资源共享深化的关键驱动力。博物馆只有加强信息化建设，才能充分发挥自身职能，提高社会影响力[13]。通过综合运用数字化技术、智能系统、远程协作平台与个性化学习策略，构建了一个高效互动、深度沉浸且高度个性化的美育学习生态系统。

首先，依托 3D 扫描、高清摄影及虚拟现实（VR）等先进技术，博物馆实体展览被转化为可随时随地访问的数字化展览，打破了物理空间的局限，使学生能够便捷地沉浸于艺术作品的数字再现中，体验历史文化的深度与广度。同时，增强现实（AR）技术的应用进一步提升了学习的互动性与趣味性，使学生在虚拟与现实的交织中深化对美的认知与感悟。

其次，智能导览系统的引入，结合物联网、大数据与云计算技术，实现了对学生学习路径的个性化定制与实时追踪，不仅满足了不同学习风格与兴趣的需求，还为教育效果的精准评估提供了数据支持。在此基础上，互动教学平台的搭建促进了博物馆、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即时沟通与合作，形成了一个开放共享、互动频繁的知识交流空间。

再者，远程协作项目的实施与资源共享平台的建立，有效联结了博物馆的丰富资源与学校的教育需求，通过跨地域、跨学科的合作项目，拓宽了学生的认知边界，培养了其全球视野与团队协作能力。这一过程中，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使得教育资源得以精准匹配与高效利用，进一步提升了教育资源的公平性与可及性。

最后，个性化学习路径的智能推荐与智能评估系统的应用，标志着博物馆研学旅行美育实践向更高层次的迈进。通过深度学习算法对学生学习行为的分析，不仅为学生提供了量身定制的学习方案，还实现了对学习成效的即时反馈与动态调整，促进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与审美情趣的持续发展。这不仅革新了传统教育模式，还极大地丰富了学习体验，深化了资源共享，为构建协同育人的美育新生态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与创新路径。

（四）加强馆校合作与资源共享

在博物馆研学旅行的美育实践中，加强馆校合作与资源共享是提升活动质量与效果、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关键举措。学校可以使博物馆的课程更具有连贯性，促进博物馆开发一些更具系统性的研学课程[14]。

通过深化馆校合作，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势互补与高效利用，可以共同构建起一个协同育人的美育新生态。

首先，加强馆校合作应明确双方的角色定位与责任分担。博物馆作为重要的美育资源提供者与教育者，应充分发挥其藏品丰富、展览多样的优势，为研学旅行提供高质量的学习内容与体验活动。学校则作为研学旅行的组织者与实施者，应负责学生的组织管理、安全教育以及课程衔接等工作，确保研学活动的顺利进行。双方应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共同制定研学计划、设计课程内容、评估活动效果，形成协同育人的良好机制。

其次，资源共享是加强馆校合作的重要内容。博物馆应开放其丰富的教育资源，如藏品数据库、展览资料、专家讲座等，为学校提供多样化的教学素材与支撑。同时，学校也可以将其教育资源，如师资力量、教学设施、学生作品等，与博物馆进行共享，促进双方资源的互补与融合。通过资源共享，不仅可以丰富研学旅行的内容与形式，还可以提升教育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最后，为了保障馆校合作与资源共享的持续性与有效性，应建立完善的评价与反馈机制。通过对研学活动的定期评估与反馈，及时发现问题与不足，不断优化合作方案与课程内容。同时，还应鼓励师生、家长以及社会各界对研学活动提出意见与建议，形成多方参与、共同监督的良性机制，推动馆校合作与资源共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发展。

四、结语

博物馆研学旅行作为当前美育教育体系中的一项创造性实践路径，不仅体现了博物馆与学校之间协同育人机制的深化发展需求，也为其提供了宝贵的发展契机。将博物馆研学课程融入学生教育经历之中，应被视为校外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设计的新范式与未来趋势。相较于传统美育教学模式，博物馆研学以其高度的实践性、互动性及沉浸式体验为显著特征，极大地丰富了审美教育的过程与成效，为培育全面发展、具备德智体美劳综合素质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开辟了有效途径，展现了重要的教育价值与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李军.“两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方针[J].南方企业家,2017,(10):52-55.
[2] 郭声健.《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一部新时代学校美育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件[J].美育学刊,2021,12(01):1-7.
[3] 习近平.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J].当代党员,2024,(18):3-6.
[4] 改进美育教学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N].中国教育报,2015-10-13(006).
[5] 王春雨.新时代背景下高校美育课程创新性探究[J].大众文艺,2022,(02):142-144.
[6] 于婉莹.浅议美育教育的不可或缺性[J].美术观察,2020,(02):77.
[7] 史金良.试论传统文化精神下的当代美育评价体系[J].美术观察,2021,(12):65-66.
[8] 徐丽丽.高校美育课程的现实审视——以音乐通识课程为例[J].文艺争鸣,2023,(12):199-203.
[9] 苗蕾.多维目标下的博物馆研学课程开发研究[J].文物鉴定与鉴赏,2024,(14):104-107.
[10] 宋明明,张帅.发展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博物馆高质量发展问题研究[J].文物鉴定与鉴赏,2024,(18):98-101.
[11] 黄媛媛,周楚欢,刘楷丰.基于 PBL 的博物馆研学课程设计研究[J].齐齐哈尔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24,(05):85-90.
[12] 袁晓梅.文化两创视域下博物馆青少年研学功能研究[J].文物鉴定与鉴赏,2024,(01):74-77.
[13] 陈艳鸽.信息技术助力博物馆研学远航[J].文化产业,2024,(02):19-21.
[14] 秦晓禾.京津冀地区考古遗址博物馆研学体验的发展研究[J].文物鉴定与鉴赏,2024,(07):112-115.

运动认知视角下初中生体育学科自我概念的培养路径研究

汤悦

（吉林体育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3）

摘　要：中学阶段是个体成长与发展的关键阶段，学业自我概念作为影响中学生学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受到广泛关注。同时，随着体育强国政策的支持以及中考体育改革，体育学业自我概念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本文基于运动认知视角，探讨探讨初中生体育学科自我概念的培养路径。针对当前初中生体育学科自我概念发展现状，从运动认知训练、体育自我效能感、体育学习动机以及凝聚教育培养合力几个方面提出具体的培养路径，旨在为初中体育学科自我概念的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关键词：初中生；体育学科自我概念；元认知；培养路径

DOI：doi.org/10.70693/jyxb.v1i4.123

Research on the Cultivation Path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Self-concept in Physical Education Subje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tor Cognition

Tang Yue

Jilin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 Jilin Changchun 130013

Abstract:The middle school years represent a pivotal phase for personal growth and development. Academic self-concept, as a key factor influencing students' academic progress, has garnered significant attention. With the support of national sports development policies and reforms in physical education for high school entrance exams, the cultivation of academic self-concept in physical education has become particularly crucial. This paper explores pathways for developing physical education self-concept amo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from a motor cognition perspective. Addressing current developmental challenges in this area, it proposes concrete strategies focusing on motor cognition training, physical self-efficacy,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collaborative educational efforts. These approaches aim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advancing physical education self-concept development in junior high schools.

Keywords: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Self-concept of Physical Education;Meta cognition;Training Path

1 前言

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22 年版）明确提出“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核心理念，强调体育教学需要在扎实传授跑、跳、投等基础运动知识的基础上，培育学生体育运动能力、健康运动行为、体育品德三大核心素养，既要让学生掌握基本的体育运动方法，又要通过体育课程与活动塑造坚韧意志、协作精神与规则意识。体育学科自我概念作为学生对自身体育学业能力的客观认知、对运动价值的主观认同以及对体育学习的情感倾向的综合体现，是驱动初中生主动参与体育学习的内在动力——它不仅直接影响着学生课堂上的参与积极性、运动技能的学习动机，更深刻影响着初中生终身运动习惯的养成，对正处于青春期的初中生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初中生正处于青春期身心发展的关键转折期，认知能力

作者简介：汤悦(2001—)，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

逐步从具体形象思维向抽象逻辑思维过渡，正是自我概念形成与发展的关键阶段，开始愈发关注自身在群体中的表现以及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因此在这一阶段的体育学科自我概念具有极强的可塑性。运动表现的成败、教师同学的鼓励或否定、教学内容的趣味性与难度适配度、课堂组织形式的灵活性等多重因素，都可能直接影响其体育学科自我概念的形成与发展，同时这也导致体育学科自我概念呈现出明显的不稳定性与个体差异性，部分学生甚至因一次失败体验或负面评价陷入自我怀疑，进而产生体育学习抵触情绪，亟需通过科学的教学引导予以正向塑造。运动认知作为认知心理学在体育领域的延伸，聚焦运动信息的获取、加工、存储与应用过程，涵盖运动感知、记忆、思维、决策等核心要素。从运动认知视角审视初中生体育学科自我概念的形成机制，可深入揭示认知过程与自我概念建构的内在联系，为优化培养策略提供科学依据。当前我国初中体育教学中仍存在重技能训练轻认知发展、重结果评价轻过程体验等问题，导致部分学生因运动认知不足、自我效能感低下形成消极体育自我概念，影响学习效果与健康成长。因此，基于运动认知视角探索培养路径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价值。

2 运动认知与体育学科自我概念的内涵关联

2.1 运动认知的理论内涵与构成

运动认知是指个体在计划、执行和监控运动行为时所涉及的一系列内在心理过程。运动认知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其主要构成要素包括：运动知觉、运动视觉、运动记忆、运动思维和运动决策。运动知觉是指个体对自身身体位置、动作幅度、肌肉张力以及外部环境中运动物体的空间特性、时间特性和运动轨迹的精准感知能力，是运动决策的基础信息来源。运动视觉区别于普通视觉，它强调在动态情境中对关键视觉信息的快速捕捉与整合，是实现精准动作控制的前提。运动记忆包括对运动技能动作模式的程序性记忆、对战术规则和比赛情境的陈述性记忆，以及对过往成功或失败经验的情景记忆，是运动技能熟练化和战术运用的重要保障。运动思维涉及在运动过程中的问题解决、逻辑推理与创造性思考。运动决策是运动认知的核心输出环节，指在有限时间内基于知觉信息、记忆经验和思维分析，选择最优运动方案的过程，直接决定运动行为的有效性。运动认知是运动技能习得与体育学习的重要心理基础。

2.2 体育学科自我概念的内涵与构成

早在 1890 年，James 就在其撰写的《心理学原理》中系统阐述了自我概念理论，从此自我概念正式进入了心理学研究者的视野之中。关于学业自我概念的界定，林崇德将其定义为：学生在学校环境中，对自己的学习活动和学习能力的认知和评估。依照学业自我概念的界定，结合体育学习的特点，本研究认为体育学科自我概念是指个体在体育学习过程中形成的对自己在体育学习方面比较稳定的认知、体验和评价。其能够将学生在体育方面的学习情况真实体现出来。根据 Shavelson 提出的自我概念多层次模型，体育学科自我概念属于特定领域的自我概念，它既受到一般自我概念的影响，又反过来影响一般自我概念的发展。初中生体育学科自我概念的形成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个人因素包括先天的运动能力、身体形态变化、技能水平等；环境因素包括体育教师的教学风格、同伴关系、家庭体育氛围以及社会文化环境等。

2.3 运动认知对体育学科自我概念的决定性作用

运动认知作为个体对自身运动技能学习、执行与监控的内在心理过程，对体育学科自我概念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这种决定性作用主要体现在认知基础、过程调控、归因方式这三个方面。运动认知通过形成精确的动作概念和清晰的运动表象，为个体评估自身体育能力提供了内在标准。研究表明，具有完善运动认知结构的学生，其自我评价更具稳定性和准确性，不易受单次表现成败或他人评价的干扰。运动元认知使个体能够监控和调节自身的运动学习过程。当学生掌握计划、监控和评估的策略时，他们能够及时发现并纠正动作偏差，从而持续获得技能进步的体验。这种基于认知调控的成功体验，促使学生形成"通过努力可以提升能力"的成长型思维，进而建立更具韧性的体育自我概念。运动认知水平直接影响个体对运动表现的归因方式。具备高水平运动认知的学生，在遇到失败时能够从技术细节、战术选择等可控因素进行归因，而非简单归咎于稳定不可控的能力缺陷。这种具体、可控的归因模式有效保护了自我概念免受负面事件的冲击，维持其稳定性。综上，运动认知通过构建评价框架、调控学习过程和影响归因方式三个关键机制，从根本上影响着体育学科自我概念的形成与发展，为通过形成良好运动认知来培养初中生积极的体育学科自我概念提供了理论依据。

3 初中生体育学科自我概念培养的现状与问题

在当前初中体育教学中，教师对体育学科自我概念的重视程度逐步提升，部分教师开始尝试通过多样化教学方法激发学生体育学习兴趣。然而，综合来看仍存在不足：体育教学中仍以单一的技能训练为主，对学生运动认知发展关注不足；评价方式以结果性评价为主，忽视过程性评价与个体差异；学生运动参与的主动性参差不齐，部分学生因运动表现不佳形成消极体育自我概念。

初中生运动认知能力尚处于发展阶段，对自身运

动能力的认知易受外界因素影响。部分学生因一次运动失败就全盘否定自身的能力，形成认知偏差；另一部分学生则因短期成功后过度高估自身能力，缺乏对自身不足的清晰认知，导致体育学科自我概念缺乏稳定性。同时，在体育教学中，技能教学多以单一动作训练为主，缺乏对运动规则、战术思维等认知要素的教育，导致学生技能建构碎片化。学生难以将所学技能迁移到不同运动情境中，在复杂运动任务中易遭遇挫折，进而影响体育学科自我概念的积极发展。并且，在教学中忽视学生运动情感体验的培育，有的学生缺乏对体育价值的认同，导致学生体育学习动机不足，进而影响积极体育学科自我概念的形成。在家庭中，部分家长过度关注学生学业成绩，忽视体育锻炼的重要性；在学校里，体育教学资源不够充足，运动场地、器材以及安全问题的限制；在社会层面，缺乏针对初中生的体育文化氛围的熏陶，这些因素共同制约了初中生体育学科自我概念的培养。

4 运动认知视角下初中生体育学科自我概念的培养路径

4.1 强化运动认知训练，树立客观的体育学科自我概念

在教学中引导学生进行运动认知反思，让学生记录运动过程中的感知、思维与决策过程，分析自身优势与不足。例如，在体育课后，让学生反思“投篮失败的原因是动作不规范还是战术判断失误”，帮助学生形成对自身运动能力的客观认知。实施针对性认知引导，针对学生的认知偏差，体育教师进行针对性引导。对因失败产生消极认知的学生，帮助其分析失败的具体原因，引导其将失败归因于可控因素；对过度自信的学生，通过有适度挑战的运动，让其认识到自身不足，树立客观的自我认知。同时要融入运动认知知识教学，在技能教学中融入运动认知知识，让学生了解运动认知的基本原理，掌握提升运动认知能力的方法，增强自我调节能力，从而促进初中生体育学科自我概念的形成。

4.2 提升在运动过程中的自我效能感，培养初中生体育学科自我概念

通过设计阶梯式技能学习目标，根据初中生认知发展规律与运动技能形成的规律，设计阶梯式技能学习目标。将复杂运动技能分解为若干简单、可操作的子目标，让学生在完成目标的过程中，形成对体育学科的自我效能感，从而培养初中生体育学科自我概念。还可以通过进行强化技能迁移训练，在教学中注重技能迁移训练，通过设置多样化运动情境，让学生将所学技能应用于不同场景中。让学生在实战中运用技能、锻炼战术思维，提升技能迁移能力，增强对自身运动能力的信心，从而促进初中生体育学科自我概念的形成。同时融合认知技能与动作技能的教学，将认知技能与动作技能教学相结合，在传授动作技能的同时，引导学生形成运动思维。例如，在乒乓球教学中，不仅教授击球动作，还讲解不同旋转球的判断方法与应对策略，让学生在认知与动作的协同发展中提升运动能力，从而促进初中生体育学科自我概念的形成。

4.3 激发持续体育学习动机，培养初中生体育学科自我概念

通过多样化教学方法创设趣味化运动情境，如将游戏融入体育教学、组织主题体育活动等，激发学生运动兴趣，让学生在愉悦的氛围中感受运动乐趣，建立对体育学习的积极情感，从而强化学生对体育价值的认同。也可以结合体育明星故事、体育赛事案例等，向学生传递体育的健身价值、社交价值与意志培养价值，让学生认识到体育对自身成长的重要意义，深化对体育的情感联结，激发持续的体育学习动机。同时要关注学生的情感体验与反馈，对运动表现进步的学生及时给予肯定与鼓励；对运动中遭遇挫折的学生给予安慰与支持，帮助其克服消极情绪。通过个性化情感反馈，让学生感受到自身被重视，增强体育学习的情感投入，从而促进初中生体育学科自我概念的形成。

4.4 凝聚教育培养合力，培养初中生体育学科自我概念

通过完善学校体育教学环境，加大体育教学资源投入，改善运动场地与器材条件；优化体育课程设置，增加多样化运动项目供学生选择；建立多元化评价体系，将过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相结合，关注学生的进步与努力，为学生体育自我概念培养提供良好的校内环境。家庭方面，通过强化家庭体育支持，向家长传递体育锻炼的重要性，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体育教育观念；鼓励家长参与学生的体育锻炼，如周末共同进行跑步、打球等运动，营造良好的家庭体育氛围，为学生体育自我概念培养提供家庭支持。在社会层面，营造积极的社会体育氛围，加大初中生体育文化的宣传，推广终身体育理念；举办青少年体育赛事、体育公益活动等，为学生提供更多运动实践与展示的机会，营造重视青少年体育的社会氛围，凝聚学校、家庭与社会的体育学科自我概念培养合力，从而促进初中生体育学科自我概念的形成。

5 小结

本研究在运动认知理论视角下，结合初中生身心发展规律，分析了运动认知与体育学科自我概念的内在关联，以及当前初中生体育学科自我概念培养现状与存在的问题。从运动认知训练、体育自我效能感、体育学习动机以及凝聚教育培养合力这几个方面提出具体的培养路径，从而促进初中生体育学科自我概念的形成与发展。本研究虽提出了运动认知视角下初中生体育学科自我概念的培养路径，但仍存在一定局限性，未通过实证研究验证培养路径的有效性。未来研究可采用实验法，选取初中生为实验对象，分实验组与对照组，对培养路径进行实证检验；同时可进一步探讨不同性别、不同运动基础的初中生体育学科自我概念培养的差异化策略，为初中体育教学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指导。

参考文献：

[1]林崇德.学习与发展:中小学生心理能力发展与培养[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2]郭成,何晓燕,张大均.学业自我概念及其与学业成绩关系的研究述评[J].心理科学,2006(01):133-136.

[3]周海霞,郭成.青少年学业自我的发展特点及研究展望[J].比较教育研究,2011,33(09):77-80+90.

[4]董艳梅,朱传耿.青少年课外体育运动对学业成绩的影响研究——兼论非认知能力的中介效应[J].体育学研究,2020,34(6):52-62.

[5]杨振宇.运动-认知联合训练对儿童执行功能的影响与迁移效应[D].西北师范大学,2024.

[6]姚玉婷.体育运动对儿童执行功能的影响:认知参与的中介作用[D].山西师范大学,2022.

“以学习为中心”教学范式在《学前儿童发展科学》中的实施策略与成效探究

孙思洁[1] 刘丽[1] 杨颜琿[2] 张文莉[1]

（1.常州工学院，江苏 常州 213032，2.六盘水师范学院，贵州 六盘水 553000）

摘 要：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向“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方向转型，“以学习为中心”的教学范式逐渐成为课程改革的重要趋势。《学前儿童发展科学》作为学前教育专业的核心课程，长期存在知识碎片化、理论与实践脱节、课堂参与度不足等问题。本研究基于行动研究方法，对该课程开展了为期两年的教学改革，重点围绕教学目标、内容结构、教学方法、学习支持体系与评价机制进行系统重构，形成了“五维一体”的学习中心教学模式。研究选取改革前后共 168 名学生为样本，通过平时成绩、实践成绩和期末成绩三项指标，对改革成效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改革后学生在实践成绩（$t = -2.206, p = .013$）和期末成绩（$t = -10.464, p = .001$）方面显著优于改革前学生，表明改革有效提升了学生的理论运用能力、情境分析能力与综合学习成效；平时成绩虽有所下降，但主要源于评价体系真实性增强及学习过程差异的充分呈现。研究结果验证了“以学习为中心”教学范式在学前教育专业核心课程中的有效性，并为我国高校专业课程改革提供了可操作、可借鉴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以学习为中心；教学改革；学前儿童发展科学

基金项目：常州工学院教学建设项目：“以学习为中心”的教学范式改革的反思与实践-以《学前儿童发展科学》为例（JGKT2023-20);“双创”精神引领的教学实践创新研究-以《中外学前教育史》为例（30120300100-23-yb-jgkt33)。

DOI：doi.org/10.70693/jyxb.v1i4.125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motion strategies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career decision-making difficulties among applied undergraduate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Sijie Sun[1], Li Liu[1], Yanhui Yang[2], Wenli Zhang[1]

[1] Normal College , Ch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Changzhou , China

[2]Liupanshui Normal University, Liupanshui,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toward a “student-centered, outcome-oriented, and continuously improved” approach, the “learning-centered” teaching paradigm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trend in curriculum reform. As a core course for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majors, Preschool Child Development Science has long faced issues such as fragmented knowledge, disconnection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insufficient classroom engagement. Based on action research methodology, this study conducted a two-year teaching reform of the course, focusing on the systematic restructuring of teaching objectives, content organization, instructional methods, learning

作者简介：孙思洁(1993—)，女，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儿童发展心理学、积极心理学；
刘 丽(1989—)，女，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家庭教育、问题青少年教育与矫正；
杨颜琿(1993—)，女，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学与文献；
张文莉（1995—），女，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教师教育、儿童发展心理。

通讯作者：刘丽

support systems,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s, result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an integrated “five-dimensional” learning-centered teaching model. A total of 168 students before and after the reform were selected as the sample, and an independent samples t-test was performed on three indicators: regular assessment scores, practical task scores, and final exam scor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ost-reform students significantly outperformed pre-reform students in practical task scores ($t = -2.206$, $p = .013$) and final exam scores ($t = -10.464$, $p = .001$), indicating that the reform effectively enhanced students' ability to apply theories, analyze situational cases, and achieve comprehensive learning outcomes. Although regular assessment scores showed a decline, this was primarily attributed to the increased authenticity of the evaluation system and the fuller reflection of differences in learning processes. The findings valid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learning-centered teaching paradigm in core courses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provide an operable and transferable practical pathway for the reform of specialized courses in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Keywords: learning-centered teaching; teaching reform; Preschool Child Development Science

一、引言

“以学习为中心”教学范式作为当代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国际趋向，已成为推动从传统“教师中心”向“学生中心”深度转型的关键理念。该范式的理论根基可追溯至 20 世纪中叶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其核心观点认为知识并非由教师单向传递，而是学习者在主动探索、社会互动与反思过程中不断建构的结果（Vygotsky, 1978）。在建构主义的影响下，国际高等教育界逐渐认识到，培养具备自主学习能力、创新思维与复杂问题解决能力的学习者，是知识经济时代大学教育的重要使命。因此，自 20 世纪末以来，“以学习为中心”的理念被美国、英国、芬兰等国家广泛应用于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并在课程设计、课堂教学策略、评价制度乃至教学资源配置等方面产生深远影响（Blumberg, 2019）。

在“以学习为中心”教学范式体系中，Weimer（2002）提出的五个关键转向具有奠基性意义，即：教学权力从教师向学生适度让渡、课程内容强调其促进学习的功能、教师角色从知识传授者转型为学习促进者、学习责任由学生主担、评价从结果导向转向促进学习过程。这些理念相互联系，共同构建起强调学生主体性、探究性学习与持续改进的一体化教学框架。

在中国高等教育背景下，传统课堂长期强调教师权威与知识灌输，学生被动接受式学习普遍存在，难以有效适应新时代对创新型、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的要求。为改善这一状况，自 2018 年以来，教育部先后出台《关于狠抓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的通知》、《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等系列政策文件，强调“坚持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政策明确提出，本科教育要从“教得好”转向“学得好”，从重知识传授转向促进能力发展，从单一终结性考试转向过程性、多元化评价体系建设。上述政策的出台，为高校全面推进“以学习为中心”的教学改革提供了制度保障与行动框架。

近年来，随着 OBE 理念在我国高校的加速推广，“以学习为中心”的课程改革研究不断增多。如李放等（2022）在儿童发展心理学课程改革研究中指出，将学习成效作为核心导向的教学设计能显著提升学生学习效能感与专业能力。郑应生等（2023）在一项课堂教学质量提升的研究中强调，“以学习为中心”的关键在于激发学生内在学习动机，构建良好的互动关系，从而促进深度学习。而在一流本科课程建设、“金课”改革等动因的推动下，多数高校也逐步在课堂中引入参与式教学、项目式学习、小组探究与多元评价等学习促进策略。

尽管如此，国内相关研究仍呈现以下不足：其一，部分研究停留在理念阐释或教学模式展示层面，缺乏理论的深度发展；其二，许多课程改革案例侧重教学方法创新，如情境教学、翻转课堂或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但对教学效果的检验多为学生满意度、自我感受等主观指标；其三，以学生学习成果为直接证据的实证研究仍明显不足，缺乏以量化成绩、能力表现等客观指标来评估改革是否真正促进学生的专业能力发展。因此，国内高等教育亟需进一步在课程层面开展严谨的教学改革实证研究，以客观学习成效作为检验标准，从而弥补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脱节。

《学前儿童发展科学》作为学前教育专业的核心课程，具有高度的综合性、应用性与发展导向性，是学生理解儿童发展规律、习得专业观察与评估技能的重要基础课程。课程内容涵盖经典儿童发展理论（如皮亚杰认知发展阶段理论、埃里克森心理社会发展理论等）、儿童行为观察方法、发展测评技术以及教育干预策略等，要求学生在理解理论的基础上具备将理论应用于幼儿教育实践的能力。然而，在现有教学模式下，仍不同程度存在以下问题：第一，灌输式讲授占主导地位，学生多以被动接受为主，难以实现知识的深度加工与迁移（孙思洁等，2025）；第二，评价体系偏向终结性评价，过程性学习档案、观察记录、案例分析等能力性评价比例不足，导致学生实践能力发展滞后；第三，课堂互动与自主探究不足，学生缺

乏从真实教育情境中主动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机会，影响其专业胜任力的提升（吴慧娴等，2024）。上述问题说明，传统“教师中心”模式难以满足学前教育专业对未来教师“高专业能力、高反思能力、高实践敏感度”的培养要求，亟需通过“以学习为中心”的范式进行重构。

基于此，《学前儿童发展科学》课程改革的核心应是通过学习任务设计、课堂活动组织、学习支持方式与评价体系的整体优化，使学生在真实问题解决、案例分析、发展评估实践等活动中实现学习的深度建构。近年来，相关研究表明，将儿童观察、微格教学、实践案例研讨、项目化学习等策略融入课程，可显著提升学生的观察能力、分析能力与理论运用能力。然而，这些研究多集中于教学方法本身的创新，而对其实际学习成效的系统量化分析仍显不足。例如，很少有研究通过改革前后学生的过程性成绩、期末成绩、能力表现量表等客观指标进行对比，以验证“以学习为中心”改革是否真正提升专业课程的学习效果。

综上所述，在政策推动、理论发展与专业需求的共同作用下，对《学前儿童发展科学》课程实施“以学习为中心”教学改革具有重要必要性和现实意义。然而，当前在实证研究层面仍存在明显缺口。因此，本研究旨在以《学前儿童发展科学》课程为对象，以“以学习为中心”教学范式为指导，通过对改革前后学生学习成果的量化对比，系统评估该范式在学前教育专业核心课程中的实际成效。本研究将重点从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两个维度分析学生成绩变化，并结合统计分析方法验证改革效果，旨在为我国学前教育类专业核心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可操作、可推广的实证证据，同时为“以学习为中心”在中国高等教育课程层面的实践提供理论支持与经验参考。

二、教学实施

本研究围绕《学前儿童发展科学》课程展开，采用行动研究方法，进行为期两年的教学改革。行动研究强调通过“计划—行动—观察—反思”的反复循环，进行教学策略的逐步调整与优化。在这一周期内，课程团队对教学内容、方法、资源体系、评价机制和教师角色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性的改革，最终形成了适应学前教育专业学生需求的“以学习为中心”教学模式。

在第一年，课程改革的主要目标是探索性实践，重点在于打破传统的“教师中心”授课模式，逐步引入项目式学习和合作学习，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逐步建立起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环境。在此阶段，课程团队首先将教学目标从知识传授转向能力培养，注重学生自主学习和小组合作能力的提升。

具体措施包括首先对课堂结构进行改革，将教学形式从以教师为主导的“讲授式”转变为“情境导入—小组探究—课堂分享—教师反馈”的互动式教学模式。在这种结构下，学生在课堂中成为学习的主体，通过小组合作和案例分析等形式进行深度探究。通过引入项目式学习，课程设计围绕学前儿童发展的实际情境展开，例如“3 岁儿童的情绪调节问题”等，旨在通过具体的案例任务让学生在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主动建构知识，提升实际问题解决能力。此外，课程还通过引入固定小组的合作学习形式，增强学生之间的互动与合作，培养团队协作能力。每个小组负责不同的任务，并在课堂上进行汇报与讨论，激发学生积极参与。

这一阶段，课程团队也尝试了过程性评价，将小组汇报和课堂表现等过程性评价方式引入课堂。尽管这些评价方式在第一轮的改革中占比不大，但已为后续评价机制的完善奠定了基础。第一年的改革使学生在课堂中的参与度显著提高，随堂测验成绩和讨论质量有所改善，学生对课堂内容的兴趣增加。然而，学生在课前准备、课程资源使用以及问题探究深度方面仍表现出依赖教师指导、学习路径不明确等问题，表明课程资源和学习支持体系仍需进一步完善。

进入第二年，课程改革逐步深化，改革目标从初步探索转向系统化构建。在这一年，课程团队重点加强了学习支持体系的构建、技术赋能的引入以及过程性评价的全面落实。课程团队通过借助学习通、慕课等线上平台，构建了一个基于学生学习层次的分级导学资源体系。通过线上预习任务、章节视频、互动测验等方式，学生可以在课前有效预习，为课堂讨论和探究活动打下基础。与此同时，课程内容也进行了模块化、项目化和本土化的重组，确保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仅能获得系统的知识架构，还能提升实际应用能力。

在评价体系方面，本轮改革显著增强了过程性评价的比重，过程性评价的占比被提升至 50%。通过引入小组合作表现、同伴互评、校内校外导师过程性反馈等多元化评价方式，课程团队全面考察了学生的学习过程，激励学生自我监控学习进度，并让教师能够依据学生的动态学习成果及时调整教学策略。这一评价方式帮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学习进展，并促进了教学方法的进一步优化。

教师的角色也在这一年经历了转型。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学习的设计师和引导者，教师不仅负责知识的传递，还要为学生提供学习任务，激发学生的思考，引导他们开展自主探究，并根据学生的学习反馈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调整。在课堂中，教师的任务是引导学生分析问题、探讨解决方案、促进高阶思维的发展。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逐步从“师生”关系转变为“合作伙伴”关系。

通过第二年的改革，学生的学习动机得到了显著激发，课堂讨论的深度与广度均有所增加，学生在知识掌握、问题分析和实际应用方面的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同时，过程性评价体系的建立为学生提供了更加多元的学习反馈，帮助学生清晰地了解自己的学习

进度和需要改进的领域，促进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

经过两年的系统性改革，课程团队最终建立了一个全面的“五维一体”教学体系。这一体系涵盖了目标重构、内容重组、方法创新、评价改革和教师角色转型五个方面的深度优化。首先，在目标层面，课程团队明确了培养学生的能力和素养的双重目标，强调从“知识本位”向“能力与素养双本位”转型。课程通过构建“儿童发展全景图”帮助学生全面理解儿童发展的各个维度，同时通过跨学科知识的融合提升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内容设计方面，课程内容由传统的章节式教学转向模块化、项目化和本土化案例的重组，使得课程内容更加贴近学生的专业需求和实际工作情境。在教学方法上，项目式学习和合作学习继续作为核心教学方法，结合线上平台的辅助，学生能够在更具结构化和层次化的学习过程中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在评价机制上，课程团队将过程性评价的比重大幅提升至 50%，全面考察学生的学习过程与能力发展，并通过案例分析和能力任务等终结性评价方式来检验学生的综合能力。教师角色的转型也使得教师不再单纯扮演知识传授者的角色，而是变成学习设计师和引导者，积极参与到学生的学习过程中，促进学生自主学习和深度思考。

两年的改革使课程逐步实现了从“教得好”向“学得好”的根本性转变，学生的学习成效显著提升，特别是在实际应用能力、跨学科思维能力和专业素养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通过这一改革，课程团队不仅提升了课程质量，也为学前教育专业的教学改革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三、教学效果

1.研究对象

为了验证“以学习为中心”教学改革的实际成效，本研究以 2022-2023 学年未参与课程改革的 2 个班级，2024-2025 参与改革的 2 个班级，共 168 名学生为研究对象。数据收集包括两个纬度，一是反映学生学习过程质量的过程性评价成绩，平时成绩和实践成绩，二是反映学生综合掌握水平的期末成绩。

2.研究方法

通过收集 2022-2023 学年未参与课程改革的 2 个班级，2024-2025 参与改革的 2 个班的平时成绩、实践成绩和期末成绩，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

3.研究结果

为了检验“以学习为中心”教学改革的实际效果，本研究对改革前后学生的平时成绩、实践成绩与期末成绩进行了独立样本 t 检验。改革前样本量为 90 人，改革后样本量为 78 人。三项指标的均值、标准差及 t 检验结果如表所示。整体来看，教学改革在不同维度上均呈现出显著效果，但不同评分项目的变化方向与变化幅度存在差异。

维度	改革前（N=90）		改革后（N=78）		t	p
	M	SD	M	SD		
平时成绩	91.04	1.865	85.72	5.556	8.061***	.001
实践成绩	81.49	5.358	83.80	7.524	-2.206**	.013
期考成绩	71.47	9.328	86.23	8.874	-10.464***	.001

首先，在平时成绩方面，改革前学生的平均分（M = 91.04, SD = 1.865）显著高于改革后学生（M = 85.72, SD = 5.556），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 = 8.061，p < .001。这一结果反映出改革后平时成绩波动增大，可能与改革引入“多元过程性评价”有关。由于改革后平时评价不再局限于基础任务的完成，而包含课堂表现、探究深度、同伴互评、阶段性任务等多个维度，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真实参与度与表现差异被更全面地呈现，因此平时表现的离散度增加、均值下降属于符合预期的结果。这说明改革后平时成绩更加能够反映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个体差异和真实投入程度。

其次，在实践成绩方面，改革后学生的表现显著优于改革前学生。改革前实践成绩均值为 81.49（SD = 5.358），改革后提升至 83.80（SD = 7.524），差异达到统计显著水平，t = -2.206，p = .013。改革后学生在实践环节的能力明显提高，主要得益于课程改革中引入大量真实教育情境、幼儿观察任务、小组项目与模拟教学任务等实践活动。教学改革强化了学生将理论运用于真实教育问题的机会，使他们在分析案例、提出策略和设计活动方面获得了更高水平的表现。

最后，在反映综合学习成效的期末成绩方面，改革效果尤为显著。改革前学生的期末成绩均值为 71.47（SD = 9.328），而改革后学生显著提升至 86.23（SD = 8.874）。独立样本 t 检验显示差异极为显著，t = -10.464，p < .001。期末成绩的大幅提升表明，教学改革在学生专业知识掌握、理论理解深度和综合分析能力方面产生了强有力的促进作用。结合课程改革的具体措施来看，这一显著提升可能与课程结构模块化、

项目式学习、高阶思维任务（案例分析、情境研判）以及技术辅助学习资源（分层视频、题库、导学单）等多因素共同作用密切相关。改革后的学习模式更强调知识的深度加工、理论与实践的贯通以及学习过程的自主性，这使学生在期末综合性考试中的表现得到全面提升。

综合以上结果可以发现，尽管改革后平时成绩有所下降，但这一现象主要源于评价体系的真实性与区分度增强，并不代表学习效果下降；相反，实践成绩与期末成绩的显著提升表明，教学改革在促进学生专业能力生成、理论应用能力提升和深度学习方面表现出实质性成效。特别是期末成绩的变化幅度最大，说明教学改革有效增强了学生在课程核心知识结构、理论理解和综合性问题解决方面的能力。整体来看，本研究的教学改革达到了预期目标，在能力导向与学习成效提升方面呈现出显著优势。

四、结论

本研究围绕《学前儿童发展科学》课程所实施的"以学习为中心"教学改革，基于两年行动研究的实践结果，从平时成绩、实践成绩和期末成绩三个维度检验了改革效果。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改革后学生在实践成绩和期末成绩方面表现显著提升，而平时成绩均值虽有所下降，但反映的实质是评价体系的重构与学生学习差异的真实呈现。整体而言，这些结果印证了"以学习为中心"的教学范式在能力培养、深度学习和理论迁移方面的有效性，也为学前教育专业核心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了扎实的证据支持。

首先，改革后平时成绩的下降并不意味着学习表现减弱，而是源于评价体系从"任务性、记忆性、重复性"向"真实性、过程性、多维度"的转型。传统模式下的平时成绩以单一作业、随堂测验和考勤为主，区分度低，学生普遍可以保持较高分数。然而，改革后增加了课堂探究、同伴互评和阶段性任务等更能反映学习过程质量的指标，这些指标强调学习深度、参与质量与合作能力，因而使得学生之间的实际差异得以呈现。这说明"以学习为中心"的评价改革更能真实反映学生的学习投入和学习方式的差异，与 Weimer（2002）提出的"从评估学习结果到评估学习过程"的改革方向高度一致。

其次，实践成绩的提升表明教学改革有效增强了学生在真实情境中运用儿童发展理论的能力。结合本课程的特点，实践能力是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最核心的技能之一，包括儿童观察、行为分析、教育策略设计和情境判断能力。改革后课程内容的模块化、项目化以及基于幼儿园真实案例的实践任务，使学生得以在模拟与真实情境中不断应用、检验并反思自己的专业知识。正如 Dewey 所强调的，"经验性任务能够引发反思性思维"，本课程改革通过构建"任务驱动—合作探究—教师引导"的实践链条，使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更加紧密，进而提升了学生的专业实践技能。

更为关键的是，期末成绩的大幅提升表明教学改革在促进学生深度学习和知识迁移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期末成绩作为综合性学习结果的指标，其显著提升反映出学生对核心知识结构的掌握、对理论逻辑的理解以及在复杂问题情境中运用理论的能力均得到增强。改革后的教学设计强调知识结构化理解（如构建"儿童发展全景图"）、高阶思维培养（如案例辩论、情境分析）、跨情境迁移（如观察任务、教育策略设计）等，这些策略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核心观点相契合，即学习者通过主动探究与意义建构实现知识的深度掌握。学生在经历预习、探究、表达、反思的学习循环后，其学习成果自然会呈现高质量的提升。

此外，本研究结果也进一步支持国内外关于"以学习为中心"教学范式的有效性研究。例如，Blumberg（2019）指出学习中心教学能够提升学生自主性与学习动机；李放等（2022）在儿童心理学课程中的改革研究也指出学习中心理念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效能感和理论运用能力。本研究的改革实践与这些理论观点和实证研究相呼应，进一步验证了学习中心范式对于"理论性强、实践关联度高"的学前教育专业课程具有较强的适切性。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相较于平时成绩，实践成绩与期末成绩提升更为明显，这一趋势揭示了教学改革对"深度学习"与"高阶能力"的促进作用。平时成绩尽管包括部分深度学习任务，但整体而言仍受学习习惯与学习策略影响较大；而实践成绩与期末成绩更多反映学生对知识的内化程度与应用程度。因此，改革后学生在这两个维度上的显著进步，表明课程改革成功突破了以往学生"理论记忆强、情境应用弱"的困境，促进了理论向实践的真实迁移，构建了更高层次的专业能力结构。

最后，本研究的结果对学前教育专业核心课程改革具有启示意义。首先，改革必须从目标、内容、方法、评价和教师角色五个维度系统推进，碎片化改革难以产生显著效果；其次，真实、复杂、开放的学习任务是促进深度学习的关键；再次，过程性评价的合理加权能够有效激发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投入与反思；最后，教师角色的转型是学习中心教学的关键驱动，教师必须从"讲授者"走向"引导者与共同学习者"，才能真正推动学生从"被动学习者"转变为"主动建构者"。

综上所述，本研究教学改革显著提升了学生在实践与理论层面的整体学习成效，为学前教育专业的教学创新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从更广泛的视角来看，本课程改革展示了学习中心范式在高等教育专业课程中的深度应用路径，对推动中国高等教育从"教得好"向"学得好"的范式转型具有重要价值。

参考文献：

[1]Vygotsky, L. S. Mind in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2]Blumberg, P. Making Learning-Centered Teaching Work: Practical Strategies for Implementation [M]. Stylus Publishing, 2019.

[3]Weimer, M. Learner-Centered Teaching: Five Key Changes to Practice [M]. Jossey-Bass, 2002.

[4]李放, 侯敬芹, 肖伯玲. OBE理念下应用型本科院校儿童发展心理学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J]. 科教文汇, 2022, (5): 95-99.

[5]张锐莹. 学前儿童发展心理学课程教学创新措施 [J]. 科学咨询, 2024, (8): 211-213.

[6]郑应生,涂亚庆,何滔,杨辉跃,彭良涛,雷猛. “学为中心”课堂教学质量提升策略研究[J].高等教育研究学报,2023,35(46):117-120.

[7]孙思洁,刘丽,张文莉,高雯吴钰.以学习为中心的《学前儿童发展科学》教学改革与实践研究[J].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2025,1(11).

[8]吴慧娴,谭甲文,游达. 学前教育专业课程教学改革路径探析——以“学前儿童发展心理学”课程为例[J]. 池州学院学报, 2024,38(4):139-142.

消防救援领域四字格翻译错误归因及对策

——基于语料库的分析

刘灵灵[1] 王莉[1*]

（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北京 102202）

摘 要：汉语四字格凭借其结构凝练、韵律和谐的特点，在消防救援领域得以广泛使用。本研究以中国消防救援学院 2024 届毕业生毕业论文的英文摘要为语料，系统分析四字格翻译的典型问题，总结出七类核心翻译错误：术语不一致、术语误译、词义偏差、过度直译、文化误译、过度翻译及翻译不足。问题根源在于译者对消防救援领域专业术语、文化内涵及政策背景的认知断层。基于此，本文构建了“专业—文化—政策”三位一体的翻译策略框架，以助力中国消防救援文化的国际传播。

关键词：消防救援；四字格；翻译策略

DOI：doi.org/10.70693/jyxb.v1i4.126

An Analysis of Translation Errors and Strategies for Four-Character Phases in Fire and Rescue Contexts: A Corpus-Based Study

Liu Lingling[1], Wang Li[1]*

China Fire and Rescue Institute, Beijing, China

Abstract: Chinese four-character phrases are widely used in the field of fire and rescue due to their concise structure and harmonious rhythm.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ypical translation errors in four-character phrases by examining English abstracts of graduation theses from the 2024 cohort of China Fire and Rescue Institute. Seven core types of errors are identified: terminology inconsistency, mistranslation of terms, semantic deviation, excessive literal translation, cultural mistranslation, over-translation, and under-translation.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se issues stem from translators' cognitive gaps regarding the specialized nature of fire and rescue terminologies,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relevant policies and historical context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is paper proposes a three-pronged translation strategy framework integrating "professional knowledge, cultural awareness, and policy understanding" to facilitate th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and acceptance of Chinese fire and rescue culture.

Keywords: Fire and Rescue; Four-Character Phrases; Translation Strategies

一、引言

中国特色词四字格结构工整、内涵凝练、音律和谐，蕴含着汉语独特的魅力与文化价值。其紧凑而精炼的表达形式能在极短的文字内传达丰富的信息。在消防救援这一强调时效性与专业性的领域，四字格高频应用于应急预案、指挥术语、学术文献和会议精神中，既契合行业对信息传递效率的要求，又彰显中国应急管理体系的鲜明特色。然而，在翻译过程中，具有丰富内涵的四字格往往给译者带来不小的挑战，消防救援领域四

作者简介：刘灵灵(1998—)，女，硕士，研究方向为翻译及口笔译教学。
王莉（1983—），女，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英语教学、消防英语、翻译研究
通讯作者：王莉

字格的误译或漏译等问题时有发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消防救援文化的国际传播。

中国消防救援学院作为中国第一所专门的消防救援本科院校，是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致力于培养高素质消防救援人才。作为共和国消防救援卫士成长的摇篮，学生的学术研究和实践成果不仅关乎行业的发展，也影响着消防救援文化的传播与国际交流。作为未来行业决策层与学术研究主力军，其毕业生的英文摘要不仅是展示个人学术能力的重要窗口，更是向世界传播中国消防救援理念与文化的关键载体。

基于此，本文选取中国消防救援学院 2024 届毕业生论文的英文摘要作为研究对象，聚焦于“汉语四字格”的翻译，通过分类讨论其英文摘要中存在的翻译问题，提出解决策略，以期为提升消防救援领域学术翻译提供参考，同时助力消防救援文化的国际传播与学术交流。

二、四字格的翻译研究背景

（一）四字格的定义

语言学家陆志韦先生在 1956 年发表的《汉语的并立四字格》一文中首次提出“四字格”的概念，此后便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作为汉语词汇系统中最具影响力的表达利器，四字格独特的表达魅力，植根于汉语独特的韵律系统，体现出汉语独特的文化价值[1]。例如，“大腹便便”在《后汉书 · 文苑列传》中原本为“腹便便”，而“笑里藏刀”在白居易的《劝酒十四首》中最初为“笑里刀”，但最终流传下来的却是“大腹便便”和“笑里藏刀”。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四字格的音节结构更加平稳和谐，符合汉语的韵律美感，因而更易于传播和接受。

然而，关于四字格的定义，学界尚未达成完全一致。吕叔湘指出,“四字格”即四音节熟语[2]；冯树鉴表示，汉语四字格中有大量“四字格”是成语,因袭定型,词序固定,不能随意拆散或组合；而有些“四字格”不是成语，结构松散，可以根据一定的语境灵活组合[3]。王毓钧和张洪明则提出:“所谓四字格，一般是指在语法、语义等方面关系紧密的四音节组合单位。四字格资料包含四音节的复合词、译音词、成语、熟语、固化语、惯用语、专业术语、固定词组等[4]”。为涵盖更为广泛的语言现象、适应英文摘要翻译需求及提升研究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本文对四字格的界定将沿用这一定义，并在此基础上展开相关研究。

（二）四字格的翻译方法

汉语的四字格词语，因其独特的结构、超强的修辞效果以及丰厚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往往对译者构成极大的挑战[5]。汉语四字格的英译是翻译实践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译界的诸多专家学者对此展开研究。例如，杨清平基于中外理论和四字格的应用实际，提出英译汉中四字格运用标准可以概括为:“完整准确、贴切得体、通顺自然”[6]；而张明玺在研究应用文的翻译时提出“不应刻意去翻译四字格,因为四字格的使用本身并不是目的，译文文雅也不是目的，信息的准确传递才是应用翻译的第一要求和首要目的[7]”；而邓礼红从语言转换、思维方式、文化差异和信息传递等角度，探讨会议传译中汉语四字格的口译策略，提出了直译、避繁就简、避形就义、套义等方法[8]。

然而，目前对于四字格的翻译研究主要针对时政文本、中医药及法律译本等少数几个领域，鲜有学者从事消防救援领域中的四字格翻译研究。这一研究空白不仅限制了四字格翻译理论的全面发展，也影响了消防救援领域对外交流与文化传播的效果。消防救援队伍作为同人民群众贴得最近、联系最紧的队伍，其背后蕴含的文化内涵及宣传中国消防救援文化的重要性不容小觑。

三、语料库分析

（一）语料收集

中国消防救援学院 2024 届毕业生共计 1200 余人，涉及消防指挥、消防工程、抢险救援指挥与技术、思想政治教育、飞行器控制与信息工程等专业，涵盖了消防工程、应急救援、火灾科学、安全管理等多个领域。为了确保研究的广泛性和代表性，笔者随机抽取了其中十分之一，即 120 份论文作为样本进行分析。通过对论文英文摘要部分的分析，笔者总结出了学生在消防救援领域四字格翻译和表达中的共性问题。

（二）错误分类

通过搜集上述毕业论文中的英文摘要，笔者统计出在摘要中共出现近 270 次四字格用法。四字格虽然是一种常见的汉语表达方式，但在翻译成英文时，学生往往容易出现各种错误。排除标点符号错误和拼写错误等低级错误，专注于学生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实质性错误后，笔者对这些错误进行分类汇总，发现涉及术语不一致、术语

误译、词义偏差、过度直译、文化误译、过度翻译、翻译不足等多个类型的翻译错误。

（三）错误分析

笔者从上述七类错误中分别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案例进行分析，形成“原文-译文-分析”为框架的分析模版。以下例子中，为保证前后文衔接流畅、问题分析全面，四字格并非单独出现，而是存在于较为完整的句子中，以引号标出，但问题分析的重点将落在四字格的翻译中。

1.术语不一致

术语不一致指在同一文档或多个相关文档中，相同的专业术语的译文未保持一致，极有可能导致读者困惑，影响文章的专业度。

原文 1：通过系统分析了四川茂县 6.24 山体“高位垮塌”灾害救援行动的各个环节，...

译文 1：Through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various stages of the rescue operation for the 6.24 “high-altitude collapse” disaster in Maoxian County, ...

原文 2：通过深入研究此次“高位垮塌”事件的前兆特征与演化过程，提出了一套新的临界预警指标。译文 2：Through an in-depth study of the precursor characteristics and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mountain “collapsing from a high position”a new set of critical early warning indicators has been proposed.

分析：在例 1 中，原文 1 和原文 2 都提到了“高位垮塌”。该四字格为地质学术语，用于描述山体或岩体从较高位置发生的崩塌或滑坡现象，通常具有突发性强、破坏力大等特点。然而，在译文中却出现了不同的表达方式，译文 1 使用了“high-altitude collapse”，而译文 2 则使用了“the mountain collapsing from a high position”。术语不一致会降低文档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导致读者难以确定不同表达是否指代同一现象，从而产生困惑。此外，译文 2 的表达较为口语化，缺乏专业性，不符合地质灾害领域的术语规范。因此，在翻译“高位垮塌”时，建议统一使用“high-altitude collapse”。这一术语直接反映了“高位”这一特征，是地质灾害领域的常用表达，能够准确传达原文的专业含义。

2.术语误译

术语误译指对专业术语的概念内涵理解错误，从而产生了根本性的错误译文。这不仅会直接扭曲原文的专业信息，误导读者，还可能引发对相关操作流程或技术规范的误解，甚至造成安全隐患。

原文：“矿山透水”事故作为常见的矿山灾害，对矿工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译文：As a common mining disaster, “mine water seepage” accidents pose a serious threat to the lives and property safety of miners.

分析：原文提到了“矿山透水”，这是一个矿业安全领域的专业术语，指在矿井开采过程中，由于地质构造、工程施工、矿井设备故障等原因导致地下水大量涌入矿井的现象。译文中的“mine water seepage”中的“seepage”一词更倾向于描述水的缓慢渗透过程，无法准确反映“矿山透水”中水的突然涌入和突发性特点。建议统一使用“mine water inrush accident”，其中“inrush”表示了水的突然涌入，且该表达在国际学术文献和行业报告中广泛使用，是描述此类事故的标准术语。

3.词义偏差

词义偏差指由于译者对两种语言中的词汇理解不够准确或不够全面而造成译文中的词语含义与原意有偏离的现象。此类错误也是学生在翻译四字格时最为常见的错误。

例 1：

原文：许昌市乡镇面积较大，灾害事故易发突发、“特点明显”。

译文：Xuchang City has a large area of townships and is prone to sudden disasters and accidents, “with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分析：原句提到许昌市灾害事故易发突发，并指出这些灾害事故的特点明显。这里的“特点明显”指的是这些灾害事故有其特定的、易于辨别的性质，而不是说这些特点一定是显而易见到无需解释的程度。“obvious”意味着某事物是显而易见的，容易被察觉或理解。使用“obvious”通常表示某个特征或结果是非常清晰且不容忽视的。“distinct”强调的是某事物具有清晰的、明确的特性，不同于其他事物。它更侧重于特性的独特性和区别性。因此，尽管“obvious”和“distinct”中文都可以翻译为“明显的”，但此处选取“distinct”才符合原文意思。

例 2：

原文：我国基层消防员的职业素质参差不齐，存在“技术不精”、理论知识不扎实等问题。

译文：The professional quality of grassroots firefighters in China is uneven,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poor technology”and not solid theoretical knowledge.

分析：“技术不精”在原文中指的是消防员的技术水平不高或能力不足，而非“技术”本身的质量差。此处学生将其翻译为“poor technology”，完全偏离了原文的意思，错误地将“技术不精”理解为“技术本身的质量差”。为了准确传达原文的意思，建议将“技术不精”翻译为“lack of technical proficiency”或“inadequate technical skills”。

4.过度直译

过度直译指过于依赖源语言的字面意思进行翻译，未能考虑到目标语言的文化差异和表达习惯，导致译文生硬、不自然，造成“中式英语”。

例 1：

原文：“消防队站”应该加强沟通联系，熟悉小区内部结构设施

译文：“Fire brigade station”should strengthen communication, familiar with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residential facilities

分析：原文中的“消防队站”指的是负责小区消防安全的消防部门或单位，通常可以理解为“消防队”或“消防站”。然而，在译文中，“消防队站”被直接字对字翻译为“fire brigade station”。尽管“fire brigade”和“station”在英语中都是正确的词汇，但组合后并不是英语中的常见表达方式，导致译文生硬且不自然，建议翻译为“fire station”或“firehouse”，等在英语中更为常见且符合表达习惯。

例 2：

原文：建立新能源汽车“协同处置”平台

译文：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energy vehicle “collaborative disposal”platform

分析：原文中的“协同处置”虽然包含“处置”二字，但根据学生论文的上下文（该平台具备信息共享、指挥调度、资源调配等功能，以实现各部门之间的信息高效流转和资源的快速响应，形成统一的指挥体系和联合行动机制，提高救援工作的组织和协同能力），可以明确此处的“协同处置”更侧重于资源整合、应急响应和多方协作，而非单纯的“处置”或“处理”。“disposal”在字面上看似语法正确，搭配恰当，但在上下文中未能准确传达“协同处置”的实际含义，导致语义偏差。因此，在翻译时需要结合上下文语境，避免过度直译。建议翻译为“collaborative emergency response platform”，以突出其“协同”和“应急响应”的核心功能。

5.文化（政策）误译

文化（政策）误译指由于对源语言蕴含文化或政策的不了解或误解，导致翻译结果不符合目标语言的文化背景或习俗，尤其见于文化特定表达、成语或典故的翻译中。

原文：广大消防指战员时刻准备着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赴汤蹈火”。

译文：Firefighters are always ready “to go through boiling water and tread on fire”to protect people’s lives and property.

分析：译文“to go through boiling water and tread on fire”是对成语“赴汤蹈火”的字面直译。虽然它准确描述了“进入沸水、踏过烈火”的动作，但完全丢失了该成语在中国文化语境下，尤其是应用于消防救援队伍时，所蕴含的深厚文化精神、职业价值观和牺牲奉献的决心。“赴汤蹈火”并非字面描述具体的物理动作。它是一个以汤、火为喻的高度象征性的成语，代表着一种最高程度的自我牺牲精神和无畏气概。建议改正为“to brave any danger, no matter how extreme”，以体现出消防救援人员英勇无畏的品质。

6.过度翻译

过度翻译指在翻译过程中添加了过多解释或修饰，超出了原文本应传达的信息程度或范围。

原文：山区道路车辆坠落事故“时有发生”。

译文：Vehicle falling accidents “occur frequently”in mountainous areas.

分析：原文中的“时有发生”表示事故“偶尔发生”或“不时发生”，强调事故发生的频率不高但存在一定的规律性。然而，译文将其翻译为“occur frequently”，意为“频繁发生”，明显夸大了事故发生的频率，超出了原文传达的信息程度。这种翻译属于过度翻译，更准确的译法应为“occur occasionally”，此处 occasionally 表示“偶尔”或“间或”，与“时有发生”所表达的“不频繁但有一定规律性”完全一致。

7.翻译不足

与过度翻译相反，翻译不足指翻译的程度不够，未能充分传达原文的所有信息或细微差别，导致目标文本的内容比原文更为简略或模糊。

原文：种灾害救援现场的环境愈发复杂、恶

劣，灾害救援的种类“层出不穷”。

译文： The environment of various disaster rescue site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complex and harsh, and the types of disaster rescue are endless.

分析：原文中的“层出不穷”是动态表达，强调灾害救援的种类不断出现或多样化，带有一种持续变化和增加的色彩。而译文中简单译为“endless”仅仅表示“无限的”或“没有尽头的”，未能传达出“不断出现”的动态性。此处翻译导致原文的动态感和紧迫感被弱化，为了避免翻译不足，可以采用“constantly emerging”，以强调种类的动态增加。

四、错误成因及对策

绝大部分“四字格”词组中，四个字音节清晰，富于变化，具有语音上的美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种独特的语言形式不仅在日常语言中广泛应用，在专业性较强的领域中也具有重要地位。在消防救援领域，四字格的使用频率同样很高，无论是学术论文中的专业术语，还是实际场景中的指挥号令，亦或是政策文件中的精神传达，四字格都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学生在翻译这类表达时往往面临挑战，通过分析七类翻译错误，笔者总结出其主要源于以下三方面认知的不足：

（1）专业含义把握不准

消防救援领域的四字格包含大量专业术语，语义凝练且指向明确。例如“矿山透水”、“高位垮塌”等，都以高度简洁的形式准确描述了特定灾害类型或事故情境，若缺乏专业知识背景，极易导致译名失真或概念混淆。

（2）文化内涵理解不足

典型代表如“十六字训词”——“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这组四字格不仅凝练了消防救援队伍的核心价值观，也已成为该领域文化身份的重要象征。翻译时若忽略其文化象征意义而简单直译，容易造成精神内涵的流失。

（3）政策背景解读不透

许多四字格浓缩了政策导向，如“改革转制”反映了消防队伍从武警部队向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转型的历史进程；“训词精神”则强调了队伍的核心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这类表达若脱离制度语境进行直译，难以准确传递其背后的政策意图。

因此，在翻译消防救援领域的四字格时，需兼顾其形式简洁、意蕴丰富的特点，同时结合专业属性、文化内涵与政策背景，力求在准确传达字面信息的基础上，充分传递其深层意义与价值导向。为系统提升消防救援领域四字格的翻译质量与传播效果，在翻译实践中可采取以下具体策略，构建“专业—文化—政策”三位一体的策略框架：

（1）专业术语标准化

推动建立《消防救援四字格术语英译数据库》，对专业术语进行系统搜集、审定与统一，实现关键术语译名的规范与共享，保障专业信息在国际交流中的准确性与一致性。

（2）文化概念阐释化

针对文化负载类四字格，应在准确理解其精神内涵的基础上，灵活采用“直译+注释”或适度意译的策略，以跨越文化隔阂，确保核心价值观的有效传递。

（3）政策表述语境化

对于反映政策导向的四字格，需深入理解其制度背景与演变脉络，在翻译中通过补充背景信息或重构表达方式，实现政策内涵的准确转译与语境化呈现。

通过上述系统性策略，既能维护四字格语言特色的跨文化传递，又能确保消防救援专业信息在国际语境中的准确性与接受度，从而有效提升中国应急管理体系的国际话语传播能力。

五、结语

本文以中国消防救援学院 2024 届毕业生英文摘要为语料，系统分析了消防救援领域四字格英译的误译类型及其成因。研究发现，学生译者在该类文本翻译中主要存在七类问题，包括术语不一致、术语误译、词义偏差、过度直译、文化误译、过度翻译与翻译不足。究其根源，在于对专业概念的认知不足、对文化意象的理解偏差，以及对政策背景的把握缺失。在党的二十大提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战略背景下，消防救援领域的对外话语建设亟须突破“翻译即语符转换”的传统认知，转向构建以“专业为支撑、文化为内涵、政策为导向”的三维翻译范式。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拓展至多模态语料分析，探索视频字幕、装备命名、应急指南等多元场景的翻译策略，为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应急管理话语体系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路径。

参考文献：

[1] 朱赛萍.汉语的四字格[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5:111.

[2] 吕叔湘.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J].中国语文,1963.

[3] 冯树鉴.“四字格”在译文中的运用[J].中国翻译,1985,(05):19-22.

[4] 王毓钧,张洪明.汉语四字格的语音表现及其韵律问题[J].当代语言学,2021,23(03):383-412.

[5] 唐根金.也谈如何翻译汉语的四字格词语——基于 MTI 课堂教学的观察所得[J].上海翻译,2020,(01):71-75+95.

[6] 杨清平.发挥译语优势与四字格运用之是非[J].山东社会科学,2007,(08):149-152.

[7] 张明玺.应用文体的科学翻译研究——以产品说明书四字格词组英译为例[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8(04):223-225.

[8] 邓礼红.汉语四字格口译策略分析——以 2013 年两会李总理记者会为例[J].中国科技翻译,2013,26(04):19-21.

识别乡村旅游发展的建筑标准——基于传统村落建筑与保护的 LDA 分析

葛文君

（滇池学院，云南 昆明 650034）

摘 要：本面向传统村落保护与活化利用的一体化需求，本研究以 LDA 主题建模对 CNKI 与 Web of Science 自 1999—2024 年的 602 篇文献进行系统分析，识别并验证四大主题： 乡村历史遗产与村庄发展、建筑与元素（含新乡土与半乡土）、生态与数字化技术、社区参与与政策治理。在此基础上，构建以历史价值—材料真实性—空间适应性—社区参与为核心的数据驱动保护框架，并细化为可操作的六类标准，用以统筹历史风貌与当代功能、提升可持续乡村旅游的综合效益。

关键词：传统村落建筑；遗产保护；LDA 主题建模；乡村旅游；适应性再利用

DOI：doi.org/10.70693/jyxb.v1i4.127

Identifying Building Standards for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An LDA-Based Analysis of Traditional Village Architecture and Conservation

Ge Wenjun

Dianchi College

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integrated needs of traditional village conservation and revitalization, this study employs LDA topic modeling to conduct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602 articles retrieved from CNKI and Web of Science spanning from 1999 to 2024. Four major themes are identified and validated: rural historical heritage and village development; architecture and elements (including neo-rural and semi-rural); ecology and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policy governance. Building on these findings, a data-driven conservation framework is developed, centered around four core principles: historical value, material authenticity, spatial adaptability, and community engagement. This framework is further refined into six operational criteria to reconcile historical character with contemporary functions and enhance the comprehensive benefits of sustainable rural tourism.

Keywords: traditional village architecture; heritage conservation; LDA topic modeling; rural tourism; adaptive reuse

1.引言

1.1 研究背景

传统村落建筑不仅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物质遗产，更是地方文化与社会结构的直观体现。自古以来，村落的发展模式与自然环境、社会习俗、宗族体系等因素紧密相关，其建筑形式、空间格局和建造技艺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地域特征。然而，在现代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许多传统村落正面临衰退和消失的威胁。人口流失、基础设施落后、产业转型乏力等问题，使得大量村落建筑无人维护，最终导致破败甚至消亡。

作者简介：葛文君(1985—)，女，汉族，硕士，研究领域：环境设计，少数民族民居设计

1.2 研究问题

传统村落建筑的保护虽然得到了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的广泛关注，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和争议。首先，当前的保护政策缺乏系统性框架，导致不同地区的实施效果存在较大差异。在一些发达地区，政府能够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和法规保障，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村落保护往往因资源匮乏而进展缓慢。政策的碎片化不仅影响了保护工作的可持续性，也增加了不同利益相关方之间的矛盾。

另一方面，现有的保护策略主要围绕建筑物理层面的修复展开，而忽视了传统村落作为社会文化空间的价值。许多经过修复的村落建筑，尽管在外观上恢复了传统风貌，但由于缺乏现代生活设施，居民仍然选择搬离，导致村落空间逐渐演变为“空心村”或仅服务于游客的商业景区。这种现象表明，仅依靠物理保护是不够的，更需要从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等多层面制定综合性保护策略。

1.3 研究目标与意义

本研究的核心目标是探索传统村落建筑保护的系统性框架，并利用数据驱动的方式，识别影响保护成效的关键因素。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本研究将采用LDA主题建模技术，对1999年至2024年间的602篇相关学术文献进行分析，系统梳理传统村落保护的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

在理论层面，本研究有助于填补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定量分析方法的空白。相较于传统的个案研究，LDA主题建模能够从大规模文本数据中提取核心主题，为研究提供更全面的视角。在实践层面，本研究通过数据分析，识别传统村落保

护的三大核心主题——建筑真实性、材料修复、社区参与，并基于这些发现提出

数据驱动的保护框架，为政策制定者和文化遗产管理者提供更科学的决策依据。

本研究将乡村旅游纳入传统村落保护的讨论范畴，探索如何在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取得平衡。这不仅可以为政府制定更加可持续的遗产管理政策提供参考，也能够帮助社区和企业更好地理解文化保护与旅游发展的相互作用。

2.文献综述

2.1.1 传统村落的文化价值与保护现状

传统村落不仅承载着丰富的物质建筑遗产，还体现了社会结构、空间组织和文化传承的独特模式。其建筑形式、聚落格局和建造技艺反映了地方性文化特征，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空间景观。然而，受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流失、土地利用变迁等因素的影响，许多传统村落面临保护困境，部分村落甚至因政策调整或市场经济发展而消失。

相比之下，中国的传统村落保护起步较晚，近年来政府相继推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工程和《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等政策，旨在通过财政补贴和政策支持推动村落的整体性保护。尽管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传统村落的消失趋势，但由于地方政府执行能力和财政资源的差异，保护措施的实际成效仍存在区域性差异。

2.1 乡村旅游与传统村落建筑的研究背景

近年来，随着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乡村旅游发展迅速，成为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改善社会结构以及传承地方文化的重要途径。乡村旅游通过整合自然、文化和农业资源，为农村带来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成为推动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引擎[1]。然而，这一过程中也对乡村核心物质与文化资源提出了更高要求，其中传统村落建筑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承载了乡村生活的历史记忆和地方文化的象征性符号。

在乡村旅游背景下，如何平衡传统建筑的保护与旅游功能的适配，成为一个亟需解决的核心问题。从保护的角度来看，传统村落建筑应当维持其历史特征和文化内涵；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些建筑还需满足现代旅游活动的多样化需求，体现功能的多元性与适应性。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通过科学的保护框架，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现代化利用的共赢[2]。

2.2 传统村落建筑保护的理论框架与挑战

传统村落建筑的保护在国内外研究中形成了多种理论框架，这些框架从不同的视角探讨了历史建筑的保护与利用问题。首先，“历史真实性”理论是传统建筑保护的重要基础，强调保留建筑的原貌、材料与工艺，避免过度现代化改造而损害其历史与文化价值 [3]。其次，“活态保护”理念逐渐成为国内研究的核心，这一理念主张通过恢复传统建筑的日常使用功能来实现可持续保护，同时将其融入社区的日常生活与经济活动中，通过发展民宿经济和文化创意产业赋予建筑新的生

命力[4]。“文化景观保护”框架则注重建筑与周围自然环境、社会文化背景的整体协调[5]。

尽管上述理论为传统村落建筑的保护提供了丰富的视角，但现有方法在实践中仍存在较多不足。当前的研究多集中于具体案例分析，难以形成普适性强的保护框架。这导致保护工作的局限性，难以满足乡村旅游背景下多元化的实际需求[4]。

未来的研究需要在现有理论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化工具和社会参与机制，构建一个兼具普适性与动态适应性的保护框架，以应对建筑材料、功能适应、社区互动与技术支持等多方面的问题。

2.3 LDA 主题分析

LDA（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6]是一种在自然语言处理（NLP）领域中广泛应用的机器学习方法，常用于挖掘文档集合中的隐含主题。该方法假设文档是由多种主题混合而成的，而文档中的每个词语都源于其中某个主题。LDA 的核心目标是通过统计推断，估算每篇文档的主题分布以及每个主题的词语分布。通过对文档中词语的共现关系进行分析，LDA 能够识别语料库中的不同主题及其分布特点，从而为研究提供一个概率框架，帮助挖掘文档集合的潜在主题结构，并揭示主题之间的内在联系。

本研究通过结合 LDA 主题分析技术和传统建筑保护理论，从大规模文献数据中提取出建筑保护的核心主题和关键参数，构建了一套适应乡村旅游背景的普适性保护框架。该框架不仅注重历史价值的保护，还关注建筑的功能适应性和环境协调性，为传统村落建筑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实践指导。

3.Methodology

本文的研究过程分为六个步骤，从数据收集到保护框架的开发，系统性地识别和构建传统村落建筑保护与乡村旅游发展的建筑标准。该框架结合了数据驱动的分析方法与理论支持，为传统村落建筑的保护和开发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实践指导。以下是每一步的详细描述及其在研究中的作用。描述研究框架，包括数据来源、处理和分析的总体流程。

（1）数据来源。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主要包括三部分：CINK（中国知识资源整合数据库）、WoS（WebofScience）两大数据库，以及不同级别政府颁发的遗产建筑保护条例。

（2）数据收集。为了尽可能搜集所有与主题相关的文献资料，在时间上并没有限制。在 CINK 数据库检索时，使用“传统村落”AND“乡村旅游”OR“建筑保护”作为关键词组合。这一检索策略能够同时覆盖传统村落主题下的乡村保护研究，以及乡村旅游背景下的建筑保护研究。检索得到了 1206 篇论文，将检索范围限定为期刊论文，以确保文献的学术质量，得到了 602 篇论文。

（3）数据处理。数据提取包含了数据清洗、构建词袋模型和确定主题数量。

（4）构建词袋模型。词袋模型通过将文档表示为词语集合并构建向量化表示，忽略词序和语法结构，其向量维度对应词汇表中的词频。分词处理生成词汇表后，这些向量被用于训练 LDA 模型，从而推断文档的主题分布和关键词[7]。LDA 不仅识别主题分布，还能捕捉文档集合中主题的动态变化趋势，为文本建模和研究提供有力支持[8]。

（5）确定主题数量。一致性 (Coherence) 是评估主题模型质量的重要指标，反映主题内词语的语义连贯性和相关性。本研究参考 Maier et al. (2018)[9]的主题建模优化方法，并结合动态变化检测[8]，通过一致性与困惑度的平衡，揭示研究热点及其演化趋势。本研究将所有按照时间与文献的数量分为了 4 个阶段，每个阶段根据一致性与困惑程度来确定主题数量。

（6）数据分析与可视化。研究结合时间序列分析和可视化工具，挖掘不同主题之间的联系和动态变化。通过这些分析，可以清晰地揭示出传统村落建筑保护的热点领域及其与乡村旅游发展的潜在联系。

4.结果与讨论

4.1 文献分布特征

在检索得到的 602 篇文献中，将数据分为 1999-2017、2017-2019、2020-2021 和 2022-2024 四个阶段，可以很好地反映中国传统村落研究的发展历程及相关政策的推动作用。这四个阶段的划分与政策实施节点高度吻合，展现了传统村落保护政策对研究热度和发展方向的显著影响。

4.1 传统村落与建筑保护主题的演化过程

4.1.1 第一阶段的主题演化

在萌芽时期，这段时间的文献较少，并且一

致性在 4 和 6 主题时达到了相对较高的水平，当主题数量达到 6 时，困惑度达到最低点，模型的效果较优。结合一致性与困惑度，主题数量因此选为 6。

1999-2016 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乡村历史遗产、村庄设计与发展、社区参与与政策、生态保护、城市化进程中的遗产管理以及乡村可持续发展等多个重要主题上。这些研究不仅深入探讨了传统村落的保护问题，还提供了实践和理论的指导，为未来乡村振兴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知识资源。

4.1.2 第二阶段的主题演化

在萌芽时期，这段时间的文献较少，一致性在 8 和 10 主题时达到了相对较高的水平，当主题数量达到 8 时，困惑度达到最低点，模型的效果较优。结合一致性与困惑度，主题数量因此选为 8。研究主题涵盖了乡村历史遗产、村庄发展、社区参与、生态可持续性等方面。这些主题不仅揭示了乡村文化与历史遗产的价值，也探讨了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护和传承这些资源。

本阶段围绕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多维主题展开，系统探讨了建筑保护、文化遗产、少数民族参与和政策治理等核心议题。“建筑与元素”主题聚焦于传统建筑在保护与现代化中的设计美学与环境适应性，提出了新乡土与半乡土建筑模式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10]，这些模式通过现代材料与传统工艺的结合实现了动态平衡[11]。

4.1.3 第三阶段的主题演化

在萌芽时期，这段时间的文献较少，一致性在 8 和 10 主题时达到了相对较高的水平，当主题数量达到 8 时，困惑度达到最低点，模型的效果较优。结合一致性与困惑度，主题数量因此选为 8。从而得到了在 2020-2021 年的研究成果，涵盖了乡村历史遗产、村庄发展、社区参与、生态可持续性等方面。这些主题不仅揭示了乡村文化与历史遗产的价值，也探讨了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护和传承这些资源。

本研究围绕乡土建筑保护、文化遗产管理与乡村振兴展开，从多方面探讨了现代技术与传统文化的融合路径。针对乡土建筑与遗产保护，研究提出通过法规完善与社区协作实现保护目标，在保护真实性的同时兼顾系统性规划[12,13]。木质结构的防火保护研究则通过结合数值模拟、防火涂层及优化设计，为现代木质建筑安全与文化价值的平衡提供了新思路[14]。

在文化与旅游的结合方面，乡村智慧旅游系统通过数字化技术提升了资源整合与传播效率，实现了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的双向驱动[15]。徽州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借助 GIS 和数据管理策略，不仅协调了历史景观与现代发展的关系，还通过对街巷和手工技艺的评估，探索出科学可持续的保护路径[16]。此外，乡村聚落振兴中，数字化技术与基础设施建设结合，为文化遗产保护和乡村经济提供了同步发展的可能性[17]。

生态与可持续发展是另一个重要议题，研究通过摩梭民居和九曲溪保护区的案例，强调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协调关系，展示了绿色技术和多方协作在生态与经济效益平衡中的作用[12,18]。政策体系在遗产保护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通过 FAIR 原则优化数据共享与管理，研究提出了政策与社区协同的文化遗产保护模式[16,19]

最后，空间分布与历史建筑研究揭示了传统街巷景观与村落空间形态保护的紧密联系。通过视觉评价模型和基于遗产价值的评估，研究提供了优化传统村落空间布局的科学依据，为其可持续发展与文化资源保护[15]提供了实践指导[12,20]。

4.1.4 第四阶段的主题演化

在萌芽时期，这段时间的文献较少，一致性在 8 和 10 主题时达到了相对较高的水平，当主题数量达到 8 时，困惑度达到最低点，模型的效果较优。

结合一致性与困惑度，主题数量因此选为 8。从而得到了在 2022-2024 年的研究成果中，多个重要的研究主题逐渐浮现，涵盖了乡村历史遗产、村庄发展、社区参与、生态可持续性等方面。这些主题不仅揭示了乡村文化与历史遗产的价值，也探讨了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护和传承这些资源。

探讨这时间段内的在了传统村落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多维主题，重点涵盖建筑设计、生态发展、公共空间规划、文化遗产再利用与保护模式等内容。

4.2 传统村落建筑保护框架的构成

通过对桑基图（图 1）的流向分析，我们可以从主题的起始和结束节点提炼出研究的演化轨迹，具体分析了消失的主题、贯穿始终的主题以及中间阶段出现的主题。这些演化路径不仅展示了研究重点的变化，也为传统村落保护标准的构

建提供了多维的时间依据。

消失的主题是指在某一时间段内出现后未延续到后续阶段的研究热点。通常，这类主题的影响范围较为有限，未能与宏观趋势相结合，因而难以形成长期的研究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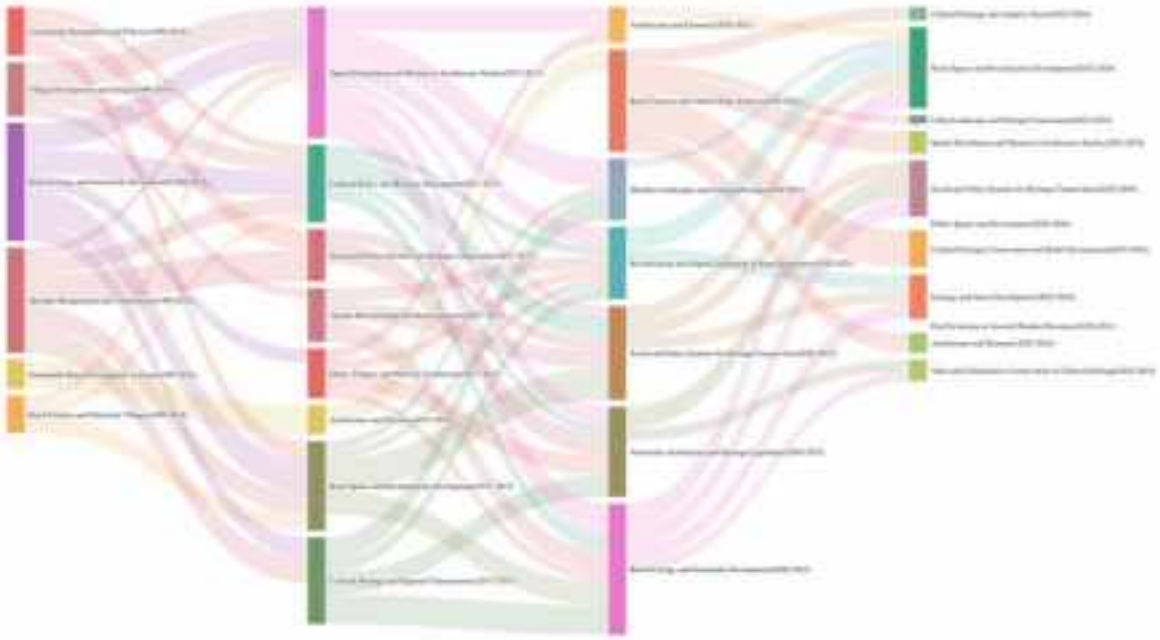

图 1 桑基图

在村落保护中的关键作用；“Rural Ecolog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展示了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自研究起步以来的重要性；“Village Development and Design”贯穿整个研究周期，凸显了村落发展与建筑设计的协同关系；“Heritage Management and Urbanization”则持续探讨遗产管理在城镇化进程中的挑战和策略。这些主题的长期延续表明，它们代表了传统村落保护中不可或缺的核心问题，符合保护与发展的综合需求。

此外，中间阶段出现的主题通常是在特定阶段的社会需求或技术发展推动下产生，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而 2022-2024 年出现的“Cultural Heritage and Adaptive Reuse”主题则进一步关注遗产的再利用与功能性适应。这些主题的出现，反映了随着时代需求的变化，研究内容逐步深入与拓展。

总体而言，通过桑基图时间流向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消失的主题主要是短期研究热点，未能形成持续影响；贯穿始终的主题代表了传统村落保护的核心内容，涵盖社区、生态、政策与设计等多个方面；中间阶段出现的主题承上启下，为研究注入了新的方向，例如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或区域特性研究。这种演化模式为我们全面理解传统村落保护的研究进程和重点提供了依据，也为保护标准的构建提供了清晰的时间与主题框架。

4.3 保护框架的推导：

在旅游背景下，传统村落建筑纳入保护的标准可以从桑基图的主题演化过程中得出，通过分析主题的消失、出现和贯穿始终的变化，总结出建筑保护的关键领域及参数。这些标准不仅考虑了建筑的历史价值，还注重其功能适应性、环境协调性和文化延续性，以确保保护工作能够满足旅游发展的多元需求，同时兼顾可持续发展目标。

4.3.1 核心建筑特征保护标准

从贯穿始终的主题如“村庄发展与设计”和“乡村特色与历史村落”来看，建筑的核心特征是保护的基础。这些主题反映了传统村落建筑在承载历史记忆和文化符号中的重要作用。具体而言，建筑年代（≥50 年）成为判断文化沉淀和历史价值的关键参数，这是因为具有一定历史长度的建筑往往见证了村落的社会变迁与文化发展而特色建筑类型占比（≥30%）则是突出村落特色的重要标准，能够强化地方性文化在旅游开发中的吸引力。结合贯穿始终的“文化景观保护”主题，建筑完整性评分（≥80 分）确保了历史建筑的外观与

结构未被破坏或过度修复。

4.3.2 材料与工艺保护标准

在材料与工艺方面，中间阶段的“生态与绿色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与模型构建”主题强调了传统材料的复原与现代材料的融合，显示出保护过程对传统建筑真实性和现代可持续性的双重追求。提出传统材料复原率（≥70%）的标准，体现了保护工作对传统工艺和建筑原貌的尊重。同时，环保材料使用比例（≥50%）不仅满足现代环保需求，还降低了施工过程中的环境负担。这些标准同时突出工艺复原评分（≥75 分）的重要性，通过保留传统工艺中的匠人精神和细节技艺，增强村落的文化认同感。这些标准的结合，反映了材料与工艺在保护工作中不仅是技术环节，更是传承地方文化记忆的重要途径。

4.3.3 空间与功能适应性标准

对于建筑的空间与功能适应性，“文化遗产与适应性再利用”和“乡村振兴”主题揭示了现代化功能与传统建筑保护之间的平衡问题。现代设施改造率（≤20%）的标准确保现代化功能的引入不会对传统建筑原貌造成破坏，同时空间利用率（≥80%）通过高效使用建筑资源，满足了现代旅游的需求，民宿、展览空间等旅游功能的适配

4.3.4 技术支持与数字化标准

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是中间阶段出现的重要主题，从“数字化技术在乡村复兴中的应用”到“文化数据分析”，数字化技术逐渐成为建筑保护的重要工具。数字化记录覆盖率（≥90%）确保了村落所有主要建筑信息能够被完整保存，这为建筑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也为后续研究与开发提供了便利。

4.3.5 环境与景观协调标准

环境与景观协调是贯穿始终的主题，如“生态与绿色发展”和“文化景观保护”，但也包含消失主题“公共空间与环境”的内容。这反映了建筑保护需要与环境保护协同进行的重要性。绿色空间保留率（≥30%）确保村落内庭院、绿地和水系等生态空间能够得以保存，既保护了村落的自然景观，也增强了游客的体验。景观协调度评分（≥85 分）则强调修缮或新建建筑需与周围环境在风貌和文化上保持一致，而游客承载力（≤80%）的标准有效防止过度旅游对环境和资源造成的破坏。

4.3.6 社区与文化互动标准

社区与文化互动贯穿了“社区参与与政策”和“文化遗产与适应性再利用”主题，强调保护工作中的社区主导作用和文化传承。社区参与率（≥60%）确保村民能够主动参与到保护与管理中，增加归属感与责任感。同时，文化活动保留率（≥70%）保证了村落传统节庆、手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延续，进一步提升旅游吸引力。而文化解说满意度（≥85 分）通过高质量的导览与文化传播服务，增强游客对村落文化的理解与认同。

5. Conclusion

本研究采用潜在狄利克雷分配（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LDA）主题建模方法，对来自中国知网（CNKI）和科学网（Web of Science）的 602 篇学术文献（时间跨度为 1999 年至 2024 年）进行分析，系统识别了传统村落建筑保护领域的研究主题演变趋势。研究结果表明，当前主要存在四大研究主题。基于四大主题，本研究构建了一个数据驱动的建筑保护框架，为遗产保护提供了以历史价值、材料真实性、空间适应性和社区参与为核心的标准化准则。该框架为政策制定者、建筑师及文化遗产从业者优化保护策略、促进可持续乡村旅游提供了实用指导。未来研究应结合实地调研与实证验证，以增强该框架的适用性。

参考文献：

1. Liu, C., Dou, X., Li, J., & Cai, L. A. (2020). Analyzing government role in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from China.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79, 177 – 188. https://doi.org/10.1016/j.jrurstud.2020.08.046

2. Olğun, T. N., & Karatosun, M. B. (2019). Rural architec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in Turkey: The case of Karaca village of Malatya reg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esign & Nature and Ecodynamics, 14(3), 195 – 205. https://doi.org/10.2495/DNE-V14-N3-195-205

3. D’Ayala D., & Wang H. (2006). Structural Preservation of Chinese Architectural Heritage: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the China Principles and the Structures Principles. 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Conservation, 12(1), 53 – 70. https://doi.org/10.1080/13556207.2006.10784960

4. Wang, X., & Zhu, Q. (2022).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raditional Villag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ilience Theory. Land, 11(12), 2314. https://doi.org/10.3390/land11122314

5. Alaeddinoglu, F., & Can, A. S. (2011). Identific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nature-based tourism resources: Western Lake Van basin, Turkey. Procedia -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19, 198 – 207. https://doi.org/10.1016/j.sbspro.2011.05.124

6. Blei, Andrew Y. Ng, & Michael I. Jordan. (2003).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Volume 3, 993 – 1022. https://doi.org/10.5555/944919.944937

7. Anupriya, P., & Karpagavalli, S. (2015). LDA based topic modeling of journal abstracts. 2015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Computing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s, 1 – 5. https://doi.org/10.1109/ICACCS.2015.7324058

8. Rieger, J., Lange, K.-R., Flossdorf, J., & Jentsch, C. (n.d.). Dynamic change detection in topics based on rolling LDAs.

9. Maier, D., Waldherr, A., Miltner, P., Wiedemann, G., Niekler, A., Keinert, A., Pfetsch, B., Heyer, G., Reber, U., Häussler, T., Schmid-Petri, H., & Adam, S. (2018). Applying LDA Topic Modeling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oward a Valid and Reliable Methodology. Communication Methods and Measures, 12(2 – 3), 93 – 118. https://doi.org/10.1080/19312458.2018.1430754

10. González Martínez, P. (2019). From verifiable authenticity to verisimilar interventions: Xintiandi, Fuxing SOHO, and the alternatives to built heritage conservation in Shanghai.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5(10), 1055 – 1072. https://doi.org/10.1080/13527258.2018.1557235

11. Zhao, X., & Greenop, K. (2019). From 'neo-vernacular' to 'semi-vernacular': A case study of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representation and adaptation in rural Chinese village revitaliz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5(11), 1128 – 1147. https://doi.org/10.1080/13527258.2019.1570544

12. Feng, H., & Xiao, J. (2020). Dynamic Authenticity: Understanding and Conserving Mosuo Dwellings in China in Transitions. Sustainability, 13(1), 143. https://doi.org/10.3390/su13010143

13. Zhu jiali, Yu yafang, & Xiong jian. (2021). Application Analysis of GIS in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China Water Transport, 12(21), 37 – 39. https://www.cnki.net

14. Miao, Y., & Chiou, S.-C. (2013). Study on the Wind Environment of the Architecture Communities: Traditional Typical Min Nan Human Settlements ' Case. Mathematical Problems in Engineering, 2013, 1 – 11. https://doi.org/10.1155/2013/467076

15. Zhu, W., & Shang, F. (2021). Rural smart touris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plus. Ecological Informatics, 65, 101424. https://doi.org/10.1016/j.ecoinf.2021.101424

16. Jacobsen, J. K., Murro, G., Presicce, C. P., Raja, R., & Saxkjær, S. G. (2021). Practicing Urban Archaeology in a Modern City: The Alessandrino Quarter of Rome. Journal of Field Archaeology, 46(1), 36 – 51. https://doi.org/10.1080/00934690.2020.1834255

17. Yao, P. (2016). Research on the space environment characteristic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raditional village in China: Taking Pengzhuang in the northern Jiangsu province as an example. Brazilian Archives of Biology and Technology, 59(spe). https://doi.org/10.1590/1678-4324-2016160543

18. Hsu, C.-H., Lin, H.-H., & Jhang, S. (2020).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in Protected Areas of Rivers and Water Sources: A Case Study of Jiuqu Stream in China. Sustainability, 12(13), 5262. https://doi.org/10.3390/su12135262

19. Xiao Hongwei & Wang Feifei. (2021). Research on Development Impact Assessment for Cultural Landscape of Traditional Village Based on HIAs. Urban Architecture, 18(199), 170 – 173. https://doi.org/10.19892/j.cnki.csjz.2021.22.37

20. Yuan jiali, Lu jiahang, & Chen chi. (2021). 景观基因理论视角下传统村落街巷景观视觉评价以湖南省永兴县板梁古村为例. Journal of 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Natural Science), 42(3), 10 – 23. https://doi.org/10.13914/j.cnki.cn43-1453/z.2021.03.003

环境设计对儿童的艺术疗愈价值与应用研究

——以幼儿园环境设计为例

田成龙[1] 黄艳华[1*]

（1.南宁师范大学，广西 南宁 530001）

摘 要：儿童心理健康问题呈现低龄化趋势，艺术疗愈作为非药物、语言干预手段的应用也日益广泛。幼儿园作为儿童离开家庭后的第一个重要的社会化的、教育的、生活的关键场所，其所具的环境设计品质不仅直接影响了幼儿的心理感受，也将深刻影响幼儿的行为表现，更发挥了幼儿园教育所未能发挥的潜在的艺术疗愈功能。依托于对幼儿园的深入研究，我们将以校园各个生动的场景如：充满童趣的游乐设施、温馨的教室空间、绚烂的走廊文化及充满创意的艺术工坊等为载体,将儿童的生理、心理特点、艺术疗愈的理论以及环境设计学的相关知识等充分的融合起来，对环境设计在缓解孩子的分离焦虑、促进孩子的情绪表达、对孩子的社会交往能力的提升及对孩子的健全的人格的塑造等都作了系统的探讨。通过分析空间布局、色彩搭配、材质选择、艺术装置等设计语言对儿童的积极影响，提出艺术疗愈理念融入幼儿园环境的设计策略与应用路径，为构建“疗愈型”幼儿成长空间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撑。

关键词：环境设计；艺术疗愈；幼儿园；儿童成长；空间优化

基金项目：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校级）环境设计对儿童的艺术疗愈价值与应用研究项目资助(编号：KY25ZQN024)

DOI：doi.org/10.70693/jyxb.v1i4.128

The Art Therapy Value and Application Research of Environmental Design for Children— A Case Study of Kindergarten Environmental Design

Tian Chenglong[1], Huang Yanhua[1*]

1.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1, Guangxi, China

Abstract: Currently, children's mental health issues are showing a younger development trend, and art therapy, as a non-pharmaceutical and non-verbal intervention method, has been increasingly widely applied. As the first important socialized, educationalized and life-oriented venue for children after leaving their families, the quality of kindergarten environmental design not only directly affects young children's psychological feelings and behavioral performance, but also contains potential art therapy functions that are difficult to be replaced by conventional education. Taking kindergarten environment as the research carrier, this paper focuses on core scenarios such as amusement facilities, classroom spaces, corridor culture and art workshops, integrates the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ren, art therapy theories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 knowledge, and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mechanism of environmental design in alleviating young children's separation anxiety, promoting emotional expression, improving social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shaping sound personalities. By analyzing the positive impacts of design languages such as color, lighting and materials on children, this paper proposes design strategies and practical paths for integrating the concept of art therapy into kindergarten environments, 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constructing a "therapeutic" growth space adapted to children's mental health development.

作者简介：田成龙(1990—)，男，讲师，研究方向为环境设计
黄艳华(1991—)，女，讲师，研究方向为环境设计

通讯作者：黄艳华

Keywords: Environmental design; Art therapy; Kindergarten; Children's mental health; Space optimization

Project Fund: Supported by the Project of Improving the Basic Scientific Research Capabilities of Young and Middle-aged Teachers in Guangxi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iversity-level) Research on the Art Therapy Value and Appl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Design for Children (Project No.: KY25ZQN024)

一、引言

随着社会竞争与教育竞争的加剧，学龄前儿童焦虑、社交恐惧等心理行为问题呈逐年上升趋势，已成为影响儿童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艺术疗愈以无侵扰性、趣味性的特点，融入儿童日常所处的物理空间，形成自然、易普及的身心健康干预模式。幼儿园作为儿童每日停留时间较长的场所，其空间布局、色彩搭配、自然景观及文化氛围，对儿童身心状态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当前，传统幼儿园环境设计多侧重安全与基础功能的实现，存在空间布局刻板、缺乏灵动性，艺术教育设施不足、色彩运用单调、自然景观缺失、难以满足儿童情感表达与身心调节需求等问题，未能充分发挥对儿童心理健康的积极作用。

3-6 岁的幼儿园阶段是儿童情绪、社交与人格发展的关键时期，该年龄段儿童对环境具有高度敏感性，其心理发展受环境因素影响显著。充满艺术疗愈设计的幼儿园环境如同“无声的疗愈师”，通过无意识的环境熏陶抚慰儿童心灵，激发创造力、培育积极人格品质。因此，将艺术疗愈理念引入幼儿园室内外环境设计，运用空间布局、色彩搭配、材质选择、艺术作品陈设等设计手法，构建关怀幼儿心灵的成长型环境，不仅能拓展艺术疗愈的应用场景、丰富儿童环境设计领域的研究视角，更能为幼儿园的改造建设提供可直接应用的疗愈性设计方案，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二、核心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一）核心概念界定

1.环境设计：本文所指的幼儿园环境设计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涵盖校园整体规划、室外游乐设施设计、室内教室布局、走廊空间装饰及艺术工坊功能设计等，包括空间布局、色彩搭配、材质选择、艺术装置、植物配置等多个方面，强调以儿童为中心，满足儿童的生理与心理需求。

2.艺术疗愈：艺术疗愈是一种以艺术活动为媒介的心理治疗方式，通过绘画、手工、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帮助个体表达内心的情感与想法，缓解心理压力，调节情绪状态，促进心理平衡与人格健全。在幼儿园环境设计中，艺术疗愈并非指专业的心理治疗，而是通过具有艺术感的环境元素，为儿童提供情感表达与心理调节的空间，潜移默化地促进其心理健康。

3.幼儿园儿童：本文的研究对象为 3-6 岁的幼儿园儿童，这一阶段的儿童认知能力、情绪表达能力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对环境具有较强的敏感性，易受环境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具有丰富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能够与环境产生积极的互动。

（二）理论基础

1.儿童心理学：皮亚杰的儿童认知发展观强调，儿童通过与外界环境的互动实现认知成长，外部环境是影响其认知能力发展的重要因素；埃里克森人格发展理论指出，3-6 岁儿童处于主动感对内疚感的发展阶段，需通过主动探索与社会交往获得成就感，适宜的外部环境有助于健全人格的培育；蒙台梭利的感官教育观认为，儿童在感官敏感期通过多元感官体验，能够有效促进认知能力与心理发展。

2.艺术疗愈理论：艺术疗愈的核心是“表达”与“释放”，通过非药物、语言的方式帮助个体梳理情绪。对于语言表达能力尚未成熟的儿童而言，图像、色彩、形状是其内心世界最直接的表达方式，艺术创作能够呈现个体潜意识，促进潜意识与意识的整合，实现心理和谐。通过艺术创作空间搭建、艺术元素应用及艺术活动开展，可帮助儿童宣泄焦虑、恐惧等负面情绪，表达快乐、希望等积极情感。

3.环境心理学理论：环境心理学研究环境对人类心理与行为的影响，这种影响对幼儿而言更

为强烈。尺度适宜、色彩柔和、采光充足、贴近自然的环境，能够降低儿童应激水平，使其产生舒适感与归属感；而混乱、嘈杂、单调、具有威胁性的环境，则会导致儿童紧张、焦虑，进而表现出攻击性或退缩行为。幼儿园环境设计应聚焦儿童的归属感与愉悦感需求，营造安全、舒适的空间氛围。

三、环境设计对幼儿园儿童的艺术疗愈价值

（一）缓解分离焦虑，构建安全心理环境

3 岁左右儿童进入幼儿园后，与家人分离易引发分离焦虑，表现为哭闹、不愿入园、情绪低落等。凭借对幼儿的环境的艺术处理，不仅可以从空间的造型上为幼儿营造一个相对的安全的“家”，使其能迅速的融入环境中建立起归属感，而且还可以通过对幼儿的情感的联结为其提供情感的寄托，通过对自然的模仿、融入自然的光线、植物的元素等，使幼儿产生宁静、放松的状态，起到消退幼儿的分离焦虑的作用。

（二）促进情绪表达，释放心理压力

幼儿情绪发展尚未成熟，面对挫折、冲突或负面情绪时难以用语言清晰表达，常表现为哭闹、大喊大叫、攻击性行为等。凭借精心的艺术疗愈性环境的设计，不仅可以为孩子们提供多样的情绪宣泄出口，如在“情绪的宣泄角”中为他们配备了绘画的材料、泥塑的玩具、绒毛的玩具等，让他们通过自己的创作或游戏的形式将自己内心中的消极的、难以释放的负面情绪予以宣泄出来；同时也将墙面设置可随意涂鸦的涂鸦墙，既满足了幼儿的创作欲望，又能让其直观的将自己的真实的感受都写出来从而将之都给予了舒缓了自己的压力；同时也将打造专门的艺术的工作坊为孩子们提供了丰富的艺术的材料与创作的形式，使得他们在专注的创作中忘却了不良的的情绪。

（三）培养社交能力，促进同伴互动

幼儿园是儿童社交能力发展的关键场所，良好的环境设计能有效促进同伴互动与社交技能提升。开放式教室布局与灵活摆放的桌椅，为幼儿开展小群体活动和合作游戏提供了广阔空间，有效激发其交往行为。户外多人滑梯、沙池、跷跷板等互动性游艺设施，为幼儿培养共事、合作、协商等社会交往能力奠定基础。通过走廊展示幼儿合作创作作品、集体生活照等，强化了幼儿的集体认知，促进同伴间的相互支持与帮助。艺术工坊中开展大班幼儿合作创作活动，如共同完成大型绘画、手工艺品制作等，助力幼儿在实践中学会表达观点、分工协作，加深彼此的理解与接纳。

（四）健全人格发展，激发创造力与想象力

艺术疗愈性环境设计为儿童提供自由探索与自主创作的空间，助力人格健全发展。丰富的自然艺术元素（如多元色彩、趣味形态、天然原生态材料），不仅满足幼儿的求知欲与探究欲，也为其艺术创作提供充足素材。艺术工作室配备的颜料、布料、废旧物品等材料，鼓励幼儿大胆尝试、自由创作，有效增强其创造性。种植区、宠物饲养角等自然景观设计，让幼儿近距离接触自然、感悟生命多样性，进而培养关爱生命、爱护自然的意识与社会责任感。同时，通过对幼儿作品的保护与展示，给予其充分认可与鼓舞，助力增强自信心，促进健康人格发展。

四、幼儿园核心场景的疗愈性环境设计策略与应用

幼儿园疗愈性环境设计应遵循安全策略、感官策略、自主参与策略与生态化策略四大核心原则，从多维度保障幼儿情绪健康。家具设计融入幼儿身形、视觉、听觉、触觉等多感官需求，以环抱式设计营造“被怀抱的安全感”。在保障教师视线全覆盖的前提下，预留充足自主调整与改造空间，兼顾幼儿的安全感受与探索需求。设计将色彩层次变化与触觉、听觉体验相结合，针对不同年龄段幼儿触发多感官感知：融入风铃、流水声等悦耳音效并配备静音调节功能，提供柔软、绒面等多元触感材料，搭配薄荷、薰衣草等芳香植物，为多感官训练创造良好条件。同时，通过可移动、拆装的家具与遮挡物，鼓励幼儿自主参与空间创设；预留个人物品与作品展示空间，充分尊重和肯定幼儿的个性与创作成果。设计优先利用自然光照、通风与植物绿化，让儿童通过感官体验与手工劳作感受自然之美。

（一）校园整体环境建设：构建自然、包容的疗愈空间

幼儿园校园整体环境作为幼儿活动的基础载体，应遵循自然性、包容性、安全性原则，打造触动幼儿内心的疗愈空间。空间布局避免生硬规

整的设计，采用圆润型、不规则形等富有弹性的布局，营造轻松自由的氛围；科学划分游戏区、种植区、运动区、休息区等功能区域，丰富幼儿活动形式；色调选择以自然、温馨、淡雅的暖色调为主，如米白色、浅绿色、淡蓝色、暖黄色等，避免过于鲜艳刺眼的色彩，同时以少量亮色点缀，唤起幼儿活力；材料选用自然、环保、柔软的木材、竹材、棉织物等，减少金属、塑胶等生冷材质的使用，地面铺装优先选择防滑、柔软的地胶、木地板或草坪，降低摔伤风险；植物配置以本地植被为主，涵盖花卉、灌木、乔木、草本植物等，打造四季有景的景观，设置幼儿可参与的种植区，让其亲历植物生长过程，增强责任意识与观察力，适当配置喷泉、水溪等小型水景，以流水与水声稳定幼儿情绪。

（二）游乐设施设计：打造互动、探索的疗愈性游戏空间

以参与、探索、治愈为一体的幼儿园游乐设施的设计不仅能满足幼儿的玩乐的需要，还能在游戏的过程中为幼儿带来舒缓情绪、促进交往、发挥创造力的教育作用。幼儿园娱乐设施设计需强化互动性与探索性，以替代单一标准化设备：配置多人滑梯、秋千、跷跷板、沙坑、水床等互动设施，满足幼儿合作需求与探索欲望，助力其在挑战中获得自我认同。形式上采用圆润萌态造型，规避尖锐棱角，色彩选用粉红色、黄色、绿色等明亮温和色调，搭配卡通形象与自然元素装饰，提升趣味性与艺术性。布局上按年龄划分专属活动区域，避免跨龄冲突，设施间预留充足活动空间以防拥挤，并在设施旁设置配备桌椅与遮阳伞的休息区，方便幼儿中途休憩。安全层面严格遵循国家相关标准，选用环保无毒材料，优化设施结构设计，下方铺设橡胶地垫、草坪等防摔设施，设置醒目安全警示标语，全面保障幼儿活动安全。

（三）教室环境设计：营造舒适、自主的疗愈性学习空间

教室作为幼儿主要的学习与生活场所，应按照舒适化、自主化、互动化原则，打造具有疗愈功能的空间。教室环境设计采用开放式与半开放式融合的布局，打破传统整齐排列的桌椅形式，创设学习区、游戏区、阅读区等多元功能区域，满足幼儿多样化活动需求。选用趣味儿童坐具、桌椅可拆分、可组装的灵活款式，便于空间调整，为幼儿合作学习与游戏提供支持。色彩设计以白色、米色、浅蓝色等浅色调作为墙面与天花板底色，通过窗帘、地毯、教学用品融入少量暖色调，既弥补空间阴冷感，又能借助色彩区分不同功能区域，帮助幼儿建立清晰的空间认知。材料选用天然健康的木料制作桌椅教具，地面铺设木地板或防滑地胶，墙面采用环保乳胶漆或墙纸，软装饰选用柔软透气材质，大幅提升幼儿舒适度。装饰元素以幼儿自创作品为主，展示绘画、手工、书法等作品，或用树枝、树叶等自然素材制作装饰画，既强化幼儿的归属感与荣誉感，也为作品展示提供良好载体。阅读区配备舒适沙发、靠垫、地毯及丰富绘本，营造温馨安静的阅读氛围；情绪宣泄角配备绘画工具、黏土、毛绒玩具、沙袋等，方便幼儿及时宣泄不良情绪。

（四）走廊文化建设：打造互动、展示的疗愈性过渡空间

走廊作为幼儿园功能区域的过渡空间，应充分挖掘其利用价值，打造兼具互动性、展示性与疗愈性的文化空间。空间利用上，打破“单纯通道”的定位，划分展示空间、互动空间、阅读空间等，墙面设置可移动展示板、涂鸦墙、留言板等，为幼儿提供作品展示与交流平台；展示内容以幼儿作品为主，涵盖绘画、手工、书法、摄影等，定期更换并保障每个幼儿的展示机会，增强其自我认可度与自信心，展示形式采用悬挂、粘贴、摆放等多种方式，适当搭配灯光效果，结合节日、季节、环保等主题活动丰富展示内容；互动设计方面，墙面设置涂鸦板、磁性贴、拼图墙等互动设施，打造“同伴赞美墙”鼓励幼儿以绘画、文字等形式表达对同伴的赞美与感谢，地面绘制跳格子、迷宫等图案，增加走廊空间的趣味性；色彩与装饰上，墙面色调与教室及校园整体环境协调，以明亮温和为主，融入植物、手工编织品、贝壳风铃等自然元素，顶部悬挂彩色气球、纸灯笼、彩带等，增强空间层次感。

（五）艺术工坊设计：构建专业、自由的疗愈性创作空间

艺术工坊作为艺术教育与艺术疗愈的核心空间，设计应注重专业性、自主性与安全性，让孩子们在自由创作中表达自己情感、发挥无限创造力。艺术工坊需通过合理空间布局实现与外界的

物理隔离，内部按功能科学划分创作区、材料区、展示区、休息区。创作区配备充足的团体及个人工作桌椅，材料区将绘画、手工、综合类材料按性质分类摆放，方便取用；展示区集中陈列幼儿作品，既为作品提供专属展示平台，也能增强幼儿自信心、激发创作热情。材料选用涵盖颜料、画笔、纸张、黏土、布料、废旧物品、木材、石头等多元类型，全程确保安全无毒。设备配置上，配备绘画架、雕塑台、黏土烤炉等专业设施，安装充足均匀且无直射的照明灯具，增设通风设施保障空气清新，全方位营造浓厚的艺术创作氛围。

六、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幼儿园为研究切入点，系统探究环境设计对儿童的艺术疗愈价值与应用方法，得出以下结论：其一，环境设计对幼儿园儿童具有重要的艺术疗愈作用，能够有效缓解分离焦虑、促进情绪表达、培养社交能力、助力健全人格养成；其二，幼儿园核心场景的疗愈性环境设计需遵循特定原则，校园整体环境应打造自然包容的空间，游艺设施应构建互动探索的游戏空间，教室应营造舒适自主的学习空间，走廊应打造互动展示的过渡空间，艺术工坊应构建专业自由的艺术创作空间；其三，优秀的幼儿园疗愈性环境设计实例表明，自然元素、艺术元素、互动元素的融入以及对儿童需求的充分考量，是设计成功的关键要素。

（二）研究不足与展望

研究不足：尽管对幼儿园的环境设计的艺术的疗愈的价值以及其在教育中的有效的应用策略都作了较为系统的探讨，但仍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例如；实地调研的幼儿园数量有限，样本代表性不足；对环境设计疗愈效果的评估缺乏量化研究，难以准确衡量环境设计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程度。

未来研究可从四方面推进：扩大调研范围与样本量，提高研究结果的普适性；采用问卷法、心理测试法等量化手段，精准测量环境设计的疗愈功能；借助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创新疗愈环境设计思路；深化与幼儿园、家长及心理专业人士的合作，推动疗愈性环境设计理念的实践推广，更好地促进幼儿身心健康成长。

综上所述，幼儿园环境设计不仅是空间重塑与装修工程，更是关照儿童心理需求的空间解构过程。将艺术疗愈理念融入幼儿园环境设计，打造兼具功能性、艺术性与疗愈性的成长空间，是未来幼儿园环境设计的发展趋势。期望本研究能为幼儿园环境设计提供有益参考，推动幼儿园空间的优化升级，让每一位幼儿都能在健康、舒适、充满爱的空间中茁壮成长。

参考文献：

[1] 夏缓缓，王鹏，曹力，俞兰. 环境心理学视域下幼儿园室内空间设计优化策略研究——以南京市江宁区某幼儿园为例.中国建筑装饰装修 . 2025 (07) .

[2] 罗琴，夏月. 儿童视角下幼儿园户外活动区环境设计策略.鞋类工艺与设计. 2025 ,5 (14) .

[3] 徐彤. 浅析幼儿园环境设计的发展历程. 中国建筑装饰装修. 2024 (04) .

[4] 赵丽荣. 幼儿园教育活动中色彩运用对儿童情绪调节的影响.色彩. 2025 (08) .

[5] 林一. 艺术疗愈对人类心理健康的前置性干预.中国艺术. 2025 (05).

[6] 李玉，英王经纬. 浅谈色彩在幼儿园空间环境设计中的应用. 2019 年南国博览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二）

星火大模型赋能高职商科教师专业发展的路径研究

韩峰[1，2]李荔[3，4]辛田静[2]

（1.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宁波 315012，2.泰国清迈大学，泰国 清迈 50200，
3.宁波市鄞州区东钱湖镇中心小学，浙江，宁波，315012， 4. 湖北师范大学，湖北，黄石，435002）

摘 要：2025 年 11 月，中国教育部发布《教师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指引（第一版）》，标志着教师 AI 应用进入规范化阶段。高职商科教师面临教学资源与产业脱节、学情分析精准度不足、科研应用能力薄弱等现实困境。本文基于人机协同理论与职业能力本位教育理论，构建“学教育评管研”六维应用框架，阐述科大讯飞星火大模型在高职商科教师专业发展中的应用路径。研究以市场营销、电子商务、跨境电商、国际贸易、商务数据分析等专业为主要案例，为高职商科教师 AI 应用提供理论框架与实践指导。

关键词：人机协同理论；AI 素养；高职商科；教师专业发展；星火大模型

基金项目：2025 年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数字商务学院重点科研课题（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

DOI: doi.org/10.70693/jyxb.v1i4.129

Spark Model Empower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Business Teachers: A Pathway Study

Feng Han[1, 2], Li Li[3, 4], Tianjing Xin[2]

[1] Zhejiang Business Technology Institute, Ningbo, China
[2]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Digital Innovation, Chiang Mai University, Chiang Mai, Thailand

[3] Dongqian Lake Central Primary School, Yinzhou District, Ningbo, China
[4] Hu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ngshi, China

Abstract: In November 2025, China's Ministry of Education issued the Guidelines for Teachers' Application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irst Edition), marking the entry of teacher AI application into a standardized phase. Business teacher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face practical challenges including disconnection between teaching resources and industry demands, insufficient precision in learning analytics, and weak research application capabilities. Based on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theory and competency-based education theory,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six-dimensional application framework of "Learning-Teaching-Education-Evaluation-Management-Research" to elaborate the application pathways of iFLYTEK's Spark Model in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business teacher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Taking marketing, e-commerce, cross-border e-commerce,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business data analytics as main cases, this research provides theoretical framework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AI applications among business teacher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Keywords: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Theory; AI Literacy; Vocational Business Education;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park Model; Application Guidelines

作者简介：韩 峰(1988—)，男，博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为 AI 赋能高职教育、直播营销；
李 荔(1990—)，女，硕士研究生，英语专任教师，研究方向为课程与教学论；
辛田静(1989—)，女，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人工智能、数字创新赋能教育应用研究。
通讯作者：韩 峰

一、引言

2025 年 11 月，中国教育部教师队伍建设专家指导委员会发布《教师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指引（第一版）》，为教师 AI 应用提供了规范框架。该指引明确提出“助力学习变革、助力教学提质、助力育人进阶、助力评价增效、助力管理升级、助力研究创新”六大应用场景，标志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从概念探索走向规范实施。科大讯飞星火大模型作为国内领先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在教育领域展现出显著应用潜力。科大讯飞教育技术研究院发布的《2024 智能教育发展蓝皮书——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应用》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将为教育带来深刻变革，但当前教育应用仍处于探索阶段，迫切需要构建系统化的应用框架[1]。

高职商科教育具有鲜明的职业导向特征，其培养目标直接对接市场营销、电子商务、跨境贸易、商务数据分析等具体岗位。这些岗位的能力要求随产业发展快速迭代，要求教师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将企业真实场景引入课堂，培养学生的岗位适应能力。然而，现实中多数教师难以实时掌握产业动态，教学资源更新相对滞后，学情分析在产业岗位维度的精准匹配上存在不足，科研聚焦应用场景的深度有待提升。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摆脱这些困境提供了新的可能，但如何构建符合高职商科特点的 AI 应用框架，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构建“职业教育+生成式 AI+教师发展”的交叉研究框架。现有研究多聚焦 AI 技术本身或通识教育应用，较少关注职业教育的特殊性。本文基于中国教育部《指引》，结合人机协同理论与职业能力本位教育理论，构建六维应用框架，弥补了现有研究对高职商科教师 AI 应用缺乏系统性指导的不足。

本研究的实践意义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为高职商科院校提供可操作的 AI 赋能方案，推动《指引》在职业教育领域的落地实施；第二，为教师提供清晰的 AI 应用路径，满足专业发展的实际需求；第三，为产教融合提供技术支撑，推动校企协同育人模式创新。

二、理论基础与政策依据

（一）人机协同理论：明确 AI 与教师的分工边界

人机协同理论强调人类智能与机器智能的优势互补[2]。人类擅长创造性思维、情感交流、价值判断，机器擅长数据处理、模式识别、重复性工作。何静[3]指出，AI 协同的核心在于 AI 负责流程化、重复性高的基础工作，而人则专注于创意构思、审美调校、伦理审查与价值挖掘等环节。

在教育场景中，人机协同要求明确教师与 AI 的分工界限。AI 可以承担数据采集、信息检索、资源生成等辅助性工作，而教师则应聚焦学情解读、教学设计、价值引领等核心工作。对于高职商科教师而言，人机协同意味着将星火大模型作为智能助手而非替代工具。当教师运用星火进行学情数据分析时，需要结合自身的教学经验对数据结果进行专业解读；当教师借助星火生成教学案例时，需要基于产业认知对案例的真实性与适用性进行审核。这种分工模式既能提升工作效率，又能保障教育的专业性与价值引领。

（二）职业能力本位教育理论：锚定高职商科的育人目标

职业能力本位教育理论（Competency-Based Education， CBE）起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北美职业教育改革，强调以岗位职业能力为核心组织教学。该理论认为，职业教育的根本目标是培养学生胜任特定岗位的综合能力，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评价标准均应围绕职业能力展开[4]。

高职商科教育具有典型的职业能力本位特征。市场营销专业对接市场调研、品牌策划、渠道管理等岗位，电子商务专业对接平台运营、直播带货、数据分析等岗位，跨境电商专业对接跨境选品、海外营销、合规管理等岗位，商务数据分析专业对接商业智能分析、数据可视化等岗位。每个岗位都有明确的职业能力标准。CBE 理论对 AI 赋能教师发展具有重要启示：“学教育评管研”的所有环节都应围绕职业能力展开，星火大模型的功能需要精准对接具体的岗位能力标准，从而确保技术应用服务于职业人才培养的核心目标。

（三）中国教育部《指引》：政策框架与实践规范

中国教育部《教师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指引（第一版）》为教师 AI 应用提供了系统化的政策框架。《指引》提出的六大应用场景——助力学习变革、助力教学提质、助力育人进阶、助力评价增效、助力管理升级、助力研究创新，涵盖了教师专业发展的全流程，为 AI 赋能教师提供了明确方向[5]。

同时，《指引》提出六大规范要求：坚持育人主体地位、加强内容审查把关、恪守学术创作伦理、引导学生规范使用、合规合法处理数据、

践行技术智能向善。这些规范明确了教师 AI 应用的底线与边界，确保技术应用符合教育伦理与法律法规。对于高职商科教师而言，《指引》提供了“应用场景”与“规范要求”的双重指导，是构建 AI 素养框架的政策依据。

三、“学教育评管研”六维应用框架

本研究基于中国教育部《指引》提出的六大应用场景，构建“学教育评管研”六维应用框架。该框架以职业能力培养为目标，以人机协同为原则，系统阐述星火大模型在高职商科教师专业发展中的应用路径。

（一）学：助力学习变革——个性化学习支持

《指引》要求支持对话式、个性化、协作探究等学习方式，推动学生向知识建构与创新者转变。高职商科学生的知识基础参差不齐，职业兴趣高度分化，传统学情分析方法难以精准评估学生的职业适配度。星火大模型的多模态数据处理能力可以整合教学数据、职业数据、赛事数据等多源信息，构建立体化的学情画像系统。

应用路径设计

学情精准画像方面，教师可以借助星火大模型或基于星火构建的星辰智能体，整合学生的课堂互动、作业成绩、职业测评、企业实习反馈等数据，生成“知识短板- 职业适配度- 提升建议”三维报告。这一应用代表了未来教育数据分析的发展方向，虽然当前完整的系统化应用尚在探索阶段，但技术基础已经具备，部分院校已开始试点实践。

个性化学习路径规划方面，教师基于学情画像结果，可以利用星火为不同学生定制差异化学习任务，精准推荐学习资源。智能学习陪伴与答疑方面，星火通过对话式交互，能够为学生提供实时学习支持，解答专业问题，引导深度思考。

应用案例

市场营销专业教师运用星火大模型对班级学生进行学情分析，发现多数学生在消费者行为分析模块表现优异，但在数字营销工具应用方面存在短板。基于分析结果，专业教学团队及时调整教学安排，增加了社交媒体营销、搜索引擎优化等实训模块，学生的岗位适配度得到显著提升。

电子商务专业教师利用星火大模型构建个性化学习系统，根据学生的职业倾向，为运营倾向学生推送店铺诊断案例，为设计倾向学生推送视觉创意资源，为数据倾向学生推送数据分析工具教程，实现了精准化学习支持。

AI 协同机制

在这一维度中，AI 负责数据采集、整合与初步分析，教师负责学情深度解读、学习方案设计与个性化指导。教师需要对 AI 生成的学情报告进行批判性审查，结合教学经验做出专业判断，确保分析结果的准确性与教育价值。

（二）教：助力教学提质——场景化教学创新

《指引》要求优化教学设计、学情分析、课件制作、课堂互动、作业设计等环节，探索大规模因材施教和人机协同教学的有效路径。高职商科教学的关键在于将产业真实场景引入课堂，培养学生的岗位实践能力。星火大模型基于企业数据与行业知识库，能够生成场景化的教学资源，推动课堂教学模式创新。

应用路径设计

岗位场景化资源生成方面，教师根据岗位能力标准，可以使用星火生成市场调研问卷、品牌策划方案、营销策划书、跨境平台规则解读、商务数据分析报告等教学资源。虚拟仿真教学环境搭建方面，教师结合虚拟现实技术，借助星火的场景描述能力，能够创建商务谈判室、直播间、跨境平台操作界面等高度仿真场景。智能教学助手应用方面，星火可以实时分析课堂互动数据，为教师提供教学建议，辅助动态调整教学策略。

应用案例

市场营销专业教师在“品牌策划”课程中引入星火大模型，利用星火生成新兴品牌的市场定位分析案例，案例包含目标市场分析、竞争对手研究、品牌差异化策略等内容。学生分组进行案例分析，提出品牌传播方案，星火系统实时评估方案的可行性，而教师则聚焦于引导学生思考品牌价值观与消费者情感连接，实现了技术辅助与人文引领的有机结合。

跨境电商专业教师创建虚拟跨境平台操作场景，学生在虚拟环境中完成选品上架、物流配置、客户沟通等完整流程。系统根据学生的操作准确性、响应速度、沟通技巧进行综合评价，教师查看系统生成的学生能力报告后，针对薄弱环节进行个别辅导，提升了实训教学的针对性与有效性。

AI 协同机制

在这一维度中，AI 负责场景生成、素材制作与客观数据分析，教师负责教学目标设定、课堂互动引导与价值观教育。教师需要对 AI 生成的教学资源进行“产业真实性+价值观”双重审核，确保

资源符合教学需要，同时避免内容失真或价值偏差。

（三）育：助力育人进阶——全面发展支持

《指引》要求在品德、体育、美育、劳动、心理健康等方面拓展育人途径，在坚守育人主导地位的基础上发挥技术辅助优势。高职商科育人的核心在于培养学生的职业精神、商业伦理与工匠精神。星火大模型可以辅助构建商业伦理案例库，开展职业素养测评，进行心理健康动态监测。

应用路径设计

商业伦理案例库构建方面，教师基于企业真实案例，可以利用星火生成涉及诚信营销、数据隐私、公平竞争等主题的伦理情境，辅助开展价值辨析与行为引导。职业素养测评与引导方面，星火通过问卷调查、行为观察等方式，能够评估学生的职业态度、团队协作、抗压能力，生成职业素养报告，为教师提供育人参考。心理健康动态监测方面，星火可以分析学生的学习投入、情绪表现、社交状态，识别潜在心理问题，为早期干预提供数据支撑。

应用案例

市场营销专业教师在“营销伦理”教学中使用星火生成虚假广告案例，案例描述企业夸大产品功效进行宣传，导致消费者投诉的情境。学生分析案例，讨论企业社会责任与短期利益的平衡关系，教师在讨论中强化诚信营销理念，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意识，实现了技术工具与育人目标的深度融合。

电子商务专业教师利用星火大模型进行职业素养测评，星火分析学生在小组项目中的沟通表现、任务完成度、冲突处理方式，生成职业素养雷达图。教师根据报告开展针对性的职业指导，帮助学生提升团队协作能力，促进了学生职业素养的全面发展。

AI 协同机制

在这一维度中，AI提供案例资源与数据支持，教师主导价值引领与情感教育。教师必须亲自完成德育活动实施，不得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为最终答案。对于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教师应基于教育经验与专业判断给予人文关怀，AI 仅作为辅助识别工具，不能替代教师的情感支持与专业指导。

（四）评：助力评价增效——智能评价系统

《指引》要求通过人机协同实施作业批改、学业诊断、试题命制与量规设计，提升评价的客观性、时效性与育人价值。高职商科评价的核心在于评估学生的岗位能力达成度。星火大模型可以辅助教师进行过程性评价、智能批改与能力诊断。

应用路径设计

过程性评价数据采集方面，星火可以记录学生的课堂互动、作业提交、实训操作等数据，形成完整的学习档案。智能批改与反馈生成方面，对于客观题，星火能够实现自动批改与即时反馈；对于主观题，星火可以进行初步评分并生成改进建议，教师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度点评，形成人机协同的评价模式。能力诊断报告生成方面，星火根据评价数据，能够生成学生的能力雷达图，直观呈现能力优势与短板，为个性化指导提供依据。

应用案例

商务数据分析专业教师在“数据分析报告”作业评价中使用星火大模型，星火根据评价标准，对学生报告的数据准确性、图表规范性、分析逻辑性进行初步评分。教师在系统评分基础上，重点评价学生的商业洞察力与决策建议的可行性，形成综合性反馈，实现了效率提升与质量保障的双重目标。

市场营销专业教师利用星火生成学生能力雷达图，雷达图包含市场调研能力、消费者分析能力、品牌策划能力、渠道管理能力、数字营销能力等维度。教师根据雷达图，为每个学生制定个性化能力提升方案，推动了精准化教学的实施。

AI 协同机制

在这一维度中，AI 负责客观题批改、数据统计与初步评分，教师负责主观评价、深度反馈与能力诊断。教师不得直接将 AI 对作文、艺术作品、开放性作业的自动批改结果作为学生最终评价，必须进行人工复核与专业判断，确保评价的公正性与教育性。

（五）管：助力管理升级——智能管理平台

《指引》要求优化班级、校务、家校协同等管理流程，增强管理的科学性、精准性与有效性。高职商科管理的特殊性在于需要协调企业实习、校企合作、就业指导等环节。星火大模型可以辅助教师进行班级事务处理、实习过程跟踪、就业数据分析。

应用路径设计

班级事务智能处理方面，星火能够自动生成班级活动方案、周报通知，优化班级管理流程，减轻教师事务性工作负担。实习过程动态跟踪方面，星火可以整合企业反馈、实习日志、指导教师评价，生成实习质量报告，帮助教师及时掌握

学生实习状态。就业数据分析与匹配方面，星火能够分析就业市场需求，结合学生能力画像，推荐适配岗位，提升就业指导的精准性。

应用案例

专业教师建立基于星火的实习管理系统，系统实时收集学生在电商企业的实习数据，包括岗位类型、工作任务、企业评价等信息。教师通过系统监测学生实习状态，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远程指导，系统生成的实习质量报告为专业改进提供了数据支撑，提升了实习管理的效能。

AI 协同机制

在这一维度中，AI 负责信息整理、流程优化与数据分析，教师负责决策判断、学生指导与人文关怀。教师在处理学生异常行为时，应基于教育经验进行深度分析，AI 生成的预警报告仅作为参考，不能替代教师的专业判断与教育智慧。

（六）研：助力研究创新——科研能力提升

《指引》要求开展基于证据的教学反思、个性化知识更新与创新性课题研究，提升教育教学研究能力与专业发展水平。高职教师的科研具有鲜明的应用导向，聚焦教学改革、产教融合、岗位能力标准等实践问题。星火大模型可以承担文献检索、数据整理、框架生成等辅助性工作，让教师将有限精力聚焦于研究设计与成果凝练。

应用路径设计

文献智能检索与综述方面，教师根据研究主题，可以利用星火自动检索相关文献，提取核心观点，生成结构化的文献摘要，提升文献梳理效率。产业数据采集与分析方面，星火能够从企业年报、行业报告、政府统计公报中提取相关数据，生成数据图表，为研究提供实证支撑。研究成果撰写辅助方面，星火可以生成论文框架、教改方案初稿，教师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度修改与学术提升，优化研究成果质量。

应用案例

市场营销专业教师在开展“新媒体营销教学改革”课题研究时，利用星火进行文献检索与综述。星火快速检索近年来相关研究，提取核心观点，生成文献综述框架。教师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度阅读与学术判断，完善文献综述内容，显著提升了科研效率。同时，教师在论文中明确标注：“本部分文献梳理借助星火大模型进行检索与初步整理，作者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学术审查与观点补充”，体现了学术规范与诚信意识。

AI 协同机制

在这一维度中，AI 负责文献检索、数据处理与框架生成，教师负责研究设计、学术判断与成果凝练。教师必须对 AI 生成的文献综述进行学术审查，避免遗漏重要文献或误读文献观点。教师在论文写作中，应对 AI 生成内容进行实质性修改，明确标注 AI 使用环节，确保论文体现自己的学术思考与独立见解，维护学术诚信。

四、结论与展望

（一）主要结论

本研究基于中国教育部《教师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指引（第一版）》，结合人机协同理论与职业能力本位教育理论，构建了“学教育评管研”六维应用框架，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学教育评管研”六维框架有效对接《指引》的六大应用场景，系统阐述了星火大模型在高职商科教师专业发展中的应用路径。六个维度相互支撑、协同推进，形成了从学习支持、教学创新、育人引领、评价改革、管理优化到科研提升的完整闭环。该框架突出了高职商科的职业导向特征，将 AI 应用与岗位能力培养紧密结合，为高职商科教师 AI 素养培育提供了系统化指导。

第二，AI 协同机制是实现高质量应用的关键。基于人机协同理论，本研究明确了 AI 与教师的分工边界：AI 负责流程化、重复性高的基础工作，教师专注于创意构思、审美调校、伦理审查与价值挖掘。这种协同模式既提升了工作效率，又保障了教育的专业性与价值引领，避免了教师主体性丧失与过度技术依赖的风险。

第三，技术应用必须坚守教育本质。在“学教育评管研”各维度的应用中，教师始终是教育教学的主导者，AI 仅是辅助工具。特别是在育人、评价等涉及价值判断与情感交流的环节，教师的专业判断与人文关怀不可替代。技术应用应服务于教育目标，而非主导教育过程。

（二）实践启示

对高职院校而言，应将《指引》落地实施纳入学院发展规划，系统推进 AI 赋能教师专业发展。院校需要建立 AI 工具评估与准入机制，选择适配高职商科教学的技术平台；制定校本 AI 使用管理办法，明确应用场景与规范要求；建立教师培训体系，提供针对性支持；推动产教融合，联合企业与 AI 平台共同开发岗位真实场景的教学资源。

对商科教师而言，应主动适应数字化转型趋势，从“工具使用者”向“AI 协同者”转型。教师需要系统学习《指引》要求，理解六大应用场景的内涵与实施路径；明确 AI 与人的分工边界，将

AI 作为提升效率的助手，而非替代思考的工具；保持对 AI 生成内容的批判性审查，发挥专业判断力，确保教学质量与科研水平；将 AI 伦理融入日常教学，通过言传身教培养学生的技术价值观。

对企业与 AI 平台而言，应深度参与职业教育的数字化转型。企业需要开放真实的业务数据与岗位场景，支持教学资源开发与学生实训；AI 平台需要根据职业教育特点，开发定制化功能，如商科案例库、岗位能力标准对接、实训场景生成等；平台应提供符合教育标准的数据保护方案，建立专业化、常态化的技术支持服务体系；积极参与教育行业应用标准制定，推动形成行业共识。

（三）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存在两方面局限：第一，案例分析主要基于理论推演与文献研究，缺乏大规模实证数据支撑；第二，研究未涉及 AI 赋能的长期效果追踪，缺乏对教师 AI 素养发展轨迹的纵向研究。

未来研究可以从三个方向深化：第一，探索“星火+岗课赛证”的深度融合模式，研究如何利用 AI 辅助技能大赛训练、职业资格证书备考、岗位实习指导，形成全流程的 AI 赋能方案；第二，开展 AI 应用标准体系研究，基于《指引》框架，研制高职商科 AI 应用的具体标准，包括工具选择标准、资源开发标准、使用规范标准、效果评价标准；第三，拓展 AI 赋能在产教融合项目中的应用，研究如何利用 AI 技术推动校企协同育人、科研成果转化、社会服务创新，构建“教育- 产业- 科技”融合发展的新生态。

参考文献：

[1] 讯飞教育技术研究院. 2024 智能教育发展蓝皮书——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应用[R]. 2024.

[2] 陈莺, 蒋艳双, 马啸天, 等. 人机协同教学中智能体应用:场景适配、价值意蕴与困境超越[J]. 中国电化教育, 2025(11): 26-33.

[3] 何静. 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实战[M].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25.

[4] 钱乃余, 王家敏. 基于职业教育能力本位的教育观[J]. 职教论坛, 2013(2): 4-6.

[5] 教师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指引（第一版）[EB/OL]. [2025-11-28]. https://www.edu.cn/xxh/focus/zc/202511/t20251128_2704300.shtml.

成都工业遗产的价值

郑毅凡 [1] 张程 [1]

（1.成都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四川 成都 610000）

摘 要：工业遗产是工业发展过程中所留下的重要物质遗存，具有历史、科技、文化、美学、经济等多方面的价值。它见证了地区历史发展的脉络，创造的科技价值影响至今，具有凝聚文化认同、进行文化传承的重要作用，承载的美学理念为工业建筑的美学研究提供了思路，蕴含的经济能力为城市经济发展拓宽了道路。成都市，作为20世纪中国西部地区的重要工业基地，其工业遗产同样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然而，工业遗产占地与城市迅速发展的冲突使得工业遗产向城市发展让步，导致许多本应该闪耀着工业文明光辉的遗存沦为工业废墟，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究其根本是对于成都工业遗产价值深度挖掘的缺失。深入探讨成都工业遗产在历史、科技、文化、美学和经济方面的价值，增强成都工业遗产的社会重视度，不仅对于实现成都工业遗产具有生命力的再生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于成都市的可持续发展也具有深远影响。

关键词：成都工业遗产;工业遗产价值;工业遗产再生

基金项目：成都大学 2024 年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项目编号：CDUCX2024683）

DOI：doi.org/10.70693/jyxb.v1i4.131

The value of Industrial Heritage in Chengdu: exploring the historical, technological, cultural, aesthetic and economic value of Industrial Heritage

Zheng yifan[1], Zhang cheng[1]

1.Chengdu University，Chengdu Sichuan,China

Abstract:Industrial heritage refers to the significant material remnants left behind during industrial development, encompassing historical, technological, cultural, aesthetic, and economic values. It bears witness to the historical trajectory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with its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continuing to exert influence to this day.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fostering cultural identity and facilitating cultural transmission, embodies aesthetic concepts that provide guidance for the study of industrial architecture, and carries economic potential that broadens the avenues for urban economic growth. Chengdu, as a major industrial base in western China during the 20th century, similarly possesses industrial heritage of immeasurable value. However, conflicts between the land occupied by industrial heritage and rapid urban development have led to industrial heritage yielding to urban expansion, resulting in many remnants—once shining embodiments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falling into ruin, causing incalculable losses. Fundamentally, this stems from a lack of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e value of Chengdu's industrial heritage. Thoroughly examining the historical, technological, cultural, aesthetic, and economic value of Chengdu's industrial heritage and enhancing societal recognition of it is not only crucial for ensuring the revitaliz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of these heritage sites, but also holds profound implication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engdu.

Keywords:Chengdu Industrial Heritage;Value of Industrial Heritage;Industrial Heritage regeneration

作者简介：郑毅凡（2005-），女，本科，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汉语言文学学生；
张 程（1990-），男，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汉语词类汉语语法、工业遗产。

通讯作者：郑毅凡

一、历史价值

成都市，作为 20 世纪中国西部地区的重要工业基地，孕育了丰富的工业景观资源。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空间的扩张与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再利用成为了城市景观更新与文化记忆保存的关键。谭玉清（2023）在其研究中对成都市工业遗产景观的美景度进行了评价，指出工业遗产不仅是城市景观的一部分，更是城市文化记忆的重要组成[1]。根据德国历史学家扬 · 阿斯曼提出的文化记忆理论，文化记忆具有跨越时空的特性，能够唤起人们对工业时代的深刻记忆，成为独一无二的历史印记[2]。成都市的工业遗产正是这样一种跨越时空的存在，它不仅反映了成都工业化的曲折进程，也映证了工业在成都市发展历史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建筑不仅是时代的产物，更是时代的镜像。自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先进技术的冲击，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中国社会显得尤为被动与脆弱。在民族危机的背景下，众多仁人志士开始探索救亡图存之路，其中重要的一环便是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这一历史抉择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而成都的工业遗产正是这一历史进程的实物见证。以四川机器局为例，该局创办于 1877 年，次年即开工生产，其厂房位于成都市东南郊下莲池，共建有 188 间西式厂房，标志着成都西式厂房的出现[3]。四川机器局等工业遗址不仅展现了当时的技术水平，更揭示了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以及中国人民在压迫下的反抗决心，从而被赋予了更为深远的历史价值。

作为历史性传统城市，在近代化的过程中，成都农业文明的历史优势逐渐弱化，发展进程显得尤为艰难与迟缓。直至 1949 年，成都的工业仍显得相对薄弱，仅以“三根半烟囱”象征其工业发展，这无疑是城市现代化转型艰难历程的真实写照[3]。这些遗产不仅见证了成都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更承载了城市艰难发展的历史记忆。它们如同一部部生动的历史教科书，让人们能够回顾过去，了解成都工业发展的艰辛与辉煌，同时也为未来的城市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

新中国成立后，成都的工业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与多方努力下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遗留下来的各类工业遗址成为当代成都工业化进程及历史变迁的重要见证。如国营成都无线电厂（后更名为国营新兴仪器厂），这家企业是国家在成都定点兴建的生产无线电复杂通讯设备的骨干企业，对成都工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4]；同时，以苏联援助的重点项目为核心，成都开启了其第一次工业化、现代化的征程，初步奠定了工业化发展的基础。如国营 132 厂，其创建与发展不仅为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更是苏联援助中国工业发展的一个缩影；随后，国家在电子、能源、建材化工和机械等多个领域进行了投资布局，涌现出了一批具有重要价值的工业遗产，如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研究所、东郊工业区等电子产业中心，以及以 132 厂、420 厂为代表的航空工业中心。这些工业遗产不仅见证了成都从手工作坊向现代工业化城市转变的历程，更为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成都工业发展史上不可磨灭的印记。

三线建设时期，成都作为西南地区的指挥中心、交通枢纽和后勤补给基地，主要承接轻工业与电子工业的项目转移，为其积累了宝贵的发展经验，并为后续的工业高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109 仓库，正是成都在三线建设中发力的历史讲述者。该仓库修建于 1982 年，承担着当时成都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日用百货供应任务，在三线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进入现代，成都工业发展的脚步仍在阔步向前迈进。1990 年，高新区正式成立，并于 1991 年被确立为国家级高新区。这一重要举措不仅开启了成都电子信息产业的新篇章，也标志着成都现代工业发展的新起点，为成都电子信息产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平台。集成电路、光电显示、软件及服务外包、电子终端制造、生物医药、精密机械制造六大产业集群这一产业体系的形成，不仅见证了成都电子信息产业从零基础到高速发展的历史变迁，还体现了成都工业遗产在现代工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2017 年，成都市对外发布了《成都电子信息产业功能区总体规划》，进一步明确了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方向。在这一规划指引下，以电子科技大学为核心，郫都区和高新西区为两翼的电子信息产业功能区逐渐形成，推动了电子信息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众多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业建筑得以保留，如中科曙光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代 X86CPU 芯片的建筑、京东方建成高端柔性屏、AMOLED6 代生产线的

厂房等[5]。这些不仅是成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实物证明，更是成都工业发展历程的重要见证。它们承载着成都工业的记忆与故事，向后人昭示着成都工业发展的轨迹与辉煌。

表 1 成都工业遗产发展历程

时期	背景	发展程度	代表
近代中国	列强入侵，中国人民在苦难中求索	成都工业化由低度化发展转向自我探索道路	四川机器局
新中国成立初期	国家主权独立，大力支持成都工业发展	成都工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国营成都无线电厂（后更名为国营新兴仪器厂）
“一五计划”时期	将成都定位为全国工业重点建设城市，苏联援助	成都开启了其第一次工业化、现代化的征程	国营 132 厂（后改组为成都飞机工业有限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研究所
“三线建设”时期	成都作为三线建设的主要后勤补给基地，获得了大量的投资与支持	成都地方工业得到较为系统和快速的发展，工业发展在曲折中前行	109 仓库、成都无缝钢管厂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	政府政策大力支持，成都工业发展迅速	成都现代工业发展	高新区的成立

在成都的语境下，工业遗产不仅映射出城市从工业初创到现今繁荣的演变轨迹，更深刻地揭示了这一过程中经济结构的转型、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文化生态的演进。例如，随着工业化的推进，成都的城市空间布局发生了显著变化，工业地带的扩展、人口流动的加剧以及社会阶层的分化等，均在这些工业遗产中留下了深刻印记；同时，工业遗产还见证了成都独特城市文化的孕育与发展，诸如工业精神、工匠精神等文化特质，已成为成都城市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此外，工业遗产还具备显著的物质与文化资源价值，为城市的产业升级、文化创新及旅游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与可能。通过合理的保护与再利用，如成华区萌想星球 · 107 文创产业园的成功实践，工业遗产不仅能够焕发新的生机，还能为城市的多元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而其在学术研究与教育领域的潜在价值，则进一步凸显了工业遗产作为城市历史与文化传承重要载体的独特地位。

二、科技价值

工业遗产有别于其他文化包括物质和非物质的遗产的关键特质就在于工业的核心——技术[6]。其作为技术与历史交汇的烙印，深刻反映了成都工业技术的革新与发展脉络。而工业遗产不仅包含率先采用关键生产流程、技术或工厂系统的建筑遗址，其建筑结构本身（如早期的防火设计、金属框架构造）及著名技师、工程师、建筑师的作品亦承载着重大的技术价值[7]。

（一）技术创新的时序演进

自 19 世纪 20 年代起，成都工业遗产便见证了从玻璃制造、铅印技术到火柴、造纸等轻工业萌芽与发展的历程。至 30 年代，纺织工业的崛起标志着轻工业技术的显著提升[8]。40 年代的“三根半烟囱”现象——成都造币厂、裕华纱厂、启明电灯公司与民康染厂，反映了工业企业整合改造的尝试。50 年代，成都电子信息企业的大量涌现及机车车辆厂、国营新都机械厂等重大项目的建成，标志着工业技术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60 年代，“三线”建设的推进，中电 29 所、中电 30 所的成立，以及原子弹部件的研发生产，进一步强化了成都作为现代工业基地的地位。70 年代，川化集团引进的首套大化肥装置，更展现了技术创新对产业升级的关键作用。

90 年代，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与高新区国家级地位的获得，促进了电子信息现代产业体系的形成。21 世纪以来，随着国家软件产业基地的建设、华为成都研究所的成立，以及东郊工业区结

构的调整，成都工业开始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新时代，软件和信息服务集群、成德高端能源装备集群的入选，以及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的设立，本土企业极米科技的上市与康柏西普眼用注射液的获奖，均彰显了成都工业技术在新时代的蓬勃创新与全球竞争力。

从手工业作坊到机器化工厂，再到智能化生产线，成都工业遗产不仅是城市记忆的珍贵载体，更是技术创新与历史演进的重要见证，对于推动现代科技创新、传承工业文明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二）工业设计领域的核心价值

工业设计，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核心要素，通过将策略性问题解决过程融入产品、系统、服务及体验创造之中，直接反映了工业的竞争实力[9]。其发展不仅是提升制造业竞争力、构建自主品牌的关键，也是推动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内在驱动力。以成都市成华区为例，凭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等多重战略定位，正积极强化工业设计在创新驱动战略中的核心地位，致力于构建具有区域特色与全球竞争力的工业设计生态系统[10]。

近年来，成华区工业设计领域经历了从传统单一形态向全链条、多维度设计的深刻转型。以柯世达等为代表的“设计+品牌培育”模式、东郊记忆艺术区的“设计+文创联动”模式等，共同塑造了成华区工业设计的多元化生态。不仅如此，区内设计企业紧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积极推动信息技术与工业设计的深度融合，涌现出华控图形等优秀企业，其前沿产品如 X 极限飞行、数字化天象厅等，拓展了设计服务的新边界。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背景下，成都工业设计正不断探索创新设计的边界。天府宝岛工业设计创新成果展上的一系列作品，如融合“软萌”熊猫元素的交互型公交车等，展现了设计与科技融合的无限可能。四川将提升工业设计能力作为推进“5+1”产业发展的关键，通过设计创新推动制造业向中高端迈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11]。

成都工业遗产在工业设计领域的核心价值体现在其作为历史与设计的交汇点，为现代工业设计提供了丰富的灵感源泉与参考框架。通过深入研究与传承工业遗产中的设计智慧，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工业设计的本质规律，促进设计思维的创新与发展，推动现代科技创新。因此，加强对成都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再利用，对于促进设计创新、提升产业竞争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工业遗产中的科技成就对现代科技的影响

三线建设初期，大批项目与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的涌入，不仅为成都带来了丰富的科技资源和高素质人才，还显著提升了其技术装备水平与经营管理能力。随着三线建设的深入，成都扩建、迁建了一批涵盖电子、机械、冶金等多领域的大中型工厂，逐步构建起以电子、航空航天等为重点的科研机构体系，为成都市新时期支柱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并积累了宝贵的发展经验。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三线建设期间建立的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九研究所与第三十研究所，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成为中国电子产业研究与发展的领军力量。二十九所取得了千余项国家和省部级重大科技成果，为国防科技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三十所则在保密通信和信息安全领域保持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其一体化设计与实现信息安全保密与信息系统网络的特色，为国家信息安全和保密通信事业谱写了光辉篇章。

进入新世纪，随着大型军工企业的集中搬迁与产业园区的形成，成都逐步构建起高新区和经开区两个工业集中发展区体系，双流、新都、青白江等地也依托三线企业建设和调整形成的产业基础，发展起不同类型的工业园区。

成都工业遗产所承载的科技价值不仅为成都的工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还为成都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提供了重要支撑。通过深入挖掘与传承工业遗产中的科技智慧与经验，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科技发展的规律与趋势，为现代科技的创新与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因此，应高度重视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工作，充分发挥其在推动科技创新、促进产业升级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三、文化价值

文化，作为社会精神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不可或缺的独特价值体现。工业遗产，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其文化价值跨越时代，历久弥新，不仅反映了不同时期的地域风土，更承载着建设过程中人们的精神品质与集体记忆，对人民的文化认同具有深远影响。

（一）凝聚人民文化认同的纽带

意大利建筑师 A.罗西（Aldo Rossi）在其著

作《城市建筑学》中深刻指出，城市是市民集体记忆的载体，与物体、场所紧密相连[12]。在成都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中，工业遗产作为工业发展的物质遗存，不仅见证了城市的工业化进程，更成为了市民心中不可或缺的城市记忆元素[1]，以其独特的历史韵味与人文内涵，传承了城市的精神与性格，使人们在追忆往昔中增强了对城市的认同感与归属感[13]。

文化认同理论，由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Erik H. Erikson）首次提出，强调文化认同是群体成员在民族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特有归属感或信仰，是身份同一性的象征[14]。在成都的语境下，工业遗产作为文化认同的物质表征，承载着人民对城市发展历史的信仰与依赖，凝聚起人民内心的精神归属，对成都工业文化、工业精神的传承与弘扬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如峨眉电影制片厂、东郊记忆、红星路 35 号、水井坊博物馆等作为成都工业遗产的再利用典范，不仅仅是物质性的显性文化遗产，更是隐性人文遗产的集中体现。它们记录了一个时代的艺术与文化，成为了城市集体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东郊工业区为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一五计划”的实施，一大批国防军工企业在成都东郊崛起，红光厂等企业的蓬勃发展，不仅改变了区域面貌，更通过修建沙河电影院等福利设施，丰富了职工生活，增强了社区凝聚力，形成了独特的“东郊情怀”。

同样，三线建设时期，成都兴建了大量与生产无直接关联的福利配套设施，如职工宿舍、球场、礼堂等，这些建筑遗产承载了职工独特的场所记忆，成为了三线建设者文化认同的物质象征。三线建设者作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他们的“三线情怀”不仅是对那段艰苦岁月的怀念，更是对工业精神与城市精神的传承。随着时代变迁，三线企业虽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三线工业遗产却成为了老一辈三线建设者与三线子弟的精神寄托，城市记忆与精神的永恒象征。

综上，工业遗产对于经历那一段岁月的人民而言，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心灵的归属与信仰的寄托。它们以独特的方式凝聚着人民的文化认同，激发着城市的活力与创造力，为成都市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二）承载工业精神的物质载体

工业遗产，作为特定历史时期工业活动的物质遗存，不仅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更深刻地体现着那个时代的工业精神。以成都东郊工业区为例，红光电子管厂的黑白显像管试制成功，不仅是技术上的突破，更是东郊人工业精神的集中体现。面对复杂的生产工艺和简陋的条件，红光人以钱玉趾为代表，怀揣建设强大祖国的雄心，突破重重技术难关，创造了“从无到有”的奇迹，见证了企业从维修车间成长为全国最大显像管玻壳生产基地的辉煌历程，赢得了“北有首钢、南有红光”的美誉[15]。这一过程中，东郊人展现出的知难不畏难、自立自强、为国争光的精神风貌，至今仍通过工业遗产这一物质载体，向世人诉说着那段奋斗岁月的故事，激励着后人不断前行。

三线建设者们所展现出的“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三线精神”，是那段特殊历史时期的精神瑰宝[16]。他们风餐露宿、肩挑背扛，以血肉之躯铸就了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基石。在严格的保密制度下，许多“三线人”隐姓埋名，将青春和生命献给了国家的工业事业，甚至几代人的青春都在这片土地上延续。这种无私奉献、扎实苦干的精神，深深烙印在了每一座工业遗产之中，成为了后人学习和传承的宝贵财富[17]。

（三）文化传承的物质基石

工业遗产，作为工业发展历程中不可或缺的物质遗存，不仅见证了工业技术的演进，更承载着丰富的工业文化内涵，为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水井坊博物馆，是中国现存最早的酿酒遗址之一，其历史可追溯至元末明初，历经数百年更迭，至今仍保持着酿酒的传统，成为探索中国白酒源头的重要窗口水井街酒坊遗址的考古发现，不仅荣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誉，更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 600 余年的文化底蕴，为水井坊提供了弘扬中华酒文化的独特平台[18]。作为一座活文物宝库，水井坊不仅珍藏了锦江春、福升全、天号陈、全兴成等名酒的历史记忆，更以其连续不断的酿酒活动，见证了成都酒文化的深厚积淀与传承。

2001 年，水井街酒坊遗址被正式认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核心遗址发掘区内，晾堂、窖池、蒸馏器基座等酿酒设施的完整保留，不仅复原了古代蒸馏酒酿造的全过程，更使水井坊成为国家文物局认定的古代酿酒与酒肆的唯一实例，被誉为“中国白酒第一坊”[19]，其史学价值足与“秦始皇兵马俑”相提并论[20]，是中国白酒业发展历程中不可或缺的无字史书。此外，水井坊酒传统酿造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

产品更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原产地域产品”称号，标志着中国浓香型白酒原产地域保护的先河。

水井坊作为保留古法酿酒工艺的工业遗产，不仅是酿酒技术进步的实物见证，更是成都乃至中国悠久酿酒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它不但丰富了成都酿酒文化史的内涵，而且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持续影响着后世。对其保护与利用，不仅关乎其物质形态的保存，更在于通过这些遗产，重构城市文脉，激发文化旅游的潜力，让人们在回望历史的同时，产生对本土文化的深刻认同，从而推动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实现工业遗产在当代社会的价值重生。

四、美学价值

工业建筑遗产，作为人类工业文明的见证者，虽在其诞生之初并未被赋予长久的文化保存意义，但在经过岁月的洗礼后，这些建筑与结构因独特的历史地位和艺术价值，逐渐成为了被社会所珍视的文化遗产。在工业遗产的诸多价值中，美学价值无疑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是完善工业建筑遗产研究体系的关键一环，也是确立有效保护机制的重要依据。

（一）建筑风格：历史美的承载与演绎

成都工业遗产的建筑风格从传统样式的保留到西式影响而渐进的中西融合，再到与现代风格的兴起，每一砖一瓦都镌刻着历史的痕迹，承载着丰富的历史美学价值。

1.传统样式的坚守与东方美学的彰显

地处内陆的成都，在近代西方文化涌入时，因其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对外来文化的接纳较为谨慎，从而保留了更多本土建筑特色。四川机器局老厂与黑药厂，作为四川最早的近代工业建筑，其完全由中国人自主设计施工，采用传统的穿斗木架结构，不仅体现了当时中国工业的自立自强，也展现了东方建筑美学的独特魅力。这些建筑在布局上虽为适应生产需求而有所创新，如联体式布局与增大的开间柱距，但其整体风格仍未脱离传统建筑样式的范畴，成为中华美学在工业领域的生动注脚。

2.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探索

随着 19 世纪 90 年代后各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对中国的侵略加剧，建筑活动更加频繁，西风东渐趋势对工业建筑的影响逐渐增强[21]，形成了兼具中西建筑特点的工业建筑。成都工业建筑在这一时期呈现出中西结合的特点，既保留了中国传统建筑的精髓，又吸收了西方建筑元素。成都白药厂便是这一风格的典范，其由德国设计师操刀，将教堂式的尖顶造型与青灰色砖瓦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中西合璧风貌。这种建筑风格不仅体现了对西方建筑技术的借鉴，也展现了中国建筑文化的包容性与创新性，是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闪耀着独特的美学价值。

3.现代主义风格的简约技术美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现代主义建筑风格逐渐成为主流。成都工业遗产中的现代主义建筑，尤其是仓储类建筑，其设计风格注重功能性与实用性，造型简洁对称，装饰简约，体现了现代主义建筑的美学原则。如 107 仓库，其建筑造型以钢筋混凝土桁架结构为主，红砖墙面与灰色水泥砂浆抹面相结合，形成了和谐稳重的外观。这种建筑风格不仅满足了工业生产的需求，也展现了现代建筑技术的美学价值，是工业遗产技术美的生动体现。

成都工业遗产的建筑风格多样且富有变化，从传统样式到中西合璧，再到现代主义风格，每一种风格都承载着特定的历史信息与文化内涵。这些建筑风格不仅是建筑艺术的展现，更是成都工业发展历史的生动写照，它们以独特的美学价值，共同构成了成都工业遗产的丰富画卷，闪耀着历史美的光辉。

（二）设计特色下的文化美：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成都工业遗产不仅是过往工业文明的物质留存，更是文化美学与精神价值的深刻体现，映射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化追求。其设计特色在于巧妙融合人与自然、传统与现代，展现出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空间调性，深刻诠释了“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

1.环境美学视角下的设计智慧

环境美学强调多元和谐的重要性，这主要体现在生态与文化的平衡、自然与人文的交融、人文诸因素间的协调以及人与环境的和谐共生[22]。这就对工业遗产与环境的和谐统一及其可持续利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实际上，工业遗产特殊的功能性质决定了其往往具备大型的开敞空间与坚固结构，而这些恰可转化为城市韧性基础设施，增强城市应对不确定性扰动的能力。在时代变迁中转换工业遗产运作形式，实现与环境的和谐共生与可持续发展，正是对环境美学的坚守。

禾创药业仓库——位于二仙桥西路的禾创药业仓库，修建于 20 世纪 60 年代，具有典型的“红色”时代背景和建筑特色。仓库原为成都市医药采购站储备仓库，后经过成华区政府与完美世界控股集团的合作保护重塑，打造为独具特色的产业园。在设计中保留了原有的红砖红瓦和苏式建筑风格，同时融入了现代文创元素，华丽变身实现了历史与现代的和谐共生。这一设计不仅尊重了历史记忆，还赋予了建筑新的生命力和功能，体现了环境美学中的可持续性和文化传承性。

4 号工厂青年旅社——作为成都市工业遗产再利用的典范，4 号工厂青年旅社保留了原工厂的建筑风貌和工业元素，如裸露的砖墙、钢铁结构等。同时，通过引入现代设计理念和设施，如舒适的客房、休闲的公共区域等，为游客提供了独特的住宿体验。这种设计方式不仅保留了工业遗产的历史价值，还实现了其与现代生活的有机融合。

2.功能与美学并重的设计实践

工业遗产特殊的性质对其实用性与功能性提出了要求，而在工业建筑的发展过程中对美学价值的兼顾使成都工业遗产闪耀出功能与美学兼具的光辉。

水井坊博物馆的屋顶造型——狮子口（亦称老虎窗），便是功能与美学并重的设计典范。这一设计不仅满足了酒坊采光和通风的实际需求，为菌群的生存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而确保了酒的高品质酿造，更以其独特的造型为建筑增添了艺术魅力。这种智慧的设计实践，不仅体现了对自然环境的充分利用，也是对“天人合一”理念的生动诠释，使工业遗产在承载生产功能的同时，也散发出浓郁的文化美学气息。

原成都机车车辆厂的灯光球场——作为成都机车车辆厂职工文化活动场所，其设计不仅满足了职工的文化娱乐需求，更在造型上与周边的工业建筑相呼应，形成了统一的整体。球场内的设施布局也充分考虑了观众的使用需求和观赏效果，实现了功能与美学的完美结合。

3.色彩设计的文化意蕴与当代启示

东郊记忆——作为脱胎于成都国营红光电子管厂的工业遗产改造项目，东郊记忆在色彩设计上有着独特的考量。整个园区以灰色、红色等工业元素为主色调，同时融入绿色、蓝色等现代元素，营造出一种既怀旧又时尚的氛围。这种色彩设计不仅体现了工业遗产的历史底蕴，还展现了其与现代文化的融合与创新。

原西南金属结构厂旧址——该遗址作为成都市重要的工业遗产之一，其建筑色彩以中低明度的灰色和红色为主，与周边的自然环境和谐相融。在设计上，保留了原有的工业元素和建筑风格，同时通过色彩的巧妙运用，使建筑更加具有时代感和艺术美感。

可见，成都市工业遗产的设计特色不仅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传统与现代的紧密融合，还展现了功能与美学的并重以及色彩设计的文化意蕴与当代启示。这些设计特色既为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为现代城市景观的设计与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三）工业遗产设计的具象美、和谐美

1.具象美：工业特质的直观诠释

工业遗产的设计造型，以其直观、简明的特点，赋予了工业遗产以具象美。在成都市众多工业遗产中，这种具象美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东郊记忆——由红光电子厂改造而来的东郊记忆，其设计造型中的具象美尤为引人注目。园区内，工业时代的标语如“工人一双手，平底起高楼”“劳动人民最光荣”等书写在墙面上，不仅传播了东郊记忆的历史故事，更以直观的形式展现了工业遗产的坚实与力量。此外，园区内的雕塑作品，如 B43 测高雷达雕塑、演艺中心前的乐器符号雕塑等，均以具象的形式再现了工业遗产的独特风貌。

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位于原成都蜀锦厂内的蜀锦织绣博物馆，其建筑设计巧妙保留了蜀锦织造的传统工艺元素。织机的形态、蜀锦的图案等被巧妙地融入建筑外观和内部陈列中，使游客在参观时能够直观感受到蜀锦织造的历史底蕴和文化魅力。

2.和谐美：设计与环境的完美融合

工业遗产的设计造型不仅注重具象美的呈现，还追求造型与周边环境的和谐统一。在成都市的工业遗产中，这种和谐美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东郊记忆——在改造过程中，东郊记忆注重保留和利用原有的工业元素和建筑风格。园区内的建筑外观和内部空间都保留了红光电子厂的工业特色，同时引入了现代的设计理念和设施。这种设计方式不仅提升了园区的功能性和实用性，更在美学上实现了与周边环境的和谐统一。园区内的绿化和景观设计也充分考虑了与工业遗产的

协调，使游客在享受现代文化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工业遗产的历史韵味和生态之美。

峨眉电影制片厂——作为中国电影的重要生产基地之一，峨眉电影制片厂不仅拥有丰富的电影文化遗产，还在建筑设计上展现了独特的美学价值。其建筑布局错落有致，空间感强烈；建筑风格既保留了传统的工业元素，又融入了现代的设计手法，与周围环境相映成趣，和谐统一，为游客提供了极具艺术魅力的参观体验。

五、经济价值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推进，城市建设对土地资源的需求日益膨胀，众多工业建筑遗存因被片面地认为经济价值微薄而面临拆毁的厄运，从历史的舞台上悄然消逝[23]。深度挖掘工业遗产的经济价值，避免其沦为工业废墟势在必行。这就要求我们突破传统观念，不拘泥于表象审视工业遗产，而是通过切实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挖掘工业遗产的经济价值，并将工业遗产的历史与文化价值融入到其保护工作中，实现保护与利用双赢的局面。

（一）承载巨大经济财富的价值实体

首先，从建设投入的角度审视，工业遗产是巨大经济投入的产物，其有形价值不容忽视。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中，每一项工业项目都是国家财政的重点支出，尤其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工厂设施、设备的购置与厂房的建设，均凝聚着国家和社会的大量财富。例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核816 工程的巨额投资，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堪称天价。即便是停产后的设施与设备，也是国家外汇资源的转化，其潜在的经济价值不容小觑[24]。成都的工业发展历程同样印证了这一点。从 1950 年至 1952 年的 700 万元，到 1978 年的 1.5 亿元，再到 2018 年的 2290.4 亿元，其增长轨迹不仅是城市经济发展的缩影，也是工业遗产经济价值累积的见证[25][26]。 每一座工业遗产，都是城市经济财富的活化石，其保护与利用，实质上是对城市经济基础的巩固与拓展。

其次，工业遗产的地理位置优势，为其赋予了高附加值的经济发展潜力。根据韦伯的工业区位论，工业区的选址与布局深受交通干线的影响，老工业区往往位于城市中心区域，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27]。这些区域，如今成为发展现代文化创意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的理想之地，与欧洲经济的快速发展趋势不谋而合。国内多个城市的成功案例表明，通过与现代服务业、创意产业的融合，工业遗产的保护性再利用不仅能够促进城市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还能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相较于拆除重建，保护性再利用在节能减排、降低建设成本、减少环境污染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要求。

工业遗产的直接拆毁不仅是对资源的极大浪费，也忽视了其在城市经济发展中的潜在贡献。通过科学合理的保护与利用策略，工业遗产能够成为推动城市经济转型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在保护与开发的天平上，我们应更加注重工业遗产的经济价值挖掘，让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开辟出一条新的、更有价值的发展道路。

（二）以再利用为核心的可塑性分析

工业遗产的经济价值并非仅仅局限于静态的保护与展示，而更多地体现在通过合理改造实现的再利用潜力上。这与一般文化遗产如古迹遗址的保护策略存在显著差异，后者往往侧重于保持原状以维护其历史价值，而工业遗产则更多地需要通过创新性再利用来激活其经济潜力。因此，探讨工业遗产的经济价值，必须深入分析其再利用的可塑性，这既是其经济价值实现的途径，也是其区别于其他文化遗产经济价值的关键所在。

1.使用价值与非使用价值的双重维度

工业遗产的经济价值可从使用价值与非使用价值两个维度来考察。使用价值直接体现在工业遗产能够通过市场交易实现的经济回报，如改造后的厂房作为商业或居住空间出租或出售或通过对工业遗产的就地再利用来增加城市经济效益。非使用价值则更多地体现在其对社区、城市乃至更广泛社会层面的正面影响，如提升地区形象、促进就业与经济增长等。成都 107 仓库的改造案例，便是工业遗产再利用优势的生动写照。这座曾经荒废的仓库，通过科学的改造策略，不仅保留了其原有的结构特色，更赋予了新的生命与功能，成为集文创商业、文创商务、文创活动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创消费新空间，旧工业区的艺术家入驻与改造，不仅实现了厂房的直接经济价值转化，更带动了周边社区的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体现了工业遗产间接使用价值的深远影响。

进一步而言，工业遗产的再利用不仅限于单一建筑的改造，更能带动周边地区乃至整个城市的经济发展。通过发展工业遗产旅游、文化创意产业等，可以形成产业链式的经济效应，促进就业，提升城市形象，吸引投资。如成都 U37 创意仓库是成都医药集团的仓库和厂房改造而成，建

筑多为上世纪 60 年代到 80 年代所建，随着时代变迁，工业逐渐远离城市中心，这些老旧厂房被废弃。但在科学理念的引导下，通过保留与改造旧厂房，不仅保留了城市的历史记忆，更激发了文化创意产业的活力，为城市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此外，三线建设遗留的设备、技术及人才优势作为工业遗产带来的附属经济价值，成都通过对其充分利用，依托科研院所与科技人才的密集分布，紧跟科技发展趋势，强化基础研究与技术攻关，积极推动产业升级与产品创新，不仅可以实现新旧动能的顺利转换，更能将人才与科技资源有效转化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现实生产力。

2.对人才引进与成都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分析

工业遗产的合理再利用，为成都创造了一个集历史文化底蕴与现代科技创新于一体的独特环境，这种环境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不容小觑。通过修复与改造旧厂房、车间等工业设施，成都不仅保留了工业记忆，还将其转化为多元化的功能空间，如创意产业园区、科技孵化器、文化教育基地等，为科研人员、艺术家、创业者等各类人才提供了丰富的工作与生活场景[28]。以成都东郊记忆为例，这一项目在原国营红光电子管厂旧址上改建而成，被定位为国际时尚产业园区，集音乐、美术、戏剧、摄影等多重文化形态于一体，成为国家音乐产业基地、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等。其通过引入文创园区专业运营商，推动经营机制转化和整体提档升级，吸引了大量年轻人才和文创资源入驻，成为成都工业遗产再利用的典范。

另一方面，人才的集聚还产生了显著的溢出效应，促进了成都整体经济结构的优化与升级。高素质人才的流动与交流，不仅提升了城市的创新能力与竞争力，还带动了教育、文化、旅游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了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如东郊记忆，其成功举办的多场国际性品牌文化活动，不仅吸引了大量游客，还带动了周边商业的繁荣，为成都的经济增长贡献了重要力量[29]。

成都的实践表明，工业遗产的合理再利用是吸引人才、推动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通过政策引导、市场运作与公众参与相结合的方式，成都不仅成功保留了工业遗产的历史价值，还将其转化为城市发展的新动力源。未来，成都应继续深化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的合作，构建更加完善的人才引进与培养体系。

六、总结

成都工业遗产，作为城市历史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忆、科技成就、文化内涵与美学价值，在经济发展中亦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通过对成都工业遗产的全面剖析，不仅揭示了其在历史、科技、文化、美学和经济等多个维度上的独特价值，还深入探讨了保护与再利用的重要性，并就未来城市规划与发展中工业遗产的地位与作用提出了见解。

在历史价值方面，成都工业遗产见证了城市从手工业作坊向现代工业化城市转变的历程，是成都工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遗产不仅有力记录了成都市的工业发展历程，还承载着工业文化记忆，成为重要历史事件的见证。

科技价值上，成都工业遗产展现了技术革新的时序演进，为现代工业设计提供了灵感与参考。从手工业作坊到智能化生产线，每一处遗产都铭刻着科技发展的印记。特别是三线建设期间建立的科研机构与工业建筑，为成都乃至全国的现代科技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文化价值方面，工业遗产作为城市记忆的瑰宝，凝聚了人民的文化认同，承载着工业精神。它们在工业文化的弘扬和传承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如水井坊博物馆等，通过对工业遗产的展示与解读，让市民深刻感受到成都酒文化的魅力。

美学价值上，成都工业遗产展现了多样的建筑风格与设计特色，反映了不同阶段工业建筑的美学追求。从传统样式的坚守到西式影响以致中西融合，再到现代主义风格的兴起，每一处工业遗产都是一部生动的建筑史书，给人们以美学启迪。

经济价值方面，工业遗产通过合理改造和再利用，能够创造新的经济价值，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遗产的合理再利用，吸引了高端人才，促进了成都整体经济结构的优化与升级，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针对未来城市规划和发展，它们不仅为城市规划提供了历史借鉴，还在技术操作、市民凝聚力提升、美学意识启迪以及城市经济发展模式探索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保护、传承和利用工业遗产，是当下城市规划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综上所述，成都工业遗产在历史、科技、文

化、美学和经济等方面均展现出独特的价值。本文通过深入剖析其多重价值及保护与再利用的重要性，不仅为成都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提供了理论支撑，也为其他城市在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方面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未来，我们应更加重视工业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让这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参考文献：

[1] 谭玉清.成都市工业遗产景观美景度评价研究[D]. 四川农业大学, 2023.

[2] 崔璐,李姗姗.面向记忆建构的文献资源语义组织模型设计与实证[J/OL].图书馆论坛,1-12[2024-11-10].

[3] 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成都市志.总志,成都时代出版社,2009.08,第 27 页

[4] 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成都市志.总志,成都时代出版社,2009.08,第 194 页

[5] 成都科创产业发展纪实_凤凰网视频_凤凰网 (ifeng.com).

[6] 寇怀云.工业遗产技术价值保护研究[D].复旦大学,2007.

[7] 青木信夫,徐苏斌,张蕾,等. 英国工业遗产的评价认定标准 [J]. 工业建筑, 2014, 44 (09): 33-36.

[8] 刘国良.20 世纪初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嬗变[J].苏州大学学报(工科版),2004,(01):65-69.

[9] 刘键,蒋同明.新型工业化视角下的工业设计产业升级路径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18,(07):122-131.

[10] 成华区人民政府.(2022).成都市成华区工业设计产业专 9IK 项规划.

[11] 四川省人民政府网站.(2019).四川用工业设计赋能高质量发展.

[12] 陆邵明.基于空间事件的城市精神塑造策略[J].城市发展研究,2011,18(08):120-124.

[13] 邵冰.基于城市记忆感知的工业遗产空间重塑——以株洲清水塘生态科技新城更新设计为例[J].城市建筑,2023,20(20):25-28.

[14] 董莉,李庆安,林崇德.心理学视野中的文化认同[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1):68-75.

[15] 转引自沈忠瑛.当代工业遗产建筑外部空间更新设计研究[D].重庆大学,2014.

[16] 段娟.近 20 年来三线建设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述评[J].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19(06):100-109+128.

[17] 陈夕.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316.

[18] 张灿.水井坊的文化营销[J].企业改革与管理,2007(11):38-39.

[19] 周胜.城市形象设计的文化问题——以成都市“世界现代田园城市”建设为例[J].中华文化论坛,2010,(02):175-178.

[20] 牟红.基于川酒文化的旅游产业区域合作发展策略[J].纳税,2017,(15):109-110.

[21] 陈子怡,江牧.我国近代建筑中国式现代化演变研究——以孙中山相关建筑为例[J].建筑与文化,2025,(07):251-253.

[22] 李阳,骆玉平.论环境美学视域下“和美乡村”的意境构建[J].湖南包装,2025,40(02):114-117.

[23] 哈静. 循环经济理念下工业建筑遗存的经济价值研究[D].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12.

[24] 许东风. 重庆工业遗产保护利用与城市振兴[D].重庆大学,2013.

[25] 【特别关注】几乎从零开始！成都工业 70 年间实现历史性跨越！_发展(sohu.com)

[26] 从仅有“三根半”烟囱到现代产业体系 !70 年来成都投资总量跨越式增长_工业化(sohu.com)

[27] 金相郁.20 世纪区位理论的五个发展阶段及其评述[J].经济地理,2004,(03):294-298+317.

[28] 张瀚月.美国城市舒适性评价及其对人才吸引力的影响[D].华东师范大学,2017.

[29] 朱德亮,曾菲菲,付业勤.产业集聚视角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J].改革与战略,2015,31(11):154-156.

地域叙事与影像工业：厦门电影文化产业的历史嬗变

毛思宇

（吉利学院，四川 成都 610213）

摘 要：厦门电影文化产业的发展历史与整个中国的电影文化产业发展历史有着共同发展的关系。厦门电影院是全国影院发展最早，持续力最为长久的地区，中华戏院、思明戏院、开明戏院是厦门早期最大电影院。在厦门播放的电影数量庞大，从民国时期开始，到改革开放后，厦门电影播放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厦门市的电影票房收入也在逐渐的增长。历史上以厦门为题材拍摄的影片有《英雄小八路》、《小城春秋》、《海囚》等优秀的影片，为厦门电影文化产业的发展做了很大贡献。作为小语种的厦语片也曾风靡一时，厦语片于是除粤语片意外最受欢迎的小语种华语影片。厦语片仅仅风靡一时，很快就销声匿迹。

关键词：思明戏院；厦语片；票房

DOI：doi.org/10.70693/jyxb.v1i4.132

Regional Narrative and Film Industry: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Xiamen's Film and Cultural Industry

Mao Siyu

Geely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Xiamen's film and cultural industry is closely linked to that of China's entire film and cultural industry. Xiamen is among the earliest regions in China to develop cinemas with the longest sustainability, and Zhonghua Theatre, Siming Theatre and Kaiming Theatre were the largest cinemas in early Xiamen. A large number of films have been screened in Xiamen. Since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and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film screening in Xiamen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with the city's box office revenue gradually increasing. Historically, excellent films shot with Xiamen as the theme include Little Eighth Route Heroes, Spring and Autumn in a Small Town and Sea Prison, which have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Xiamen's film and cultural industry. As a minor-language film, Hokkien films once became very popular and were the most popular minor-language Chinese films besides Cantonese films. However, Hokkien films only prevailed for a short time and soon faded away.

Keywords: Siming Theatre; Hokkien films; box office

巴拉兹说："电影是唯一可以让我们知道它的诞生日期的艺术，不像其他各种艺术的诞生日期已经无法稽考。[1]"1895 年，法国卢米埃尔兄弟发明了电影机，并在一家咖啡馆的地下室放映了《火车到站》、《工厂大门》、《水浇园丁》、《婴儿喝汤》等短片。[2]

然而中国的第一步电影比西方整整晚了十年，1905 年，京剧表演艺术家谭鑫培先生 60 岁的寿辰之上，北京丰泰照相楼的老板忽然想起将谭鑫培先生“影戏”中的拿手好戏拍摄出来。随即片子就拿到了前门放映，万人空巷。因此“影戏”《定军山》也成为我国的第一步电影。

厦门电影文化产业发展相较于北京与上海稍晚一些，但整体而言，厦门电影文化产业的发展还是在全国处于领先位置。厦门电影史是独特值得研究的，对厦门电影文化产业的发展有了全面

作者简介：毛思宇（1996 年），女，四川成都，博士在读，吉利学院，助教，研究方向：女性主义电影，AIGC 影视传播。

的概述。厦语片风靡一时，厦门在电影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厦语片也使得厦门成为电影史上值得关注的地点之一。

一、厦门电影发展简史

(一)厦门电影院简史

1.解放前的厦门电影院简史

电影在中国出现之前，最潮流的就是观看影戏，因影戏的兴起，戏院也顺应建立起来。中国电影院与影戏就联系在一起，早期的中国电影都是在戏院播放，厦门也不例外。厦门最早的专业戏曲演出场所,是邵利杏于1907年在田仔墘.(今南田巷)修建的“中华茶园”。二层木结构的建筑,场内设圆桌藤椅,却是人声鼎沸,可以容纳观众五500人。[3]戏曲大受欢迎，因此，在戏院中已经有了电影院的雏形，如售卖瓜子、糖果等。

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厦门的娱乐产业有了蓬勃向上发展的势头，电影业的发展也不例外。1922年，“中华茶园”更名为“中华戏院”，在中华戏院中，引进了很多外国大片，例如《黑夜盗》、《宝莲灯历险记》以及卓别林喜剧短片，中华戏院也成为了第一个在厦门播放电影的戏院。由于厦门当时是外国的租界，因此，在厦门播放的电影多为外国引进的大片，很少有国产影片出现。当时许多的华人华侨也看到了，电影院的商机，因此厦门的电影院如同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厦门的各个角落。经过一段激烈的票房大战后，厦门的电影院最终出现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分别是开明大戏院、中华戏院、思明戏院。

三大电影院各自的票房偏向也有所不同，如开明戏院，专门播放国产影片，以低廉的价格与大量的影片来招募顾客。中华戏院因处于繁华位置，具有地理位置优势，又具有很多好莱坞公司的专映权，因此，也是有着不错的票房。思明戏院则是厦门电影院中的显贵,专门设有池座包厢为太太小姐、公子哥儿及老外服务,一度专门放映美国好菜坞影片,每天放映不过两三场。[4]

1929年，“开明戏院”，也播放了厦门的第一部有声片。1930年“思明戏院”也进口并放映了美国的有声片《月宫宝盒》、《侠盗查禄》、《三剑客》等。1931年6月，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上映。

“九·一八”事件后，有声电影的创作进入高峰期，这期间在电影院热播的有《渔光曲》、《马路天使》、《神女》、《十字街头》等影片。1938年5月，厦门沦陷。厦门的各个戏院都被日本没收，日伪军政府则将所有戏院播放的电影改为播放日本片。很长一段时间里面，电影院的发展停滞不前，一直到抗战胜利。抗战胜利后，厦门电影院有思明、中华、开明、鼓浪屿（延平戏院）、大同、金城六家，且设备陈旧，片源困难，很难吸引观众。[5]抗战胜利初期，影片没什么来源，先是收集一些散落民间的私人所有的影片放映，后来，一些国产影片制片厂派代表驻厦门发行影片，美国好莱坞各家影片公司在厦门也设立了代理人，如林荣泰和沈文台负责监督思明、中华、开明等各戏院观众数、票款和放映计划。厦门各戏院影片上映，逐渐恢复正常。[6]在此期间，广受欢迎的影片有《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夜半歌声》、《八千里路云和月》、《出水芙蓉》、《戏水鸳鸯》等。其中《出水芙蓉》

与《戏水鸳鸯》作为彩色片，为厦门的彩色电影放映打开了大门。

内战全面爆发，位于南边小城厦门，迁入的外来人口愈来愈多。1949年2月，厦门市人口总量增加了两三万，各个娱乐场所人满为患，每每有新影片上映时，戏院门口人山人海，电影票也是一票难求，催生出了大量的黄牛进行倒票。据当年报纸报道,思明戏院上映进口片《一千零一夜》的时候,原本为100多元的票价,黑市高达200多元,整整多了一倍。[7]

政治生活影响着电影的发展，随着全国解放的临近，厦门电影院也面领着混乱不堪的情况。通货膨胀严重，电影院的片源短缺以及各种政治问题，导致厦门电影院的发展止步不前，甚至有所倒退的情况发生。直至厦门解放时，厦门仅有三家戏院勉强维持经营，分别是思明戏院、开明戏院与中华戏院。其余的三家戏院则处于半停顿或者是无法营业的状态。

2.改革开放前的厦门电影院

电影作为意识形态的产物，也受到政府的控制。1949年新中国成立，厦门也迎来了解放。厦门市解放后，市军管接手了思明戏院，并且并发动中华、开明两家戏院职工以生产自救、政府贷款方式维持戏院业务。同年11月,黄栋梁接受香港南方影业公司委托,携带苏联影片拷贝从香港来厦,于12月间在厦门筹建了“香港南方影片公司福建分公司”,为福建省解放后成立的第一个电影发行机构。1952年,思明戏院改名为“思明电影院”。1954年,中华戏院改名为“中华电影院”。开明戏院也于1969年改名为“开明电影院”。[8]电影作为“最重要

的武器”，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所有的电影都遵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的思想，产生了一批又一批的红色电影。

厦门的各个电影院也播放和发行着优秀的红色电影《红色娘子军》、《南征北战》《小二黑结婚》等，与此同时在厦门电影院也上映了与中国交好的社会主义的电影《金星英雄》、《攻克柏林》、《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等电影。在此期间，第三代导演活跃于影坛之上。厦门电影院便播放了《早春二月》、《林家铺子》、《林则徐》、《青春之歌》等电影，这些电影都成为当年厦门影院中的热门影片，深受厦门人的喜爱。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特殊时期”期间，产生了很多优秀的电影艺术作品。这些作品在厦门到电影的电影院也是十分的卖座。厦门的电影院也纷纷更名，更名为东方红影剧院、红卫兵剧场、东风影院、红星影剧院等等。由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特殊时期的继续进行，因此很多影院都会播放旧电影而不再上映新电影。“八亿人民，八大戏”成为了中国电影的现状，深入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厦门也不例外。加之当时的政治斗争十分的十分激烈，以至于常常出现一两个月为放映电影未放映电影的情况出现，即使是放映电影也是革命戏份。观众对于电影的热情大大的降低，厦门与整个中国电影行业进入荒漠时期。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特殊时期”结束后，厦门的电影院都从红色名称修改回来，1979 年《洪湖赤卫队》在厦门上映造成轰动，紧随其后的就是整个中国电影业的复苏，厦门电影院也随即复苏播放了《小花》、《巴山夜雨》、《天山云传奇》、《人到中年》等大受欢迎的影片。

3.改革开放后的厦门电影院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整个中国的电影业有了新进的发展，厦门的电影院也有了新进的发展。中华电影院在新中国成立后积极配合党的各项方针路线政策做了很多工作与调整，1986 年到今天多次都被评为厦门市优秀电影发行放映单位，但是中华电影院由于建筑的老化已经停用，在 1993 年 7 月颁发停用文书，1995 年正式动工拆建。厦门历史最悠久的电影院从此落下了帷幕。

开明戏院，1969 年改名为开明电影院。在原有的基础上娱增设了很多娱乐厅，例如电子游戏室。开明电影院与中华电影院的命运则是完全相反，在 1995 年开明电影则进行了重建工作，投资两千多万，占地八千多平方米。一跃成为福建省最豪华的电影院。

在 1991 年，厦门市人民政府创办了莲花影剧院，莲花占地 5010 ㎡。主营的是文艺演出和电影放映，厦门市绝大多数的文艺演出都在莲花影剧院。在 2005 年。莲花影剧院进行了全面维修改造。至此莲花，莲花影剧院还经营了舞厅，乒乓球似的提丰富的文化娱乐服务。

（二）厦门电影播放简史

在厦门热播的电影与全国热播的电影基本同步，伴随着中国电影播放而热映的电影。例如以早期的《火烧红莲寺》为首的一大批中国武侠电影，《火烧红莲寺》在厦门连映几个月,卖座率很高,老一辈厦门人几乎都好奇地观看了这部电影片,影响深远。甚至在时隔 20 年的 1950 年,厦门龙山剧院重映此片时,仍在《厦门日报》上用“名震剧坛,武侠名剧”的广告词来宣传,可见其余威不减。[9]就是在厦门热播的电影。从《渔光曲》到《十字街头》，从《八千里路云和月》到《出水芙蓉》在厦门热播的电影广受欢迎。

解放初期的厦门电影市场,和其他行业和领域一样,深受社会主义思潮影响,放映的多为苏联、东欧、朝鲜、印度影片,特别以“苏联老大哥”为马首是瞻,苏联影片更是受到大家的欢迎。[10]包括全国的革命样板戏到文艺片的播放，厦门电影的播放也是与全国有着同步，与此同时也具有着厦门地方的特色。

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厦门电影的发展也进入了新纪元。1992 年到 2001 年期间，厦门电影的票房收入有了较大程度的增长，也在稳步向前增长。近年来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截止 2020 年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票房第一的国家，厦门的电影票房则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贡献了大量的票房成绩。2020 年在厦门热播的电影有《金刚川》、《八佰》、《我和我的家乡》、《姜子牙》等，这些影片在厦门取得了很高的票房。[11]

二、厦门题材电影简史

有关厦门题材的电影主要有 1961 年拍摄的《英雄小八路》、1981 年拍摄的《小城春秋》和《海囚》。这三部影片取材于不同时代发生在厦门的真实历史史实,原著者以厦门籍作家为主,拍摄的外景也主要在厦门。因而可以说,它们是反映厦门那段历史的印鉴。

（一）电影《英雄小八路》

1958 年，为粉碎美国分裂中国的企图,反击台

湾地区当局的侵扰,“8·23”炮战前夕,为减少伤亡,全村妇婴老幼,需后撤远离敌炮射程,只留下部分干部与民兵,搞好支前生产。但是,“前线少先队员支前活动大队”的 13 位勇敢的少先队队员,坚决要求继续留下来支前。他们穿梭在炮声震耳、弹片横飞的前沿阵地上,与解放军一起扛弹药、擦炮弹、抢修公路、接电话线;利用战斗的空隙帮助解放军补、洗衣服,送开水,烧火做饭;与民兵一起巡逻、站岗,防止敌特破坏活动;硝烟弥漫的炮火中,他们还以石头当椅子、以地板作黑板坚持学习。他们为自己所从事的伟大光荣的事业而干劲倍增,不知疲倦地忙碌着。此后,“英雄小八路”的称号及其英勇事迹更广泛地流传开来,作家田汉、田间、陈伯吹,画家艾中信、蒋兆和以及各地报社、杂志社的记者也纷纷前来采访。[12]

厦门禾山中学的总辅导员、语文老师王添成,从禾山第四中心小学接过了这一优秀群体,并继续带领他们开展支前活动。他利用教学机会,让这些学生以作文的形式将他们支援前线的经历写下来。对“英雄小八路”的事迹有了充分的了解后,王添成老师发现这是个很好的题材,可以加以艺术创作,成为文艺作品,于是便开始着手写《英雄小八路》话剧脚本,并找到校领导希望能进行排练演出,但由于各种原因,其愿望未能实现。1960 年 5 月,上海戏剧学院陈耘老师带领五六个学生到厦门来访慰问“英雄小八路”。陈耘看了王添成的剧作脚本,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随即结合自己的采访所得编写了话剧《英雄小八路》,并于同年“六一”儿童节在福州公演。回上海后,该话剧又在上海公演,引起全市轰动,各中小学校还掀起了学习“英雄小八路”的热潮。上海市委为了让更多的青少年学习“英雄小八路”的勇敢精神,同时,也为了向党的 40 周年献礼,决定将“英雄小八路”搬上银幕,并把任务交给了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接到任务后,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非常重视,安排该制片厂办公室主任周郁辉任编剧,并特别请观众熟悉的《长虹号起义》、《地下少先队》的导演高衡出任该片导演、有着 30 多年丰富摄影经验的老摄影师石凤岐任摄影,又从上海各学校挑选了五位小演员扮演影片中的“小八路”。1960 年 9 月,编剧周郁辉和导演高衡到厦门深入生活,搜集有关材料,访问了“英雄小八路”群体和当时领导“小八路”斗争的公社党委书记、“小八路”所在的学校等,并在厦门市党政军领导的关怀和指导下,对这部电影剧本进行了四五次修改。10 月 20 日,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到厦门开拍电影《英雄小八路》,于振寰、冯笑等剧组演职员进驻厦门第三中学,并在前沿拍摄了外景镜头。导演夜以继日地赶写电影分镜头本。演员组积极深入体验生活,并根据角色需要,分别下部队、公社、学校,与村民、战士和“小八路”交朋友,进行军事操练和劳动锻炼。[13]

1960 年 12 月 29 日,在驻厦门江头解放军某师部礼堂举行的“慰问前线三军大会”上,《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第一次公开演唱,指挥王添成,手风琴伴奏是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的冯笑、凤凰,合唱团的成员有“英雄小八路”队员和电影剧组的小演员们。从此,《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歌声响彻前沿,传遍厦门,飞向全国 1961 年 1 月,电影《英雄小八路》在厦门拍摄完成,1962 年正式上演,并在全国各地热播,反响强烈。“英雄小八路”和那个走出自然灾害困境的时代相辉映,成为亿万人崇拜的英雄。[14]

18 年后的 1978 年 10 月 27 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十届一中全会通过决议,将电影《英雄小八路》主题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确定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它激昂的旋律及其旋律背后的故事,激励着一代又代的中国少先队员战胜困难,勇往直前。

(二)电影《小城春秋》

电影《小城春秋》极具时代魅力,它让人怀想那个年代的人和事,以及电影人的风采和时代的变迁。《小城春秋》是福建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第一部故事片,承载着当年福建电影人的梦想和努力福建电影制片厂成立于 1958 年 7 月,以摄制新闻纪录片、科教片、木偶艺术片、旅游风光片等为主,没有故事片拍摄权。1962 年,由于各种原因取消了建制,1979 年又恢复了建制。恢复建制后,福建电影制片厂在许多方面是一片空白。办公室简陋,职工没有宿舍,更谈不上什么先进设备,可是福建电影人不甘心这样沉寂下去,大家都想拍个故事片,而且要拍个好片子,来证明自己的实力让福建电影制片厂有个新的起步。当时制片厂定下调子,拍摄的故事片必须取材于一部成功的、为社会所认可的小说,而且要能体现福建地域特色。很快,高云览的《小城春秋》和司马文森的《风雨桐江》(后来拍成电影《欢乐英雄》、《阴阳界》)摆在面前。经过商议,大家认为《小城春秋》知名度更大,且故事性强,情节好,篇幅适中,正好可以改编成电影剧本,更主要的是反映了福建地下党革命斗争的历史,非常适合作为福建电影制片厂拍摄第一部故事片的选题。于是,当时的年轻编剧蒋夷牧和陈耕承担起改编的任务,全厂上下也全动

员了起来。[15]

就在这时,却突然传来“不利”的消息:北京电影制片厂也准备拍摄《小城春秋》,而且当时福建电影制片厂还没有取得故事片的拍摄权。眼看福建自己的第一部故事片就要“胎死腹中”,时任福影厂厂长的吴形立刻带领编剧蒋夷牧弃赴北京,找了许多闽籍的老领导,请他们出面帮忙疏通。他们先找到杨成武将军,听完家乡来的客人说完情况,杨成武立刻表示,鼓励他们拍摄《小城春秋》。他铺开信纸,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黄镇和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汪洋写信,请他们给予支持。第三天,吴形、蒋夷牧找到文化部部长黄镇。“我支持福影厂拍摄《小城春秋》,原则上就这么定了,希望你们能拍好这部片子。”黄镇很干脆地表态。这无疑给他俩注入一针强心剂。其后,当时的国家电影局局长陈播也同意由福影厂拍摄这部电影,福影厂因此取得了个宝贵“指标”。福影厂从北京电影制片厂“抢”来《小城春秋》,吴形和蒋夷牧担心北影厂厂长汪洋不高兴。他们想去说明情况,又怕对方生气造成尴尬场面,于是他们挑了个汪洋不在家的时候,登门拜访。汪洋的夫人接待了他们,从谈话中,他们感觉到,汪洋厂长对此事心中并无芥蒂,并且对福影厂也很支持,大家这才完全放心了。[16]

之后,福影厂全力投入《小城春秋》的拍摄工作,除了请长春电影制片厂罗泰担任导演、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朱永德担任摄像、著名演员梁波罗担任男主角以外,其余的如服装、道具、美术、制片、剧务以及其他演职人员全部用本省的人才。资金投入也不多,一部分由省里支持,一部分靠贷款,总额最多几十万。《小城春秋》1980 年 11 月投拍,拍摄了三四个月,1981 年 3 月正式发行放映。这部电影培养了福建早期电影的一批精兵强将。1984 年福建电影制片厂获得了国家批准的故事片拍摄权,成为当时我国仅有的 16 家拥有故事片拍摄权的制片厂之。从此,福建电影制片厂在中国影坛占有了席之地。[17]

1980 年 11 月,影片《小城春秋》在厦门开拍。这部影片全片采用实景拍摄,使整部影片的画面真实可信,不但缩短了周期还节约了开支。影片中的一些镜头选在厦门鼓浪屿拍摄,如有一个镜头是在鼓浪屿虎巷拍摄的,这个巷窄小,两旁房屋破旧,加上附近有一座日本式的红楼房,保留着解放前的特色;革命知识分子何剑平和特务赵雄的家庭场景是在鼓浪屿旗山路 7 号一座 30 年代的建筑物里拍摄的,这座建筑物的造型和屋内的摆设与剧情十分贴切。当时,屋子的主人李锦志及其全家 13 口人,为福建省第一部故事片能选在他们家拍摄而愉快并辛苦地忙碌了一个月,他们借道具、折服装、端茶送水、打扫卫生,俨然是一组“编外”的摄制工作者,直到 1980 年 12 月 28 日在他们家拍摄的镜头全部完成,他们才依依不舍地告别摄制组;反映革命者在狱中的生活和劫狱战斗的许多镜头是在“厦门破狱斗争旧址”拍摄的,当时,为还原这所监狱的场景,摄制组还对部分房屋设施进行了维修;在厦门胡里山炮台原清兵营和周边海滨等地也拍摄了些镜头,当时驻扎在胡里山炮台附近的某部九连官兵还热情地为摄制组提供了许多方便。此外,《小城春秋》还在泉州拍摄了一些外景,由梁波罗与徐佳音扮演的男女主角相约会面的两个场景,其中一个是在泉州清源山“第一山”石桥边枫树下拍摄的,另一个会面的场景是在泉州开元寺东塔下拍摄的。《小城春秋》是最早部在泉州清源山上取景的电影,《小城春秋》放映后,清源山独特的自然景观吸引了一批批电影摄制组专程前来取景。[18]

(三)电影《海囚》

《海囚》将发生在厦门的这段可歌可泣的史实搬上了银屏,同时也将闻南,特别是厦门的印记深深地烙在了影片上。如影片中不时闪现的出砖入石、马鞍脊等南民居建筑特色;武术指导是厦门的闽南五祖拳教练曾谋尧;影片中的插曲,地是流传于闽南的民歌等等。

1981 年 3 月 15 日,《海囚》在厦门鼓浪屿正式开拍。为了取得符合剧本要求的 100 多年前具有浓厚闻南地方色彩的实景,摄制组在厦门及闽南地区四处寻觅当时遗留的相似的旧址。在厦门,摄制组找到了鼓浪屿宾馆中楼原黄奕住别墅作为英国领事馆、胡里山炮台原清兵营作为关押“猪仔”的“猪仔馆”;在泉州的后城街找到了古老的民房建筑,作为 100 多年前厦门的一条街道;在晋江的青阳公社清华大队烟边巷、永宁公社的城隍庙大门前,找到了符合影片中人物的住家、“建南行”等。此外,还在泉州的开元寺、平潭的关帝庙等都拍摄了一些镜头。[19]

《海囚》中主要角色张天乙的一段戏选在了厦门海沧农村拍摄。当时,海沧一个村口外的空地上,生长着一棵高大茂盛的大榕树,它同根生着五株巨大的树干,遮盖着近 200 平方米的地面。不远处有条小河逶迤流过,沿着河上的小木桥走过去,便是一片广阔的田地。在这棵大榕树下,所要拍的戏是厦门有名的闯棍头子张天乙,被洋奴买办所利用,干了一些拐卖“猪仔”的勾当;最后,在他自己亲

手造成的悲剧中猛省过来。这场戏正是他被迫做最后一次打“猪仔”买卖,却恰巧打了他的亲生儿子小碰。当摄制组的五六辆卡车、发电车隆隆开进村口的时候,这个宁静的小看着扮演张天乙的著名演员张连文和其他演员们剃着半边光头,拖着大辫子,穿着 100 多年前的服装,人们笑着、谈着,孩子们不断冲过警戒线,跑来跑去,想看看张连文的辫子是真的还是假的。张连文在旁认真做着开拍前的最后准备,因为这场戏很重要,12 个镜头,每一个都有他。他既要表现出在此情节中人物复杂的内心矛盾,又要有干净利索的形体动作。扮演张小碰的小演员智强,为了掌握被闯棍打昏的表情,一次又一次地叫人用塑料木棍打他,棍子打断了,还不肯间歇……“预备一一开始!”导演一声令下。紧张的拍摄开始了。榕树下,张天乙潜伏树干旁……张小碰手提竹篮,满怀着对父亲的思念匆匆赶路而来……张天乙跃过树干,飞起木棍,打倒小碰……张天乙扎好袋口。一手挟着小碰,一手拎着竹篮,大步走去……等到导演最后一次喊“停”的时侯,张连文已经是满头大汗,再也没有力气抱起小碰了。而小演员智强从麻袋里钻出来的时候,也是气喘吁吁脸色发白了。这场戏没有间歇地拍摄了四五个小时,演职员们连晚饭都忘了吃。在《海囚》的拍摄过程中,不但主要演员废寝忘食,其他演员也同样刻苦敬业。影片中有许多武打的场面,参加拍摄武打场面的演员,全都由厦门人客串,大多是曾谋尧的徒弟。他们在开拍前四个月就开始练功了,每天上午都要练三个多小时,每次都练得汗流浃背,而拍在影片上只有几分钟就过去了。[20]

《海囚》在全国热播后,其独特的艺术成就引起了观众的共鸣。《海囚》分上、下两集,作为当时少有的彩色宽银幕故事片而风靡一时,并获北影厂“小百花”奖。风格上,《海囚》注重悲壮、悲愤、气势磅礴、粗犷浓烈,强调悲与愤的交融,表现激昂壮烈、可歌可泣的民族精神;表现手法上,影片的结构吸收了我国古典戏剧的表现手法,悬念迭生,起伏跌宕,引人人胜,《海四》让演员的表演和镜头的运用都完成在“动”的处理中,加强悬念的设计、安排,从而达到突出人物、深化主题的目的,较好地体现了主旨,烘托了全剧的悲刷结局。[21]

三、厦语片简史

战后 40 年代末至 60 年代中,香港出产了 240 多部厦语电影，这批电影大部分由来自菲律宾、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闽籍商人投资，市场主要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等地。[22]厦语片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即不再厦门拍摄，面向的市场也不是厦门，但是却是粤语片风靡前，风靡东南亚的方言电影。在厦语片风行时期，也产生了很多的厦门籍演员。

最早的厦语片产生于 20 世纪 30 年代，究竟是哪一部影片是第一部厦语片众说纷纭，厦语片”何时开始,现在找不到可考的文献。相关研究者认为,约拍摄于 1933 年的《陈靖姑》是最早的厦语影片,根据福建地方女神陈靖姑“扶胎救产,保赤幼童”的神话故事改编。[23]1936 年有两部厦语片上座率很高。一部名为《郑元和》,另一部是《陈三五娘》,说的都不过是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但因为取材于闽南一带的民间传说,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很受南语地区的观众欢迎。1947 年,香港拍摄首部“厦语片”《相逢恨晚》,其中一个外景地在厦门,新光影业公司为此片在报上刊登广告,高薪聘请懂闽南语的女演员,19 岁的厦门学生鹭红胜出,成为该片的女主角。同年 8 月“厦语片”《厦门风光》开拍,并在厦门公开招募演员。1948 年 7 月《破镜重圆》在厦门上映,该片在厦门连续放映一个多星期,场场爆满。20 世纪 50 年代是港产“厦语片”飞速发展的时期。1950 年 8 月,《相逢恨晚》在台湾地区首映,备受观众欢迎。此片随即传播至东南亚地区,观众反响强烈。同年,《唐伯虎点秋香》在南洋各地公映,打破以往票房纪录。到 1958 年,在新加坡、马来亚、非律宾等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地区首映的“厦语片”已达到 70 部,比当年港产国语片还多。此后厦语影片一度停止拍摄。[24]

“厦语片”的风行造就了一大批知名的导演、演员和公司。著名导演有毕虎、王天林、马徐维邻、周诗禄、程刚、袁秋枫等,著名男演员有白云、黄英、关发和东南亚著名歌星舒云、林冲等,女演员有花雪芳、江帆、小雯、鹭红、凌波、白兰、丁兰等。因出品“厦语片”而闻名的公司有“一中”、“南风“闽声”、“暨南”金都”、“邵氏”、“新华”和小娟创办的“华夏”等。“厦语片”中知名的古装影片有《唐伯虎点秋香》、《梁山伯与祝英台》、《荔镜缘》、《彩楼配》;时装片有《儿女情深》、《厦门阿姐》、《鸾凤和鸣》等。[25]

参考文献:
[1] 雅克·奥蒙,姬风.关于细节的细节[J].世界影,2025,(02):31-43.
[2] 周宇峰.电影叙事艺术研究[M].文化发展

出版社:2023,12.181.

[3] 洪卜仁.厦门电影百年[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129.

[4] 洪卜仁.厦门电影百年[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8.

[5] 洪卜仁.厦门电影百年[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9.

[6] 洪卜仁.厦门电影百年[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9.

[7] 洪卜仁.厦门电影百年[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10.

[8] 洪卜仁.厦门电影百年[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10.

[9] 洪卜仁.厦门电影百年[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126.

[10]洪卜仁.厦门电影百年[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174.

[11]雷荣通,概况厦门市近十年电影票房走势.郭振家主编,厦门年鉴,鹭江出版社,2002,295,年鉴.

[12]洪卜仁.厦门电影百年[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49.

[13]洪卜仁.厦门电影百年[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50.

[14]洪卜仁.厦门电影百年[M].厦门:厦门大学版社,2007:51.

[15]洪卜仁.厦门电影百年[M].厦门:厦门大学版社,2007:62.

[16]洪卜仁.厦门电影百年[M].厦门:厦门大学版社,2007:63.

[17]洪卜仁.厦门电影百年[M].厦门:厦门大学版社,2007:63.

[18]洪卜仁.厦门电影百年[M].厦门:厦门大学版社,2007:64.

[19]洪卜仁.厦门电影百年[M].厦门:厦门大学版社,2007:73.

[20]洪卜仁.厦门电影百年[M].厦门:厦门大学版社,2007:74.

[21]洪卜仁.厦门电影百年[M].厦门:厦门大学版社,2007:75.

[22]吴君玉.香港厦语电影的兴衰与题材的流[J].电影艺术，2012(4):97—104.

[23]洪卜仁.厦门电影百年[M].厦门:厦门大学版社，2007:11—12.

[24]洪卜仁.厦门电影百年[M].厦门:厦门大学版社，2007,第 12.

[25]洪卜仁.厦门电影百年[M].厦门:厦门大学版社，2007,第 13.

基于 CIPP 模型的大学英语课程思政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丁建华

（唐山师范学院，河北 唐山 063009）

摘　要：本文基于 CIPP 评价模型构建大学英语课程思政三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德尔菲法对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论证。基于专家意见修改初步构建的指标体系。经过计算，各级指标的变异系数均低于 15%，确定最终评价指标体系。根据萨蒂 9 级标度法构造两两比较判断矩阵，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级指标权重值并通过一致性检验，最终形成一级指标 4 个，二级指标 12 个，三级指标 25 个。研究致力于为大学英语课程思政评价提供一定参考。

关键词：CIPP；大学英语；课程思政；评价指标体系

基金项目：唐山师范学院 2024 年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2024JG12）

DOI：doi.org/10.70693/jyxb.v1i4.133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dex System for College English Courses Based on the CIPP Model

Ding Jianhua[1]

[1] *International Affairs Office, Tangshan Normal University, Tangshan,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ree-leve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college English courses based on the CIPP evaluation model. The Delphi method is employed to validate the proposed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the initially developed system is refined based on expert feedback. After calculation, the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for all indicators at each level is found to be below 15%, confirming the final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Using Saaty's nine-point scale, pairwise comparison judgment matrices are constructed, and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is applied to determine the weight values of indicators at each level, all of which pass the consistency test. The final system comprises 4 first-level indicators, 12 second-level indicators, and 25 third-level indicators.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evaluat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ntegration in college English courses.

Keywords: CIPP; College English;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一、引言

大学英语作为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关键环节，既要提升学生的英语实际运用能力，也要贯彻立德树人的根本教育宗旨。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实施，旨在将思想政治教育有机融入大学英语教学全过程，通过语言学习与价值引领相结合，引导学生树立家国情怀、拓宽国际视野、提升跨文化沟通能力，从而培养兼具高尚品德与卓越才能的复合型人才。目前，以大学英语为代表的外语类课程思政研究主要聚焦在外语课程思政的理论探讨，外语课程思政资源建设，外语类课程教学模式、教学内容、教师角色构建等研究，以及外语类课程思政的实现路径等。但是大学英语、外语专业、高职英语等课程思政的微观性、实证性、案例性研究较薄弱，尤其是对教学质量与教学效果评价方面的研究相对缺乏（赵应吉，董保华，2022；谢争艳，严玉婷，2022；王欣欣，任桂婷，

作者简介：丁建华(1992—)，女，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为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2024）。因此，构建系统的大学英语课程思政评价体系将成为未来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研究趋势和重点。

CIPP（Context 环境、Input 输入、Process 过程和 Product 产出）评价模型由 Stufflebeam 提出，旨在通过积极主动的评估方法促进教育的改进（Stufflebeam，1983）。CIPP 评价模型突出评价发展性功能，具有反思性和决策导向性的特点，适用于课程评价（黄凌云，2022）。CIPP 评价模型已广泛应用于教育评价。国内已有学者将 CIPP 评价模型运用在高校课程思政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建设（许祥云，王佳佳，2022；董保珠等，2025）、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评价（许瑞芳，张岩，2023）等研究中。CIPP 评价模型的动态性、诊断性和系统性使其与高校课程思政教育评价具有很高的适切性。

二、CIPP 评价模型与大学英语课程思政评价的适切性

（一）四维框架与课程思政育人逻辑的适切性

背景评价（Context）契合课程思政的教学目标。背景评价需要分析学校办学定位、学生学情以及社会需求等，以此为基础来确定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确保课程思政的方向性和针对性。输入评价（Input）契合课程思政的教学方案和课程资源。《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指出课程思政建设的组织实施和条件保障核心在于全面规划的设计组织方案以及统筹各类资源进行支持保障，来对课程思政这项系统工程奠定良好的实施基础。因此，教学方案和课程资源是输入评价的主要参考标准。过程评价（Process）契合课程思政的教学实施全过程。教师是课程思政建设过程的关键，课堂教学要将课程思政贯穿教学全过程，同时还要创新模式扩展教学场域。因此课程思政的实施要考虑到教学主体、教学过程。成果评价（Product）契合课程思政的教学效果。学生思政素养、教师思政教学能力以及思政教学效果均是成果评价的要素。

（二）动态过程与课程思政过程性评价的适切性

CIPP 评价模型包含诊断性评价、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可以对评价对象进行全面系统的评估,侧重于过程评估和及时反馈，是一种从计划到组织实施再到改进的动态过程（魏子秋，何雍祯，2021）。而过程性评价是课程思政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为调整教学策略、提供个性化指导提供依据。因此 CIPP 模型的形成性评价机制可高度契合课程思政的动态教学过程。

三、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初步建立三级评价指标体系

结合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的特点，构建包括背景评价、输入评价、过程评价和成果评价四个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基于《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大学英语教学指南》等文件，依托 CIPP 评价模型，初步制定大学英语课程思政评价指标体系。包含 4 个一级指标、13 个二级指标、25 个三级指标。见表 1。

表 1 大学英语课程思政评价指标体系初建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A1 背景评价	B1 政策环境	C1 与政策方针契合度	1.课程目标与国家教育方针、《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等文件契合
		C2 学校顶层设计	2.学校顶层设计涵盖课程思政内容
	B2 需求分析	C3 学生成长需求	3.课程思政内容与学生成长需求、专业发展需求密切相关
		C4 职业素养要求	4.课程思政匹配学生未来职业素养要求
	B3 课程目标	C5 教学目标设计	5.课程思政教学目标明确、合理，能够体现“价值塑造、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的融合
	B4 教学资源	C6 教材文化内容配置	6.教材中中西文化内容配置合理
		C7 本土化思政素材库建设	7.建有融入中国故事、本土案例的课程思政素材库或案例库
		C8 数字化教学资源	8.微课、线上平台等数字化教学资源丰富
A2 输入评价	B5 师资队伍	C9AI 平台应用	9.运用 AI 平台进行智能预习与学情分析
		C10 教师思政理论与育人意识	10.教师掌握思政理论、具备育人意识
		C11 思政元素融入教学	11.教师具备将思政元素有机融入语言教学的能力
		C12 思政培训与教研	12.教师能够参与课程思政相关培训与教研活动
	B6 课程设计	C13 思政元素内容	13.思政元素在课程教学内容中所占比重合理
		C14 教学实施方法与手段	14.课程设计中明确了课程思政实施方法和教学手段
A3 过程评价	B7 教学内容	C15 思政元素融入教学内容	15.思政元素与课文主题、语言知识点的结合自然、

			贴切，做到“润物无声”
	B8 教学方法	C16 多元化教学方法	16.采用项目式学习、情景模拟、混合式教学等方法，利用技术手段创设真实语境
	B9 学生表现	C17 学生课堂参与与思辨表现	17.学生在课堂讨论、角色扮演、项目汇报等活动中表现积极、体现思辨思维
	B10 教学管理	C18 教学管理与制度	18.课堂教学管理规范，线上线下结合的学习管理制度健全
		C19 常态化教研机制	19.形成常态化集体备课等教研机制
	B11 学生发展	C20 学生英语应用能力	20.学生英语应用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高
		C21 学生思政素养	21.学生家国情怀、文化自信、职业道德等思政素养的养成情况
A4 成果评价		C22 中国文化国际化展示能力	22.学生能够用英语有效讲述中国故事，通过演讲、短视频、实践报告等成果展示中国形象
	B12 教师发展	C23 教师教学能力	23.教学反思以及教研能力的提升
		C24 教师教学成果	24.教师在课程思政方面的教学改革成果、获奖情况
	B13 社会效应	C25 社会及用人单位反馈	25.社会及用人单位对学生表现评价情况

（二）三级评价指标体系的厘定

1.专家信息和专家权威系数

本文采用德尔菲法对初步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论证。通过多轮征询专家意见，研判其对各项指标的认可度与重要性判断，并据此对指标体系进行修改完善，形成具有专家共识、科学可靠的课程思政评价指标体系。本次研究共邀请了14 位专家,其中有 12 位专家接受邀请,积极系数为 85.71%。12 位专家的基本信息见表 2。

表 2 专家基本信息

基本情况	项目	比例
职称类别	教授	25%
	副教授	41.67%
	讲师	33.33%
职务类别	教学岗	83.33%
	行政管理岗	16.67%
承担课程类型	专业课程	33.33%
	思政类课程	16.67%
	综合素质类课程	50%
课程思政研究年限	1 年以内	8.33%
	1-2 年	8.33%
	2-3 年	15.38%
	3 年以上	66.67%

专家的权威程度用专家权威系数(Cr)来表示,计算公式为 Cr=(Ca+Cs)/2（杨良斌，2017）。Ca 代表专家对问题的判断依据，Cs 代表专家对问题的熟悉程度。Ca 主要源于实践经验、理论分析、参考国内外文献以及直观感受四个方面。本文参考张筠（2023）的计算方式，得出专家权威系数的平均值为 0.85，见表 3。若专家权威系数 Cr≥0.7，即认为调查结果可靠，因此本次参与调查的专家权威程度较高，调查结果可靠。

表 3 专家权威系数

	判断依据(Ca)	熟悉程度(Cs)	权威系数(Cr)
总和	11.6	8.8	10.2
人数	12	12	12
均值	0.967	0.733	0.85

2.专家意见和指标修订

通过回收专家征询问卷，共收集 5 条意见。专家普遍认为“微课、线上平台等数字化教学资源丰富”表述不清晰，建议更换为“具备微课、线上平台等数字化教学资源且有技术支持”；因测量方式不具体，建议删除“社会效应”指标；建议修改“学生发展”指标为“教学效果”，修改“教师发展”指标为“课程影响”，并增加课程推广方面的评价指标。

在首轮专家意见的基础上，调整指标体系，进而形成用于第二轮征询的问卷。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设计问卷，数值 1，2，3，4，5 分别对应很不重要，不重要，一般重要，重要，很重要这五个重要程度。问卷对每项指标进行打分。根据问卷结果对专家意见的协调程度展开分析。本文使用 SPSS 计算应用标准差的变异系数（CV）来体现调查结果的协调程度。由于标准差的变异系数既受标准差的影响，又受平均数的影响，因此通过标准差的变异系数说明调查结果的协调程度时，须同时给出变异系数、平均数和标准差（范晓玲，2005）。三级指标的变异系数见表 4、表 5、表 6。

表 4 一级指标变异系数和相关数值

一级指标	有效人数	平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CV)
A1 背景评价	12	4.347	0.15	0.035
A2 输入评价	12	4.6	0.163	0.036
A3 过程评价	12	4.458	0.252	0.056
A4 成果评价	12	4.458	0.237	0.053

表 5 二级指标变异系数和相关数值

二级指标	有效人数	平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CV)
B1 政策环境	12	4.208	0.498	0.118
B2 需求分析	12	4.167	0.326	0.078
B3 课程目标	12	4.667	0.492	0.106
B4 教学资源	12	4.396	0.225	0.051
B5 师资队伍	12	4.611	0.343	0.074
B6 课程设计	12	4.792	0.257	0.054
B7 教学内容	12	4.417	0.515	0.117
B8 教学方法	12	4.5	0.522	0.116
B9 学生表现	12	4.583	0.515	0.112
B10 教学管理	12	4.333	0.326	0.075
B11 教学效果	12	4.472	0.361	0.081
B12 课程影响	12	4.444	0.328	0.074

表 6 三级指标变异系数和相关数值

三级指标	有效人数	平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CV)
C1 与政策方针契合度	12	4.083	0.515	0.126
C2 学校顶层设计	12	4.333	0.651	0.15
C3 学生成长需求	12	4.167	0.389	0.093
C4 职业素养要求	12	4.167	0.389	0.093
C5 教学目标设计	12	4.667	0.492	0.106
C6 教材文化内容配置	12	4.417	0.515	0.117
C7 本土化思政素材库建设	12	4.583	0.515	0.112
C8 数字化教学资源	12	4.333	0.492	0.114
C9AI 平台应用	12	4.25	0.452	0.106
C10 教师思政理论与育人意识	12	4.667	0.492	0.106
C11 思政元素融入教学	12	4.583	0.515	0.112
C12 思政培训与教研	12	4.583	0.515	0.112
C13 思政元素内容	12	4.667	0.492	0.106
C14 教学实施方法与手段	12	4.917	0.289	0.059
C15 思政元素融入教学内容	12	4.417	0.515	0.117
C16 多元化教学方法	12	4.5	0.522	0.116
C17 学生课堂参与与思辨表现	12	4.583	0.515	0.112
C18 教学管理与制度	12	4.167	0.389	0.093
C19 常态化教研机制	12	4.5	0.522	0.116
C20 学生英语应用能力	12	4.583	0.515	0.112
C21 学生思政素养	12	4.25	0.622	0.146
C22 中国文化国际化展示能力	12	4.583	0.515	0.112
C23 教师教学能力	12	4.583	0.515	0.112
C24 教师教学成果	12	4.417	0.515	0.117
C25 课程思政推广	12	4.333	0.492	0.114

分析显示，各级指标的变异系数均低于 15%。当变异系数低于 20%时，即可认为专家对指标重要性的评判意见协调一致，不存在显著分歧。基于此统计结果，可以判定现有指标体系已获得专家共识，无需进行进一步修改。

四、确定指标体系权重

1.构造判断矩阵

为保证评价指标体系权重的客观性和合理性，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值。根据萨蒂 9 级标度法（表 7）两两对比同一个层次的两个指标间的重要性并进行赋值，构造两两比较判断矩阵（表 8）。

表 7 9 级标度法及含义

标度	标度含义
1	两个因素比较同等重要
3	两个因素比较，前一个因素比后一个因素略微重要
5	两个因素比较，前一个因素比后一个因素明显重要
7	两个因素比较，前一个因素比后一个因素强烈重要
9	两个因素比较，前一个因素比后一个因素绝对重要
2，4，6，8	上述两个相邻判断的中值
倒数	若指标 i 与指标 j 比较得以上某一个标度值 f_{ij}，那么指标 j 与 i 比较即为该标度值的倒数，即 $f_{ji}=1/f_{ij}$。

表 8 一级指标判断矩阵示例

大学英语课程思政评价指标体系	A1 背景评价	A2 输入评价	A3 过程评价	A4 成果评价
A1 背景评价	1	1/4	1/3	3
A2 输入评价	4	1	2	5
A3 过程评价	3	1/2	1	4
A4 成果评价	1/3	1/5	1/4	1

2. 一致性检验

本文依据层次分析法原理计算权重一致性 CI（$=\frac{\lambda_{max}-n}{n-1}$）与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RI 之间的比率 CR。通过 SPSS 进行 AHP 层次分析和一致性检验，结果显示全部权重 CR 值均小于 0.10，满足一致性要求，权重分配合理。最终的大学英语课程思政评价指标体系以及指标权重见表 9。

表 9 基于 CIPP 模型的大学英语课程思政评价指标体系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相对权重	三级指标 相对权重	三级指标 综合权重	指标说明
A1 背景评价 (0.118)	B1 政策环境 (0.260)	C1 与政策方针契合度（0.750）	0.023	1.课程目标与国家教育方针、《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等文件契合
		C2 学校顶层设计（0.250）	0.008	2.学校顶层设计涵盖课程思政内容
	B2 需求分析 (0.160)	C3 学生成长需求（0.667）	0.013	3.课程思政内容与学生成长需求、专业发展需求密切相关
		C4 职业素养要求（0.333）	0.006	4.课程思政匹配学生未来职业素养要求
	B3 课程目标 (0.580)	C5 教学目标设计（1.000）	0.068	5.课程思政教学目标明确、合理，能够体现“价值塑造、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的融合
A2 输入评价 (0.489)	B4 教学资源 (0.310)	C6 教材文化内容配置（0.300）	0.045	6.教材中中西文化内容配置合理
		C7 本土化思政素材库建设（0.400）	0.061	7.建有融入中国故事、本土案例的课程思政素材库或案例库
		C8 数字化教学资源（0.150）	0.023	8.具备微课、线上平台等数字化教学资源且有技术支持
		C9AI 平台应用（0.150）	0.023	9.运用 AI 平台进行智能预习与学情分析
	B5 师资队伍 (0.490)	C10 教师思政理论与育人意识（0.550）	0.132	10.教师掌握思政理论、具备育人意识
		C11 思政元素融入教学（0.320）	0.077	11.教师具备将思政元素有机融入语言教学的能力
		C12 思政培训与教研（0.130）	0.031	12.教师能够参与课程思政相关培训与教研活动
	B6 课程设计 (0.200)	C13 思政元素内容（0.667）	0.065	13.思政元素在课程教学内容中所占比重合理
		C14 教学实施方法与手段（0.333）	0.033	14.课程设计中明确了课程思政实施方法和教学手段
A3 过程评价 (0.314)	B7 教学内容 (0.350)	C15 思政元素融入教学内容（1.000）	0.110	15.思政元素与课文主题、语言知识点的结合自然、贴切，做到“润物无声”
	B8 教学方法 (0.400)	C16 多元化教学方法（1.000）	0.126	16.采用项目式学习、情景模拟、混合式教学等方法，利用技术手段创设真实语境
	B9 学生表现 (0.200)	C17 学生课堂参与与思辨表现（1.000）	0.063	17.学生在课堂讨论、角色扮演、项目汇报等活动中表现积极、体现思辨思维
	B10 教学管理 (0.050)	C18 教学管理与制度（0.400）	0.006	18.课堂教学管理规范，线上线下结合的学习管理制度健全
		C19 常态化教研机制（0.600）	0.009	19.形成常态化集体备课等教研机制
A4 成果评价 (0.079)	B11 教学效果 (0.750)	C20 学生英语应用能力（0.300）	0.018	20.学生英语应用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高
		C21 学生思政素养（0.500）	0.030	21.学生家国情怀、文化自信、职业道德等思政素养的养成情况
		C22 中国文化国际化展示能力（0.200）	0.012	22.学生能够用英语有效讲述中国故事，通过演讲、短视频、实践报告等成果展示中国形象
		C23 教师教学能力（0.300）	0.006	23.教学反思以及教研能力的提升
	B12 课程影响 (0.250)	C24 教师教学成果（0.500）	0.010	24.教师在课程思政方面的教学改革成果、获奖情况
		C25 课程思政推广（0.200）	0.004	25.课程思政实施方法获得推广

五、结语

本文以 CIPP 评价模型为基础，构建了包含 4 个一级指标、12 个二级指标和 25 个三级指标的大学英语课程思政评价指标体系，每个三级指标下设指标说明。指标体系聚焦于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教学实践，也涵盖政策与制度设计。本文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判断矩阵并为指标权重赋值，确保权重的客观性和合理性。但目前的研究尚未从教学管理、学生等角度进行信度效度检验。同时，研究还需结合大学英语课程思政育人的动态发展进行调整。未来将展开进一步研究，增强该评价体系在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建设中的适用性、全面性与深入性。

参考文献：

[1]赵应吉,董保华,.外语课程思政研究的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2015 — 2021)[J]. 外国语文,2022,(06):129-139.

[2]谢争艳,严玉婷,.外语课程思政研究的可视化分析(2017—2021)[J].外语研究,2022,(04):53-58.

[3]王欣欣,任桂婷,.国内高校英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的现状、热点与趋势——一项基于CiteSpace的可视化研究[J].大学,2024,(02):19-22.

[4]Stufflebeam, D.L, The CIPP Model For Program Evaluation[J]. Evaluation Models, 1983(6):117-141.

[5]黄凌云,.基于CIPP模型: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成效评价研究[J].教育学术月刊,2022,(02):57-63.

[6]许祥云,王佳佳,.高校课程思政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基于CIPP评价模式的理论框架[J].高校教育管理,2022,(01):47-60.

[7]董保珠,王颖,刘明鼎,.基于CIPP评价模型的高校课程思政评价指标体系构建[J].唐山学院学报,2025,(04):93-101.

[8]许瑞芳,张岩,.基于CIPP模型的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评价研究[J].思想政治课研究,2023,(03):132-141.

[9]魏子秋,何雍祯,.基于CIPP模型构建课程思政评价体系——以“供应链管理”课程为例[J].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3):76-81.

[10]杨良斌编著.信息分析方法与实践[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33.

[11]张筠.基于CIPP评价的高职院校课程思政评价体系研究[D].西南大学,2023(10).

[12]范晓玲编著. 教育统计学与SPSS[M].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62-91.

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藏中国佛教造像碑概述

王颖

（上海立达学院，上海 201600）

摘　要：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内造像藏品资源丰富，在展的佛教主题石刻造像有三，时间分布为北魏晚期、东魏晚期、北齐晚期，通过造像内容解读、铭文释读、风格解析发现：无纪年佛教石碑为“燃灯佛、释迦牟尼与弥勒”的三世佛、“释迦多宝二佛并坐”主题，年代为北齐晚期；公元 520 年造像碑出自山西吉县，建造年代为北魏神龟三年，主题有上下生弥勒、释迦牟尼说法、维摩文殊对坐、思惟太子，造像整体风格继承北魏云冈石窟，混有南朝遗风；东魏武定二年（公元 544 年）一佛二菩萨背屏式造像并非出于纪念李洪演而造，造像风格有明显北魏晚期向北齐过渡的特点，且比石窟造像的过渡要早，二菩萨身份不可确定。

关键词：二佛并坐；弥勒；北朝；三世佛

DOI：doi.org/10.70693/jyxb.v1i4.134

Overview of Chinese Buddhist Statue Steles in the Collections of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Wang Ying[1]

Shanghai Lida University , Shanghai , China

Abstract: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boasts a rich collection of sculptures, featuring three Buddhist-themed stone sculptures on display, dating from the late Northern Wei, late Eastern Wei, and late Northern Qi periods. Through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tent of the sculptures, interpretation of inscriptions, and analysis of styles, it was discovered that the undated Buddhist stone tablets depict the Three Buddhas of the Three Ages, namely "Buddha of the Lamp, Shakyamuni, and Maitreya", as well as the theme of "Shakyamuni and the Treasure Buddha Sitting Together". The tablets date back to the late Northern Qi period. The sculpture tablet made in 520 AD originates from Jixian County, Shanxi Province, and was constructed in the third year of the Shengui era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Its themes include the Upper and Lower Maitreya, Shakyamuni Teaching, Vimalakirti and Manjusri Sitting Together, and the Contemplative Prince. The overall style of the sculpture inherits the style of the Yungang Grottoes i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mixed with the style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The back-screen style sculpture of one Buddha and two Bodhisattvas in the second year of Wuding in the Eastern Wei Dynasty (544 AD) was not created to commemorate Li Hongyan , the style of which exhibits a clear style transition from the late Northern Wei to the Northern Qi period, and this transition precedes the transition of grotto sculptures , and the identities of the two Bodhisattvas cannot be determined.

Keywords:Two sitting together Buddhas ; Maitreya; Northern Dynasty; Three-Period Buddha

作者简介：王颖(1995—)，女，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艺术史、视觉设计

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在展的佛教主题石刻造像分别为 1 块纪年背屏式造像、2 通中国北朝佛教造像碑，其中 1 通纪年造像碑，1 通无纪年造像碑，造像精美，存在内容误释，缺乏专题研究的问题，下文将从造像内容解读、铭文释读、风格解析等角度对其进行详细解读。

一、北齐佛教石碑

根据博物馆资料介绍，此碑（如图 1、2、3、4[1]）名为“Buddhist Stele”，即佛教石碑，高 163 厘米，长 26.7 厘米，宽 19.1 厘米，石灰岩材质，由艺术基金支持购买，藏品编号：A.61-1937，藏品介绍上显示铭文记载了出资修建此碑的捐赠者姓名，但是铭文并不完整，认为很是罕见，可能是因为献词仪式必须在某个吉日举行，而雕刻者没有足够的时间将所有捐赠者的名字都刻进去。本人梳理中国现有造像碑遗存发现，这种情况已出现多例，原因各不相同，有的是因为供养人没有在规定时间内交付钱款，有的是因为中途放弃供养，或是因为“造像碑已进入市场领域，石匠先雕刻佛像，留出造像题记和邑子名的位置，施主购得再刊记添名。”[1]

此碑为方形扁体碑，碑阳面通体造像，其他三面仅上龛造像，装饰纹样华丽，造像题材丰富。碑的四面上端均为三片连续叶子装饰，碑阳从上至下分为三层龛，首龛顶部有两条装饰带，上条为 7 个重复的忍冬纹，下条为轴对称的 6 片心形装饰叶，龛内顶部为对称式分布的两条蛇，尾部相接，下为一菩萨二弟子二菩萨组合像，主尊双目微睁，面带微笑，脸部方圆，善跏趺坐于金刚座上，脚底为一对面朝前方的卧狮，主尊赤足踏狮头，着菩萨装，头戴宝冠，附有缯带，缯带沿肩下落至坐台两侧，上着斜肩内衣，下着裙，腰部系带贴体下垂至台座下缘，肩披帔帛于腰部穿环呈 X 形交叉，下垂绕膝，上绕肘部，贴台座下垂，尾接狮尾，手部残缺，但根据现有造像惯例，应为说法印，根据中国可考的纪年造像碑，此龛主尊的菩萨装为在兜率天宫说法的身份，善跏趺坐意味着其为佛陀身份。身旁的二弟子着僧装站立于其后，二胁侍菩萨斜朝主尊赤足直立，凸出主尊所在平面，头戴光芒纹冠，带手镯，双手合十于胸前，双目微睁，下着裙，腰部系带贴体下垂，附有短缯带，肩披帔帛于膝盖中部穿环呈 X 形交叉，上绕肘部，贴体下垂。造像碑中该主尊的表现形式自北魏 520 年至隋之前一直存在。

阳面中层龛顶部为 5 个兽面纹口衔珠串交错下垂于帷帐，龛下缘以摩尼宝珠为中心轴对称分布麦穗纹样。龛内为“释迦多宝二佛并坐”，此题材流行于北魏晚期至隋代，主要是北齐时期，基本上均以主龛雕刻，出自《妙法莲华经》，二者双唇微抿，左佛为低平磨光肉髻，浅浮雕圆形头光，左手施与愿印，右手抚膝，内着僧祇支，腰间系带，着双领下垂式袈裟，右领下缘敷搭左肘，衣襞覆坛，结跏趺坐于镂空坐具上，右佛也为低平磨光肉髻，浅浮雕圆形头光，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抚膝，内着僧祇支，腰间系带，着双领下垂式袈裟，右领下缘敷搭左肩下垂，衣襞覆坛，与左佛一同结跏趺坐于一镂空坐具，坐具中间设一

图 1 北齐佛教石碑阳面

1 图片来源：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官网：https://collections.vam.ac.uk/item/O34032/stele-unknown/，碑的左右方位是以碑阳面为参照，而非面向碑阳。

竖柱，从佛像的服装风格、兽面纹等元素，可以锁定其为北齐晚期作品。

图 2 北齐佛教石碑阴面

图 3 碑左侧面

图 4 碑右侧面

碑阳下龛为一佛二弟子组合，尖楣顶龛，高浮雕镂空，主尊低平磨光肉髻，浅浮雕圆形头光面带古风式微笑，结跏趺坐于须弥座，衣襞覆坛只覆盖台座上半部，左手施与愿，右手残缺，内着僧祇支，袒右式袈裟，当为释迦牟尼。二弟子双手至于袖下站立于插件式莲蓬上，身份为一迦叶一阿难。

碑阴部（如图 2）顶部为植物纹，下有两条相同的叶形装饰带，下设矩形龛，尖楣顶龛，龛内左边为高浮雕结跏趺坐于方形台座的手执灯（似古代燃烧状态的烛台）者，有高浮雕圆形头光，右为跪朝左像者，有头光，小肚微凸，双手合十，头部带帽，有垂带，此主题当表现佛本生故事“燃灯佛授记释迦牟尼”，此题材在北魏至唐代均有表现，北魏晚期至北齐时期较多，主要分布在中国河洛地区，具体内容：燃灯佛又名定光佛，定光佛为佛陀时，释迦牟尼为儒童，定光佛预言释迦牟尼此后会成佛。现有石窟（云冈石窟的北魏窟第 18 窟南壁西部图像、第 12 窟前室西壁）、单体造像（中亚斯瓦特遗址的犍陀罗风格定光佛立像）、背屏式造像（北魏皇兴五年弥勒像背面图案）以及其他造像碑（北魏末期洛阳平等寺造像碑、天水麦积山北魏末期 10 号造像碑、山东博兴北齐造像碑等）[2]中关于“燃灯佛授记释迦牟尼”的图像表现为：一佛陀站立或者弯腰，剩余组成元素为其旁有 2-3 个童子争着献花，或者是一人跪在地上将头发盖在泥土上以便让佛陀踏过，或是佛陀的头光上莲花与肩膀上莲花合计 7 朵，或者是佛陀头光上有 7 朵莲花，通常还会结合女子图像，图像与经文或者铭文描述大致对应，相关的经文为孙吴时期支谦译《佛说太子瑞应本起经》、东汉时期竺大力与康孟祥译《修行本起经》、南朝刘宋时期天竺三藏求那跋陀译《过去现在因果经》、南朝刘宋时期宋宝云译《佛本行经》卷五、隋代阇那崛多译《佛本行经》卷三，经文内容上相差不多，童子献花的图像与阿育王施土姻缘相像，常常被混淆。虽然此龛图像内容与前者均不相同，但根据题材的分布年代和地域，以及其他碑面的题材（碑阳上龛的弥勒、最下龛的释迦牟尼与此龛的燃灯佛构成竖三世佛，表现时间上的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以表佛法传承的连续性）来看，当是“燃灯佛授记释迦牟尼”，至于为何把佛陀雕刻成戴帽子的形象，可能是因为雕刻工匠不明白佛教义理，将其与太子形象混淆。

碑左侧面为圆拱形龛，内有一直立佛像，低平磨光肉髻，右手下垂，左手施与愿印，着双领下垂式佛装。碑右侧面为方弧形龛，内有一禅定佛，结跏趺坐于金刚坐上。

综合来看，此通造像碑表现“燃灯佛、释迦牟尼与弥勒”的三世佛、“释迦多宝二佛并坐”主题，年代为北齐晚期，“燃灯佛授记释迦牟尼”的燃灯佛为手执灯，此前未见。

二、北魏神龟三年（520 年）李僧智等造佛石像碑

此碑在馆信息为：名称是“stele”，时间为公元 520 年（正光元年），出于山西省。笔者实地考察发现此碑四面开龛，平顶式佛教造像碑，为佛

教邑义组织合资建造，通过铭文考释、造像内容和风格解析，发现此碑出于山西吉县，建造年代为北魏神龟三年，造像主题有上下生弥勒、释迦牟尼说法、维摩文殊对坐、思惟太子，造像整体风格继承北魏云冈石窟，混有南朝遗风。详细内容见《北魏神龟三年（520 年）李僧智等造佛石像碑研究》专题论文。

三、东魏武定二年（公元 544 年）一佛二菩萨背屏式造像

图 5 公元 544 年一佛二菩萨造像碑

此碑馆藏信息为：“刻有公元 544 年的日期，石刻作品，石灰岩，高 92.5 厘米，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V&A）最重要的佛教石雕之一，藏品编号：FE.7-1971，是为纪念李洪演而雕刻，它可能来自中国北方，可能位于公共场所，供路人朝拜，具体是陕西和河南两省交界处，可以察觉到各种瑕疵，尤其是佛像面部上的褐色痕迹。除了手部、面部和底座等区域因持续触摸而变得光滑外，表面普遍凹凸不平。正面雕刻有释迦牟尼（佛陀）的图像，高逾 77 厘米，右手举着无畏印，两侧各有一尊菩萨，均为高浮雕，可能是观音（观世音菩萨）和达什奇（大势至菩萨），现在无头的观世音菩萨右手持一朵莲花。底座的侧面则刻有五位捐赠者的名字，其中三位来自同一家庭。底座正面刻有一段长铭文。光环的背面原本布满了雕刻图案，但如今已所剩无几。主要图像是一尊巨大的坐像释迦牟尼，但仅有一部分留存。两侧的菩萨也仅部分可见。顶部刻有两尊小坐佛像，它们代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佛陀（迦叶、释迦牟尼、弥勒），由于石碑断裂，第三尊佛像已缺失。背面其余部分刻有飞天、施主像和装饰图案，其图像设计基于《法华经》。”

经考证，此碑正面的造像记内容有误释，正面造像特点描述不够细致，风格分析不明确，故下文作一细化研究。

据《金石萃编》记载，此像原先获得于陕西嘉县南二十里法云寺，故用途不应是放在路边供路人瞻仰。

从形制上看，此石刻作品为佛教主题的背屏式造像，正面底部刻有造像记，从内容可知，此作品造于武定二年三月一日，即东魏（公元 544 年），铭文内容从上往下，从右往左，结合造像特点逐步释读如下：

第一竖列：“□子李洪演”，与发愿文内容无关，缺损的地方按照以往惯例应当是“邑”，“邑子+姓名”代表出资供养人 xx，故此处代表李洪演是此碑的出资供养人之一，并非指“为纪念李洪演而雕刻”，同时表明此碑是佛教邑义组织合资供养。

后面发愿文提到与造像主题有关的文字为：“释迦出没”、“邑义”、“拾□嘉石于此/造宝像□区/庶钟万品等□十号”“颂曰/有释迦与体苞”“双林显末”，由此可知，正面主尊雕像为释迦佛，低平磨光肉髻，有四圈阴线刻的同心圆头光，方圆脸，唇部微笑幅度变大，更有亲和力，眼睛细长，具有真人的血肉感，目视前下方，具有东魏的时代特征，脖颈处有两条阴线纹，赤脚站立，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施与愿，内着袒左式僧祇支，但佛教造像通常是袒右式，腰间系带贴合身体下垂，横向带处中部以阴线刻划装饰，外着双肩下垂式袈裟敷搭左肘，薄衣贴体，保留了北魏时期就有的特点以及衣裙外展，在视觉呈现上更接近北齐佛装，不似东魏的石窟造像对服装厚度的表现，体现了从北魏晚期像北齐过渡的特点，这一变化在背屏式造像上的发展早于石窟造像的过渡，在右膀处雕 y 字纹，符合常规，但左膀处雕向下倾斜的纹样，较有特色，主尊总体样式既不同于东魏主要佛像分布地如河北、山西的石窟造像以及背屏式造像，也与陕西地区出土的其他纪年造像碑有所不同。

左侧菩萨束发头戴冠，发纹清晰可见，发冠中间为摩尼宝珠，赤脚立于磨光莲蓬上，方圆脸，眼部刻画似主尊，但立体感稍弱，鼻部损毁，嘴唇微抿，脖带花瓣形项圈，边缘内部阴线刻细线，

双肩披帔带，中部刻一阴线纹，帔带交叉于腹部穿环，下垂至腿部，上搭两肘下垂，此样式与东魏时期石窟的菩萨造像一致，左手残缺，右手带钏，搭于腿上，下着裙贴体，腰间系带，带结头部上翻。

右侧菩萨头部缺损，与左侧菩萨的区别在于，右手持有莲蕾，靠在腰侧，左手下垂搭在腿上，腰间系带中部刻有两装饰线条，结纽为圆环状，肩部帔带无装饰纹样，穿环方式特殊，

从现存实物看，中国圣观音图像和大势至菩萨的图示均有个演变过程。有学者指出：北朝最初出现的是“莲花手观音”：观音多以右手上举且握持长柄莲蕾，左手下垂体侧，或握帔帛，或持净瓶。此式观音在北魏太和年间（477-499）最为流行，大约在东、西魏之后趋于消失。而南朝最先出现的是双手分施无畏印和与愿印的像式，大约在 6 世纪初，北魏观音亦见类似像式。其后，此式观音与“莲花手观音”并行发展，至北周、北齐时占据主流。入隋以后，这种双手施印的观音像式基本消失。大约在 6 世纪 20 年代，双手分持净瓶和杨柳的观音像式开始出现，但头冠未见化佛，北朝类似实例出现稍晚，539 年后，此种造像渐增，西安出土的三尊北周白石观音造像的头冠中均雕刻了化佛，武周前后，“头戴化佛冠，双手分持净瓶和杨柳”成为圣观音标准样式，在全国普及，并延续至今。[3]大势至菩萨在经文当中的描述特征为肉髻上方有宝瓶或者头戴发冠“冠中住军持”，在中国的最早有榜题的例证是甘肃永靖炳灵寺 169 窟的西方三圣组合，即无量寿佛、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大势至菩萨为立像，普通菩萨装，没有宝瓶，其他要素与观音无差。根据纪年文字可知时间在公元 420 年，表现的是西方净土思想；其次是云冈第 13 窟东壁造像的三个菩萨像，根据铭文可知是公元 483 年，身份为：文殊菩萨、大势至菩萨和观音菩萨，但无法一一对照，交脚坐，头上也没有宝瓶元素。

结合东魏时期流行的题材为释迦牟尼、弥勒、思惟像以及少量无量寿佛、阿弥陀佛。可见，二菩萨造像不符合观音或者大势至菩萨造像图示，也没有铭文佐证，故二菩萨身份是不确定的。

此外，该造像背面现已模糊不清，故不对内容做展开推断。

综合来看，此件作品的释迦牟尼造像在东魏现存作品中独具特色，不可多得，为佛教邑义组织合资供养，不为纪念某人，其他造像内容在铭文中没有足够证据可以证明独特身份。

参考文献：

[1] 李静杰.佛教造像碑[J].敦煌学辑刊,1998,(01):81-86.

[2] 李静杰.造像碑佛本生本行故事雕刻[J].故宫博物院院刊,1996,(04):66-83.

[3] 邓新航.中国观音图像体系分类研究[J].法音,2022,(03):41-50.

[4] 李羚.净土信仰衍生图像实例三则——以大势至菩萨的图像学特征为中心[J].艺术设计研究,2012,(01):31-40.

[5] 吉薇羲.基于大势至菩萨的图像学特征为中心的净土信仰衍生图像探究审美完美结合分析[J].艺术科技,2013,26(05):138.

《觉醒》中的隐含作者

曹斐

（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北京 102202）

摘　要：《觉醒》是美国著名女作家凯特·肖邦的代表作，主要讲述了一位传统女性埃德娜的觉醒历程。本文运用韦恩·C. 布斯的“隐含作者”概念，试图论证：该小说中的隐含作者向那些即将踏上觉醒之路的人们，揭示了她们可能面临的困境与警示。

关键词：《觉醒》；隐含作者；女性觉醒；精神困境；叙事策略

DOI：doi.org/10.70693/jyxb.v1i4.136

The Implied Author in *The Awakening*

Cao Fei

China Fire and Rescue Institute, Beijing, China

Abstract: Kate Chopin's *The Awakening* traces the journey of Edna Pontellier, a conventional wife and mother, as she seeks self-discovery and liberation from the restrictive gender roles of late-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society. While often celebrated as a foundational feminist text, this paper proposes a more nuanced reading by employing Wayne C. Booth's concept of the "implied author." Rather than simply endorsing Edna's rebellion, the implied author—the artistic consciousness constructed through the novel's narrative choices—subtly critiques the limitations and inherent dangers of her awakening. Through an analysis of Edna's aimless pursuit of freedom, her solipsistic worldview, and her objectification of others in her quest for subjectivit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novel serves as a complex warning. It illuminates the psychological chaos, ethical isolation, and potential self-destruction that can accompany a quest for selfhood that lacks a coherent social or moral framework. Thus, The Awakening transcends a straightforward manifesto of female emancipation, emerging instead as a profound literary exploration of the intricate and often tragic dilemmas inherent in the modern pursuit of individual identity and agency.

Keywords: *The Awakening*; implied author; female awakening; spiritual dilemma; narrative strategy

引言

凯特·肖邦出生于圣路易斯，是美国著名的小说家与短篇小说作家。她以其作品中的地方色彩而闻名，并被视作 20 世纪女性主义作家的先驱之一。她关注女性的社会地位、婚姻与家庭、爱情与自由等问题及其困境。《觉醒》是她最著名的作品之一，自问世以来便吸引了众多评论家的关注。故事主要讲述了一位传统女性埃德娜的觉醒之旅：她离开家庭、搬入新居，拒绝服从丈夫与父亲的指令，甚至与一位声名狼藉的花花公子产生恋情，并试图成为一名艺术家、追求自己的爱情，但最终却走向了大海。该书首次出版于 1899 年。彼时，肖邦已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了数百篇短篇小说与散文，享有很高的声誉。然而，《觉醒》却因父权社会力量的强大而被视为异端，终结了她的文学生涯与声誉。当时社会大多数人无法接受埃德娜这样的行为，认为她是一个“不道德”的

作者简介：曹斐(1996—)，女，硕士，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女人。

《觉醒》的意义与艺术价值在此后长期未被正视。许多评论家曾严厉批判埃德娜的形象。例如，为肖邦撰写首部传记的丹尼尔·兰金认为，《觉醒》"背景设定充满异域风情，主题病态，动机色情"（175）。这一情况直到 20 世纪下半叶才有所改善。自 1960 年代该作品被重新发掘以来，学界围绕埃德娜的性格、她的英雄式抗争与悲剧命运、自我实现与母性之间的冲突等展开了大量研究。他们赞扬埃德娜勇敢反抗父权社会，并将其视为女性觉醒的先驱。例如，艾米丽·托特声称，埃德娜"冒险走进了此前没有女性涉足的领域，拓展了美国独立女性的定义"（14）。国内学者申丹也指出，《觉醒》是一部具有鲜明女性主义特征的作品。与之相对，也有评论家认为埃德娜并非真正的女性主义者。莫莉·J. 希尔德布兰德在《男性化的海洋：凯特·肖邦〈觉醒〉中的性别、艺术与自杀》一文中指出，埃德娜的觉醒实际上是她对当时社会男性特权的一种认同，她所追求的实则是成为社会中有权势的男性角色。此外，近年来许多学者将目光转向该小说的叙事技巧。国内许多研究生也从叙事视角、叙事修辞等角度对该作品进行了探讨。尽管对《觉醒》的叙事分析并不少见，但从"隐含作者"理论切入的研究却相对较少。作为著名文学批评家韦恩·C. 布斯提出的西方文论重要概念，"隐含作者"不仅为读者提供了更多阐释文本的可能，也使文本意义保持开放，从而更具吸引力。本文主要尝试从隐含作者的视角解读文本，以探索其潜在意义。

一、隐含作者：理论定位与文本阐释可能

"隐含作者"由韦恩·C.布斯在其 1969 年出版的《小说修辞学》中提出。该概念主要用于文学批评，主要指读者从文本中推断出的作者形象。布斯提出这一概念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当他在 1969 年提出"隐含作者"时，新批评与形式主义在文学批评中正盛行。与主张关注作者与文本背景的传统批评不同，这两种理论主张文学批评应回归文本本身。布斯的"隐含作者"则是新批评与传统批评之间的一个中介。"隐含作者"这一巧妙术语，一方面指向文本自身，符合内部批评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指向"文本的生产者"，使批评家能够考虑作者的意图、技巧与价值判断（申丹 81）。因此，他的"隐含作者"概念对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影响。

尽管布斯从未对"隐含作者"给出明确定义，但读者在阅读《小说修辞学》后可以推断，隐含作者指的是文本中呈现的作者形象。根据布斯的观点，隐含作者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选择我们所读内容的人；我们将其推断为一个理想的、文学的、被创造的真人版本；他是其自身所有选择的总和"（71）。血肉之躯的真实作者通过文本中的各种技巧创造出一个隐含作者。因此，真实作者与隐含作者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此外，"推断"也暗示隐含作者的形象与读者相关，不同的读者会推断出不同的隐含作者，这导致文本的意义保持开放。由于隐含作者因作品而异，为把握文本的潜在意义，读者必须摆脱对某一作者的固定理解。

就凯特·肖邦而言，大多数评论家与读者认为她是一位坚定的女性主义作家，她的作品揭示了父权社会的压迫，鼓励女性追求自身的权利与自由，并为自我而抗争。然而，通过对文本本身的细致分析可以发现，在她这部最著名的女性主义作品《觉醒》中，隐含作者实际上揭示了自我觉醒过程中潜藏的危险，小说是对那些即将踏上觉醒之路的人发出的迫切警示

二、觉醒的起点：微光与混沌

这个故事主要讲述了传统女性埃德娜的觉醒之旅。她在格兰德岛的假期中，首次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当第一次面对丈夫的无理指责时，她感到"一种难以言表的压抑"，过去习以为常的一切如今却让她痛苦（Chopin 34）。在这种压抑中，她开始了觉醒的旅程。她试图摆脱父权社会对她的一切束缚，进而追求自由。她拒绝成为一个传统的"母亲型女性"，离开家庭和孩子，搬进新居，并尝试成为一名艺术家，甚至拥有秘密情人……表面上她似乎获得了自由，但关键在于，这种无边的自由将她引向一个无法定义的未来，而这种混沌感一直持续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

当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时，她感到"一道微光开始在她心中朦胧地亮起"。这道光引导埃德娜"开始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并认识到她作为一个个体与内在及周遭世界的关系"。她不再将自己视为丈夫和孩子的附属品，开始了觉醒的旅程。但她同时也明白，"事物的开端，尤其是世界的开端，必然是模糊的、混乱的、混沌的，并且极其令人不安。我们之中有多少人能从这样的开端中走出来！有多少灵魂在其喧嚣中灭亡"（Chopin 14）。

可以发现，隐含作者用“模糊、混乱、混沌、极其令人不安”来描述她觉醒之初的状态。她知道某种事物已经开始、发生，但她不知道结局是什么，也从未试图去思考。从一开始，隐含作者就已提出警示：混沌而模糊的开端所带来的危险可能会毁灭她，但她从未认真对待。

相反，她总是让自己陷入这种混沌状态。当阿黛尔问她“你在想什么”时，埃德娜回答“什么都没想”，随后又说：“眼前的那片绿色，让我觉得我必须永远走下去，没有尽头……我一定是被它迷住了。”此外，她认为“这个夏天仿佛我又走在那片绿色的草地上；慵懒地、漫无目的地、无思无想、无人指引”（32）。这段描述与她首次学会游泳时的心境相呼应。她“想游到没有女人游过的地方去”（47）。可见她渴望自由，于是试图在一个充满限制的世界里摆脱一切束缚。但这种自由却使她陷入一种漫无目标、失去方向的状态。

当她第一次拒绝丈夫的指令，试图反抗丈夫并继续躺在吊床上时，她的梦境只给她“半醒半睡的意识留下某种不可企及之物的印象”；醒来走到室外后，“她并非在寻求任何外在或内在的源泉来获得精神振作或帮助。她只是盲目地追随任何推动她的冲动，仿佛她把自己交给了陌生的手来指引，从而让自己的灵魂免于责任”（55）。隐含作者明确地向读者展示了她盲目且漫无目的的生活。没有目标，她无法成为一名成功的艺术家。天气不好时她画不了画，即便天气晴朗，“由于缺乏雄心，也不追求成就，她仅从工作本身获得满足”（111）。作为一名艺术家，她没有明确的目标，最多只能算作一个艺术爱好者。

最终，这种混沌甚至影响了她的言语。在经历了来自情人罗伯特和朋友阿黛尔的双重打击后，她终于明白，只要生活在这个社会中，她就永远无法摆脱所有束缚。没有终点的意识，她的混沌感便永远无法消除。阿黛尔的分娩提醒她，自己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她永远无法摆脱母亲的身份。面对阿黛尔丈夫的关怀，她无法清晰地解释自己：“哦！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164）。当她最终决定走向海边时，她反复对自己说：“今天是阿罗宾；明天会是另一个人”（168）。对她而言，她从未思考过自己人生的结局与目标，她只想要开始，但目的地却从不明确。最终，她在永恒的混沌之海中溺亡。在海中，她再次忆起童年时那片无尽的草地，但她渐渐感到筋疲力尽。拉莫斯指出，这一意象暗示了埃德娜对自由的错误理解，即拒绝一切限制与界定。拉莫斯认为，“埃德娜未能定义自我，这使得她的生命失去了意义，她的死亡也因此成为对这种自由理解方式的一种警告”（147）。

在埃德娜生命的最后一幕中，她再次走向海边。隐含作者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向“一只翅膀受伤的鸟在空中挣扎、摇晃、拍打着翅膀，盘旋着，无能为力地向下、向下，坠入水中”（168）。这呼应了她觉醒之初那些“在喧嚣中灭亡的灵魂”，隐含作者从一开始就发出的警告“在结局中应验了”（Cuff 342）。然而，她始终未能看见。

三、主体建构的悖论：从被注视到注视他人

伴随混沌而来的另一重困境是主体建构的悖论。她试图摆脱传统社会的一切约束，努力追求自由。但这种自由是以忽视对他人的责任为代价的。她宣称不会全身心奉献给孩子；她不愿服从丈夫的指令；她想作为一名艺术家追求自己的生活。但她从未思考过自己在这个社会中的责任。她的自由建立在他人的宽容之上。她始终无法否认的是自己作为母亲的身份。但她对孩子的爱是“一种不均衡的、冲动的方式。有时她会充满激情地将他们拥入怀中；有时又会忘记他们”（34）。作为母亲，她深爱孩子，但一旦母爱与她的自由发生冲突，她会选择自由。当她从丈夫的房子搬到“鸽舍”时，她从未考虑过孩子。孩子们问他们是否会住在“鸽舍”，她只是回答：“仙女们会把一切安排好的”（140）。这意味着她从未计划让孩子介入她的生活。

对于丈夫，她过于冷漠。她从未试图向丈夫解释她的打算。如前所述，她只是盲目地追随自己的心绪。她从未考虑过自己的自由意志给丈夫带来的麻烦。她私下决定不参加妹妹的婚礼，这引发了父亲的愤怒。而她完全没有考虑如何解决。最终，是她的丈夫替她道歉，并为她的妹妹送去结婚礼物；她未通知丈夫便从旧居搬到了新公寓等等。似乎她从不考虑他人。即便对于罗伯特，她要求罗伯特接受她的爱并勇敢地与她在一起，这只是她一厢情愿地认为罗伯特能做到。但她从未问过罗伯特是否愿意。

与她相比，她周围的人却如此宽容。她的丈夫不断地解决她造成的麻烦；怀孕的阿黛尔不遗余力地照顾她，甚至在她与声名狼藉的花花公子阿尔塞的恋情公之于众后依然如此；赖斯小姐在她悲伤时扮演安慰者的角色等等。而她所做的只是追随内心，至于麻烦和问题的解决之道，从不在她的考虑范围。

更重要的是，她建构自我权力的方式“是以他人和其他存在模式为代价的”（Schweitzer 173），这主要体现在她作为画家的身份上。当她从一个总是作为沉默缪斯的客体化模特，转变为积极的艺术家时，她开始像男性观察者一样审视她的模特。当她欣赏阿黛尔美丽的容貌时，她用来描述阿黛尔的词语是“蓝宝石”、“樱桃”等，这些并不充满生命力的词汇。这一场景与庞特里耶先生最初看待埃德娜的视角如出一辙：“看着他的妻子，就像看着一件遭受了某种损坏的贵重个人财产”（14）。当她把阿黛尔视为模特时，她不仅将阿黛尔客体化，还要求阿黛尔提供情感价值。尽管她知道阿黛尔无法给予有价值的评判，但阿黛尔慷慨的赞美仍让埃德娜十分受用。事实上，埃德娜无意识地认同了男性在社会中的优越地位，并将自己获得独立的方式视为获取男性已有的特权。然而，她没有意识到的是，当她为自己争取到这种特权时，这仍然建立在牺牲其他女性的基础上。

除了阿黛尔，她的女仆们也成为了她的模特。她用“像野蛮人一样耐心”来形容她们（89）。她只将她们视为灵感的来源，却从不关心她们也是女性，也是独立的个体。她正在通过将他人客体化来建立自己的主体性。如果阿黛尔作为模特，尚能通过评价埃德娜的画作来表达自己，但对于这些女仆，埃德娜从未邀请她们发言。她没有给予她们表达的权利。她们依旧是沉默的群体。这不仅暗示了她的自私，也体现了她的种族与阶级特权。当她第一次看到墨西哥女人玛丽基塔时，她“上下打量着玛丽基塔，从她丑陋的棕色脚趾到她漂亮的黑眼睛，又看回来”（56）。这是一种明显的审视，充满了白人上层女性对有色人种女性的特权目光。这种目光与庞特里耶先生审视他的财产、他的妻子埃德娜和他的家具时的目光如出一辙。看似埃德娜推翻了父权权威，但实际上她不仅认同了男性的特权，还忽视了其他女性。有评论家认为，埃德娜的自杀正是由于她“无法摆脱施加在白人上层女性身上的传统约束”（179）。并且，“唯我主义，彻底的自我中心，永远无法为女性带来自由，因为这些建立在白人男性原则之上的观念，重新编码了一种将女性彼此隔离的个人主义”（Hildebrand 204）。肖邦曾给这个故事加过一个副标题：一个孤独的灵魂。“孤独”不仅用来描述埃德娜在社会中的孤立无援—无人理解与帮助她，也意味着她同样自私、以自我为中心，这也阻碍了她获得真正的自由。

结论

韦恩·C. 布斯的“隐含作者”概念在传统批评与新批评之间扮演了重要的中介角色。它既强调对文本本身的分析，也关注作者，对文学批评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一概念也引导读者摆脱对特定作者的定义，以探索文本的潜在意义。它为阐释文学作品提供了更多视角，为读者理解文学作品创造了更多可能性。《觉醒》被许多评论家和读者认定为一部女性主义作品，他们认为肖邦也是一位坚定的女性主义者。事实上，肖邦曾说过：“如果我的丈夫和母亲能重返人世，我觉得我会毫不犹豫地放弃他们离开后进入我生命中的一切，再次将我的存在与他们的融为一体。要做到这一点，我将不得不忘记过去十年我的成长——我真正的成长”（Seyersted 58）。

通过隐含作者这一理论视角重新解读《觉醒》，我们得以超越“女性主义颂歌”的单一阐释，进入文本更为复杂、甚至自反性的意义层次。肖邦通过其叙事建构，既同情埃德娜对自由与真实的渴望，又清醒地揭示了她精神世界的局限与危机。隐含作者的声音因而具有双重性：它鼓励女性觉醒，同时也警示觉醒之路布满认知陷阱与伦理困境。

《觉醒》之所以成为经典，正在于它不只讲述了一个女性反抗的故事，更以深刻的叙事智慧，呈现了人类在追求自由过程中普遍面临的自我认同、人际关系与意义追寻的难题。隐含作者通过埃德娜的形象，既点亮了那缕“微光”，也毫不回避地照亮了微光周围深邃的黑暗。这正是文学的力量所在：它不提供简单的答案，而是在复杂的叙述中，邀请读者与自我、与时代进行持续而诚恳的对话。

参考文献：

[1] RANKIN D. Chopin and Her Creole Stories [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32.

[2] TOTH E. The independent woman and "free" love [J]. The Massachusetts Review, 1975, 16(4): 647-664.

[3] SHEN D. What is the implied author? [J]. Style, 2011, 45(1): 80-98.

[4] BOOTH W C. The Rhetoric of Fiction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9.

[5] CHOPIN K. The Awakening [M]. New York: Barnes & Noble, 1995.

[6] RAMOS P. Unbearable realism: freedom, ethics and identity in “The Awakening” [J]. College Literature, 2010, 37(4): 145-165.

[7] CUFF M. Edna’s sense of an ending: a rhetorical analysis of Chopin’s use of narrative in The Awakening [J]. The Mississippi Quarterly, 2016, 69(3): 327-346.

[8] Cuff, Mary. "Edna's Sense of an Ending: A Rhetorical Analysis of Chopin's Use of Narrative in The Awakening." The Mississippi Quarterly, vol. 69, no. 3, 2016, pp. 327 – 346.

[9] SCHWEITZER I. Maternal discourse and the romance of self-possession in Kate Chopin’s The Awakening [J]. Boundary 2, 1990, 17(1): 158-186.

[10] HILDEBRAND M J. The masculine sea: gender, art, and suicide in Kate Chopin’s The Awakening [J]. American Literary Realism, 2016, 48(3): 189-208.

[11] SEYERSTED P. Kate Chopin: a critical biography [M].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9.

网络思政融入高校就业指导工作的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

武亮亮

（邯郸学院，河北 邯郸 056005）

摘 要：网络思政与就业指导是高校育人体系的重要环节，随着数字时代的深入发展和就业形势日趋严峻，其协同融合已成为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升毕业生培养质量的迫切课题，关系广大高校毕业生个人命运和社会整体发展。研究发现，网络思政与就业指导融合在实践中面临制度缺位、技术壁垒、“思政－就业”融合形式化碎片化、师资能力不足等诸多困境。本文基于系统耦合理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和生涯建构理论，通过文献与案例研究，探究网络思政融入就业指导工作的有效路径。研究认为，构建“制度－技术－内容－师资”四位一体的协同机制，是推动二者有机融合、助力毕业生高质量就业的关键。

关键词：网络思政；就业指导；协同育人；现实困境；突破路径

基金项目：2025 年邯郸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下应用型高校大学生就业能力提升策略研究”（Q2025364）；邯郸学院 2025 年网络思政育人精品项目“网络思政融入就业指导工作的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研究”（WLSZ202524）

DOI：https://doi.org/10.70693/jyxb.v1i4.137

Realistic Dilemmas And Breakthrough Paths In Integrating Network-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University Employment Guidance

Liangliang Wu

（HanDan university, HanDan, 056005）

Abstract:Network-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are vital components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nurturing system. With the deepening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ra and the increasingly severe employment landscape, their coordinated integration has become an urgent task for universities to implement the fundamental mission of "fostering virtue and cultivating talents" and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graduate cultivation. This integration is crucial to the personal destinies of a vast number of university graduates and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society. Research reveals that the integration of network-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aces numerous practical challenges, including institutional gaps, technological barriers, the formalistic and fragmented nature of "ideological-political-employment" integration, and insufficient faculty capabilities.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system coupling, constructivist learning, and career construction, this study explores effective pathways for integrating network-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employment guidance through literature and case studies. It argues that establishing a synergistic mechanism encompassing "institutions, technology, content, and faculty" is key to promoting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the two and facilitating high-quality employment for graduates.

Keywords:network-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mployment guidanc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作者简介：武亮亮(1990—)，男，硕士，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就业指导。

一、引言

网络思政是高校在“互联网+”背景下，为适应学生成长新特点、提升育人实效、推动思政教育创新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教育形态，也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实践样态[1]。高校毕业生是宝贵的人才资源，是保就业稳就业的重点群体，其就业状况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发展、民生福祉和社会稳定[2]。据教育部公布，2026 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 1270 万人，持续保持高位态势，加之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持续影响就业环境，使得毕业生面临的就业压力持续加剧。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4 年全国教育大会上明确指出：“要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不断拓展实践育人和网络育人的空间和阵地。”[3]。互联网已成为大学生获取信息、表达思想的主场域，网络思政作为高校立德树人在网络空间的补充和延伸，其与就业指导的深度融合，是践行“三全育人”理念的关键举措，也为破解就业结构性矛盾提供了创新突破口。将网络思政融入就业指导工作实践，本质上是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引领功能贯穿于学生的职业认知、求职准备、职业选择和生涯发展全过程，这种融合引导学生将个人价值实现与国家发展、社会需要紧密结合，帮助学生应对复杂职场环境，进而实现长远发展。然而，在高校实践中，网络思政与就业指导“融而不合”的现象普遍存在，因此系统分析融合过程中存在的现实困境，并探索破解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二、网络思政与就业指导融合的理论基础

（一）系统耦合理论

系统耦合理论是研究两个及以上系统要素或一个系统内的子系统之间耦合关系的相互作用和发展机理的理论[4]。高校育人工作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思想政治教育和就业指导是其中的两个子系统，二者都服务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且相互作用并影响。依据系统耦合论观点，打破子系统之间的壁垒，增加系统间的互动性和耦合性，能够产生“1+1＞2”的整体效应。网络思政与就业指导的融合，正是对系统耦合理论的实践和应用。

（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建构主义认为，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下，借助他人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5]。职业生涯规划与价值观的形成并非被动接受的过程，而是学生在真实的求职情境、社会观察与人际互动中主动建构的结果。网络思政融入就业指导，就是要创设富含价值元素的职业情境（如云端企业参观、校友访谈），引导学生在分析与解决实际职业问题的过程中，自主建构积极的职业态度和崇高的职业理想。

（三）生涯建构理论

生涯建构理论由美国职业心理学家萨维科斯于 2002 年提出，该理论强调生涯是个人通过一系列人生主题故事来赋予工作经历以意义的主观建构过程[6]。该理论关注个体的适应性、主观能动性和生命叙事。这为融合提供了切入点：就业指导不仅帮助学生“找到一份工作”，更要引导他们“讲好自己的生涯故事”，思考“为何而工作”。网络思政的价值引领恰好能帮助学生确立积极的人生叙事主题，如将个人奋斗融入国家乡村振兴、“制造强国”等宏大叙事之中，从而提升职业选择的境界与使命感。

三、网络思政融入高校就业指导工作的现实意义

（一）对大学生群体所面临心理与现实双重困境的积极回应与现实关切

在当今高压的就业竞争中，大学生尤其是应届毕业生容易滋生焦虑、“躺平”等消极心态，或是陷入盲目考公、考研、考编等跟风从众的心理困境。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为党和国家“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一历史使命[7]。网络思政作为高校思政教育在网络空间的延伸，能够有效拓展教育阵地、提升教育实效，增强学生的网络素养和思辨能力[8]，引导学生锚定价值观和培育职业精神，为学生提供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精神支撑，引导学生正视挫折，避免陷入功利化与短视化的误区，有效缓解毕业生“就业恐惧症”。

（二）这是顺应大学生作为“数字原生代”的本质特性和育人模式转型的本质要求

当代高校大学生是在互联网“浸泡”中成长起来的，是典型的“数字原生代”[9]，其认知模式、信息获取渠道与社交方式已深度重构，这就要求就业指导工作必须将主阵地延伸至网络空间，而网络思政现有的平台资源、技术工具和话语体系，如虚拟仿真实验室、AI 职业画像、弹幕互动思政课堂等，为推进就业指导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关键

要素。这种融合使就业指导工作能够突破时空限制，学生可通过 AI 模拟面试测评、元宇宙招聘会等新形态锤炼就业素养、深化职业认知，从而提高就业竞争力。

（三）服务于国家战略人才需求，破解人才供需结构性错配的战略支点

网络思政的核心作用在于，它能将“新质生产力”“数字中国”“人工智能+”等国家宏观战略转化为学生可直观感知的职业叙事与生涯主题。通过构建基于国家战略的行业案例库、邀请重点领域领军人物开展云端访谈、利用虚拟仿真技术再现“卡脖子”技术攻关场景等方式，网络思政能有效激发学生的报国情怀与使命担当，引导他们主动将个人职业理想融入国家发展蓝图。这种深度的价值引领与职业认同，是从源头上优化人才供给结构、纾解战略性领域人才供需矛盾的关键所在。

四、网络思政融入就业指导的现实困境

（一）顶层政策设计存在显著的融合“盲区”

通过研究教育部及有关部门出台的有关政策文件，发现有关“网络思政”的政策文件较少，且相关主题集中于网络课程和网络育人，有关“就业指导”的政策文件较多，但主要内容是就业创业政策宣传、招聘活动等的通知和意见，缺乏两者交叉融合的政策指导文件，这种制度设计上的泾渭分明让高校在政策执行层面难以找到切入点。例如，《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便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建设任务归于育人阵地的拓展，而将就业相关事宜全然划入人才政策与培养适配的范畴。

（二）技术壁垒下的“信息孤岛”与功能缺失

目前，市场上尚无专门的大学生职业发展和就业准备的思想政治教育平台，高校在网络思政教育中通常使用通用的网络资源平台，其呈现内容往往缺乏互动性和吸引力，且与就业系统、职业测评工具等相互独立，无法实现信息互通共享。各高校毕业生常用的就业服务平台如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省市级人社部门官网或公众号、各高校就业信息网站等，其主要作用是提供就业政策、招聘岗位信息、毕业去向登记等功能，部分高校探索性开发了职业兴趣测评工具、模拟面试室等，这些平台在内容和功能上相互独立且实际使用率不高。

（三）“思政 - 就业”教育融合形式化与碎片化

当前，大量网络思政资源库内容建设仍停留于对传统媒体内容的简单数字化搬运，与快速变化的就业市场相脱节，无法有效回应学生遇到的复杂思想困惑和价值选择难题。现有实践大多停留在“思政- 就业”的浅层叠加，如仅在职业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课程中穿插少量思政故事或视频片段，而未引导学生深入讨论其背后的职业精神，难以实现思想价值引领和职业技能素养提升的统一。

（四）师资能力单一化，部门间协同存在壁垒

网络思政与就业指导的深度融合，依托于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和高效的协同机制。一方面，传统的思政课教师对就业市场的动态和职业规划的专业知识了解普遍不足，而就业指导教师可能缺乏深厚的思政教育意识和能力。同时，思政教师和就业指导教师普遍面临数字素养不足的挑战，难以有效驾驭新兴技术平台；另一方面，在高校行政管理体系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通常由宣传部、学生工作部和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而就业指导工作则归属于招生就业处或就业服务中心，各部门之间在工作协同上存在一定壁垒，导致资源无法共享、信息沟通不畅等问题，融合工作难以协同开展，最终导致育人合力不足。

五、网络思政融入就业指导的突破路径

（一）构建专项制度体系，为网络思政与就业指导的有机融合提供制度保障

当前，网络思政与就业指导工作的融合处于非体系化探索阶段，其深层梗阻在于制度性支撑缺位。尽管部分高校已开展特色实践，如合肥工业大学通过构建 AI 赋能的生涯数据中台，整合了学情分析、科创竞赛、就业信息、谈心谈话等多类关键数据，为学生后续的生涯规划分析提供了数据支撑；西南石油大学开发的“能源报国”情境化课程矩阵，将能源安全观教育与生涯指导深度融合，实现了能源报国精神从知识传递到信念塑造的渗透；而电子科技大学则通过创立人机协同价值观引导模型，打造“i 思政大模型”，为学生在求职过程中提供了兼具价值引领与情感支持的智能陪伴等，但由于缺乏国家层面的顶层制度设计与系统性指导框架，各校的先进经验难以推广复制，育人成效呈现碎片化。因此，建议由教育部牵头研究并出台《网络思政与就业指导融合育人指导意见》，为高校实践提供权威依据。

（二）以数据融合为核心，重塑精准育人与就业

指导协同新范式

在数据整合层面，建议由教育主管部门牵头，建立跨部门的数据共享接口，打通大学生网络思政教育、国家就业服务平台等系统，为实现精准指导奠定数据基础。在高校层面，应建立校级“思政- 就业”融合数据中台，积极开发“思政内容精准送学+职业兴趣与性格测评+智能岗位匹配+职业路径规划”于一体的智慧思政与就业服务系统，使学生能够精准接收网络思政学习资源、精确匹配岗位信息。还应鼓励和支持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在思政教育与就业指导中的应用探索，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明确各职能部门的管理职责，形成推动工作的合力。

（三）就业指导课程“思政化”与网络思政内容“职业化”并行，形成协同效应

高校应着力构建“情境- 反思- 行动”的融合教学模式，在职业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课程中，多采用生动的案例分析、榜样故事、情景模拟等方式，替代枯燥的理论说教。创设基于真实职场伦理的道德困境案例，引导学生进行小组辩论和价值排序，最终形成个人的职业行为准则。引导学生思考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关系，通过介绍国家战略发展方向和“卡脖子”技术领域，激发学生报国之志。在毕业生求职阶段重点引入诚信、责任和工匠精神等内容，培养学生从学校到职场转变的抗压能力和奉献精神。同时，注重打造精品化网络课程资源，建设“行业思政案例库”，邀请业界专家和优秀校友介绍行业前沿、职业道德困境、价值抉择与解决方案，并将其录制成线上微课、短视频等，将鲜活的案例与思政理论相结合，同时满足学生线上、碎片化学习需求。

（四）建立双向培养机制与常态化的数字素养计划，为融合实践提供关键的师资保障

教师是决定网络思政与就业指导融合效果的关键因素。高校应探索建立“思政- 就业”教师教学共同体，制定系统性的师资培训计划，优先提升思政教师和就业指导教师的信息化素养及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能力，弥补其在技术应用上的短板。要求思政教师与就业指导教师共同设计并讲授融合课程，定期组织思政教师参加企业实践，增强其对就业市场的理解，同时，对就业指导教师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培训。在此基础上，积极开展信息化教学能力提升专项培训，聚焦“融合式在线教学情境创设”。例如，指导教师如何解读职业测评数据中的价值观倾向，并据此设计线上辩论、虚拟面试等蕴含价值选择的互动教学活动，帮助教师掌握在线课程设计、新媒体技术应用、网络思政平台应用与数据分析等技能。另外，还要在网络思政工作的创新中增加学校、社会与家庭之间的协同育人，增强育人合力[10]。

六、结论与展望

将网络思政融入就业指导是高校应对严峻就业形势、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举措。针对当前存在的整合困境，亟须进行系统的路径创新：通过“制度破壁”加强顶层统筹，通过“技术赋能”打通数据血脉，通过“内容重构”促进知行合一，通过“师资攻坚”提供人才保障。这一系列举措共同指向于构建一个协同发力、精准高效的新型育人生态，从而为服务国家战略人才需求、引导学生实现充分高质量就业提供可持续的支撑。

展望未来，随着元宇宙、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崛起，网络思政与就业指导的融合将迎来新的机遇与挑战。未来的研究与实践应更加关注智能技术在模拟职业情境、进行价值观测评与引导等方面的潜力和风险，不断探索人机协同育人的新模式。唯有坚持守正创新，持续深化对融合规律的认识与实践探索，才能构筑起新时代背景下高效、温暖且富有感召力的大学生就业支持体系，真正培养出既具备过硬专业技能，又怀抱远大理想情操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参考文献：

[1]冯甫.互联网背景下高校大学生网络思政的现存问题与应对举措[J].高教探索,2025,(S2):57-59.

[2]别敦荣.内外用力实现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J].中国大学生就业,2024,(11):3-10.

[3]习近平. 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朝着建成教育强国战略目标扎实迈进[N]. 人民日报，2024-09-11(01).

[4]李宇阳,周洪宇.如何完善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基于系统耦合理论的分析[J].中国教育学刊,2023,(08):59-63.

[5]万瑶,孙梅.职业教育任务本位课程信息化教学的优化路径——基于建构主义视角[J].成人教育,2023,43(09):82-88.

[6]樊颍达.高质量充分就业背景下大学

毕业生“反向”读职校行为分析——基于生涯建构理论的分析框架[J].职业技术教育,2025,46(20):63-69.

[7]王金元.习近平关于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重要论述的历史基础、主要特征和价值指向[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62(05):15-26.

[8]杨万贺.新时代构建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的三维考量[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4,(19):85-88.

[9]陈琳,戴建兵.数字化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工作内在逻辑的“变”与“不变”[J].黑龙江高教研究,2025,43(11):108-112.

[10]周春燕.融媒体视域下高职院校辅导员网络思政工作创新研究[J].鄂州大学学报,2025,32(02):29-31.

高校行政人员数智素养培训体系的优化路径研究

樊梅[1] 蒋宝晴[1] 唐瑛[1] 陈逸璇[1]

（1.四川大学，四川 成都 610041）

摘 要：在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向纵深推进的背景下，高校行政人员的数智素养已成为提升学校治理效能、优化师生服务品质的核心支撑要素。然而当前高校针对行政人员数智素养的培训普遍面临理念滞后、需求模糊、内容零散、方式单一、评估虚化的系统性困境，难以匹配数字化转型的现实需求。本文旨在剖析这些现实问题，并基于成人学习理论、ADDIE 系统性培训模型与柯氏四级评估模型，构建涵盖“精准化需求诊断、标准化能力框架、多元化教学实施、科学化效果评估、协同化组织保障”的五维闭环培训体系，为高校系统性提升行政队伍的数智素养、破解数字化转型“最后一公里”难题提供可行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高校行政人员；数智素养；培训体系；体系优化

DOI：doi.org/10.70693/jyxb.v1i4.138

Towards an Optimized Training System for Digital Intelligence Literacy of University Administrative Staff

Fan Mei, Jiang Baoqing, Tang Ying, Chen Yixuan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deepen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literacy of university administrative staff has become a core supporting element in enhancing institutional governance efficacy and optimizing service quality for faculty and students. However, current training programs aimed at improving such literacy generally suffer from systematic shortcomings, including outdated concepts, ambiguous needs, fragmented content, monotonous delivery methods, and ineffective evaluation mechanisms, which collectively fall short of meeting the practical demand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se practical challenges and, grounded in adult learning theory, the ADDIE systematic training model, and the Kirkpatrick Four-Level Evaluation Model, proposes a five-dimensional closed-loop training system. This framework encompasses “precise needs diagnosis, standardized competency framework, diversified instructional implementation, scientific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and collaborative organizational support.” It offers a feasible practical pathway for universities to systematically enhance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literacy of their administrative teams and overcome the“last mile”challenges i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Keywords:University Administrative Staff; Digital Intelligence Literacy; Training System; System Optimization

作者简介：樊 梅(1986—)，女，博士，研究方向为行政管理、医学教育管理、信息化建设；
蒋宝晴(1987—)，女，硕士，研究方向为行政管理、医学教育管理；
唐瑛(1990—)，女，博士，研究方向为行政管理、党务管理、医学教育管理；
陈逸璇(1991—)，女，博士，研究方向为医学教育管理、社会学。

通讯作者：樊梅

一、引言

随着“数字中国”战略的深入推进以及国家教育数字化行动的全面实施，高校在治理模式、服务形态与决策机制等方面正经历系统性重塑。智慧校园的全面建设、数据驱动的精准治理、基于人工智能的个性化服务，已成为衡量高校现代化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志。高校行政人员作为推动政策落地与服务优化的枢纽角色，对其数智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此外，2024 年，中央网信办、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2024 年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工作要点》，明确提出全面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的总体要求[1]，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也强调实施数字化赋能发展行动，推动各类教育工作者积极应对新技术变革[2]。当前，高校行政管理人员亟须通过系统性培训提升数智素养。然而，目前多数高校的数智培训体系仍难以有效支撑数字化转型的需求。因此，对高校行政人员数智素养培训体系进行系统性优化，已成为提升高校整体运行效能与核心竞争力的迫切任务。

二、当前数智素养培训体系的五大核心困境

（一）培训理念滞后：从“工具论”到“赋能论”的转型迟缓

当前，许多培训管理者仍将数智技术窄化为“软件操作技能”，未能从“重塑业务流程、赋能管理决策”的战略高度进行顶层设计[3]。这种认知局限导致培训目标被窄化为“掌握特定系统操作”，而非培养行政人员“用数据思考、用智能优化”的系统性思维与底层能力，最终使得培训体系难以驱动行政工作的实质性数字化转型。

（二）培训需求模糊：缺乏基于岗位胜任力的精准分析

培训内容的规划缺乏科学的需求分析作为支撑，多依赖于主观经验或盲目追随热点，缺乏针对不同序列、层级行政岗位的数智素养需求分析。这种精准性不足的培训设计，导致出现学非所用、训非所需的现象，不仅造成资源投入的浪费，也难以弥补实际工作中的关键能力短板。

（三）培训内容零散：缺乏阶梯式的课程体系

现有培训多为针对新上线系统或更新软件的应急性、零散化培训，培训内容较为“碎片化”，缺乏顶层设计与路径规划。由于缺乏一套从“基础数字素养”到“高级数据分析”，从“通用能力”到“专业应用”的阶梯式、模块化课程体系，学习者难以将知识有效整合，无法构建起支撑持续发展的完整数智素养架构。

（四）培训方式单一：违背成人学习的核心规律

行政人员作为成人学习者，其学习行为具有自我导向、经验依托、问题中心和追求实效的鲜明特征。而传统的单向灌输式讲座，恰恰忽视了这些规律，学习者陷入被动接收状态，导致参与度低，知识留存率差，最终造成技能向实践转化的效果不佳[4,5]。

（五）培训评估虚化：缺乏闭环式的效果追踪

现行培训评估大多停留在收集学员对课程的即时满意度反馈。对于学员是否真正掌握技能、是否应用于工作并改变行为、是否为组织创造业务价值，缺乏有效的追踪与衡量机制，评估结果无法为培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导致“培训-评估-改进”的管理闭环断裂[6]。

三、优化高校行政人员数智素养培训体系的三大支撑

（一）核心概念：数智素养的三维构成模型

高校行政人员的数智素养是一个复合型概念，具体包含三个核心维度：从技能层面的“基本数智知识与技能”，从思维层面的“高阶数智思维能力”，再到规范层面的“数智信念与伦理”[7]。这一系统模型为科学设计培训内容提供了清晰框架。

（二）方法论指导：ADDIE 系统性培训模型

ADDIE 模型通过分析（Analysis）、设计（Design）、开发（Development）、实施（Implementation）与评估（Evaluation）五个环环相扣的环节，为构建培训体系提供了系统化指引[8]。其核心价值在于以终为始的内在逻辑：它要求培训活动始于对业务需求的精准分析，并终于对培训效果的严谨评估，由此形成一个持续改进的闭环，确保培训成果能精准对接并支撑业务目标。

（三）效果衡量标尺：柯氏四级评估模型

柯氏四级评估模型作为经典理论，强调评估应贯穿从即时反应到长期价值的完整链条。将其引入数智培训体系，可推动评估理念实现根本性转变：从关注表层“满意度”，转向层层递进地验

证“学会、应用、见效”，从而将培训效果切实转化为可衡量的组织绩效[9]。

四、重构路径：数智素养培训体系的“五维闭环”模型

基于上述理论与现实分析，本文构建了“五维闭环”培训体系模型（见图 1）。该模型以“行政业务价值”为核心导向，通过五个相互关联、持续反馈的维度，深度融合培训设计与业务目标，形成一个动态循环的有机整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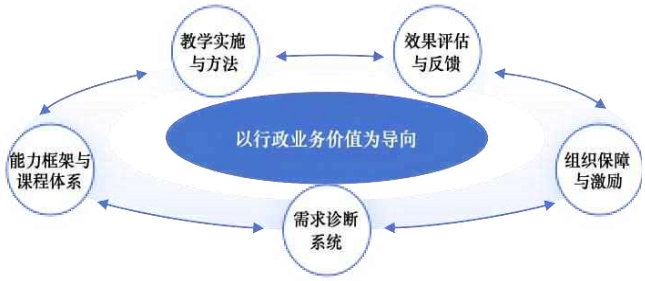

图 1. 高校行政人员数智素养培训体系“五维闭环”模型图

（一）精准化需求诊断系统

精准的需求诊断是构建培训体系的逻辑基石。采用三层分析法，系统性地将宏观战略转化为具体需求清单：

在组织层面进行系统分析，自上而下地对接学校数字化转型战略与中长期规划，以此明确支撑组织未来发展的核心数智素养方向。

在任务层面进行横向对标分析，依据数智素养五维模型，为教务、学工、科研等不同岗位序列，构建差异化的“数智胜任力模型”[10]，并设定清晰的能力等级标准。

在人员层面，采取自下而上的路径，综合运用线上测评、实操考核等方式，系统盘点在岗人员的实际能力水平，精准定位其与岗位胜任力模型之间的量化差距，从而确定核心培训需求。

（二）标准化能力框架与课程体系

在精准需求诊断的基础上，建立标准化的能力框架与模块化的课程矩阵：

1.制定分级能力标准

学校应以教育部《教师数字素养》标准为基本框架，紧密结合本校发展战略与行政岗位实际，研制校本化的行政人员数智素养评价标准。在此基础上，应针对不同岗位序列开发相应的测评量表，科学评估行政人员的数智素养水平，为人才培养、绩效考核与专业认证提供依据。同时，构建分层分类的行政人员数智素养发展模型，引导行政人员根据自身发展需求选择适配的学习路径，并通过精准的个性化诊断，实现对其数智素养的差异化、阶梯式精准培养[11]。

2.构建分层递进、业务耦合课程体系

高校行政人员数智素养课程体系的构建，应遵循“分层递进、业务耦合、数据驱动”的原则，形成覆盖基础操作到战略支撑的全方位培养框架。课程架构可设计为基础应用层（如办公系统自动化、数据可视化工具使用）、业务融合层（数据驱动的精准管理、AI 赋能的师生服务流程优化）与战略决策层（基于大数据的校情研判、智慧校园发展规划）三级模块，实现从工具熟练到智能决策的阶梯式能力跃升[12]。在内容上，需建立动态迭代机制，依托校园业务系统实时采集行政流程效能数据，精准诊断共性瓶颈与个体能力短板，并据此及时开发适配课程，例如将“大模型在公文处理与政策问答中的应用”设为必修内容，从而确保课程体系始终与高校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需求同步演进。

（三）多元化教学实施与方法

遵循成人学习规律，推动培训模式从“以教为主”向“以学为中心”转变。一是推行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线上以微课等形式高效传授基础知识，线下通过工作坊、案例研讨与实操训练深化复杂技能的内化与迁移；二是强化项目制学习应用，将培训内容嵌入真实业务场景，以实际项目驱动学员在解决问题中掌握数智技能；三是建立“数字导师制”与学习社群，选拔兼具业务专长与数智素养的骨干人员担任“数字导师”，提供常态化、个性化的辅导支持，并依托线上学习社群，促进知识共享与同伴互助，营造持续学习、共同成长的组织氛围[13]。

（四）科学化效果评估与反馈

运用柯氏四级评估模型，建立覆盖培训全流程的效果评估机制。在反应层，通过课堂反馈与即时问卷等方式采集学员对课程内容、讲师表现的直接评价，并对这些数据进行系统分析，为优化教学设计与改进培训流程提供依据。在学习层，采用技能认证考试、项目成果汇报等方式，检验学员对知识技能的实际掌握程度，并为完成模块学习的学员授予“微认证”数字徽章，实现学习成果的可视化与制度化[14]。在行为层，作为衡量培

训效果是否转化为实际工作效能的关键，在培训结束 3 至 6 个月后，通过上级访谈、行为观察与工作流程分析等方法，评估学员是否将所学应用于实际工作，并产生了积极的行为改变与技能迁移。最终在成果层，聚焦培训对组织产生的终极价值，通过对比培训前后在业务处理时效、师生满意度及资源节约率等关键绩效指标上的量化变化，综合论证培训对提升组织绩效的实际贡献与投资回报。所有评估结果将系统反馈至首轮“需求诊断”环节，为下一轮培训规划提供数据依据，最终形成“评估—反馈—优化”的可持续闭环。

（五）协同化组织保障与激励机制

为保障培训体系的持续有效运行，需构建“组织-制度-资源”三位一体的支撑体系。在组织层面，应成立由校领导牵头的“数智素养建设领导小组”，确立由人事处/教师发展中心统筹规划、信息网络中心提供技术支撑、各职能部门协同落实的分工机制，形成战略引领与跨部门联动的良好格局。在制度层面，将数智素养等级与绩效考核、职称晋升、评优评先等激励制度挂钩，激发行政人员从“要我学”转向“我要学”的内生动力，并为每位人员建立个人“数智素养档案”，持续记录其学习历程与认证成果。在资源层面，设立常态化专项培训经费，保障课程开发、师资聘请与平台建设顺利推进，同时着力培育内部讲师团队，将业务骨干的实践经验有效沉淀为可复制、可推广的组织智慧资产，为体系运转提供持续动力[15]。

五、结论与展望

构建面向未来的高校行政人员数智素养培训体系是复杂的系统工程，绝非简单的课程堆砌，而是涉及理念更新、流程再造与组织变革的深刻管理实践。本文提出的“五维闭环”模型，以精准需求为起点、以能力提升为核心、以业务价值为导向、以持续改进为目标，为高校数智培训提供了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可行性的框架。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EB/OL].(2024-08-06). 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202408/t20240826_1147269.html

[2]中央网信办等四部门印发《2024 年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工作要点》[EB/OL].(2024-02-03).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402/content_6933541.htm.

[3]杨鹃瑞.数智时代高校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提升路径探究[J].教育教学论坛,2025,(21):137-140.DOI:10.20263/j.cnki.jyjxlt.2025.21.022.

[4] 张腾.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数字化转型的路径分析[N].中国工业报,2025-05-26(015).

[5]李丽娇,朱有祥,成敏,等.基于冰山模型的高校思政课教师数智胜任力提升研究[J].昭通学院学报,2025,47(02):64-70.

[6] 段夏胤.大数据背景下事业单位人力资源培训与开发创新路径研究[J].市场瞭望,2025,(17):199-201.

[7]许亚锋,彭鲜,曹玥,等. 人机协同视域下教师数智素养之内涵、功能与发展[J]. 远程教育杂志,2020,38(6):13-21.

[8]蔡乐眉,万超,赖贞华.基于 ADDIE 模型构建新入职行政人员规范化培训体系——以 F 医院为例[J].中国总会计师,2025,(08):138-141.

[9]朱炎军.高校新教师岗前集中培训效果的评价与影响因素研究[J].黑龙江高教研究,2023,41(01):91-96.DOI:10.19903/j.cnki.cn23-1074/g.2023.01.019.

[10]范建丽,张新平. 大数据+智能时代的教师数智胜任力模型研究[J]. 远程教育杂志,2022,40(4):65-74.

[11]王致嫣.数字化转型背景下贵州应用型高校教师数字素养培养路径与评价研究[J].现代职业教育,2024,(30):81-84.

[12]温晶.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高校教师数字素养提升的目标体系与实施策略[J]. 学周刊,2025,31(31):151-154. DOI:10.16657/j.cnki.issn1673-9132.2025.31.038.

[13]舒晖,白彬兵,冯军.数智时代高校教师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路径研究[J].中国医学教育技术,2025,39(03):335-339. DOI:10.13566/j.cnki.cmet.cn61-1317/g4.202503008.

[14]黄庆双,李晓华.教师数字素养微认证：内涵特征、体系构建与实施路径[J].教育理论与实践,2024,44(07):39-44.

[15]刘冬冬,赵超琳.教师数字素养:历史演进、经验总结与培育路径——以欧洲以及美国、日本为例[J].继续教育研究,2025,(11):71-78.

政产学研用融合育人促进高职学生主体性发展研究

王夏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1）

摘 要：本研究聚焦数字化与创新驱动背景下教育、产业与政策的协同问题，旨在系统性解决三大核心问题：高职学生主体意识觉醒受何制约；“政产学研用”融合中的资源与利益难题如何解决；现有人才培养模式与产业需求脱节如何系统优化。本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研究构建促进学生主体性发展的理论框架与整合路径，为突破多主体协同育人瓶颈、深化产教融合提供兼具学理支撑与实践参考的新视角。

关键词：政产学研用融合；高职学生；主体性发展；育人机制

DOI：doi.org/10.70693/jyxb.v1i4.142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 Subjectivity Development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Government-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Application

Wang Xia

Hunan Railway Professional Technical College, Zhuzhou, Hunan, 412001)

Abstract: The study investigates the critical challenge of aligning educational outcomes with industrial and policy imperatives in an era of rapi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on-led growth.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address three interconnected problems. Firstly, it seeks to identify the constraints imposed by technological limitations, ethical dilemmas and pedagogical inertia on the cultivation of vocational students' subjectivity. Secondly, it will explore the mechanisms for overcoming resource fragmentation and aligning disparate interests within deeply integrated Government-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Application (GIURA) Integration. Thirdly, it will address the systemic disjunction between prevailing talent cultivation models and evolving disconnect. The research employs a method of literature analysis to construct an integrative framework and propose actionable pathways for fostering student subjectivity development. The objective of the present study is to provide a novel, theoretically grounded, and practically relevant perspective for advancing multi-stakeholder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and deepening the synergy between industry and vocational training.

Keywords:Government-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Application (GIURA) Integration;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Subjectivity Development; Educational mechanism

作者简介：王 夏(1995—)，女，博士，研究方向为教育学；课程设置
通讯作者：王 夏

引言

在全球经济数字化转型与创新驱动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教育体系、产业形态与公共治理之间的深度融合已成为推动社会进步与国家竞争力提升的核心动力。近年来，学术界围绕教育主体与产业创新融合、交通系统与产业创新、政产学研用协同机制等方向展开了广泛探讨，并取得了显著进展。研究表明，教育场域中主体意识的觉醒、技术赋能机制的构建以及教师角色的转型，正逐步重塑人才培养的范式（李子成等，2025；焦会银，2021）；高速交通系统等基础设施的演进，则为区域产业升级与制造业创新提供了物理支撑与发展契机（陈小鸿等，2025）；而在“政产学研用”多元协同框架下，创新资源的整合与人才培养体系的优化，已成为促进区域发展与产业转型的关键路径（蔡勇等，2025）。 这些研究为推动教育、交通、产业等领域创新发展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指导，但仍存在待解决的问题。

1.政产学研用融合育人视域下高职学生主体性发展的研究进展

当前，在推进教育强国建设、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时代背景下，深化“政产学研用”融合以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已成为我国职业教育改革的核心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在肯定“政产学研用”协同育人宏观框架的同时，愈发关注融合育人过程中“学生主体性发展”这一关键内核，形成了从机制构建到价值回归的研究转向。

1.1 政产学研用融合育人机制的构建与演进研究

早期研究侧重于从宏观制度和组织层面，探讨“政产学研用”融合的必要性与机制构建。学者们普遍认为，深化产教融合是破解教育供给侧与产业需求侧结构性矛盾、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的必然要求（孔艳丽等，2021）。相关研究揭示了传统融合模式中存在的“主体协同性不强”、“运行机制不通畅”等现实困境（陈克正，毛常明，2025），如各参与方目标错位、利益共享机制缺失等。为破解这些难题，研究主张构建“需求牵引—制度嵌入—价值共创”的融合发展新范式（任友群，2025），并通过具体的协同模式进行探索。

在模式探索上，王超等（2015）较早提出以共性问题需求为导向的“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模式，认为通过打破学科界限、创新人才培养与人事制度，可有效促进深度融合。龙春阳（2018）进一步指出，资源难以聚集是深度融合的主要障碍，需通过战略认同、利益回报、流动自由和平台共享等路径加以解决。张家宇（2018）以交通职业教育为例，提出通过创新机制体制、优化人才培养模式来对接供给侧与需求侧，从而提升职业院校服务能力。随着实践发展，融合模式不断拓展，唐军等（2022）提出了融合“政产学研用金”各类要素，以基金模式构建创新联合体的思路，旨在提高创新成果转化率。苏玉欢（2024）则以山区油菜产业为例，提出了多方主体联动和“四链合一”的协同发展模式。这些研究共同指向一个核心,有效的融合机制是协同育人得以实现的基础保障。

1.2 融合育人视域下高职学生主体性发展的多维度研究

随着产教融合实践的深化，研究焦点逐渐从外部机制建设转向育人过程本身，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的价值回归。这一转向明确了学生在融合育人体系中的三重核心主体地位：目标主体（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利益主体（保障学生发展权益）、实践主体（在真实情境中主动建构）。在此共识下，对学生主体性发展的探讨呈现出多维度深化态势。

首先，在意识觉醒与能动性激发层面。研究指出，学生主体性发展的根本在于其内在意识的觉醒。曲秀丽（2020）从思政教育角度论证，突出学生主体性能促进全面发展、实现师生良性互动。焦会银（2021）则从教师角色反思切入，指出教师的“平庸之恶”可能阻碍学生主体性发展，强调教师必须通过反思教学惯性、破除教学壁垒来为学生主体意识觉醒创设外部条件。这一观点将学生主体性的激发与教育者的自觉改革紧密联系。

其次，在技术赋能与学习范式革新层面。数字技术为赋能学生主体性提供了全新路径。李子成等（2025） 提出，生成式 AI 技术能通过个性化学习路径和资源共享提升学习效能，但也需警惕技术局限和伦理身份解构等问题，寻求技术与人的主体性平衡。在实践层面，技术赋能正推动教学变革，如通过构建 VR 课程思政资源库，让学生在沉浸体验中实现价值观的自主内化（吴莹雪，2024）。

最后，在思政教育与价值引领融合层面。学生主体性发展内含价值塑造的维度。研究强调需将思政教育深度融入专业实践。例如，陈敏（2025）

提出构建“三师”（思政教师、专业教师、企业导师）协同育人机制；徐小曼（2025）探索运用 VR、区块链等技术搭建“大思政课”元宇宙平台，实现沉浸式教育。这些尝试旨在在真实的职业情境中，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和职业道德，实现“立德”与“强技”的统一。

1.3 促进高职学生主体性发展的实践路径研究

在理论明晰的基础上，学者们进一步探索了促进学生主体性发展的具体实践路径，主要集中在课程、教学与评价三个关键环节的系统性重构。

课程体系重构是基础。研究主张打破学科界限，构建对接产业的动态课程体系。谢志远（2016）提出了“产学研创”一体化的培养模式，强调以学生为主体、需求为导向。蔡勇等（2025）针对软件工程专业，提出构建“12345”政产学研用融合创新人才培养体系，以解决人才培养与市场脱节的问题。陈金武等（2023）在新工科背景下，提出通过构筑交叉型课程体系和搭建产学研平台来完善人才培养模式。

教学模式创新是关键。核心是创设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场域，推行项目式、案例式教学。刘永生等（2022）提出构建五位一体的融合创新创业教育体系，通过改革教育评价体系来提高学生创新实践能力。沈红伟等（2022）以商务英语专业为例，探索了打造政、产、学、研、用五方命运共同体的“双创”育人模式。

评价机制改革是导向。为全面反映学生发展，需建立多元化、过程性评价体系。研究倡导利用大数据建立学生成长数字档案，实施动态评价；或构建量化评价模型，对学生的能力成果进行多维度精准画像（吴莹雪，2024）。其根本目的是将评价从单一的知识考核，转向对创新实践、职业素养等综合能力的关注。

综上所述，国内关于“政产学研用融合育人高职学生主体性发展”的研究，已形成从宏观机制建构到微观育人实践、从外部资源整合到内在意识唤醒的较为系统的论述。现有研究清晰地指出了“融合”是载体，“育人”是根本，“学生主体性发展”是核心目标这一逻辑主线。未来研究需进一步关注在深度融合的复杂系统中，如何通过更精细化的制度设计、更智能化的技术支撑和更人性化的文化浸润，持续激发并保障每一位高职学生的自主性、创造性与责任感，从而为实现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与实践指南。

2.融合育人实践中主体性发展的现实挑战

2.1 主体意识觉醒挑战

当前研究在探讨教育主体与产业创新融合时，虽强调了学生主体意识的觉醒，但对于如何有效激发和培养这一意识，仍存在诸多挑战。一方面，技术赋能和教育改革虽为提升学习效能和理想信念提供了途径，但技术局限、主体意识缺失和伦理身份解构等问题制约了其效果。另一方面，教师角色定位、思政教育以及校企合作等多维策略的实施，尚未形成系统性的理论框架和实践路径。此外，学生主体性发展受到“平庸之恶”的影响，教师反思教学惯性、破除教学壁垒、纾解教学焦虑等方面仍需深入探讨。

2.2 资源聚集难题待解

在“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过程中，资源聚集难题成为制约创新发展的关键因素。尽管已有研究提出通过战略认同、利益回报、流动自由和平台共享等路径解决资源聚集难题，但实际操作中，如何有效整合各方资源，形成协同创新合力，仍面临诸多挑战。此外，资源聚集过程中，如何平衡各方利益，避免资源过度集中或分配不均，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2.3 人才培养模式需优化

当前研究在人才培养模式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有优化空间。一方面，应用型高校专业人才培养对接产业需求不足，学生创新实践能力欠缺，导致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脱节。另一方面，地方高校新型智库在参与区域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产业政策有效性提升、企业转型升级精准性增强等方面仍有待提高。此外，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背景下，如何构建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人才培养体系，培养具备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3.范式转型与路径创新

研究范式正由单一的教育主体研究向多元融合的产业创新融合转变，从传统的教育主体觉醒问题拓展至技术赋能、教师角色、思政教育等维度。技术演进推动着教育领域由传统教学向生成式 AI 个性化学习的转变，方法创新从“产学研”融合向“政产学研用”多元要素整合发展，理论突破则从意识主体性觉醒向伦理主体性平衡迈进。

其一，针对研究范式转型的挑战，未来研究可致力于构建教育主体意识激发与培养的系统性理论框架，以技术创新与教育改革为驱动，探索技术局限、伦理身份解构等问题下的学生主体性

发展路径，进而推动教育主体与产业创新融合的范式革新。

其二，针对资源聚集难题，未来研究应聚焦于资源整合与协同创新机制构建，通过战略认同、利益平衡和平台共享等多维策略，探索有效整合各方资源的路径，以促进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解决资源过度集中或分配不均的根本性问题。

其三，针对人才培养模式的优化需求，未来研究应着眼于构建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人才培养体系，深入探讨如何提升应用型高校专业人才培养对接产业需求的精准性，同时加强地方高校新型智库在产业政策制定与实施中的作用，以培养具备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推动人才培养模式的理论重构与实践创新。

4.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指出政产学研用融合育人的核心目标在于促进高职学生的主体性发展，当前实践面临学生意识觉醒受技术局限与教学惯性制约、多元主体协同存在资源聚集与利益协调难题、人才培养模式与产业需求脱节三大挑战。未来应通过构建“技术赋能-机制创新-体系重构”的系统路径：以智能技术创设个性化学习场域并防范伦理风险，以利益平衡与平台共享深化协同机制，以动态课程、项目教学与多元评价重塑培养模式，最终在深度融合中激发学生的自主性、创造力与责任感，为实现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与区域创新提供坚实支撑。

参考文献：

[1]陈小鸿 & DAI Xiaoyun.(2025).建设面向未来的地面高速交通系统.城市轨道交通研究,28(11),4+157-158.

[2]蔡勇 & 曾安平.(2025).软件工程专业“12345”政产学研用融合创新人才培养.计算机教育,(09),131-135. https://doi.org/10.16512/j.cnki.jsjjy.2025.09.021.

[3]李子成 & 赵壮.(2025).生成式AI赋能高校青年发展的效能、限度以及突破策略.新疆职业大学学报,33(02),40-45.

[4]边伟军,付雯雯 & 解文文.(2025).制造业创新联合体：结构、行为及创新机制——以高速列车研制为例.中国科技论坛,(06),128-139. https://doi.org/10.13580/j.cnki.fstc.2025.06.007.

[5]苏航.(2025).“政产学研”深度融合下企业有组织创新效能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黑龙江大学).硕士 https://doi.org/10.27123/d.cnki.ghlju.2025.000740.

[6]张艺,陈凯华 & 周志勇.(2024).后发国家产业核心技术追赶的产学研合作创新机制——基于中国高铁产业的案例分析.管理世界,40(11),20-48. https://doi.org/10.19744/j.cnki.11-1235/f.2024.0118.

[7]陈耀 & 杨尧均.(2024).面向“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地方高校新型智库建设模式探析.智库理论与实践,9(06),122-129. https://doi.org/10.19318/j.cnki.issn.2096-1634.2024.06.13.

[8]杨忠华,周勃,宁宝宽,鲁丽华,兰信颖,吕洁... & 孙成才.(2024).面向新能源产业的专业研究生研创能力培养实践探索——基于“政产学研用”融合驱动.高教学刊,10(23),19-22. https://doi.org/10.19980/j.CN23-1593/G4.2024.23.004.

[9]方志坚,程玉,沈涛 & 张凤伟.(2024).政产学研用融合新篇章：“四位一体”合作模式的创新实践.今日科技,(07),66-68.

[10]苏玉欢.(2024).建始县油菜产业政产学研融合发展的模式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农业大学).硕士 https://doi.org/10.27158/d.cnki.ghznu.2024.000477.

[11]唐敏.(2024).徐州市“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现状、困境及发展对策研究.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37(10),60-62.

[12]吴莹雪.(2024).产教融合背景下高职院校“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路径的研究——以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为例.(eds.)“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教育教学发展论坛优秀论文集(pp.124-127).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13]武晓东.(2024).着力推动“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奋斗,(05),54-56. https://doi.org/10.16634/j.cnki.cn23-1001/d.2024.05.016.

[14]周烨.(2024).促进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助力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盛隆电气·第四届盛博会在北京举行.中国科技产业,(02),26-27. https://doi.org/10.16277/j.cnki.cn11-2502/n.2024.02.015.

[15]翟万江.(2023).“政产学研用”融合融通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重庆邮电大学董事会 2023 年年会暨“大数据智能化引领高质量发展”论坛召开.

中国科技产业,(11),5-6. https://doi.org/10.16277/j.cnki.cn11-2502/n.2023.11.001.

[16]本刊讯.(2023).加强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书写哈密瓜产业发展新篇.中国科技产业,(08),76. https://doi.org/10.16277/j.cnki.cn11-2502/n.2023.08.014.

[17]徐高珍.(2023).融合点式后备模式的 CTCS-4 级新型列控系统研究.铁路通信信号工程技术,20(07),10-15+23.

[18]陈艳君,张振 & 韩冬越.(2023).“政产学研用”“三共三同”育人模式的探索——以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应用化工技术专业为例.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7(04),21-26.

[19]王滋 & 张树满.(2023).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如何系统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中国科技论坛,(06),75-85+107. https://doi.org/10.13580/j.cnki.fstc.2023.06.012.

[20]陈金武,齐璐璐,孙娴 & 徐忠东.(2023).新工科背景下生物技术专业“政产学研用”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探索.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0(02),75-77.

[21]上海市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2023).以特色办赛模式推进“政产学研用”融合发展.中国研究生,(03),18-19.

[22]唐军 & 蓝志威.(2022).融合“政产学研用金”各类要素打造战略产业创新联合体.广东经济,(12),6-11.

[23]葛翠翠.(2022).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冲突识别与融合机制研究.科技创业月刊,35(10),88-91.

[24]刘永生,惠记庄 & 陈一馨.(2022).新工科背景下智能制造专业政产学研用融合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探索.高教论坛,(09),26-29.

[25]沈红伟 & 姜海霞.(2022).基于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商务英语专业“双创”育人模式研究.长春大学学报,32(06),32-35.

[26]焦会银.(2021).教师对学生主体意识觉醒的影响及其实现——基于教师“平庸之恶”的反思.教育研究与实验,(06),42-48.

[27]孔艳丽,杨宗霄,姚霞,陈敬云 & 胡鑫铭.(2021).刍议“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以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为例.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下旬刊),(10),155-157.

[28]陈小兰,罗筑华 & 刘永.(2021).建构产教融合评价体系:要素、问题与策略.科技风,(22),151-152+164. https://doi.org/10.19392/j.cnki.1671-7341.202122067.

[29]张娜.(2021).“纺织之光”2019 年度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纺织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巡礼（四）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创新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新昌模式改革.纺织导报,(02),93. https://doi.org/10.16481/j.cnki.ctl.2021.02.023.

[30]贺山明,廖春发,梁勇,汪金良,佟志芳 & 邓庚凤.(2020).产学研协同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工程技术创新能力的实践探索.高教学刊,(36),47-50. https://doi.org/10.19980/j.cn23-1593/g4.2020.36.011.

[31]刘辉,代学武,崔东亮,俞胜平,李宝旭 & 李建明.(2021).基于参数自适应蚁群算法的高速列车行车调度优化.控制与决策,36(07),1581-1591. https://doi.org/10.13195/j.kzyjc.2020.0992.

[32]陈冠松.(2020).促进四川省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策略探讨.决策咨询,(05),1-4.

[33]曲秀丽.(2020).思政课中学生主体性研究——基于 PAD 课堂模式.黑河学刊,(05),76-79. https://doi.org/10.14054/j.cnki.cn23-1120/c.2020.05.024.

[34]卢春房 & 穆文奇.(2020).高铁工程质量管理系统内涵与总体架构.中国铁路,(07),15-20. https://doi.org/10.19549/j.issn.1001-683x.2020.07.015.

[35]祁善军,荣智林,邹档兵 & 孙亚运.(2020).400 km/h 多流制高速动车组牵引系统研制.机车电传动,(02),7-11+22. https://doi.org/10.13890/j.issn.1000-128x.2020.02.002.

[36]杨阳,王穗东 & 郁秋亚.(2020).政产学研用融合创新与高校创新能力提升的路径突破——基于苏州纳米科技协同创新中心的案例研究.中国高校科技,(Z1),96-99. https://doi.org/10.16209/j.cnki.cust.2020.z1.024.

[37](2019).政产学研用有机融合,共同缔造美丽城市——记华东地区城市管理学科建设研讨会暨中国城市与社会治理创新高端论坛.财经论丛,(10),113.

[38]本刊综合报道.(2019).政产学研用有机融合共同缔造美丽城市——华东地区城市管理学科建设研讨会暨中国城市与社会治理创新高端论坛圆满落幕.城市管理与科技,21(03),92. https://doi.org/10.16242/j.cnki.umst.2019.03.028.

[39]龙春阳.(2018).资源聚集:“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着力点.管理观察,(35),73-75.

[40]张家宇.(2018).基于教育供给侧改革的高职道桥专业“政产学研用”融合研究.职业技术,17(02),73-75. https://doi.org/10.19552/j.cnki.issn1672-0601.2018.02.024.

[41]张子麟,孙学文 & 宋蕊.(2017).自主学习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的应用.中学政治教学参考,(12),64-65.

[42]孟泉.(2016).从觉醒到行动——新生代工人自发工业行动的行为要素.中国工人,(04),14-19.

[43]陈潘 & 林楠.(2016).辅导员职业能力发展的主体意识觉醒——叙事研究的视角.广东青年职业学院学报,30(01),44-46.

[44]王超,李庆丰,王大勇 & 张爱林.(2015).协同创新:政产学研用融合模式的转型——基于北京工业大学的案例分析.现代教育管理,(09),51-53+88. https://doi.org/10.16697/j.cnki.xdjygl.2015.09.010.

[45]席成孝.(201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共产党民族主体性意识的觉醒.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31(03),6-12+40.

[46]黄俊杰.(2005).大学通识教育中的主体觉醒与群体意识:教学理念与实践.高教发展与评估,(03),4-11.

[47]赵修义.(2003).主体觉醒和个人权利意识的增长——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观念史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3),7-12+120. https://doi.org/10.16382/j.cnki.1000-5579.2003.03.002.

[48]张建云,郑玉香.(2003).论主体意识与主体性问题.社会科学辑刊,(01),41-44.

[49]冀党生.(1988).青年自主意识的觉醒.青年研究,(08),27-31.

新文科视域下基于非遗活态传承的《微纪录片工作坊》课程改革与实践

刘冬[1] 龙海鸣[1]

（1.东莞城市学院 广东 东莞 523000）

摘 要：在全球化与数字化深度融合的背景下，新文科建设对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融合创新、跨界实践的新要求。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面临传承断层与传播乏力等现实挑战。本文以东莞龙舟文化（如中堂“龙舟制作技艺”、万江“龙舟月”）为具体对象，依托广东省社科基地开放课题，探索了《微纪录片工作坊》课程的改革路径。通过构建“教学—科研—实践”三位一体的育人模型，将真实科研项目全面嵌入教学流程，实现了课程内容从虚拟选题到真实攻坚、教学目标从技能传授到价值引领的系统性重构。课程以项目化方式组织实施，涵盖文献研究、田野采集、资源整合、创作传播与反思评估五个阶段，使学生深度参与非遗数字化记录、数据库建设与创新传播的全过程。实践表明，该模式不仅有效提升了学生的跨学科实践能力与文化使命感，产出了符合地方文化遗产数据库标准的数字化成果，更推动了非遗从静态保存向活态传承的范式转型，为新文科背景下应用型传媒人才培养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范式。

关键词：新文科；非遗活态传承；微纪录片工作坊；教学—科研—实践三位一体；课程改革；龙舟文化

基金项目：东莞城市学院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编号 2025yiig054)

DOI：doi.org/10.70693/jyxb.v1i4.143

Curriculum Reform and Practice of the "Micro-documentary Workshop" Based on the Living Heritage Safeguard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Liberal Arts.

Liu Dong[1], Long Haiming[1]

[1] New Media and Art College，Dongguan City University, Dongguan, China

Abstract:In the context of deepening global integration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Liberal Arts has introduced new requirements for talent cultivation models in higher education, emphasizing integrated innovation and cross-disciplinary practice. Simultaneously, the living heritage transmiss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faces practical challenges such as broken intergenerational succession and insufficient dissemination. This paper, focusing on Dongguan's Dragon Boat culture (e.g., the "Dragon Boat Making Technique" in Zhongtang Town and the "Dragon Boat Month" festival in Wanjiang District) and supported by an open research project from the Guangdong Provincial Social Science Base, explores the reform pathway for the Micro-documentary Workshop course. By constructing a trinity educational model of "teaching-research-practice," which fully embeds authentic research projects into the teaching process, a systematic restructuring has been achieved: shifting course content from virtual topics to tackling real-world challenges, and transforming teaching objectives from skill impartation to value leadership. The course is implemented through a project-based approach, encompassing five stages: literature review, field collection, resource integration, creative dissemination, and reflective evaluation. This enables students to deeply engage in the entire process of digital

作者简介：刘冬(1994—)，男，硕士，研究方向为电影制作、媒体传播研究；
龙海鸣（1994—），男，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媒体传播。

通讯作者：刘冬

document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database construction, and innovative communication. Practice demonstrates that this model not only effectively enhances students' interdisciplinary practical skills and cultural 使命感 (sense of mission), producing digital outcomes that meet the standards of local cultural heritage databases, but also promotes a paradigm shift i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from static preservation to dynamic living transmission. It provides a replicable practical framework for cultivating application-oriented media talents within the New Liberal Arts context.

Keywords:New Liberal Arts; Living Heritage Safeguarding; Micro-documentary Workshop; Teaching-Research-Practice Trinity; Curriculum Reform; Dragon Boat Culture

一、引言

在全球化与数字化浪潮交织的当下，高等教育的使命与形态正经历深刻重塑。新文科建设作为一项引领性的战略举措，其核心在于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突破传统学科壁垒，与前沿技术交叉融合，以培养能够应对未来复杂挑战的复合型创新人才。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将新文科的理念转化为切实可行的教学实践，成为高校教学改革的关键议题。与此同时，作为民族文化血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保护与传承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许多珍贵的非遗项目因传承人老龄化、年轻一代认同感弱化而陷入“活态”传承危机；另一方面，数字化技术虽为非遗保护提供了新工具，但如何超越简单的技术应用，实现文化内涵的深度挖掘与创新传播，仍是一大难题。这两大时代命题，在应用型传媒人才的培养场域中交汇，呼唤一种能够深度融合科研前沿、教学实践与社会需求的新范式。

传统的实践类课程，如《微纪录片工作坊》，往往存在选题虚拟化、实践环节碎片化、成果与真实社会需求脱节等局限。学生虽能掌握一定的制作技能，却难以在解决真实、复杂问题的过程中，实现知识整合能力、创新思维与文化使命感的系统性提升。因此，探索一种能够有效连接课堂内外、贯通理论与实践的教学模式，显得尤为迫切。本项目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它以东莞龙舟文化（如中堂镇国家级非遗“龙舟制作技艺”、万江“龙舟月”等）这一极具地方特色与文化底蕴的活态非遗为具体对象，将广东省社科基地的开放课题《东莞龙舟文化体系数字化记录与传播创新研究》直接引入课堂，尝试构建一个“教学-科研-实践”三位一体的课程模型。

本文旨在系统阐述这一课程改革的理念、路径与成效。文章首先将剖析新文科的内涵及其对课程改革的指导意义，并详细论证“教学-科研-实践”三位一体模型的理论基础与构建逻辑。继而，将重点聚焦于基于“龙舟文化”项目的《微纪录片工作坊》课程改革，从教学目标的重构、教学内容与流程的项目化设计等方面，具体展示其改革实施路径。最后，文章将总结课程改革的创新特色与初步成效，并反思其面临的挑战，展望其在更广范围非遗数字化保护与数字人文人才培养方面的推广潜力与未来图景，以期为新文科背景下的实践教学改革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个案。

二、理论基础

（一）新文科的内涵

新文科的深层逻辑在于对技术工具理性的超越与人文价值的复归。在人工智能浪潮的冲击下，教育面临着知识被解构为可计算单元、学习被简化为参数优化的异化风险。新文科建设的核心要义，正是要在此数智洪流中充当“防波堤”与“导航仪”，守护教育中不可量化的“灵动”部分，如批判性思维、价值判断与创造性顿悟[i]。它追求的不是技术炫技，而是“数智理性与人文灵性的共生”，其最终目的是在算法优化与灵魂唤醒之间找到动态平衡，实现技术解蔽尽头的人文觉醒，培养具有中华文明韧性的主体性。

新文科打破了传统僵化的学科壁垒，强调深度交融。这种融合是“知识型”的深刻变革，使得实地田野调查与大数据画像相互校准，文献研究与语义网络分析相辅相成[ii]。其目标是为满足国家战略对拔尖创新人才的需求， 培养能够应对复杂现实问题的复合型人才[iii]。这意味着新文科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是能力、情感和价值的塑造。它坚守“以学生为主体”的理念，注重人文关怀，通过深度学习与全面发展，引导学生具备主动探索、融会贯通的能力，最终实现从“认知外包”到“智慧生长”的转变，完成对“整全人”的观

照[iv]。

（二）“教学-科研-实践”三位一体课程模型的构建

传统的实践课程往往采用模拟或虚拟选题，容易与真实社会需求脱节。本模型的首要创新在于将广东省社科基地的开放课题《东莞龙舟文化体系数字化记录与传播创新研究》直接引入课堂，作为《微纪录片工作坊》贯穿整个学期的核心项目。这使得课程内容从“解题”转变为“攻坚”，学生面对的不再是纸上谈兵的理论假设，而是非遗传承中真实存在的“传承人老龄化”、“记录标准不一”、“传播效果不彰”等紧迫问题。

课程教学为科研项目提供了稳定的人才梯队和系统化的训练平台[v]。每届选修《微纪录片工作坊》的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按照课题研究计划（文献研究→田野调查→素材采集→内容制作→传播展映）分阶段开展工作。课堂讲授的理论知识（如非遗保护理论、纪录片叙事学、数字人文工具应用）立即在项目中得到应用和验证。申报书中提及的“智能媒体创新班”学生，正是在课程中掌握了前沿技术，并将其应用于中堂龙舟制作技艺的数字化记录中，实现了从学习者到研究实践者的角色转变。

以《微纪录片工作坊》课程为载体构建的“教学-科研-实践”三位一体模型，成功地将一个高水平的科研项目转化为一场深刻的教学改革与育人实践。它打破了高校内部以及高校与社会之间的壁垒，使学生在解决真实世界问题的过程中，实现了知识、能力、价值观的同步成长，为新文科背景下应用型人才培养提供了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有效范式。

三、基于“龙舟文化”项目的《微纪录片工作坊》课程改革实施路径

（一）教学目标的重构

本课程改革的核心实施路径在于将真实的科研课题——“东莞龙舟文化数字化记录与传播创新研究”——完整嵌入《微纪录片工作坊》的教学全过程，实现“课题即课程，创作即研究”。具体而言，课程严格遵循科研项目的内在逻辑，设计了环环相扣的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文献研究与方案设计”，引导学生从文化保护、影像叙事等角度进行理论准备，并撰写兼具学术规范与创作美感的拍摄脚本与访谈提纲。第二阶段进入“深度访谈与田野采集”，学生不再是旁观者，而是作为项目组成员深入中堂龙舟制作工坊、万江龙舟月现场，运用专业设备，在教师的指导下系统采集视频、音频、图片等第一手素材。这一过程不仅是技术实践，更是深刻的田野调查，要求学生与传承人、龙舟队员建立信任，理解文化背后的情感与社区逻辑。第三阶段是“资源统筹与内容创作”，学生将田野采集的海量素材进行标准化整理、归档，并导入“岭南文化数字化研究中心”的数据库，在此基础上，将“原材料”转化为系列微纪录片与短视频，完成从文化记录者到文化转译者的角色跃升。最终阶段是 “成果传播与展映”，通过构建线上传播矩阵与组织线下社区、校园展映，使课程成果接受真实社会的检验，实现文化价值的社会化传播。这条路径确保了学生在解决真实问题的完整链条中，同步完成知识建构、技能训练与价值塑造。

基于上述实践路径，课程的教学目标实现了根本性的重构与升华。它超越了传统影视课程以掌握拍摄、剪辑等技术性目标为主的局限，构建了“价值引领-能力复合-知识融合”的三维目标体系。在价值层面，课程旨在培养学生对本土文化的深厚情感与传承使命。通过亲身探访，如学生在中堂龙舟工坊见证霍沃培先生“一斧一凿，以‘年’甚至‘代’为单位的匠心”，其教学目标直指激发学生的文化自觉与责任感，使其认识到媒体的使命在于记录与传承那些能够“流传”的价值。在能力层面，目标从单一技能操作转向复合型创新能力培养，强调学生在项目驱动下，整合运用跨学科知识（文化研究、影视艺术、数字技术）、开展团队协作、进行有效沟通并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在知识层面，教学目标促使学生将传播学理论、非遗保护知识、纪录片叙事方法等融会贯通，形成对“龙舟文化”这一特定对象的系统性、结构化理解，从而实现知识的深度融合与创造性应用。

此次课程改革的成效是显著的，它成功地将一个地方性文化保护项目转化为一个高效的育人平台。课程评价体系也随之重构，不再局限于作品的艺术性，而是综合考察其学术规范性 （如口述史访谈的伦理、元数据标注的准确性）、文化阐释的深度以及社会传播的实际效果。最终，学生产出的不仅是课程作业，更是能够服务于地方文化数据库建设的标准化数字资源，以及能够触达公众、引发情感共鸣的文化传播产品。这种“教学-科研-实践”的深度融合，使《微纪录片工作坊》成为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培养具备家国情怀、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卓越传媒人才的一次成功

探索。

（二）教学内容与流程的项目化设计

本课程的教学内容设计彻底打破了按知识模块线性组织的传统模式，转而以科研项目“东莞龙舟文化数字化记录与传播创新研究”的全生命周期为依据，进行模块化重构与嵌入。课程内容被精准地对接到项目实施的五个核心阶段：“文献研究与方案设计”、“田野访谈与素材采集”、“资源统筹与内容制作”、“成果传播与展映”以及“研究总结与报告撰写”。在每一阶段，理论知识的传授与项目任务的推进紧密耦合。例如，在项目启动的“文献研究”阶段，教学内容聚焦于非遗保护理论、龙舟文化学术史梳理以及纪录片伦理规范，指导学生撰写兼具学术深度与创作可行性的项目方案、拍摄脚本及访谈提纲。当项目进入“田野采集”阶段，教学内容则迅速转向实地调查方法、专业设备操作、突发情况应对以及与文化持有者的沟通技巧，确保学生能高质量完成申报书中设定的“不少于 400 分钟高清影像、400 张图片、3 小时口述史音频”的标准化采集任务。这种设计使得每一堂课、每一次作业都直接服务于一个明确的科研子目标，教学内容因项目的真实需求而充满张力与时效性。

在此基础上，教学流程的设计强调“闭环式”与“沉浸式”，旨在模拟专业媒体团队或文化研究机构的完整工作流。流程始于对真实问题的界定，止于成果的社会化传播与反思，形成一个从理论到实践再反哺理论的闭环。学生不再是孤立地学习单项技能，而是在一个完整的项目链条中扮演不同角色，体验从前期策划、中期执行到后期制作与推广的全过程。例如，在“资源统筹与内容制作”阶段，学生需要将田野采集的原始素材进行标准化整理、元数据标注并导入“岭南文化数字化研究中心”的数据库，这一流程不仅训练了其信息管理能力，更让其深刻理解个体工作如何贡献于一个更大的系统性文化工程。最终，通过“成果传播与展映”，学生的课程作品（微纪录片、短视频）需接受真实受众的检验，其传播效果（如申报书设定的“线上传播量突破 10 万+”）成为衡量学习成效的关键指标之一。这种项目化的流程设计，有效解决了传统实践课程中常见的“选题虚拟化、环节碎片化、成果作业化”的弊病，使学生在一个高仿真、强约束的项目环境中，系统化地锻造其综合职业能力。

四、课程改革的创新特色与初步成效

（一）主要创新

本改革的根本创新点在于彻底摒弃了模拟或虚拟课题，将广东省社科基地开放课题——《东莞龙舟文化体系数字化记录与传播创新研究》这一真实、高规格的科研项目作为课程的唯一核心载体。这使得课程的内核发生了质的飞跃：学生的学习过程等同于参与前沿科研攻关的过程，其课程作业成果（如微纪录片、数字化档案）直接转化为服务于地方文化遗产保护的战略性资源。课程成果的价值从获取学分，跃升为产出可入库（“东莞文化遗产基础数据库”）、可展映（线上线下数字展览）、可传播（目标线上传播量 10 万+）的公共文化产品，实现了从“作业”到“作品”再到“公共产品”的价值三级跳。

课程设计并非简单地将项目作为案例，而是将科研项目的完整生命周期（文献研究→田野调查→资源采集→内容创作→传播应用→总结反思）深度嵌入教学流程，构建了一个“学术研究引领、教学实践支撑、社会服务产出”的闭环培养链条。学生在此链条中，不仅学习技能，更完整地体验并实践了一套解决复杂社会文化问题的科学方法论。例如，在“田野访谈与素材采集”阶段，学生必须严格遵循学术伦理规范（如传承人“知情同意”、口述史采集标准），其工作成果需满足构建标准化专题数据库的科研要求，这种以科研规范倒逼教学严谨性的模式，有效培养了学生的学术素养和职业精神。

课程创新性地依托课题组成员构成，组建了跨学科的“导师组”协同指导机制。该机制融合了项目负责人与成员的学术研究优势、网络与新媒体专业教师的技术实践优势，以及来自东莞广播电视台的行业专家的市场传播优势。这种“学术+技术+行业”的三维赋能模式，确保学生在项目执行中能同时获得理论深度、技术实现能力与市场洞察力的综合指导，避免了培养过程中的片面性，为学生成为复合型创新人才提供了坚实支撑。

（二）文化传承

本项目的文化传承价值，核心在于其实现了从对文化遗产的静态、博物馆式保存到动态、活态化传承的范式革新。东莞龙舟文化，尤其是中堂镇的国家级非遗“龙舟制作技艺”与万江“龙舟月”等民俗，其精髓不仅在于可见的龙舟实体与竞渡场面，更深植于其背后一套完整的知识体系、工

艺逻辑、社区组织方式与精神价值。然而，这一活态传承正面临严峻挑战，如“传承人老龄化（平均年龄 63 岁）”以及“年轻群体参与度不足”。传统的记录方式难以完整保存其动态的、依赖于实践与口传心授的文化基因。本项目通过系统性的数字化记录，旨在构建一个可解析、可交互的“数字孪生”体系，这不仅是对龙舟外在形态的精准留存，更是对其内在技艺流程、仪式规程、社群记忆乃至情感认同的全要素捕捉，从而为应对非遗的“记忆危机”提供了一份前瞻性的、可永续利用的数字资产，为后世的文化研究与实践传承奠定了坚实的资源基础。

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本项目探索了一条将文化遗产从节庆化、仪式化的展示转化为可日常接触、可参与创造的社会化资源的活化路径。文化传承的关键在于“传”与“承”的闭环，其核心是人的连接，特别是与年轻一代的连接。本项目将《微纪录片工作坊》课程与科研实践深度融合，使学生不再是文化的旁观者，而是成为积极的记录者、阐释者与传播者。通过带领学生深入中堂龙舟工坊，亲身感受霍沃培先生“一斧一凿，以‘年’甚至‘代’为单位的匠心”，并记录“元心龙舟队”普通成员因热爱而集结的社区活力，课程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文化认同与传承使命感。最终产出的微纪录片、短视频及数字展览，运用 Z 世代熟悉的语言和媒介形式进行传播，目标直指“线上传播量突破 10 万+”，这实质上是将龙舟文化符号进行年轻化解码，塑造出植根于社区土壤的“平民英雄”形象，让年轻一代觉得“龙舟就是我们身边的、很酷的一件事”，从而自发地成为文化的守护者与传播者，真正实现文化血脉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创造性延续。

五、反思与展望

（一）面临的挑战

尽管本项目在非遗数字化保护与活态传承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但其推进过程仍面临多重挑战，主要体现在技术应用、资源整合与伦理边界三个核心维度。在技术应用层面，如何超越工具理性的窠臼，避免先进技术流于形式的炫技，而真正服务于龙舟文化深层叙事与情感共鸣的精准转译，是首要难题；这要求团队在“技艺解码”与“文化释义”之间找到平衡点，防止沉浸式体验消解仪式背后的象征意义。在资源整合层面，挑战源于东莞龙舟文化本身的“镇街分异”特性与数字化标准的统一需求之间的张力，中堂、万江、沙田等地龙舟形态、习俗各异，需构建一套既能容纳地域特色又符合“东莞文化遗产基础数据库”统一标准的元数据框架，同时解决多源异构数据（如散存于 12 个独立数据库的龙舟资源）的互操作性难题。在伦理与实践层面，挑战尤为复杂：田野调查需在传承人知情同意与家族秘史保护间取得平衡，素材采集需在嘈杂动态的龙舟赛事中确保音画质量与文化场景的真实性，而最终面向 Z 世代的传播，更需破解传统符号系统与年轻群体审美及认知习惯之间的代际隔阂，确保活化不至沦为浅薄化的消解。这些挑战共同构成了项目从理论蓝图迈向高质量实践所需突破的关键瓶颈。

（二）未来展望

本项目的成功实施，为“教学-科研-实践”三位一体模式在更广阔领域的应用提供了可复制的范本，其未来发展的核心方向在于从个案实践走向范式推广，从区域性文化保护升维至引领学科交叉创新的战略平台[vi]。展望未来，本项目所探索出的标准化数字资源构建方法、跨学科团队协作机制以及“以项目驱动教学”的育人模式，可系统性地迁移、应用于东莞乃至粤港澳大湾区的其他非遗项目（如莞香制作、千角灯彩扎等）的数字化保护工作中[vii]，从而快速构建起一个覆盖更广、类型丰富的“岭南文化数字资源体系”。此举将极大推动“东莞文化遗产基础数据库”的实质性建设，使其从蓝图转化为坚实的文化基础设施。更为深远的是，这一模式有望超越非遗保护的具体领域，为新文科背景下整个数字人文领域的教学与科研提供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论，激励更多学科将前沿科研问题转化为高端人才培养的生动场景，实现知识生产与人才培育的同频共振。

从更宏大的技术演进与文明互鉴视角看，本项目的未来蕴含着引领文化遗产数字化范式变革的潜力。随着生成式 AI、元宇宙等技术的持续突破，未来的工作将不再满足于构建静态的“数字档案”，而是致力于创建可交互、可演化、甚至具备一定认知能力的“文化认知系统”。例如，利用大语言模型技术，未来或可构建能与用户进行深度对话的“虚拟传承人”，动态讲解龙舟制作的技艺诀窍与文化象征；通过扩展现实（XR）技术，则可打造沉浸式、开放叙事的“龙舟文化元宇宙”，让全球用户都能身临其境地参与龙舟月的起龙、竞渡等仪式，从而将地方性知识转化为可全球共享的文化体验。最终，本项目旨在将东莞龙舟文化打造为一个开放的、国际化的数字人文研究“基

准案例”，通过与国际学术机构的合作，向世界展示中国在利用数字技术保护、传承与创新文化遗产方面的智慧与方案，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形成技术赋能人文研究、人文引领技术发展的新范式，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独特的文化数字力量。

参考文献：

[1] 冯丹娃 and 李丹宇, 新文科背景下学生课堂参与度评价研究——基于讨论式教学视频的分析. 教育学术月刊, 2024(08): p. 67-76.

[2] 许游 and 王宝玺, 大学新文科建设及教育发展路径. 江苏高教, 2025(11): p. 74-83.

[3] 项国雄,郑盼盼,刘然.人工智能时代复合型传媒人才培养[J].传媒,2025,(16):25-28.

[4] 王泽庆.人工智能赋能人文科学的康德式哲学三问——兼谈新文科复合型人才的培养[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75(06):140-148.

[5] 徐燕妮,富涵,蔡丽玲,等.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的大学课程教学改革——以《服装生产管理》课程为例[J/OL].服装设计师,1-8[2025-12-14].https://doi.org/10.20100/j.cnki.cn11-4548/ts.20251211.016.

[6] 吴超.数字时代下的文科实验室建设[J].天府新论,2025,(06):20-29+151.

[7] 马知遥,常国毅.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与新时代非遗保护的联结[J/OL].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14[2025-12-14].https://doi.org/10.19898/j.cnki.42-1704/C.20251203.05.

多模态大模型赋能高校思政教育的比较与路径

陈佳琪[1] 柯宇曦[2*]

（1.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7，2.武汉华夏理工学院，湖北 武汉 430223）

摘 要：多模态大模型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教学范式、提升育人实效提供了重要机遇。然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仍面临核心理论抽象难懂、教学互动深度不足以及价值引领路径单一等现实挑战。通过系统分析多模态大模型的特性与风险，研究深入探讨了多模态大模型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重构与过程再造两大维度的应用潜能，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涵盖价值、制度与素养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为多模态大模型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融合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多模态大模型；人工智能；高校思政教育；比较；路径

基金项目：2024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高等教育中应用的风险与伦理规范模型设计（24YJAZH206）；2024 年度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思想政治理论课），生成式人工智能助力思想政治教育提质增效路径的实证研究（24Z058）

DOI：doi.org/10.70693/jyxb.v1i4.144

A Comparative And Pathways Study On Multimodal Large Models Empower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Chen Jiaqi[1]，Ke Yuxi[2*]

[1] Philosophy Institute, Hube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Wuhan, China

[2] School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Wuhan Huaxi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China

Abstract:Multimodal large models present significant opportunities for innovating teaching paradigms and enhanc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PE)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However, IPE in universities continues to face practical challenges, such as the abstract and difficult nature of core theories, insufficient depth of instructional interaction, and limited approaches to value-oriented guidance. By systematically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otential risks of multimodal large model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ir application potential in two key dimensions of IPE: content reconstruction and process reengineering. On this basis, it proposes an educational ecosystem that integrates values,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and digital literacy, offering valuable insights for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multimodal large models into IPE practices in universities.

Keywords:Multimodal Large Model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Comparative; Pathways

作者简介：陈佳琪(1998—)，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柯宇曦(1999—)，男，博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人工智能、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研究。
通讯作者：柯宇曦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中明确提出：“促进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变革，建立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支持的教育评价和科学决策制度”，同时强调要“制定完善师生数字素养标准，深化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1]。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高速发展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带来了全新机遇。多模态大模型是一种能够综合处理、理解和生成文本、图像、音频、视频等多种不同类型数据的大规模预训练模型，其具备大规模训练、多模态内容理解、跨模态资源生成、多模态人机交互、关联与推理能力等关键技术特征[2]。多模态大模型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变革提供可能。思想政治教育正逐步突破传统的文本主导传播范式，向沉浸式、交互式、情感化的教育体验转型。然而，伦理规范滞后、师资适应能力不足以及课程体系与模型能力的契合度不高等现实问题仍未得到有效回应，如何科学、有效、可持续地将多模态大模型引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已成为当下重要挑战。

学术界已围绕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政教育的路径与机制展开多维探讨，聚焦其作用机制与潜在风险。研究肯定了技术在提升教育精准性[3]与教学沉浸感[4]等方面的应用潜能，但其介入亦引发了对伴生风险的系统反思。这些风险涵盖了重构教育结构可能导致的教育主体性遮蔽[5]，以及内容层面潜在的价值偏向与意识形态渗透等挑战[6]。为此，学界从技术、体系到宏观治理层面提出了应对策略，强调构建以“可控生成”为核心的技术规范机制，推进制度嵌入与育人体系的协同化构建[7]，并建立战略调节与系统评价并重的宏观治理体系[8]，以实现技术与教育的系统耦合。

图 1 多模态大模型赋能高校思想政治

现有研究充分肯定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价值，并围绕伦理治理与教学重构提出诸多策略，但大多缺乏对文本、图像、语音、视频等不同技术模态的细致区分与比较。鉴于各模态在信息组织、认知激励与价值渗透路径上存在显著异质性，直接影响技术与思政教育的深度适配与功能发挥，本文以多模态比较为切入口，剖析多模态大模型的技术特性与思政教育适配逻辑，探寻其差异化应用与协同融合路径，为构建人机协同、情理共融的智慧思政新生态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引。

一、多模态大模型赋能高校思政教育的内在逻辑

（一）多模态大模型的技术特征与教育意涵

多模态大模型的跨模态内容生成能力，实现了从信息检索到知识创新的功能跃迁。为动态化、情境化的教学设计开辟新路径。教育者借助该技术，将抽象的理论转化为动态的、可感知的多媒体形态，重塑知识传递方式。

多模态大模型在交互范式上也实现了重要进阶。模型具备在多轮对话中理解和记忆上下文语境的能力，能够支持更加自然、连贯和情境化的人机互动，为构建智能、敏捷、个性化的学习支持系统提供了技术可行性，为实现规模化教育背景下的个性化学习指引创造了条件。模型本质是通过底层的数据整合与处理能力理解知识，通过跨模态内容生成能力重塑知识的呈现方式，再通过情境化智能交互能力优化知识的传递与吸收过程，三者环环相扣、有机结合，指向教育在内容、方法与支持体系的革新，如图 1 所示。

（二）多模态大模型应用的风险与挑战

多模态大模型在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智能化水平、优化教学过程与推动课程改革等方面展现出巨大潜能，但其技术的复合性与表达的直接性也带来了一系列风险挑战。

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场景下最为核心的挑战之一。与单一文本模态相比，多模态表征能够将抽象的价值偏见与刻板印象具象化、实体化。文本中的偏见尚需通过阅读与解码方能被感知，而图像、视频或音频中的偏见则直接诉诸感官，以视觉符号或听觉模式的形式被高效传递。这意味着模型在训练数据中习得的关于特定人群、历史事件或社会文化的偏见，被固化为可感知的、看似客观的视听表象，极大地增强了其传播的隐蔽性与价值渗透的效力。

生成内容的“眼见为实”对于人的理性思辨的冲击是又一关键挑战。人们在阅读文本材料时会自然地进行分析和判断，然而多模态大模型生成的图像、视频和语音，画面逼真、情感饱满，能够直接激发用户的情感共鸣，形成对人的认知的直接冲击效应，信息的接受过程可能优先甚至取代理性的判断过程。这种通过感官体验来影响人的方式，对强调理性认同和价值辨析的思想政治教育构成了挑战。

随着深度伪造技术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所依赖的事实基础本身也受到了威胁。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建立在对历史和社会事实的准确理解之上。过去，图片、录音和视频因其难以伪造而通畅被认为是可靠的证据。但现在这些都可以被轻易生成。例如，技术上可以生成一段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先进人物报告会”视频，甚至伪造历史人物发表不符合其时代与身份的言论。当学生无法对内容真实性进行有效判断时，他们对历史和现实的认知就会产生混乱，教育者进行有效引导的权威性和可信度也会受到极大削弱。

二、多模态大模型赋能下的思政教学内容重构与呈现创新

（一） 核心概念的可视化与情境化演绎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中包含了大量高度凝练与抽象的核心概念，具有深刻内涵与复杂逻辑，对于大学生而言，容易形成较高的认知壁垒，从而影响其学习兴趣与理解深度。多模态大模型为突破这一教学困境提供了全新路径。

利用图像与视频生成模型，教育者能够将“四个自信”“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宏大而抽象的理论框架展现为生动的图解、动画或虚拟场景。视觉化的呈现方式能直接诉诸学生的直觉感知与形象思维，从而降低理解门槛。动态的视频演绎，则能将理论的形成过程、历史的演进脉络或制度的运行逻辑，以故事化的叙事方式呈现出来，增强了教学内容的吸引力与感染力，有助于学生在具体的情境中把握理论的现实意涵与实践价值。

然而，这种从抽象到具象的转译过程本身即是一种充满了解读与再创造的诠释行为，对于图像生成而言，其核心风险在于符号误导与意义窄化。当模型被要求为一个抽象概念生成一幅代表性图像时，它只能依据其训练数据中的高频关联，选择一组具象符号进行组合。这一过程可能导致符号的错配或异化的问题和意义的固化与窄化问题。

视频生成所带来的风险则集中表现为历史事实与社会现实的重构风险。模型为了生成一段逻辑连贯、情节流畅的视频，必然会对现实素材进行剪辑、拼接乃至虚构。在演绎某一历史进程或社会发展脉络时，模型可能会为了增强戏剧性而填补事实空白，或为了迎合某种叙事框架而选择性地呈现信息，从而模糊纪实与虚构的边界，学生可能在不经意间接受被篡改或简化的历史版本。这对高度依赖事实根基的思想政治教育而言，是一种根本性的挑战。

因此，多模态大模型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应用中，教师需要对模型生成的图像或视频中所蕴含的视觉符号、叙事逻辑和情感倾向进行价值

审核，确保其与教育目标和主流价值观保持一致。此外，教师必须对历史细节、理论阐释等进行核查，为学生提供必要的背景知识补充和批判性视角引导。跨模态大模型生成的可视化内容应作为开启深度对话、激发批判性思考的起点，引导学生实现对理论的思辨与内化[9]。

（二）理论知识的体系化与结构化建构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教学实践中面临的另一挑战是其理论知识在传统教学模式下常呈现为一种线性的、相对孤立的结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往往难以针对单个的知识点、事件或人物建立起有机的、网络化的联系。在此背景下，以强大的语言理解与逻辑分析能力为核心的文本大模型，为推动思政知识从线性排列走向网络化建构，提供了技术可能[10]。

文本大模型能够对海量、非结构化的文本数据进行深度的语义分析、关系抽取与结构化重组。通过这一能力，模型可以将思想政治教育涉及的各类文本材料，转化为动态的知识图谱，每一个理论概念、历史事件或人物不再是孤立的节点，而是被置于一个由复杂的逻辑关系、影响关系和演化关系构成的网络之中。这使知识的组织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学生得以直观地观察到理论的源流、流派的分野、概念间的传承与辩驳，从而实现对理论的深刻理解，从而引导学生超越对孤立知识点的机械记忆，转向对理论体系内在逻辑与历史脉络的深度探究。

然而，模型虽然能够高效地识别并连接知识节点，但它往往难以真正理解这些连接背后所蕴含的深刻历史背景、复杂社会动因与深层哲学意涵。它能够构建出不同思想家之间的影响网络，却无法阐释这种影响发生的具体历史情境与思想交锋的细节。这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局限，使其难以胜任思想政治教育所必需的、充满思想厚度与人文精神的阐释任务。

为了从根本上规避语料偏见，亟需推动构建面向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高质量、权威性的专用语料库，对模型进行针对性的训练与微调，确保其知识结构的准确性与价值导向的正确性。另一方面，必须确立教师与领域专家的核心引导地位。模型生成的知识图谱不应被视为最终成品，而应作为一种辅助教学与研究的“初稿”。教师需要在此基础上，进行专业的审核，为人机共同构建的知识网络注入必要的历史情境、理论深度与人文内涵，确保技术赋能最终服务于思想政治教育根本任务的完成[11]。

三、多模态大模型驱动下的思政教学过程创新与互动范式变革

（一）历史情境的“在场”与价值认同的“共情”

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引导大学生形成科学的价值认以及深厚的情感认同，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学生对特定历史情境的深度理解与情感共鸣。传统的以文本为中心的教学范式，在知识灌输方面具有优势，但在营造历史的“在场感”和激发学生的共情体验上，则往往力有不逮。历史被简化为书本上的文字与图片时，其所蕴含的复杂情感、艰难抉择与精神力量则难免褪色。而跨模态大模型则为重塑教学过程、变革互动范式提供了关键的突破口，其核心在于再造一个能够让学生“身临其境”的教学场域。

沉浸式教学的实现，依赖于多模态技术对人类感知的协同调用。多模态大模型通过构建一个多感官、高保真的信息环境，来模拟真实的历史情境与社会场景。在这一环境中，高清晰度的动态视频负责构建视觉叙事的骨架，当其与虚拟现实等技术结合时，学生便从“观看者”，转变为“在场者”。多模态协同所营造的“在场感”，能够最大限度缩短学生与历史之间的距离，使抽象的历史知识转化为鲜活、可感的个人体验。

技术构建的“在场感”，是激发学生价值“共情”的有效催化剂。它推动学生在感同身受的体验中，自主地发现价值、理解价值并最终产生情感上的认同。沉浸式教学的强大情感感染力，也伴随着多维伦理风险。创造“共情”与实施“情感操纵”之间仅有一线之隔，一个被算法精心编排、过度渲染的沉浸式体验，可能会压倒学生的理性判断能力，从而接受某种特定的、甚至是偏颇的价值叙事。此外，过度依赖完美而流畅的虚拟情境，也可能导致学生对真实历史的复杂性、模糊性与残酷性产生认知偏差，在虚拟与现实之间产生价值迷失。

因此，在沉浸式教学的实践中，教师必须成为情境设计师与情感引导者。教师需要以明确的育人目标为导向，对教学内容进行严格筛选，确保技术所营造的“在场”是为“共情”服务的。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适时介入，通过互动引导学生进行理性的反思与批判性的思考。这种“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教学设计，旨在确保技术所带来的情感冲击，最终能够沉淀为学生稳固、理性的价值认同，从而真正实现育人的根本目标[12]。

（二）智能对话赋能下的思辨能力与批判性思维培养

思想政治教育的另一重要目标是培养学生运用科学立场、观点和方法独立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教学过程必须超越单向的知识灌输，为学生提供充分的思辨能力培养。在传统的班级授课制下，受限于教学时间与师生比例，教师往往难以对每位学生进行持续的、个性化的启发。而以文本和语音模型为核心的智能对话技术，为系统性地开展探究式学习、规模化地培养学生的思辨与批判性思维能力，开辟了全新的实现路径。

智能对话模型的核心优势在于其能够模拟人类复杂的语言交互逻辑，扮演一个不知疲倦、极具耐心且知识渊博的老师。它能够根据预设的教学目标不断提出追问、质疑学生的前提假设、要求学生对自己的观点进行澄清与辩护，从而引导学生对一个问题进行多角度、深层次的思考。此外，模型还可以模拟特定的角色或立场，与学生进行虚拟的辩论。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为了说服对手，必须主动搜集论据、构建严谨的论证链条并预判对方的反驳。为学生提供了一个低风险的犯错空间，使其能够在不断的试错与修正中，锤炼自己的逻辑思维与论辩能力。

智能对话技术在赋能探究式学习的同时，其内在的风险也需审慎对待。当一个能够提供清晰答案、构建完整逻辑的强大工具唾手可得时，学生可能会放弃独立思考过程，对模型产生依赖。不仅会削弱其自主探究的意愿，更可能使其将模型基于概率统计生成的观点，误认为是最优解，从而压抑自身思考，长期与此类系统互动，也可能在潜移默化中固化学生的思维框架，使其难以跳出既有范式进行真正的创新性思考。

为应对这一问题，教师应引导学生在与模型互动的过程中，展现出自己的分析、综合与批判能力，教学评价的重心也应随之转变，从关注学生提交的答案是否正确，转向评估其在探究中所展现出的思维深度、逻辑严谨性以及视角独创性。如此，多模态大模型才能真正激发学生的深度思考[13]。

四、人机协同的育人生态构建

（一）以主流价值观驾驭算法强化话语引领力

高校思政教育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阵地，必须从价值向度出发，以主流价值观驾驭算法、以主流理念校正技术逻辑、以主流话语引领内容生成，推动技术应用与育人使命同向发力、同频共振、同质融合[14]。这不仅是保障思想政治教育安全性的根本要求，也是实现人工智能助力思政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首先，必须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算法设计和数据训练的价值根基，将价值理念前置嵌入算法逻辑中。在大模型训练与调优阶段，应构建以权威教材、主流文献、优秀案例为核心训练数据，过滤易引发意识形态风险和价值偏移的外源数据，以数据源头的价值纯净性保障内容输出的正确性。第二，建立高校自主可控的思政教育专用数据库与大模型体系，改变对商业模型或外源算法的依赖局面，从底层数据、核心算法到应用接口全面强化高校在技术领域的话语主导权和安全掌控力，防止算法逻辑、生成机制与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脱节。第三，必须健全价值导向驱动下的大模型监管体系，构建价值筛选、算法监管、内容审核三步闭环治理链条，通过人工校核与技术监管并举，实现内容生成全链条的价值一致性和政治安全性[15]。

价值向度的治理与建设是多模态大模型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前提。唯有以主流价值观驾驭算法逻辑、以政治安全引导数据治理、以国家战略指导技术创新，方能构建人工智能服务思政教育的坚实价值底座，推动技术进步与教育本质的深度耦合与有机统一。

（二）提升师生数字素养筑牢人本防火墙

全面提升师生数字素养、构筑以人为本的教育防线，不仅是确保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善用而不滥用的现实需要，更是思想政治教育有序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

第一，将提升教师数字素养作为筑牢人本防火墙的首要任务，推动教师从知识传授者、课堂管理者向教育设计者、技术调度者、价值引导者转型。教师不仅要熟练掌握多模态大模型及其在教学场景中的应用逻辑，还需具备数据伦理意识、算法原理认知与技术边界判断能力，以防止技术逻辑取代育人逻辑、工具理性架空人文精神。同时，教师应成为学生技术素养培育与风险防范的第一责任人，在教学实践中培养学生正确使用人工智能的能力与习惯，将技术工具纳入价值引导和思想培育的过程之中。

第二，将学生数字素养的培养作为高校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系统化设计、多维度评价和全过程融入，着力提升学生的高阶思

维、批判性思维与风险识别能力。在多模态大模型高度赋能的学习环境中，学生易形成对生成内容的过度依赖、对智能反馈的无条件接受，从而弱化自身的思辨意识、创新意识与独立人格。因此，高校需持续引导学生理解人工智能的运行逻辑、技术风险与伦理底线，促使学生在“会用”的基础上实现“善用”，在“善用”的基础上实现“慎用”，最终形成敢质疑、会辨析、能超越的能力结构，有效抵御技术误导、算法偏见和虚假信息的侵蚀。

第三，构建多层次、系统化的师生数字素养提升机制，将技术素养与思政教育目标有机融合、统筹推进。在顶层设计上，高校应将人工智能素养与教育数字化能力纳入师生发展指标体系，制定分层分类培养方案；在过程建设上，应以专业培训、交流研讨、行动研究等形式推动教师数字能力与育人能力同步提升，以案例化教学、项目化研学、协作式探究等方式促进学生在真实问题情境中锤炼数字素养与思维能力；在效果保障上，应建立师生数字素养水平评估、育人效果跟踪与风险防控反馈联动机制，实现素养建设与治理效能的有机统一[16]。

结语

本文系统阐述了协同运用不同模态，以创新的方式重构教学内容、再造教学过程，并最终在价值、制度和素养层面构建多模态大模型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为高校运用多模态大模型赋能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有益参考。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两个方向深化：一是通过更为系统的实验对多模态大模型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应用的效果进行精准评估；二是推动多学科交叉协作，开发内嵌主流价值观、符合教学规律的专用教学工具，将理论研究转化为优质教学资源。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国务院.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 — 2035 年)[EB/OL]. [2025-01-19]. https://www.gov.cn/gongbao/2025/issue_11846/202502/content_7002799.html.

[2]黄志南,李根,郑娅峰.多模态大模型赋能科学教育高质量发展：潜能、挑战与应用探索[J].中国电化教育,2025,(06):60-69.

[3]李娜,戴钢书. ChatGPT 赋能高校精准思政的逻辑耦合、潜在风险与优化策略 [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24, 40 (02): 155-160.

[4]吴宏政，王子豪. 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下的视频教学变革：思政教育的重构逻辑与应对策略[J]. 电化教育研究, 2024, 45(2): 102-110.

[5]马也. ChatGPT 介入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风险审视及应对策略 [J]. 江苏高教, 2024, (06): 88-96.

[6]董翼. 从 ChatGPT 到 Sora: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应用的意识形态风险审视 [J].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37 (02): 85-93.

[7]郑秋伟,李前进,程晓东. 人工智能驱推思想政治教育变革：逻辑、趋向与策略 [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4, 44 (15): 31-36.

[8]冉金昊,张毅翔. AIGC 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特征、动力与进路 [J].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2024, 10 (02): 66-75.

[9]杨现民，卜浩德，李新. 推进多模态大模型的教育深度应用：价值赋能、场景构建与实施建议[J]. 中国教育学刊, 2025, (04): 9-14.

[10]王磊，杨旺，韩泉叶. 基于大模型构建开放教育多模态课程图谱及其价值逻辑研究[J]. 陕西开放大学学报, 2025, 27 (01): 18-23.

[11]王博岳，杜蓉，亓东林，李晓理. 多模态大模型在大学教学中的应用与挑战[J]. 现代职业教育, 2024, (36): 73-76.

[12]闫寒冰,杨淑婷,余淑珍,等.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沉浸式学习：机理、模式与应用[J].电化教育研究,2025,46(02):64-71.

[13]王世鹏,王非凡.生成式人工智能创造力层级性缺失及其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应用风险 [J].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4(03):103-110.

[14]周利生,刘芳华.DeepSeek 类生成式人工智能嵌入意识形态治理的价值、风险与应对[J].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56(02):40-49.

[15]陈林.人工智能嵌入大学内部治理的技术逻辑、潜在风险与优化策略[J].大学教育科学,2024,(03):22-30.

[16]陈涛,张欣,谭卓熙,等.迈向数字人文教育新时代：现状、转向与进路[J].图书馆论坛,1-1

WISVORA

WISVORA 出版社：专注于学术出版管理，WISVORA 出版社提供期刊编辑、论文出版和国际索引、期刊创办、期刊托管等服务，增强学术研究的全球传播和影响力。

www.wisvora.com

中国现代教育学报

Journal of Modern Educational Studies in China

《中国现代教育学报》是一份聚焦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服务教育强国战略的学术期刊。期刊以推动教育学理论发展与教育实践创新为核心使命，重点关注课程改革、教育政策、教学理论、教师发展教育技术等重大议题，致力于在新时代教育变革背景下，探索更加科学、高效、人本的教育路径。

印刷出版 ISSN 3080-3039
电子出版 ISSN 3080-3047

ISSN 3080-3039
9 773080 303002 01

学术期刊

权责声明
期刊所刊载的评论、意见、观点等均出自文章作者个人立场，不代表本出版社的观点或看法。对于文章任何部分及文内引用材料由任何个人、机构、及其财产所带来的任何损失及伤害，本出版社均不承担任何责任。我们郑重声明，本出版社的出版业务，不构成对任何产品商业性能的保证，也不表示本社业已承认本社出版物中所述内容适用于某特定用途。如有疑问，请寻找专业人士协助。